

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

胡適

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遊歷時的一篇講演的大意。

我最初在哈佛大學把這個見解提出同一些國際政

治學者討論，後來又用這個見解在紐約，華盛頓

，費城，綺色佳，芝加哥，司波城(Spokane)，

西雅圖，洛杉磯，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

各地講演過十多次，然後寫出來，題爲「太平洋

的新均勢」(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紐約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

airs)的本年一月號裏。我現在把這個見解用本

國文字重寫出來，稍稍有點增減改寫之處，請國

內的政治學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國的約瑟彌岱(Yosemite)去出席第

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大會，到會的有十一國(中，日，

英，美，蘇聯，法，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菲律賓，荷

蘭)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國聯派來的列席的代表三人。

會議的主要論題有五個：

(1)美國的新措施及其國際的涵義。

(2)日本的新進展及其國際的影響。

(3)蘇聯的新建設。

(4)中國的建設及其國際的涵義。

(5)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及和平解決的可能性。

前面四個是分論，最後一個是綜合的尋求解決的方案。當然大家都特別注意這最後一組的圓桌討論。

我在那第五個圓桌會議的四天討論終結之後，得着一

個結論：對於太平洋西部(遠東)的問題，大家議論雖多，

其實只有兩種看法，一是敗北主義，一是樂觀主義。認這

問題沒有和平解決的方法的，是敗北主義。認它還有和平

解決的可能的，是樂觀主義。我是生來樂觀的，所以始終

不肯輕易放棄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認，出

席那個會議的人和歐美一般的人，多數，也許是絕大的多

數，是抱着前一種敗北主義的。這也難怪他們；他們看了

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國本身的無力，看了國聯的失敗

，看了一切國際條約的撕成廢紙，當然不能不承認遠東問

題是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了。

敗北主義在各國的實際政策上的表現有多種主張。去年九月中，「新共和」週報(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論，主張美國政府命令美國商人和銀行全部退出中國，他們的損失可由美國政府從減縮海軍所省的經費裏撥款賠償。這是敗北主義的一種表現。恰相反的政策，如單方的擴張軍備而沒有一種積極的國際政策，也是一種敗北主義。至於那些主張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現勢的人，那些攻擊司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的人，那更是敗北主義者，不用說了。

我會細想，這種敗北主義都是由於觀察太平洋形勢的錯誤。他們心目中所謂「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只是指滿洲事變以來日本的強權獨霸東亞，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勢力，而一切舊有的國際組織構構對於那個獨霸東亞的強權竟無法可施。他們把「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解作了「日本的獨霸西太平洋」，當然他們要感覺和平解決的絕望了。因為在一國絕對獨霸的局勢之下，如果主持那個國家的人決心不顧一切國際的束縛，那麼，除非旁的國家能用有效的強力來和他爭霸，別無他種救濟方法。在那種獨霸形勢之下，旁的國家既不肯替人犧牲作戰，也只好忍氣吞聲準備把一切國際信義和條約尊嚴都暫時擱起，或

者希冀在那個獨霸的強人嘴裏分一杯殘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週報主張的）決心拋棄一切可以引起衝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種觀察是錯誤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獨霸」，這一句話已成爲過去的史實，而不適用於今日了。

日本的獨霸東亞，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三一）。「九一八」以後，因爲他濫用他的霸權，引出了一些新勢力，造成了一個新均勢的局面，那個獨霸的局勢就維持不住了。這是歷史的事實。

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的時候，俄國英國法國德國都用全力在歐洲作戰，無餘力顧到遠東，日俄戰後的東亞均勢局面完全打破了，遠東就完全轉到英國的同盟國日本的獨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戰期中，並且在那戰後的頭兩三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一——日本獨霸西太平洋，沒有第二國能和他爭霸。因爲如此，所以在大戰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國提出那二十一條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戰停止之後，在巴黎和會席上，戰勝的協約各國還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思，寧可得罪中國全國人民的情感，寧可拋棄威爾

避的民族自決原則，把山東的德國舊有權益完全送給日本。這七年是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取得的東亞獨霸地位，是爲日本東亞霸權的第一期。

但這種獨霸的形勢是使英美兩國最不安的。於是在大戰結束之後的第三年，因爲英領太平洋三個大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要求，因爲英美法的合作，才有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的召集。華府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巴黎和會留下的幾個大問題。華府會議的結果有四個方面是和太平洋形勢有直接關係的：（一）中日之間爭執最尖銳的山東問題總算得着了一個和平滿意的解決。（二）九國公約簽字的八國彼此相約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及行政權完整；相約給中國一個最充分的機會去自己發展維持一個健全強固的政府；並且相約不得利用中國國內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權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繼續了，改用四國公約來替代他。（四）採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爲英美日三國海軍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這些華府條約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約束來限制日本在遠東的霸權。其實日本的霸權，因爲接受了一種國際的約束，就等于得着了國際的承認，倒反更穩固了。山東問題的解決使得中日之間解除了一種最尖銳的衝

突；海軍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軍國對日本的猜忌；九國公約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關係的各國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裏，日本在遠東的威權絲毫不會減縮。就拿那「五，五，三」的海軍比率來說，事實上是英美海軍的減縮，而日本獨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軍勢力還是無敵的。所以華府各種條約，從遠見的政治家看來，不但沒有減低日本的霸權，倒反給日本的霸權加上一層國際條約的保障。所以在華府會議之後的十年（一九二一——一九三一），是日本在遠東的霸權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二期。

我這種說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種流辯。其實我說的話只是歷史常識。我們必須知道，凡一種勢力最無害的時期。正是他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例如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正因爲是大家公認爲最無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強盛最穩固的。我們看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里之長，從沒有一兵一卒守衛，就可以知道這「霸權無害」的真意義。華府會議之後十年之中，日本屢次有開明的政治家執政，——原敬，濱口，若槻，幣原諸人！他們都不肯輕易濫用日本的霸權，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權無害」的境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大致遵守着華府會議的結果，

對中國總算有點耐心，不輕易利用中國內亂的機會來侵略中國。在歐洲，日本是國際聯盟裏「四大」之一，安穩穩的受各強國的尊敬。所以在那十年中，日本的霸權，因爲公認爲無害，所以最穩固，最強有力。

日本的霸權無害，我可以舉一個最有力的實例。民國十六年，我從紐約起程回國，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亞消息，那時全美國的輿論都很興奮憤慨。

我上船時，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有一天，外務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東京朝日新聞的新屋，樓上有一層正開着一個「新聞事業展覽會」，岩村先生帶我去看一間特別展覽。我進去一看，只見牆上掛滿了無數薄紙條子，像是日本電報紙，足足有兩三千條。岩村先生對我說：「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東京朝日新聞一家接到的緊急電報。那天南京日本領事館被攻擊了，日本人也有被傷的，據說還有國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報紙發了無數的號外。人心的憤激，先生請看這些電報就可想而知。但幣原外相始終主持不用武力。引下關的英美炮艦都回炮了，日本炮艦始終沒有開炮。」我那時看了那一間小房子牆上密密層層的電報紙，我第一次感覺到日本的霸權的威嚴，因爲我明白日

本那時有可以干涉中國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濫用，可以說是無害的霸權了！

我到東京的時候，幣原外相已下台了，已是田中內閣的時代了。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濟南慘案，引起了絕大的中國抵制日貨的運動。無害的霸權一旦變爲有害，就不能保存向來的尊嚴了。後來雖然有若槻內閣的耐心彌縫，兩三年後，日本的軍人終于不滿意于那無害的霸權，就衝決了一切國際的約束，濫用暴力，造成滿洲事變。從此以後，帶甲的拳頭越顯露，日本的國際地位就越低落了。

當國聯盟約和華府條約和巴黎公約都還不會被撕破的時期，太平洋上並沒有什麼均勢的局面，只有一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在那個新秩序裏，大家無形中默認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遠東的領袖。

一旦那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被戳穿了，不但遠東陷入了大紛亂，整個世界的秩序也被攪亂了。九一八以後的種種暴行毀壞了那一套保證日本霸權的國際機構。那個國際紙老虎不能保障中國的被侵害了，同時也就不能保證日本的霸權了。因爲日本的濫用霸力，引起了傍的國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許多新勢力一一起來抗拒日本的暴力。于是日本十七年獨霸的局面就不能不結束，于是這些引出來的

新勢力就聯合造成一個太平洋的新均勢局面了。

☆ ☆ ☆ ☆ ☆ ☆

日本暴力引出來的種種新勢力，綜合起來，可以說是
有三種：

第一是蘇聯的回到太平洋上來做一個第一流的強國。

當華府會議的時候，蘇聯在太平洋上還算不得一個強國，他的政府還不會被各國承認，九國公約也沒有他簽字的份。華府條約有效的十年中，蘇俄自己忙着整理內部，也顧不到遠東和太平洋。可是自從九一八的一炮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捐起對付蘇俄的招牌，東四省的淪陷又使日本的軍事勢力直接和蘇聯直接接觸了。於是蘇聯政府在實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手段之下，積極的調集重大的兵力到遠東各境，一面用大力改進西伯利亞的交通，開發遠東各地的實業。五六年之中，蘇聯已調了三四十萬精兵到遠東，在蒙古西伯利亞的邊境上興造了七千英里的鐵路，加長了三千英里鐵路的雙軌。蘇俄的空軍是多數人認為世界第一的。在那無限的兵力背後還有蘇俄近幾年來拚命發展的重工業建設。

無疑的，蘇俄現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個頭等強國，富源是無限的，人力是無限的。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一個大

敵，日本不能不鄭重顧慮的。

第二是環繞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亞洲民族的國家的新興的軍備。這個新興軍備的大圈子，從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魯與羣島(Aleutian Islands)起，南面直到澳洲與紐西蘭，西面直到新加坡與荷屬東印度。我去年在美國時，美國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國在美國購買軍火的，荷屬東印度佔第一位。這是預備對付誰的呢？新加坡的英國大海軍根據地，在華府會議之後，本來早已擱置了；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淞滬戰爭之後，英國人才用全力趕造這個海軍根據地，現在已完工了。據最近英國報紙的記載，英國將要調集重大的海軍長駐新加坡。這又是對付誰呢？香港的防禦大計劃是在極積進行的了。加拿大從來沒有海軍，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起看報，就看見加拿大首相金格在倫敦宣言要創立加拿大海軍了！還有那南半球的澳洲與紐西蘭，——南太平洋的兩個人間樂土，——從來沒有夢想到國防的需要，近年也在那兒積極的擴充自衛軍，建築海防工事，製造軍用飛機，努力從煤和片頁岩裏提取汽油。這又是對付誰的呢？至於美國的海軍大擴充，和那從菲律賓直到阿拉斯加的防禦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這一大圈子的新興軍備，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

來的，這是日本霸權不能不顧慮的第二組新勢力。

第三，雖然最後，却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內新興的統一的中國。日本在東北四省和華北的暴力行爲是促進中國統一的一個重要動力，這是我們不妨大度的承認的。在那嚴重國難的黑影之下，一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居然很快的漸漸形成了。雖然這個新統一的國家還是很脆弱的，但這六年國難的陶煉，急迫的需要煎逼出來的一點交通建設和軍事建設，也居然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們現在可以自信我們是在努力造成一個能夠抵禦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國的軟弱無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來「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人情之常。我們自己不能振作自強，自然引起鄰國的垂涎。最近英國曼哲司德衛報有一篇文章裏說的最好：「中國之弱在日本人眼裏是一種引誘。日本之強可以抵抗一切，只能抵抗這裏引誘。」中國的統一自強正是造成一種叫日本不能不顧慮的新勢力。這是太平洋新局勢裏的第三種新勢力。有了一個可以獨立自強的統一中國，其他的種種新勢力方才有個核心可以附麗集中。

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來的三組新勢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組勢力，漸漸的形成一種太平洋上的新均勢局面。在這個新均勢裏，日本只是幾個因子中的一個因子，他處處不能不顧慮到其餘的那些勢力，所以就不成一個獨霸的局面了。

最後，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戰禍，也可以構成一個和平解決的新基礎的。爲禍爲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瞭這個新局勢，能不能充分運用他。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種澈底悔禍懼禍的決心。

如果日本還不明瞭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勢，如果他還在迷夢裏自命爲支配東亞命運的唯一霸者，如果他還要逼中國走到鋌而走險的路上去，——如果這些新興的勢力不能好好組織起來朝着一個共同的目標上去發展，——那麼，這個新均勢必定引領我們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戰爭，先起于中日的衝突，逐漸的把太平洋上的國家一個一個的捲到那奇慘奇酷的大漩渦裏去。沒有一個太平洋國家可以希望倖免的。

但是，如果世間還有遠見政治家，他們一定可以從這個新均勢裏看出一線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個「國際新秩

☆ ☆ ☆ ☆ ☆

序」的新礎石。他們應該可以明白，這一羣新興勢力正可以用來建立一個太平洋區域的「集體安全」的和平新機構，在那新機構裏，蘇聯，美國，英國（和他的太平洋上屬國），和中國日本都應該平等的參加，共同的商榷解決太平洋與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許多問題，彼此不能單獨解決的，在那個國際新機構裏，應該比較容易有尋得解決的可能。

總而言之，日本獨霸東亞與西太平洋的日子是過去的史實了。爲日本的前途計，正如爲中國的前途計，我們兩國的遠見人士都應該睜開眼睛認清這個太平洋上的新局勢，都應該想想如何運用他來圖謀我們兩個國家的長久的安寧進展。「有人騎瞎馬」的蠻幹是必定會把我們的國家陷於不堪設想的慘痛裏去的！

一九三七，四，十夜，改稿。

綏東地勢及其位置的重要

張印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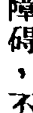
察綏地勢的骨幹有二：一曰陰山山脈，二曰綏東高原，二者相交成「丁」字形，陰山山脈橫貫察綏之中部，自西而東，包有狼山，大青山，陰山等，東西綿亘一千五百餘里，分察綏爲二大部：山之北爲蒙古高原區，地勢向北略下傾，屬戈壁內陸流域，拔海多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山南爲陷落之平原盆地，分佈於綏東高原之東西兩側，拔海多在一千公尺下，如後套平原，歸綏平原，洋河平原等，皆爲察綏二省土脈最肥之地，屬渤海流域。陰山南北之地勢高低相差約五百公尺。在地勢上陰山山脈向稱爲「阻得山脈」(Barrier Range)，蓋自北面觀之爲高原之邊險

，而自南面視之，則爲若干山嶺與峻崖，及因斷層與侵蝕成之深谷溝壑，南北長幾近百里，順谷北上則可漸漸升至高原上，形成南北之自然孔道，如張家口北之漢諾嶺，萬全嶺，及歸綏北之蜈蚣嶺，皆爲察綏南部去蒙古高原之衝要峴口也。

綏東高原，乃爲蒙古高原越陰山面南伸之一部，與晉北之大同盆地遙遙相對，亦即陰山以南之主要東西分水也。高原之東爲洋河流域，西則爲黑河流域（歸綏沖積平原上之主要河流），南則屬御河（即桑乾河上游）流域。三河流域之間又爲一內地流域之盆地，綏東高原的地質構造

比較簡單，幾全爲太古界之片麻岩及花崗岩所成，間或有玄武岩相雜。總之，其構造與蒙古高原本部略同，惟因受中生界之燕山造山運動的影響，或因地層的陷落，或由火山的噴發，加以以後的侵蝕，致綏東高原略呈破裂形狀。是以綏東高原之形勢，實有數個極開展之盆地形，如綏東五縣（豐鎮，集寧，陶林，興和，與涼城）之屬境莫不各自成一大盆地。例如集寧縣境，北則有灰騰梁山與陶林相隔，東則有磨子山與興和相交，南則有蘭陰山與豐鎮爲界，西則有馬鞍山與涼城相接，其餘四縣地勢皆然，盡屬盆地形勢，惟四圍之山環形勢多屬殘餘的丘陵或斷裂成之平頂山與低微之火山堆，而峻峭之少年山勢並不得見。故綏東地形大勢，仍不失爲一遼闊之高原地。

綏東高原的盆地多在片麻岩中，如陶林與和豐鎮等，上覆紅土，山嶺多爲玄武岩所造成，高出盆地僅一二百公尺。綏東高原上更有不少的柴達木地（Tsaidam，乾涸的湖地）與內陸湖泊，大者如太海（原名岱哈海），距豐鎮西六十里，葫蘆海分佈於紅砂嶼北二十里處，二蘇木海（亦名黃旗海子）在平地泉南官莊附近。湖面之大其周經各有百餘里。富產鹽鹼。環湖低地遂多爲鹽荒及鹹草地，不宜耕種，但四圍坡地及乾涸的盆地中土質尚好，多爲沖積所

成，難以腐爛之植植或粗或細散佈各處，其土層分佈之厚薄隨地雖有不同，惟皆可供耕種之用。其土質雖不若洋河歸綏與後套諸平原土壤之肥美，然亦實一大優良的牧場，足堪作廣大之粗放的墾牧經營。自清季經我移民墾殖以來，豐鎮集寧等縣農產之富，已有綏東糧庫之稱，惟綏東高原之東西南側，臨接歸綏與洋河二平原處，因地層之斷裂，加以雨水之侵蝕，多成切斷之峯脊溝壑狀，峭崖峻壁，蜿蜒交錯，異常險峻。東邊俯臨洋河谷平原者曰樺山，西邊俯臨歸綏平原者曰涼城山，其崇峻之勢正與歸綏平原與後套平原及洋河平原北之陰山山脈同。攀登非易，是以平綏鐵路自張家口至歸綏一段之修築，爲避免樺山與涼城諸山之障礙，不得不作一「」字形之大曲折。

查張家口與歸綏二城位置幾在同一緯度之直綫上（皆在北緯四十半度處），兩城直距僅五百餘里。今經大同與集寧延長至九百餘里，此曲折之目的爲連結集寧與大同間之商務交通固在意中，惟其最大之原因，乃在躲避綏東高原東南之樺山與其西南之涼城諸山之地勢的阻碍也。蓋自張家口西行，西北一面有陰山脈樺山之阻隔，東南一面則限於南口嶺，致迫於洋河谷漕之中，故不能不沿陰山之陽順陽河而西南行先趨大同。道經地勢，除南北兩側遠見之

山嶺重疊不斷外，並無自然之障礙。（中間所經之地以聚樂堡爲最高，拔海約一千二百公尺，比張家口高四百公尺，較大同僅高一公尺。）大同歸綏間復爲涼城諸山所阻，其形勢之險峻與樺山大青山同，分隔於大同盆地與歸綏平原之間，巍然峭立，不易穿行，故平綏路自大同又不得不北折沿御河（即桑乾河上游之水源）河谷之自要孔道，經得勝口（大同北舊長城關塞，在堡子灣北十里，豐鎮南廿里處），舒徐攀登即陞至綏東高原之上，所經地勢毫無南口青龍橋間之天險阻碍。過豐鎮至集寧（舊名平地泉），復西折過十八台（平綏沿綫拔海最高處拔海爲一千五百八十五公尺），則入黑水流域，後順黑河上流西南行過卓資山（舊名卓子山），乃至綏東高原之西北邊緣，破山而出至旗下營遂降落歸綏平原上。由此觀之，平綏路之綏東一段恰處全綫之中腰地位，形勢又高，儼然成東西交通之一大自然樞紐。其地勢位置在我西北國防上之重要非可言喻。

從東一隅不獨爲察綏間之要衝，即甘，青，寧，新諸省與平津之交通亦以此路爲最簡便。綏東共有五縣分佈如下，興和位於東，涼城位於西，豐鎮居其南，陶林在其北，中間爲集寧。自綏東之興和縣東至張北不過二百里，北去商都僅一百餘里，興和距集寧僅一百二十里，自集寧北行經陶林縣屬之土木爾台（距集寧二百四十餘里）至滂江（爲張庫路上察北最要之驛站）約四百八十餘里。土木爾台爲綏東最東北之最大鎮市，自集寧北去庫倫與自商都西去白靈廟（白靈廟）皆所必經之地。紅格爾圖在土木爾台東南五十里，亦爲綏東之富區重鎮，東距商都僅數十里。若自陶林北行去滂江僅四百里。自陶林東行至商都約一百八十里。再東北行二百里即達加普寺，現爲德王偽蒙軍之首府。由此觀之，綏東陶興二縣一在張北之西，一在商都之西南，相距不過百餘里，疆土毗連近在咫尺，其間地勢雖微有低崗起伏，然大致尚屬平緩，極便軍事行動。况自綏東高原舉目四望，更有居高臨下之勢。爲軍事上最重要之根據地，得之不但可以維持察綏之交通，及西北與華北之關係，進一步言之更可捍衛華北全部。假如一旦失陷，不獨使綏遠陷於包圍之孤立地位，且西北之要衝被切斷後，華北之自然屏障一失，冀晉陝甘諸省又何得以保存？敵人自興和可順東洋河（橫穿樺山南北惟一之自然孔道）南下直趨柴溝堡。自此東下可奪察南之張家口宣化，南下則可攔我懷安陽原，西則更可沿平綏路侵我晉北之陽高大同。以上諸縣皆晉北察南之盆地富區也。自集寧順平綏路西行入歸綏平原直搗我綏遠腹地，南下沿平綏鐵路所經之御河自

然孔道經豐鎮，得勝口，亦可直奔大同，順勢南下，必將勢如破竹，無法抵禦。蓋大同自古以來即稱雲中鎖鑰，向為北方異族侵入華北途徑之一，得失相繼若下次，終為我國所有，不幸邇來敵人也利用綏東地勢與位置，依日然便利想重來扮演歷史的舊劇，因大同以南過雁門一險即可直搗晉垣。晉垣一下，東可出娘子關侵我冀魯，南則出大慶關略西安，再東出漳關更可迫入中原。自豐鎮西行經葫蘆岱哈二海間之低陷帶可趨涼城，斷我歸綏之歸路（因涼城為歸綏晉北大道必經之地）。設敵人佔我陶林，便可西往，出入自由，擾我綏北後方。所幸綏北偽匪之巢穴（白靈廟）已為我國軍所克，因而綏北暫可告安，但白靈廟之北仍屬烏盟境地，北距戈壁尚有二百餘里寬之草野，地勢空曠，茫然無際，匪敵隨時仍可繞道西竄，擾我綏北後方，窺我五原臨河之後套沃野，並施行其侵略我寧新之工作。在此敵人西去途徑尚未封鎖之時，國軍仍須北進堵截以防竄擾。

查敵人積極攻我綏東之企圖目的，要者有六：（一）切斷綏寧與我冀晉之聯絡，期以擷得我綏寧全部。（二）控制

平綏全線以作其侵略經營我西北富源之工具。（三）破壞我華北沿長城一帶所有的邊防，以除我國之屏障而資南下侵略我國內地。（四）杜絕我收復東北之所有去路以免將來之顧慮。（五）斷絕中俄陸上的交通以防止中俄將來政治經濟直接的互助。（六）佔我察綏寧新全部，藉以直搗俄國後方（中亞）之根據地。察其用意，故不專在侵我而已，實亦有防俄之意義，其野心之大至足驚人。

敵人對我綏東的蓄心積慮既然如此的迫切，綏東的地勢與位置在國防上又形成我華北自然屏障之陰山山脈的一大樞紐，傾全國之力去死守固屬我國存亡之關鍵，但據拙見所及，祇取守勢，難圖久安，欲求澈底辦法，最低限度須剷除察綏境內所有的偽匪敵人。換言之，應積極的作進一步的工作去收復察綏全部。最近白靈廟的收復即是一個好例。但是由綏東去收復察北固無不可，然在地勢位置上確不如自察南後方取之容易多多。苟能雙方同時夾攻，或可不必大舉，問題可告解決。不然，敵匪巢穴根深蒂固，以後非特不易毀滅，勢必捲土重來大舉進犯，當更難以抵禦了。

我們爲甚麼要說長道短

張佛泉

本刊復刊之始，我願意談談「我們爲甚麼要說長道短」。我們的目標不在解釋我們的意向。我所以寫此文，仍在對言論及結社自由等問題做一個一般的解釋。

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的人很多。要求這種自由的理由也很不一致。有的人認爲這些是自然權利；有的人認爲這些是做人及求幸福的最低條件，所以應當得到保障；有的人認爲這些是政治方面的至善。我却要在此處指出，言論等自由是優良政府的必需條件。

我們認爲國民對政府的批評，乃是優良政府的一部分。政務的進行是離不開社會上公共批評的。輿論之於政府，有時正如汽車上的燈之於汽車，有時又如車閘之於車。輿論可以是政府的領導的力量，可以是制止的力量。輿論與政府不能看爲兩事。有許多人認爲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點綴物，奢侈品。排除這種謬見，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事。

執政的人，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全正如我們常人一樣，同是不能脫去弱點的。他們有時眼光不夠，認識不足，判斷不正確，有時不能克服惰性，不能抵抗自私的

誘惑。所以凡是施政方針，執行的方法，以及大小規模的，正常的及變象的貪污，都須受公共批評的督促。公共批評在這種情形下，是補充的，修改的，糾正的，迫人向上的力量。全國人如都噤若寒蟬，那便是蔽聰塞明的辦法，耳目既已蔽塞，多們聰明的，亦必成一個聾子，成一個啞者。我現在且從國語裏面的周語中，舉一段故事：

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流王於彘。

經典裏類似上面那樣的故事，我覺得倒是提倡讀經的人可以知道知道。

上面那段故事，也許離今日太遠了。最講統制的法西

斯政治，却是許多人羨慕的。我從一位在皇家羅馬大學裏教書的學者的著作中引幾句話。吉尼(Corrado Gini)教授是被指爲「御用」學者的。但他却有這樣的話：

「爲避免大多數的反對，爲贏得大多數人的同意更容易些，無疑地那是很需要的事，就是政府應與人民維持極密切的接近，應注意政府各種設施所給他們的印象，宜垂聽他們所發出之建議。當重要問題正在討論的時候，就祇爲參考牠們的意見，那些代表個人及地方機關意志的組織，如衆議院，省議會，眾議會，以及政黨等，都是應當維護的。」（「法西斯主義的科學的基礎」，見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27, p. 113）

中國現正在國難期間，政府的權力必須集中，這是大家都同意的。有人說，當軸或亦有時如此覺得政權既須集中，那末公共批評便應受限制與抑止。我們却以爲此種見解是膚淺的。政權愈集中，公共批評愈應有力，正如同汽車開的愈快，牠的燈愈須明亮，牠的閘愈要強而靈敏。高度集權的政府，外面若沒有控制的力量，便必要回到專制的狀態。

上面所說，社會上的公共批評爲優良政府必不可免的

條件等話，看來似是老生常談。然而中央及地方當局却很少能把捉住那簡單真理的重要。譬如我們的中央政府的構造，在原則上，即與上面所說的很不相同。中央政府爲剷除貪污，爲求行政效率，於是創設了考試院；爲監察一切政治上的措施，創設了監察院。但是公共批評却不是政府所願容許，更無論鼓勵。其結果究竟如何呢？近些年來考試院與監察院的成績，不能使我們說牠們對政府有重要的功用。對政府的控制，必須求諸政府之外。

讓我再重複一遍：健康的公共批評，乃優良政府（中央，地方，市政，都沒有分別）所必需的條件，牠與政府是一事，是不能分的，是須同時存在的。社會上自由獨立職業者的沒有用意的，沒有惡意的，沒有背景的，良心話，是應該，是必須，尊重的。不歧視這樣的意見是爲政的最低條件，能採納這樣的意見方證明爲有真學問。

我說輿論的重要，也許還有更深的意義。即，我們相信真理與最優的對付實際問題的方策，祇有由互相討論的過程中方能逼得出來。我們個人單獨所構成的意見，恐怕都不是最後的，最好的。祇有容我們能對話，能交換所信持，能「予與取」，能相參，相浸，相容，相滲透，方可

以達到那共同可以信奉與履行的「善」。但這是抽象的收

治理論，我們不能在此繼續詳細講。(四月十日)

漫遊雜感(五)省府合署辦公

陳之邁

中國普通所謂「匪區」，初不以江西南部爲限。這個名辭至少包括江西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這四省的地方都曾受「匪共」的侵擾，而經國府明令劃歸軍事委員會直接統轄。當時蔣委員長認定「匪區」的問題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故自始卽由那時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先生肇劃政治建設的工作。

軍事委員會在整理「匪區」的政治上採取「管教養衛」的政策，用保甲制度爲其推行的根本組織。保甲制度與地方自治的理想根本水火，我前此已經述過(獨立評論，第二二二號；關於保甲極好一篇文章是張純明先生的「現行保甲制度之檢討」，載行政研究月刊，二卷三期)。除了保甲之外，軍事委員會尙倡導四種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一曰省政府合署辦公，一曰縣政府裁局改科，一曰各縣公區設置，一曰行政督察專員制度。這四種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在「匪區」裏實驗之後，都將次第推行到其他各省。茲就我見聞所及，將省府合署辦公一端略論之。

省府合署辦公的改革倡自前湖北省府主席張岳軍(羣)先生。這個辦法經軍事委員會與「匪區」內數省的當局反復徵詢後，於二十三年七月訂定「省府合署辦公辦法大綱」，先令贛鄂豫皖閩等省切實推行，其他如蘇浙陝甘蜀冀等省亦先後倣行。按省府合署辦公的目的有二：其一爲節省省政府之經費二分之一爲充實縣政府經費之用，其一爲集中行文於省政府秘書處，一切由省政府主席判行，以矯正前此各廳各自爲政對各縣府各科直接下令之弊。南昌行營的訓令裏說：

第一就現制本身之觀察，則爲頭重腳輕，基礎不固。論組織則省龐大而縣縮小，論經費則省極鉅而縣極微；治官之機關太多了，而治民之機關太少；俾食高官之人員太多，而深入民間之人員太少；政令均成具文，實以此爲最大之癥結。茲將豫鄂皖贛四省二十二年度經常歲出預算資爲比較，則省與縣政費之懸絕，自可一目瞭然。除保安處經費不計外，

專以省政府及四廳爲準，查河南爲九十一萬一千餘元，湖北爲一百一十一萬九千餘元，安徽爲一百零一萬元，江西爲八十一萬三千餘元；而各省中之縣政經費，則河南全省一百一十一縣，共一百零九萬一千餘元，平均每縣九千八百三十餘元；湖北全省七十縣，共八十八萬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二千六百餘元；安徽全省六十一縣，共九十五萬七千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五千七百餘元；江西全省八十一縣，共一百一十三萬二千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三千八百餘元。故縣政費以安徽爲最多，江西次之，湖北又次之，河南最少。然無論何省，每月平均每縣皆不過千元上下。縣爲執行一切政令之中堅，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經費之微薄，則又如彼，實無從充實組織，延用人才，以爲匡助，百舉皆廢，亦固其所。故欲革此頭重腳輕之弊，首在縮小省府之編制，擴大縣府之組織，削出省府之節餘，移增縣府之經費，庶質劑得宜，推行盡利。

第二就橫的方面觀察，各廳處駢肩而立，各成系統，各固範圍，各私財用，凡屬甲廳主管之事件，率不許乙廳過問，而事涉兩廳以上者，往往遷延不決

，權則相爭，過則互諉。且一切設施，多以本廳處之立場爲觀點，實乏抑己伸人共維全局之精神。於是各認主管之事件，爲當前最要之急務，同時督責於縣，縣長莫知所先，亦無法同時並舉，遂使狡黠者專事敷衍，尤不肖者則借甲抵乙，任意張弛操縱，以自便其私圖，而賢能自愛之士，則深苦政令紛歧，疲於奔命，而不安於厥職，吏治之壞，此種畸形制度實爲厲階。故欲革除今日省政滯滯矛盾重復隔閡推諉齟齬之弊，惟有打破各廳處並立之分割局面，而併爲整個一體之省政府，庶克收齊一簡捷協和之效。

第三就縱的方面觀察，省府與各廳處、縣府與各局處科，均各截然形成兩級。中央部會往往認省之廳處爲其直屬機關，省之廳處亦認縣之局科爲其直屬機關，而彼此直接行文。流弊所及，遂使省府與縣府不克層層節制，頓失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所謂主席代表省府監督所屬執行省政，各縣長綜理縣政之規定，乃徒託空言，系統不同，層級凌亂，何以率屬而責效。故欲革除此弊，必須使整個省府對中央院部負絕對責任，整個縣府對省府負絕對責任

，凡省之廳處縣之局科乃省與縣之補助組織，不能離而爲二，一切斜枝旁出之行文辦法，自應毅然廢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訓令治字第八五九五號）。

關於經費節省的目的，據軍事委員會的報告，二十四年度各省節省之費用爲（一）湖北省二九三，八七二元；（二）安徽省三〇九，一六四元；（三）福建省一二一，六八一元；（四）江西省七二，八八五元；（五）河南省二三七，〇八五元。同時，這些省分將其節除之經費，「悉數增撥爲各縣之政費」，計二十四年度縣行政費增加數目（一）爲湖北省二七五，八七三元；（二）安徽省二〇〇，〇〇〇元；（三）福建省三四〇，〇〇〇元；（四）江西省四八〇，〇〇〇元；（五）河南省二三六，一六〇元（以上根據二十四年十一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政治工作報告」）。照這些數字看來，省府合署辦公似乎在節省經費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但爲什麼福建江西河南三省，增撥給各縣的經費比由省府合署辦公所節省的經費還多呢？據上引的報告說，該數省政府及各廳處，「均因早經厲行緊縮，其原支經費比較其他各省特少，故所減經費亦比較略少」。同時，江西省的解釋亦與有關係。據省方的報告說：

江西近年因受匪禍影響，財政異常困難，各機關之組織及預算原已極爲緊縮。此次合署辦公所節省之經費……每年僅減一萬六千零七十三元；然將所有因合署辦公而被裁機關及停撥減撥之經費預算數合計之，對除新增加之經費預算數，則每年實減十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一元（「江西省政府合署辦公之實施」，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編印，頁二一至二二）。

但是二二二，六二一元的數目，距離其所增加給各縣的四八〇，〇〇〇元的經費數目，尙相差極遠。由這些數字及其解釋看來，各省撥給各縣的經費增加，其主要的原由並不在於省府合署辦公的實施，而在政府費用之「厲行緊縮」及各種經費之「停撥減撥」。所以我們聽見山東省合署辦公之後，經費反而因此增加，並不足爲奇，因爲所謂合署辦公，原不過是一種內部機關及人員隸屬的調動，張岳軍先生節省經費二分之一的希望？在現在看來實是一種過奢的希望。換言之，合署辦公本身原不是一種節省經費辦法；如果省政府當局銳意節省，不合署辦公也可節省，如要浪費，則合署辦公並不能節其浪費。

至於提高行政效率一點，則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在合署辦公的前，省政府各廳處各自爲政的流弊，以上引

的一段訓令已道其梗概。但合署辦公便能矯正此項弊端了嗎？考省政府各廳處之「駢肩而立，各成系統，各固範圍

弊端正合爲現在中央整個政府的描寫：在中央各院部會間也正是：

，各私財用」，對於縣府各科——在裁局改科後便是縣府本身——濫發各不相侔的命令，致使縣府莫知所從，一部分固然由於省府各廳處不知聯絡，但一部分亦有其更根本的原因。這個癥結正是軍事委員會訓令中所謂「中央部會往往認省之廳處爲其直屬之機關」。現在省政府合署辦公，固然在對外文時由秘書處統收統發，但這並不阻止「中央部會以省之廳處爲其直屬之機關」，而直接向其發布命令

駢肩而立，各成系統，各固範圍，各私財用，凡屬甲（部會）主管之事件，率不許乙（部會）過問，而事涉兩（部會）的上者，往往遷延不決，權則相爭，過則互諉。且一切設施，多以本（部會）之立場爲觀點，實乏抑己伸人共維全局之精神。於是各認主管之事件，爲當前最要之急務，同時督責於（省府）……

。一個省政府的民政廳收到行政院的命令，同時也收到內政部的命令；省政府的建設廳收到實業部的命令，但也收到建設委員會或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命令；教育廳收到教育部的命令，但亦收到訓練總監部的命令；至於軍事委員會之可以隨時指揮一切廳處，尤爲人所共知的事實。在行政院直屬的機關間，該院的秘書處政務處尙能爲之調整，從

而中央一方面有行政院所屬之各部會，一方面有與行政院平行的各院及其所屬部會，而在五院之外尙有無數「直隸國府之機關」，彼此的職掌重疊凌亂，恰是造成「矛盾紛雜，阻滯推諉，齟齬敷衍浮濫」的局面，中央之於省府，也恰如省府之於各縣：

「五院之外直隸國民政府之機關」出來的命令則非行政院所能過問。這種現象使得省政府各廳處的上司複雜繁多，政出多門，各不統屬，命令往往互相矛盾，以致省府各廳處既不得不各依其上司的命令行事，遂不能兼顧其各自對

頭重腳輕，基礎不固，論組織則（中央）龐大而（省）縮小，論經費（中央）極鉅而（省）極微；治官之機關太多，而治民之機關太少，伴食高官之人員太多，而深入民間之人員太少；政令均成具文，實以此爲最大之癥結。

於縣府所頒發之命令之衝突。其實未合署辦公前省政府的

觀於中央對於省府的這種情形，省府合署辦公之成效未彰

，與其歸咎於是項辦法之不良，毋寧責備中央政令之缺乏系統。中央各院部會既然政出多門，毫無一貫之系統，而省府又有恪遵中央機關命令之職責及義務。希望省府不將中央的命令照樣傳遞到縣政府，實為超出於可能範圍以外的玄想。這就是省府合署辦公辦法未能達到預期成效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省府合署辦公，在經費之節省上，縱然得到相當的效果，但此項效果亦並非徒因合署辦公而獲得，其主要的理由尚在駢枝機關之裁撤及行政經費以及事業經費之縮減；在行政效率之提高上，則因中央政府本身缺乏一貫的系統，實難收到絲毫的功效，其唯一可能的效果只

編輯後記

適之

在公程式上的小改革，實無關宏旨。我們以為在一個自命集權的政府之下，一切的改革都應由中央先行開始，才能得到實際的成效。省府合署辦公如此，其他的改革，如考銓制度，如審計制度，如考績制度，亦莫不如此。若果中央的政府能夠切實調整職掌，裁併駢枝機關，禁止各機關濫發功令，則中國的行政定有一番嶄新的氣象；若果中央政府能夠切實推行考銓制度等等，上行下效，其效果亦當數倍於添設種種的考銓分機關，審計分處等等。其實政治應用上行下效的方法推進，是我國幾千年論政者的主張，這一點平凡的道理，望提倡改革者注意。

二六，四，五。

△本期是繼續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二二九期的。我們這一次停刊了四個多月（共十七期），勞各地的朋友來信慰問，我們不能一一答謝，只好在這裏深深道謝。

△張印堂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的「綏東形勢」一文是去年十一月底寫的，我們把它擱到今天，很

感覺抱歉。我們深信這篇文字在今日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前線戰場的形勢。

△我們十分誠懇的盼望國內外愛護「獨立」的朋友照舊陸續投寄文稿。「獨立」還是原來的「獨立」，我們當然盼望各位老朋友的熱心贊助。

中日問題的現階段

胡適

整整一年前，我在「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獨立第一九七號）一篇文章裏，曾提出一個基本原則：「調整中日關係必須以消除中日間的仇恨局勢爲基本原則」。

這回兒王謙次先生領導的經濟考察團到上海，和中國商界銀行界的領袖周作民徐新六諸位先生會談中日經濟提攜的

問題，周作民先生們很誠懇的對他們說：必須先解除兩國間的政治障礙，然後可以談經濟提攜。這個答覆，我們認爲最平實，最忠懇。上海的中國商界領袖說的話，其實是中國人人都要說的話。政治上的障礙不除，就是仇恨的局勢常在。天下那有互相仇恨的人可以合夥做經濟上的提攜

事業的？從低級消費者的立場看來，人人當然要買價錢最賤的貨物。但這種不受國家觀念民族思想的影響的低級消費者，一來購買力太低，二來支配力太少，在整個對外貿易上是影響不大的。中上社會的人，人數雖然比較稍少，但他們有購買力，又能支配他們的團體，所以他們在那個國際仇恨的局勢之下寧可忍受經濟上損失，而不肯蒙受不愛國的惡名。一個家長可以使他全家不買敵貨，一個校長

可以使全校不買敵貨，一個報館經理可以使整個報館不買敵國的紙張材料。這種志願的經濟抵制，是政府的力量不能遏抑的，是強鄰的兵力無法制止的。何況在這個政治的仇恨未消的局勢之下，正當的商人又誰敢投資去做中日經濟提攜的事業呢？

我在去年那篇文章裏曾提出調整中日關係的七項先決條件。一年以來，國內平實的輿論也漸漸承認那些項目是現階段內必須做到的先決條件。例如大公報二月十七日的社論就提出這三項「第一階段之調整方法」：

- (1) 冀東偽組織必須取消。
 - (2) 察北六縣必須歸還。
 - (3) 華北各地的特務機關必須完全撤退。
- 又如王芸生先生在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八期裏也提出「最先應該做到的三件事」：

- (1) 取消冀東組織。
- (2) 根絕走私。
- (3) 調整冀察平津等地一切畸形狀態（包括恢復察

北主權及撤銷特務機關等)

王先生說：「這些事是建設中日正常關係的清道工作」。

這些項目比我去年提的七項已經是和平的多了。我也願意承認這些項目是先決條件中的最低限度。如果連這樣平實的「清道工作」都還做不到，我們可以斷言我們的強鄰是決心要保持這個互相仇恨的局勢的絲延的了。

同時，我們當然不應該僅僅妄想我們的強鄰一旦革面洗心的奇蹟。我們應該責成我們的政府在這一年中完成這

幾件第一階段必須做到的事：

第一，政府應該宣布所謂「何梅協定」「察東協定」一律無效。

第二，政府應該責成綏遠冀察當局協力剋期肅清察北六縣的匪偽勢力。

第三，政府應該用國家力量協助冀察當局剋期肅清冀東的匪偽盤踞。

廿六，四，十八夜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

吳景超

中國的工業化，近來還在萌芽時期，以後的數十年，一定還會發揚光大。但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許多困難的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作者最近得到一個機會，在常州，無錫，上海等處參觀了三十幾個工廠，并與從事工業有年的人，對於中國工業化幾個重要的問題，作了若干次的討論。這篇文章，就是要報告這次考察與討論的結果。

(一) 資本

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需要許多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資本。中國是一個缺少資本的國家，但發展工

業，沒有資本，是不行的。我們可以從那些地方，取得我們所必需的資本呢？這個問題，大約凡是注意中國工業化的人，都會考慮到的。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便是去研究歐美以及日本等國的經濟發展史，看看這些國家的資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後考慮這些國家的經驗，有無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在這篇文章中，不擬運用。這兒，我只願意提出一般工業界的先進對於這問題的意見。他們以為發展中國工業的資本，可以有四個重要的來源。第一便是由現有的工業，來供給發展

工業的資本。這不是一個理想，在我所參觀的工廠中，有好些在設立的時候，資本不過數萬或數十萬，而現在的資本，居然到了數百萬的。這個數目的增加，一部份是由于招添新股，但一大部份的新資本，還是由工業本身孳生出來的。他們在每年結算營業賬的時候，有的多提公積金，有的保留紅利不發，到了相當的時期，便把工廠的資本額擴充，如常州大成紗廠，在民國十九年時，資本只有五十萬元，民國二十四年，便增至二百萬；又如無錫麗新紡織印染公司，在民國九年，只有資本三十萬，現已增至二百七十萬，都是用上述的方法膨脹的。別的例子，類此的甚多，不必枚舉。所以我們希望一切從事工業的人，都要認識並且擔負這個創造新資本的責任，不要把每年的盈餘，都當作紅利分走，應當積少成多，使工業資本，每年都有加增。工業資本的第二個來源，便是由政府取締投機事業，引導社會上的遊資，走上生產事業的途徑。中國人口衆多，一方面雖然貧民觸目皆是，但另一方面，擁有鉅資的也不在少數。他們的資本，在過去多投資于買賣公債，地產，標金等投機事業，自從政府採取新貨幣政策，並整理公債之後，這一方面的投機事業，已無遊資用武之地。地產買賣，自從數年前地價慘落之後，投資者已有戒心。所

以在這個時候，由政府用獎勵的方法，如保息，或減稅等，來鼓勵正常投資，一定有好多資本，可以作發展工業之用。工業資本的第三個來源，便是鼓勵華僑投資。華僑每年由海外匯回中國的款，近來每年常在二萬萬以上。這二萬萬的資本，其用途如何，惜尙無人加以研究，我想此中一定有一部份，可以引導其注入工業中的。除却這二萬萬零星的匯款以外，我們知道華僑中有許多鉅富，頗欲投資于祖國，這種熱心，政府應特別加以獎勵。如在上海開設中國酒精廠的黃氏，在爪哇素稱鉅富，其財產達三萬萬之鉅，酒精廠的資本一百五十萬，在黃氏創辦的事業中，還算是小規模的，以後中國各種工業的發展，借助于黃氏的機會，應當還多，所以對於黃氏在中國初辦的事業，應當特別加以愛護。又如在上海開設永安紗廠的郭氏，是澳洲的華僑，他們在中國紡織業中投資之鉅，除無錫榮氏的申新紗廠外，無與倫比。像這一類的華僑事業，如政府特別加以愛護，一定可以吸收更大的華僑投資。工業資本的第四個來源，便是利用外資。過去私人利用外資而成功的事業是很多的，如商務印書館在初辦時，曾與日本金港堂合作，其初兩方各出十萬元，嗣後華股陸續增加，到民國三年，便將日本股份全數購回。又如五洲固本皂藥廠，本為

德人盤門氏所創辦，到了民國三年，由上海巨商張雲江收回，又讓與項松茂，經營二十餘年，便成爲今日國人自辦最大的肥皂廠。又如中國亞浦耳電器廠，原爲德人亞浦耳所創辦，民國十四年，亞浦耳回國，便將全部機器生財，盤與國人，現在居然也可以與荷商飛利浦，德商亞司令，美商奇異，匈商太司令等合組的中和燈泡公司競爭，而得到相當的勝利。又如在紡織業中首屈一指的榮宗敬氏，其所轄的九個紗廠，第二廠原來是日人開設的恆昌紗廠，第七廠原爲英商安利洋行設立的東方紗廠，但先後均由榮氏接收下來。又如康元製罐廠現在的廠址，原爲日人所辦的工商製罐公司，民國十二年，康元製罐廠，接盤工商製罐公司，遂將老廠遷入，合併辦理。又如阜豐麵粉公司，其設備的新穎，在國內可稱第一，據經理孫氏言，公司中有一部份機器，值洋一百五十萬元，即係由英國借貸而來，利息七厘，五年還清。由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可見利用外資，不問他是合夥，或是借貸，或由外人單獨經營，如國人肯自己努力，結果都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不過在上面所舉的利用外資三種方式之中，其由外人單獨經營一方式，便是讓外人在華設廠，是利弊互見的，我們應當設法去其弊而收其利。近來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每注重於弊的一

方面，如外人在華經營事業，每不肯受中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的限制，又某種國家，每因經濟問題而牽涉到政治問題，所以我們聽到某國的投資，總懷疑他後面有不良的動機。但是利用外資的弊，是可以用外交的方法剷除的，同時如我們的國家力量增強，所有的弊端，都不難一掃而空。至於利的方面，外人在中國投資，除加速中國的工業化外，還可使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降低；農民的產品，添一顧主；失業的工人，多一謀生的機會；空虛的國庫，多一稅源。例如日本在青島所設紗廠，據民國二十二年海關報告，該年由火車裝運之貨，如棉花，煤斤及其製品，所付運費共計五百萬元；所繳棉花稅捐，亦不下二百八十萬元；採購華棉九十萬擔，價銀三千萬元；採購魯省煤斤，五十萬元；華工工資，三百六十萬元。雖然日商直接由紗廠中，得到許多的利潤，但間接對於中國的利益，是不必否認的。中國人在利用外資的條件下，應設法積蓄財富，以便遇有機會，即可使外資變爲華資，使現在外人開設的工廠，將來可以變爲國人自己經營的工廠。這種結果，并非不可能，上面所舉的例，已可證明。我們再看美國，在一九一三年，雖然在國外的投資，達二十萬萬元，但外人在美國的投資，也有五十萬萬元。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

所以在歐戰前，利用外資的數量，超過本國資本的輸出。但在歐戰中，美人一方面把外人手中的美國股票買回，一方面把歷年積蓄的資本，投資外國，到了一九三〇年，除去美國政府借與歐洲各國的債款不計外，美人在外國的投資，竟達一百五十二萬萬元之鉅數，與英國在歐戰前的國外投資總數相彷彿，但英國人花了一世紀的工夫所做到的成績，美國人在十五年之內，便完成之。由此可見一個沒有資本的國家，在工業化的初期中，利用外國的資本，是無妨的。只要利用的人，肯自己努力，肯藉國外的資本，孳生本國的資本，那麼在某一時期，雖然欠外國人的債，而經過若干年後，也可一躍而為債主國。美國是一個好榜樣，而我國實業界的前途，如上面的例所表示的，也可以使我們發生一種信心，就是中國人如自己肯努力，是可以收利用外資之利的。但如中國人自己不努力，那麼中國的殖民地化，也可因利用外資而加增其速度。為禍為福，關鍵還在中國人的本身。

(二) 技術

工業中的技術問題，可以分作技術設備與技術人才兩點討論。

技術上的設備，中國現在是落伍的，無可諱言。落伍

的現象，從兩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各工廠中所用的機器，大部份都購自外國，本國人自造的，還不多見。第二，就拿這些外國機器來說，也是陳舊的多，而新穎的少。這種落伍的設備，中國工業界中，亟應設法改良。無錫慶豐紡織有限公司，是設備最好的工廠，他的經理唐星海先生曾說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業之成功，全在產量多，產品良，產費廉之三大要端，故凡可以增進產量，改良產品，減低產費應有之設備，決不能稍厚吝惜，因小失大。科學進步，年有改觀，機器改良，日新月異。今年稱為新穎者，明年即為陳舊。所謂實業者，實為進趨之事業，非可一成不變，墨守舊章，而能與人角逐者，故凡有可以增進產量，改善產品，減低產費之新穎設備，亦應隨時改進，力避落伍。

唐先生的理論，誠然是正確的，但實踐這種理論，却有相當的困難，即以慶豐而論，他的紡織機器，都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的。一九三二以後的紡織機器，我除在永安第一紗廠看到數架外，別處并未見到。反是，一九二〇年的機器，我在很多的紗廠中還見過面。這種現象所以存在

的原因，第一由于中國的資本缺乏，第二由於中國的重工業不發達，第三由於中國人口的衆多。前兩種原因是很明顯的，第三種原因，我願舉兩個例來解釋。我於參觀華成煙草公司時，顧少卿廠長曾指出兩架包煙機來使我注意，一部是購自外國的，價洋五千元，一部是本國人仿造的，價洋一千元。我問他：既然本國人可以製造這種價廉的機器，爲什麼不多造幾架。他說：這種包煙機，一部可以代替一百個女工，本公司不願見許多舊的工人失業，所以不擬多造。又于參觀美亞織網廠時，曾與蔡聲白先生論中日織網廠中設備不同之點。蔡先生謂日本織網廠中，一女工可管三四機，有管到八機的。中國織網廠中，十年以前，兩人管一機，近來則一人管一機。如廠方將設備改良，使一人兼管兩機，工人每不肯合作，仍要求一人只管一機，原因係彼等抱有飯大家吃主義，如一人管兩機，必有若干人失業，有此顧忌，所以工人都願意停留于一人管一機的階段。以前我常說中國人口數量的龐大，阻礙了生產力的自由發展，于此又得一證。

我們一方面雖然承認中國工廠中，技術設備的落伍，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認中國近年來在技術上的進步。我們有一時期，所有的機器，都要向外國人買，近年來有好些

鐵器，中國人已能自己仿造了，而且仿造的結果，還可做到價廉物美的地步。上面所舉的華成包煙機，便是一個好例。此外如華生電扇廠，有一螺絲釘製造機，如向外國購買，需洋四千元，本國人自造的，只需一千元。康元製罐廠的玩具部，有一製造發條的機器，是不輕易讓人參觀的。據項康原先生說，這個機器製造出來的發條，貨色與舶來品并無差別，但只售二角一磅，外國貨要四元一磅。像這一類的例子，很可使人興奮。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機器，不但有模仿的能力，而且還有改進的能力，只要假以時日，那麼追上歐美，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事。

關於技術人才在中國的缺乏，也是大家所承認的，不過我們如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就可看出中國近年來的進步。大成紗廠的經理劉國鈞先生，在他與我的通信中，有一段可以表示二十年前技術人才缺乏的情形，他說：

民國三年，卽來武進城內，與友人合組大綸機器織布廠，創全國未有之單純紗織布廠之新紀錄。國鈞雖自己祇在私塾讀書一年，未曾進過學堂，辦此機械織布新工業，學識不足。但想外人非生而知之者，製造機器，無中生有者很多，吾人買得此等進口現成布機，祇須認真苛求，無有不

能織布者，自信只要功夫深，鐵亦磨成針。以此自勵，并未聘請工程技師，全憑苦幹。于民國四年二月開工排機，至六月尙無成效。常有夜半思得一事，披衣而起，或乘半夜車往申求救。又費時四五月，毫無眉目（因彼時有織布機械知識者甚少，且購此舊機，無人負責裝置），請來機匠，連換三次，終未見效。在萬分困苦中，國鈞易服工衣，私進上海怡和織部，練習二天，并得一機匠，返常研究，始克略具頭緒。日在車間研究，忘食午膳者有之，燙傷軋壞我皮肉有之，此爲國鈞在發展工業過程中最初之困難。

這種困難，現在辦紗廠的人，是不會感到的。下面我們再引一段一個過來人所述的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事迹。這位過來人說：

技術艱深，那是最初動手就在覺悟中的，不過也沒有想到艱深到如此地步。那時蘇爾維法的秘密，在世界上還是金匱無缺，統制在一個組織之下。各國縱然也有幾家少數獨立驗廠，那是自己暗中摸索出來的，從來沒有真正在驗廠做過工的熟練技師放出來代人設計，各國也沒有現成的機

器發賣。不像近年，日本廠家，能出高價，就有阿快斯君代他設計，并且保管他出貨的品質和產量。難易之分，相隔天淵。我們那時候花幾萬元金錢，費幾個月功夫，造成一座機器，開動不到一個月，就而全部毀壞，變成廢铁的。從新再造吧，未見得新的一定比舊的有把握。徘徊審慎，這個煩惱，真沒有言語可以形容。至于開一天工，停下修理十天半個月的玩意，更是家常便飯，有時教人吐不出氣來。昏天黑地的幹，一共七八年，工程上這樣幸而敷衍下來了。

辦理永利的人所遇到的煩惱，辦理開成，天原，天利的人是不會遇到的，可見中國的技術人才，是逐漸加多了。另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中國技術人才的增加的，就是中國各工廠中，外國的工程師，已經少見了。有一個時期，中國工廠中離不了外國工程師，正如以前的國立大學，離不開外國教習一樣。現在，像我所參觀過的三十幾個工廠中，只有兩家還用外國的技術人才，其餘的工廠，技術方面，都由中國人主持。上海水泥公司的經理華潤泉先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他說，工廠中有一個外國技術人員，便如多添了一處租界，使管理的人，發生許多麻煩，

因爲廠中所定的一切規則，外國人都可以不遵守，這種租界，自然早取消愈早愈好。工廠中外籍技術人員，除不易管理外，薪水過高，也是使中國人不願請教的一個原因。以後中國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多，外籍的技術人員，在中國工廠中，恐難有立足之地了。

技術人員的加增，自然要歸功于政府的留學政策，及大學政策，不過現在中國的技術人員，從量的方面看去，還是不夠用的，而且中國的技術人員，並不是在每一方面都是有代表的，特別在重工業方面，現在恐怕還要借重客卿。救濟的方法，治標自然是繼續過去的留學政策，治本還在充實本國的大學及研究院。

以上所討論的，特別注重于上級的技術人才。但中國不但缺乏上級的技術人才，就是中級的技術人才，也是隨處都感不足。這種人才，本來應當由職業學校供給，但中國過去對於職業教育，太不注意了，以致現在一切的工廠，對於此種人才，只好自己訓練。許多工廠中，都招收練習生，許多是高中畢業的，也有在高小畢業的，在廠中受過相當時期的訓練以後，才可在廠中擔任工作。這種辦法，在最近的將來，各工廠一定還會繼續下去的，因爲社會上訓練這種中級技術人才的機關，現在還不夠用。

(三)管理

過去許多工廠的失敗，都是由于管理不得其法。管理問題，非常複雜，現在分作四方面討論。

第一，我們先論廠屋與機器的管理。過去有許多辦理工廠的人，把招股所得的資本，大部份拿來建廠屋，買機器，只留一小部份的錢來做流動資本，于是在開工出貨的時候，時感周轉不靈，不得已，只好將廠屋及機器作押，向銀行借貸。年底計算，如有盈餘，先還銀行欠款，次分官利紅利，對於公積及折舊等事，不知亦不能顧及，如此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廠屋及機器都陳舊了，生產力量減低，而生產費用却加高，與同行的競爭，當然失敗，金融機關或政府方面，如不加以救濟，這種工廠，只有宣告破產。我們如研究中國的工業失敗史，一定可以發現許多廠家，都是循着上面所述的途徑，走到破產的歸宿。根據在工業界有多年經驗的人的觀察，中國各工廠，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指廠屋及機器等）的分配，常爲一與三之比，如使其比例爲三比一，即使流動資本，三倍于固定資本，則辦理工廠的風險，就要減少許多。因爲流動資本的數量加多，則向銀行借款的機會便減少，因而利息的擔負也就減輕，所以在股本招足的時候，以幾成建廠屋，購機器，以

幾成作平常事業上的活動，乃是管理工廠的人，第一個要細心考慮的問題。在資本缺乏的中國，欲使一般開辦工廠的人，把流動資本的百分數提高，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應當以此為標準。除此以外，辦理工廠的人，在資產負債表內，決不可忘記把公積與折舊列入，而且最好在分配盈餘之前，便把這兩項用度提出，因為不如此，即使廠方有一個時期可分盈餘，而終以廠屋與機器陳舊，無錢抵補，也會破產的。據唐星海先生說，日本紗廠之所以能保持勝利，設備永不落伍，便是因為注重公積與折舊之故。唐先生特別拿出一本上海紡織株式會社的某一期營業報告書給我，該社的資本六百萬兩，公積金已有三百五十八萬兩，已超過資本額的一半。在那一期的營業報告書內，有一利益分配表，極可注意。在盈餘的一百二十五萬兩中，不到三分之一，便是三十九萬兩，是以官利紅利的名義，分與股東的，其餘的部份，有二十五萬是折舊準備金，四十五萬歸入下期計算，其餘的便分入幾種公積準備金。我們只要看一下這種報告，就知道這個紡織株式會社的基礎是很穩固的，一般商業上的風險，決打不倒這個帶固根本的組織。中國現在也有好些工廠，注意到這個根本的問題，阜豐公司，便是一個好例。在二十

四年度的帳略中，阜豐表現出他的資本，雖只一百萬元，而公積已有八九十萬元，折舊也有七十八萬元。阜豐的設備，能夠日新月異，當然要歸功于這種管理的方針。

第二，論人的管理。工廠中的人事管辦，可以分作職員與工人兩方面討論。職員的任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有一個在上海辦理工業多年的人，前幾年事業失敗了，我曾請教他的同行，打聽這位先生失敗的原因。據許多人說，這位先生在用人方面，沒有採取人才主義，總是用親戚本家，其次用同鄉，其次再用別地的人，這種用人方針，是他失敗的主要原因。我想在中國的舊倫理觀念之下，用人不脫這種窠臼的，實在不多。為避免當事者的麻煩起見，對於職員的進用，莫如實行考試制度。商務印書館，便是實行這種制度的。該館所定的規則，凡是進來的人，除了有特別技能，或者很高的程度之外，其他的都要經過考試。年青的剛離學校的學生，考取進館之後，高小程度的要做三年學生，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的，至少也要當二年或一年的學生。他們不是單掛學生的名義，還要受兩種訓練：第一種是業務上的訓練，第二種是普通知識的訓練。這種考取再加訓練的職員，其服務的能力，當然比靠講情面進來的，要高得多。此舉很可為一般工廠所取法。

職員入廠之後，應當有嚴密的獎懲方法，來加增他們的工
作效率。凡是講科學管理的工廠，如商務印書館，如康元
製罐廠，對此均有細密的規定。但也有好些工廠，其加增
效率的方法，完全靠經理或廠長以身作則。一以法治，一
以人治，兩種制度，在小規模的工廠中，其優劣不易看出
，但在大規模的工廠中，無疑的應當採取法治，只有嚴密
的規章，加上嚴密的稽核，才可使各個職員各盡其職，為
工廠的生產而努力。

管理工人的目標，概括的說，共有兩個，第一是要加
增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是要預防工潮。提高工人工作效
率的方法，各廠採用的，約有四種：一為入廠時的體格檢
查，于是身體孱弱，不堪工作的，都被淘汰了。二為入廠
後的訓練，在好些工廠中，訓練不只是技術的，同時對於
做人之道，普通常識，精神訓話等，也多加以注意。亞浦
耳廠的經理胡西園先生曾說過，如想每個工人成爲一個好
的工人，先要使他成爲一個好人，這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話
。第三便是用獎勵的方法使工人生產的多少，與他收入的
多寡，發生密切的關係，件工制爲多數工廠所採用，便是
由于這個原因。四爲辦理工人宿舍，使工人與外界少接觸

，藉免傳染惡習，同時因起居有時，飲食有節，工人的精

神，也不致在不正當的娛樂上浪費，其影響于生產的能力
是很大的。關於預防工潮，據多數廠家的意見，最有效的
方法莫如由廠方自動的爲工人謀福利。在我所參觀過的工
廠中，工作環境，可以說是都在水平線以上，華成，慶豐
，大成等廠，還有冷熱氣的設備。至于無錫的華新絲廠，
其環境與學校相彷彿，即與外國管理最良的工廠相比，亦
不多讓。據云：工作環境不良之工廠，多係小廠之用學徒
制的，以後如同業公會的組織嚴固，此種現象，或可改善
。除工作環境的改良之外，各工廠中，對於補習教育，運
動及醫藥設備，養老金，團體壽險等，已有多數加以注意
，尤以前數項爲普遍。天厨味精廠，對於服務滿十年的工
人，給以一年的工資，名爲惟舊酬金。商務印書館鼓勵職
工保險，保費由公司出一半，個人出一半。康元製罐廠，
鼓勵集團結婚，凡參加上海市集團結婚，其參加費二十元
，由廠方贈與，此外廠方每兩月舉行集團結婚一次，一切
佈置，由總務部負責，茶點亦由廠方酌備，參加的人，不
得發喜帖，或設宴款客，以省費用。大成現正籌設公墓，
使工人因病逝世的，不必另籌墓地。以上這幾點，是比較
特別的，但也可以表示近來廠方爲工人謀福利的趨勢。

第三，論物料的管理。工廠的工作，就是購進原料，

使他變成製造品，然後以之出售。自購進原料以至製造品的出售，中間都可發生很多弊端，使成本加重的。辦理不善的工廠，有兩種弊端是普遍的。其一是買賣的舞弊，即在買貨賣貨時收取佣金；或以次等原料，冒充上等原料，交付工廠；成與商人勾結，減低貨色分量，從中漁利。其二是製造時的舞弊，如故意浪費，或從中偷料，而以廢物名義售品，以圖非分之利。如在紗廠中當事的人，出售廢花；或在絲廠中工作的人，出售廢絲等事，都可以表明這些工廠管理的不得法。管理已上軌道的工廠，沒有一種材料，是可以當廢物看待的。記得以前在美國參觀一個屠場，場中的司事，對我說過，在那屠場中，沒有一件廢物，只有牛羊臨死時的一聲哀鳴，屠場中不能利用。這種經濟的物料管理法，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這次在無錫參觀華新絲廠時，廠長薛祖康先生，說在他的廠中，也沒有一點廢物，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我便問他，繭中的死蛹，是否也有用途，他說，死蛹可以作肥料出售，或拿來培植桑樹，決不可視作廢物。我想每一個工廠中，如管理的人，其肯用心，決不難發現廢物利用的途徑。至于有意的作弊，廢除之法，只有一方面對于進用職工時，加以謹慎；另一方面，對於防止作弊的方法，須嚴密制定。有好些紗廠

的經理告訴我，他們廠中，在某一時期，存了若干棉花，紡成了若干包紗，織成了若干疋布，這些紗或布，放在什麼地方，可以查攷一下簿記，便立刻回答得出。一個工廠中，如有這種嚴密的簿記，作弊是不容易的。

最後，我們可以論錢的管理。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對於錢的管理，曾發表下列的意見：

本館舉辦新式會計最早，近年迭有改進，規定頗為嚴密。款項之進出，咸須經過多人之手，并隨時受審核部之檢查，故數十年來絕少弊端。查我國工商業之失敗，除因營業上正當之損失外，多有由于主管人之移用公款，經營私利者。本館除主管人均能安分盡職，恪守信義外，會計制度之嚴密，使公私款項，絕對不能相混，實亦本館數十年來維持不敗之一要因。

王先生所說的主管人移用公款，經營私利，我在上海也聽到許多的報告，如某紗廠的失敗，係由經理之子，挪用廠方款項，私作投機生意；某罐頭公司的失敗，亦因經理挪動公司款項，投資于個人所創辦的事業。所以新式會計的採用，以及會計，出納，稽核等事務的分立，一方面可使職責分明，一方面可收互行監督之效，實為一切工廠

中急不可緩之圖。

以上所論四點，一廠屋與機器，二人事，三物料，四金錢，已經把工廠管理的四個主要方面都談到了。過去失敗的事業，每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他人，但我們敢說其

中有一大部份，其失敗係因自己腐敗，并非由于外界的壓迫。反是，如一個工廠在上述的四方面，都有辦法，那麼外界的壓力，是打他不倒的。

（未完）

讀經平議

胡適

前幾年陳濟棠先生在廣東，何鍵先生在湖南，都提倡讀經。去年陳濟棠先生下野之後，現在提倡讀經的領袖，南方仍是何鍵先生，北方有宋哲元先生。何鍵先生本年在三中全會提出一個明令讀經的議案，他的辦法大致是要兒童從小學到中學十二年之間，讀孝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到了大學，應選讀他經。冀察兩省也有提倡小學中學讀經的辦法。

的功效；五經的勢力在政治上遠不如「貞觀政要」，在宗教道德上遠不如「太上感應篇」。(三)各個時代所謂經學，其實都只是每個時代的哲學；漢宋學者都只是用經學來傅會他們自己的時代思想；我們在今日要想根據五經來造這時代哲學是辦不到的了。

學校讀經的問題，傅孟真先生在兩年前的大公報早期論文（二十四年四月七日）裏曾有很詳細的討論。（轉載在獨立評論一四六號）他先從歷史上考察，指出三項事實（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創業都不靠經學，而後來提倡經學之後，國力往往衰弱；漢唐宋明都是實例。（二）經學在過去的社會裏，有裝點門面之用，並沒有修齊治平

傅先生又從現在事實上立論，指出兩點：（一）現在兒童的小學中學課程已太繁重了，決不可再加上難讀的經書了。（二）經過這三百年來的樸學時代，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承認六經的難讀：「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

傅孟真先生是經史學根柢最深的人，他來討論這讀經問題，正是專家說內行話，句句值得提倡讀經的人仔細考

慮。當時我十分贊同傅先生的議論，我也在獨立評論上（第一四六號）發表了一篇「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裏），特別引中他的最後一段議論。我指出近幾十年來的「新經學」的教訓是要我們知道古代經書的難讀。博學如王國維先生，也不能不承認「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觀堂集林卷一，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我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古經典在今日還正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的時期。我當時說：

詩，書，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分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工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這都是兩年前的老話。不幸我們說的話，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都不肯垂聽。他們偏不肯服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訓，很輕率的把幾百萬兒童的學校課程，體力腦力，都看作他們可以隨便逞胸臆支配的事。我們有言責的人，對於這種輕率的行為不能不指摘，對於這種重要問題不能不鄭重討論。

我現在用很簡單的語言，表明我個人對於學校讀經問題的見解：

第一，我們絕對的反對小學校讀經。這是三十多年來教育家久已有定論的問題，不待今日再仔細討論。小學一律用國語教本，這是國家的法令，任何區域內任何人強迫小學校用古文字的經典教學，就是違背國家法令，破壞教育統一，這是政府應該明令禁止的。何況今日的小學教員自己本來就沒有受過讀經的教育，如何能教兒童讀經？

第二，初中高中的選讀古文，本來沒有不許選讀古經傳文字の規定，所以中學教本中，不妨選讀古經傳中容易了解的文字。今日初中讀本往往選孟子論語詩經左傳禮記，高中讀本竟有選到尙書小雅大雅的。中學選讀古經傳，有幾點必須特別注意：（一）中學選古經傳，必須限於那些學者公認為可解的部分。今日有些選本實在選的不妥當，

例如傅東華先生的高中國文第一冊就選了小雅的「六月」

和大雅的「民勞」，這正是王國維先生一流學者認為不易解的部分。（例如民勞的詩的「汜」字，「式」字，傅君皆無註。今年中央研究院丁聲樹先生發表專文釋「式」字，是爲此字第一次得着科學的解釋。）（二）中學選古經傳的文字，與其他子史集部的文字同等，都是把他們看作古人的好文字，都是選來代表一個時代的好文學，都不是「讀經」的功課。例如孟子「魚我所欲也」一章，是最懇切哀艷的美文，無論他是經是傳是文集，都應該選讀。我們把經史子集裏的一切好文章都一律平等看待，使青年學子知道古經傳裏也有悱惻哀艷的美文，這是引導青年讀古經最有效的法門。（三）如果中學生被這些經傳美文引誘去讀四書詩經等書，教師應該鼓勵他們，指示他們的途徑，給他們充分的幫助。但我們絕對反對中學有「讀經」的專課，因爲古經傳（包括孝經四書）的大部分是不合現代生活的，是十二歲到十七八歲（中學年齡）的一般孩子們不能充分了解的。我們都是嘗過此中甘苦的人，試問我們十幾歲時對於「天命之謂性」「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類的話作何了解！我們當時只須讀幾本官板經書，不妨糟蹋一點時間去猜古謎；現在的兒童應該學的東西太多了，他們的精力

不可再浪費了！

最後，我有一個愚見，要奉勸今日提倡讀經文武諸公。諸公都是成年的人了，大可以讀經了，不妨多費一點工夫去讀讀諸公要小孩子讀的聖賢經傳。不但一讀再讀，還應該身體力行。諸公最應該讀的，第一是孝經的第十五章：聖人說：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諸公試自省，諸公有幾個諍臣呢？第二應該讀的是論語第十三篇的「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一章，特別是那一章的下半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爲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諸公試自省，諸公提一案，下一令，影響到幾百萬兒童的學業體力，而諸公屬下專司教育的廳長局長是不是都唯唯

諾諾奉命唯謹呢？這是不是已到了「不善而莫之違」的程
度呢？諸公讀的聖賢經傳，難道不記憶了嗎？

廿六，四，十四夜（四月十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

陳序經

自從我的那篇「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在獨立評論一
九六號發表以來，關於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在獨立評論
發表的，有楊駿昌先生的「論鄉村建設運動」（一九八號）
，傅葆琛先生的「衆目睽睽下的鄉建設運動」（一九九號）
瞿勃農先生的「以工作答覆批評」（二〇二號），濤鳴先生
的「此路不通」（二〇九號），陳志潛先生的「唯一出路」
（二一五號），黃省敏先生的「讀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敬
答陳序經先生」（二一六號）。在民間半月刊發表的，從二
卷二十四期至三卷三期已有七八篇。此外在文化與教育旬
刊，政問週刊，以及他種刊物上發表的尚有很多。

這些文章，大多數是不滿意於我那篇文而發表的。不
過批評我那篇文的人，或是辯護今日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工
作的人，完全是一般提倡或從事於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的人
。我細心讀了他們的文章之後，覺得他們所說的話，並不
否認我所指出的各種困難與缺點。民間半月刊上所發表的

好多文章，固是如此，就是批評我很厲害而盡力辯護今日
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工作的黃省敏先生，不但不能證明我所
指出的各種困難與缺點是不對，而且一再承認今日的鄉村
工作的「不到家」與「不滿意」。

又如楊駿昌先生會把所提出的各點，逐條討論。他不
但屢屢聲明我所說的話都是目前鄉村建設運動中所表現的
事實，而且指出「現在國內各界對於鄉建工作和陳先生一
樣看法的，恐怕還很多」。我可以說，我寫那篇文的動機
，不外是指出目前一般鄉村建設運動的缺點與困難。假使
我所說的話，而正是很多人所要說的話，那麼我的話並不
是我個人的私見，至多也不過是說了一般普通的人們所欲
說而却不說，或尚未說的話罷。

一般提倡與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每每指出以往好
多的運動的失敗，以及現在各種運動的錯誤，而堅決的相
信他們所謂鄉村建設運動，是民族自救，國家復興的，「

唯一」或「最後」的覺悟。比方，梁漱溟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一書，孫伏園先生在民間半月刊一卷一期所發表「鄉村建設實驗工作」一文，與在晏陽初先生的言論裏，在瞿菊農先生的著作裏，都是這樣看法。然而經過這一次的討論之後，他們多數已很肯定的相信，所謂鄉村建設運動，只是救國工作的一種工作。比方瞿菊農先生在以工作答覆批評一文裏說：「即使鄉村建設不是惟一的救國的路，但至少是應該努力的一種工作」。

其實一般人所謂鄉村建設運動，在目前既尚未超過試驗的時期，不但不能謂爲救國的唯一路徑，恐怕也不能謂爲救國的一種辦法。因爲既曰試驗工作，則能否成功，固是有了問題，即算能夠成功，然而能否推廣，也是有了問題。在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正像我已說過，救濟一般已在鄉村裏從事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的工作人員，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救國救民，是談不到的。

總之，提倡或從事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的人，既並不否認我所指出今日一般鄉村工作的缺點與困難，而又改變其本來態度，相信這個運動不是救國的唯一途徑，這不能不算作提倡或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的一種新覺悟。

一般提倡或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多以爲我對於這個運動，不應持悲觀態度。我很懷疑，我的悲觀是否像梁漱溟先生的那樣的「不寒而慄」，是否像晏陽初先生那樣的「慄慄危懼」。其實我之所以悲觀，恐怕未嘗不是受了這些領袖的暗示而來，至於傅傑琛先生以爲我所抄錄梁晏兩位先生的話，是近於斷章取義，那是很大的錯誤，難道傅先生忘記了梁先生所說那些話是他的報告的結論，而晏先生所說那些話是他的報告的引言嗎？

我之所以感覺悲觀，乃是由於近年以來的鄉村建設運動有的是失敗了，有的尚在失敗的途中。假使提倡或從事於鄉村建設運動工作的人，不能在工作上給我們良好印象，而徒然要人們存着空洞的樂觀，試問這種樂觀，又有什麼用處？

何況悲觀未必一定是壞的。一個很有名的法國人曾說過：沒有悲觀，世界上不會有很大的造就。傅先生也曾說過，「失敗是成功之母」。成功既能使我們樂觀，失敗當然會使我們悲觀。

陳培光先生在教育旬刊八十八期所發表「鄉村建設運動的前途果足以悲觀嗎？」一文，以爲梁先生的「不寒而慄」，晏先生的「慄慄危懼」全是當事人虛心自檢的話，

我在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文，已經指出這兩位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的領袖說的，不只是一「謙抑戒懼」，反之我覺得鄉村建設運動之所以令人失望原因，也許很多，然而善於誇張自己的工作成績，可以說是主要原因之一。「鄉村建設實驗」第二集，紀錄集曾經過裏有了下面一段話，證明我這種看法是對的。

在這兩天連接的報告中，大概我們可以看出一種傾向：就是大多數述說各團體的功績，和他們是怎樣努力鄉建，怎樣的認識鄉建，對於實際問題，似乎很少很少提出。

又如凡是到鄉村建設實驗區參觀的人們，也很容易明白領導參觀或主持工作的人所給人們的一個印象，多是「述說他們的功績，和他們怎樣的努力鄉建，怎樣的認識鄉建」。我們知道，定縣的鄉村建設工作，三十年來得了不少的地方紳士與私人團體的提倡試驗，以及縣政府與省政府的幫忙，然而試問三十年來所謂功績究竟何在？所謂努力究有何益？所謂認識究竟何用？從事定縣的鄉村建設工作，人才最多，經費最裕，而年數又最久，然其結果，也不過如此，其他各處，可以想而知了？

今日好多提倡與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人，表面上雖好像歡迎局外者的批評（民間半月刊一卷一期發刊辭）然而事

實上，局外人一說及他們的缺點與困難，他們却又要說道：「我們不希望運動以外的君子譏評」（民間二卷廿三期）。這好像是矛盾，這好像是狹見。其實一般提倡或從事於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好像不但不願運動以外的人批評，還要人家鼓勵他們，正如傅葆琛先生所說：

凡不站在鄉建運動的人們，不但應當時時對這種運動，表充分的同情，而且應當盡力協助，並從旁鼓勵，如同看長途賽跑的人，在圈外不斷的吶喊着，希望着，至少他們能給予跑者精神上的興奮。

我很可惜，理性上既不許我去鼓勵今日一般之所謂鄉村建設運動，感情上也不許我去鼓勵今日一般之所謂鄉村建設運動的工作。原因是這種運動既築在一個很不健全的理论上，而這種工作不但少有益處，而且往往生出不少的弊病。正如一個氣力本不適宜於長途賽跑而却不自量其氣力之不適宜而偏要參加這種賽跑的人，圈外人若要他勉強增加速度，那恐怕結果是「欲益反損」罷。

我的愚見是：真正的工作既不怕人家批評，真正的工作，也決不會因人家批評而失却了價值。只有有名無實的工作，纔怕人家批評。然而這種工作，就使沒有人家去批評，就使請人去歌頌與鼓勵，也決不會增加其價值。其實

若說一種稱爲救國的唯一途徑的運動，爲了一兩篇批評的文章，而能破壞其前途，那好像愈顯出這個運動的價值太低罷。

在「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文裏，我以爲凡是稍能知道十餘年來的鄉村建設運動史的人，都免不得會覺到這種運動已經有了很多失敗，而且有了不少還正在失敗的途上。一般不滿意於我那篇文的人，既並不否認這些事實，那麼鄉村建設運動的前途之未可樂觀，與我之所以「頗感覺悲觀」，只是自然而然的。我雖指出定縣與鄒平的工作的缺點與困難，然我並未斷言其必定失敗。可是近來一位很熱心於鄉村建設運動工作的朋友，却很肯定的說鄒平是必定失敗的。鄒平是否要失敗，我們在這裏，不願加以斷言。不過，鄒平的工作近來已經縮小範圍，這是無可諱言的。

最近來陳國鈞先生在中國建設十四卷第四期發表「濟南市和山東省及鄒平縣的概況」裏，曾有下面一段話，我願意抄之於下。

余由鄒平回周村，途中到各農家閒談，似乎農民對於研究院，（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沒有很好的印象。他們總說：種美棉本來是好不過，研究院未辦以

前，我們就種了美棉。以後就一年一年的發展，研究院所種的美棉，並不見得比我們自己種的好。養豬一項，似乎研究院的豬肥些，可以到二百多斤，不過要養一年或二年之久，而我們所養本地的豬，一年可以四次，比較還是養本地豬合算得多。此外沒有看見研究院甚麼好處。這固然不能說老百姓的觀察一定是對的，不過我總覺得研究院和鄒平縣政府似乎還沒有深入民間，獲得着百姓的同情。辦鄉村建設，而不得到老百姓的同情，總是一種最大的缺點。

數年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之向外間宣傳其工作之最有（也許是唯一的）成績的，是種美棉了。然而從這段話看起來，研究院之提倡種美棉，不但是在鄒平的老百姓已種美棉之後，而且研究院所種的美棉，並不見得比鄒平的老百姓所種的好。研究院的工作之在鄒平的成功與失敗，至少可以從這一點上知其大概。而且從陳國鈞先生的話看起來，正足以證明我在「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文所說：深入民間尚做不到，還談什麼建設鄉村？

至於定縣方面，楊駿昌先生在他那篇文已經說道「現在的定縣平民教育會又因各勢力所迫，而不得不易地試驗

別起爐灶了。」以定縣已有歷史上鄉村建設的相當基礎，再加以平教會十年的努力，其結果也不過如此，「別起爐灶」，「易地試驗」，而謂其必能成功，那是不能不使人懷疑的。

其實近來國內各處所謂鄉村建設運動之衰落，是一種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只要隨便的舉出幾個例，便能明白。政府機關如農村復興委員會，學校實驗區如燕京的清河鎮，或則已被裁撤，或則停止工作。他如金融機關慈善團體之從事於這種工作者，照各方面的觀察，前途均未可樂觀。最近「中國建設」十二卷五期裏有一位述及四川鄉村建設的史略，指出四川的鄉村建設運動已趨於日暮途窮的地步。馬伯援先生在民間半月刊三卷十八期所發表「這一年在湖北鄉間所得到的情報」一文，明白的指出湖北鄉村工作的失敗。馬先生且說：

賀函之一

復 堂

適之先生：

新大陸歸國後，始終沒有機會見面，北來友人，常常聽到關於你近狀的片段，所以精神上還是很接近的。前幾

我們中國江湖式的學者與政客，借主義或學說去騙領袖，領袖愛國情深，委他去作，他的官運亨通，自己從不走到民間，實地工作，却立一個機關，或講習所，遍布爪牙，諸事包辦，有個人無國家，有官治無民治，有什麼合作保甲倉庫可言？完全是欺騙領袖，借復興農村美名，爲自己升官發財耳。我願意把民間編者在「編輯後記」一段話，來做本篇的結論：

馬先生在本文內所說的好多事實，我們相信不致於有，但是馬先生又都有實事爲證，我們又怎敢說他不是事實。不過我們也不願意多說什麼，我們祇得馬先生的結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一點不錯的。

天在報紙上看見獨立評論復刊的消息，使我興奮到不可名狀。中國歷史上危急存亡的關頭，轉換時局關鍵，始終在幾個文人身上。不幸五口通商以後，中國的文人沒有受到

西洋文明的好處，精神上却無形中受了殖民文化的斷喪，一批一批過江名士，終落得晚節不終，一堆一堆通儒達人，終究無補蒼生。

獨立評論產生於國難嚴重之日，獨立評論的作者，過去會和前方的戰士，同樣地在精神上為民族國家衝鋒肉搏。獨立評論所代表的精神，曾經替民族支持半壁的山。全國讀者雖然與這個刊物小別了數月，然而大眾的神經中，永遠忘不掉這個刊物，永遠禱祝獨立評論這個營壘中的鬥士，照舊向前奮鬥！

更生後的獨立評論內容如何，現在還不曉得，但是我却希望仍舊要保持過去的優點，不要太漢學化了。在北平的環境中，學者們很自然的要流於漢學化。在過去，且有不少自命愛護胡適之的人，每吟惜適之何不絕對漢學化。

編輯後記 適之

△吳景超先生討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長文，是近日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著作，我們讀了可以增加不少的知識，不少的勇氣。可惜原文登在「行政研究」的一月號裏，得讀的人恐怕不很多，所以我們轉載在這裏。

△陳序經先生又來討論「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了。去年濟寧的新鄉建運動成立以來，這個運動很像轉了一個

記得前年瞿秋白臨死時對新聞記者談話，也有這種口調。這是一種錯誤。社會上花多少力量，造成一個領導者，難道他的歸宿，只在藝文志一類典籍中增加幾行紀述！何況我們的民族國家是什麼一個境界呢！

敬祝獨立評論的復興，並諸位鬥士的努力！

復堂，四月十四日於南京

△附答書

復堂先生：

謝謝你祝賀獨立復刊的信。你誇獎我們的話，我們實在不敢當。我們雖然遵照你的意思把這信發表了，心裏着實感覺慚愧。

我們盼望你不要忘了替獨立作文的舊約；六百字的短信是救不了米糧庫缺糧的危急的呵！

適之

新的方向。我們希望陳先生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朋友能考察這個新試驗，記載出來，給我們發表。

△陳之邁先生在獨立第二二七號的「漫遊雜感」裏，曾提到蕭縣的土地陳報，誤記為前任縣長王公瓊辦的，其實此事是前任姚雪懷縣長自廿四年辦起的。陳先生要我們在這裏替他更正。

△獨立復刊之後，我們收到了各地朋友的賀電賀函，不能一一奉覆，只好在這裏向大家深深道謝。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畫報

創刊紀念
特價發售

創刊號照定價八折發售
預定全年照定價七折計算

本館發行的兒童定期刊物，有兒童世界和兒童畫報兩種，早已風行於小學生界。茲為滿足中小學生及一般青年的求知慾，特又創刊少年畫報，以嶄新的姿勢，與讀者相見。其內容編制與形式，略述於次：

少年畫報的內容

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本刊的使命，就在用真實的圖畫和淺顯的文字，介紹種種新知識與新事物，使讀者的認識，格外深刻而真切。內容範圍甚廣，包括自然科學、應用技術、社會藝術等等。舉凡宇宙間的奇觀，自然界的現象，生命的種種活動和作用，機械之發明、構造、和利用，都有圖文解釋得很清楚。同時對於社會、藝術、史地和身心娛樂方面的材料，本刊也給以重要地位，源源介紹。

少年畫報的編制

本刊的內容，以圖畫為主體，但是文字的欣賞，亦不忽略。其編制以圖畫為主的佔全部五分之四，除時事照片等僅須簡單的註釋外，關於科學知識之介紹，每幅以相當篇幅之有系統有趣味的文字說明，俾讀者按圖索驥，而得其概括觀念。其餘五分之一為文字敘述，但仍以精密的插圖襯托出來，使讀者感覺得親切有味。

少年畫報的形式

本刊用三開版本，圖畫部份每期三十二面，全部用重磅紙張，影寫版精印；文字部份，每期八面，用上等新聞紙印。封面、月份牌紙，彩色照相膠版或彩色影寫版套印，尤為圖畫輔飾中所備見。

少年畫報的售價

本刊每月一册，一日出版，零售每册二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二元四角。創刊之始，發售特價兩個月，創刊號零售每册一角六分，預定全年照定價七折計算，祇收一元六角八分，每册祇合一角四分，可謂低廉無比。特價自四月一日起至五月底止。

商務印書館紀念兒童節 創刊少年畫報舉行 三種雜誌 聯合優待特價辦法

- 1、少年畫報 零售每册二角，創刊號照定價八折發售。
- 2、少年畫報 預定價全年十二册二元四角，半年六册一元二角五分，優待期內定閱全年，照定價七折計算，祇收一元六角八分。（國內郵費在內）
- 3、定閱少年畫報，同時加定兒童世界或兒童畫報全年者，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照定價八折計算。（兒童世界全年廿四册，定價二元四角；兒童畫報全年廿四册，定價一元六角。）
- 4、特價辦法自廿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五月底截止。

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

陳之邁

中國內政上近日來一件大事是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會選舉法的修改。按國民大會本定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是年夏間各地方候選人之推舉一時極形忙碌。後來因推舉候選人過忙發生糾紛及困難，國民大會遂以籌備不及為理由而延期至今年十一月十二日，選舉法亦經五屆三中全會授權給中央常務委員會修正，近三數日中常會的修正也是由此而來。此項修正尚須交立法院一完成立法程序，但立法院是須遵照中常會的原則的，故原則上一定沒有變更。

這次修改重要之點有三。第一，除特種選舉外，關於指定（圈定）候選人之辦法一律取消。按國民大會選舉法規定第一步是由地方推選十倍於名額的候選人，第二步是國府就中指定三倍於名額的候選人，第三步是選民就此中選舉其代表。例如湖北省區域代表名額為四十人；湖北省各區各縣便聯合推出四百人（十倍）為候選人，國府就中指定一百二十人（三倍）候選人，選民再就此一百二十人中選出四十名代表。此項辦法在去年夏間便會舉行，大致完

成，中央亦組織了圈選委員會為指定之機關；但是終因種種人事的關係，不知何去何留，故未敢指定。按這種圈定或指定的辦法，在國民黨內部組織中行之甚久，為一種有效的統制辦法。立法院制定國民大會選舉法時採用這種辦法，其淵源也是從黨內的選舉來的。但是黨裏的辦法，未能施用於全國；在各地的十倍候選人推出之後，國府便看出這個辦法之不妥，因為被推選為候選人而被淘汰的百分之七十的人必然對國府表示不滿，而在國府指定時國府又必受種種的運動及鑽營。這是這次廢指定制的原因。但是去年推出的那一萬多位候選人，又當怎樣處理，在報紙上却看不出來。

第二，國民大會職權隆重，鑽營必烈，所以這次修正之又一點是將國民大會的職權縮小。按從前的規定，這一次的國民大會行使憲法草案中國民大會的職權，任期六年，選舉中央各種官員，並行使創制，複決及修改憲法之權。此次修正則將其職權限於制定憲法及決定憲法施行日期，做了這兩件事後便「任務終了」。這樣國民大會便是一

個純粹制憲機關(Constituent Assembly)而不兼爲國家機關，一方面「得以專心壹志，鄭重努力於根本大法之制定」(四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社評)，「集中精力專於制憲，俾求完善之憲法產生」(二十四日大公報載某要人談話)，一方面亦因職務比較輕微，沒有選舉官員的權力，可以減低競爭爲代表者的熱烈情緒。間接選舉制往往形成了直接選舉制，在歐美各國亦然。人選問題究爲政治中的核心。例如美國總統選舉，本爲間接制，但演變結果事實上竟成了直接選舉制。但美國的總統選舉人專爲選舉總統而被選，尙無大碍，如果要讓他們担負別種任務往往便有諸種流弊。例如美國從前各邦議會選舉各邦派至中央的參議員，各邦議會的議員便有時竟因其擁護某人爲參議員而當選，其對於邦議會的工作竟成次要。過去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競爭之熱烈及令「讀者齒冷」，也便是因爲他們有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職權，其他職權相形之下反而不甚重要。

限制國民大會職權於制憲，已如上述，今其決定施行憲法日期一點，亦極重要。現在我們不能預料憲法被國民大會制定後是否便立刻施行；因此喧嚷已久的訓政時期結

束及憲政時期開始是否便在今年十一月實現，一切要看國民大會的決定，現在全無把握。鑒於近年結束訓政的問題議論紛紜，將這個決定交給國民大會當是一個最適宜的辦法，但該會無論如何決定均不能令人滿意，則在意中。

第三，變更國民大會的內部組成，其主要者有五點：

(一)國民政府主席不列席國民大會；(二)增國民政府指定之代表二百四十名；(三)特種選舉的代表如無法舉行選舉，亦得由國民政府指定；(四)國民大會當然出席代表不但包括國民黨全體中執監委并且包括全體候補中執監委(後者按從前規定只能列席)；(五)列席人員中除國民政府委員及各院部會長官外，從前國民大會主席團特許列席之人員一項現被取消。按以上五點，國府主席不列席的理由是「國民政府既有召集國民大會之權，國府主席當然可以參與，且主席爲一國元首，國民大會中并特設主席座位，中常會將此條刪去，實爲崇敬主席之意」(見四月二十四日各報所載某要人談話)。國民黨的最高機關——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法規裏雖然是由下級黨部選舉的，但自始即有一部分代表逕由中央指派出席或列席，而下來所謂選舉的部分，直接選出代表名額者甚少，大部分是選出加倍候

選人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倍候選人就中選舉。現在國民大會有依區域選舉方法選出者六百六十五名，依職業選舉方法選出者三百八十名，依特種選舉方法選出者一百五十五名，合共一千二百名，現在添加逕由國府指定的二百四十人，其方法是採自國民黨的成規，而將國民大會代表的人數擴張到一千四百四十名的數目。中央執監委員及候補執監委員現在共有二百六十名，連前合計，總數出席的人數便達一千七百人的鉅額。國府在指定之時，當然不指定已有資格出席的人，而中央委員都極有被選舉（區域的或職業的）之希望，故事實上出席者或不達這個最高的數額。國府委員幾完全是中央委員，各院部會長官也大半是中央委員，而非中央委員的國府委員等亦極有被選舉為代表之可能，故所謂列席人員實際上是虛設的。在這一千七百位出席人員中，政府可以把握得住的有全體中央委員二百六十人，指定的二百四十人；如果特種選舉不能辦理，又有一百五十五人，合計六百五十五人。若果各中委及下級黨務人員以及政府現任長官及官吏能夠有相當數目被人民選出為其代表，黨及政府便能在國民大會中佔得極大的勢力。固然我們深知政府中人并不見得完全一致，就是國民黨中也有「黨內的多黨狀態」，派系林立，但這次國

民大會之極度受黨及政府之拘束，則為顯而易見的事實。在選舉中，黨及政府的拘束力量亦至偉大。辦理選舉者為當地政府，固無論矣，選舉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年滿二十歲，經公民宣誓者，有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之權」。所謂公民宣誓的誓詞為：

×××正心誠意，當衆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

國民大會組織法也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於舉行國民大會開會式時，應行宣誓，其誓詞如左：

×××敬以至誠，代表中華民國人民，接受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依法行使職權，并遵守國民大會之紀律，謹誓！

鑒於憲法草案的弁言是：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付託，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制茲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而所要建立的「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以上所列的誓詞，當然是一貫的。

但是這便引起了中國政治前途的問題來。中國將來要建立的是一個英美式的政黨政治，抑是俄意德式的一黨政治，抑是胡適之先生所謂「無黨政治」（其實從傳統政黨政治的看法，一黨政治便是無黨政治，沒有反對黨的政黨便不能成爲政黨），現在可謂毫無定論。民國初年的國民黨是一個英美式的政黨。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黨，聯合而成國民黨，開成立大會時孫中山先生亦臨席演說。那時除了國民黨外，尚有別的政黨；國民黨的宣言也說：「一國政黨之興也，祇宜兩黨對峙，不宜小羣分立。」議會制度本須要兩個以上的政黨方能運用，這種政黨是所謂「議會制度下的政黨」(Parliamentary Party)，孫中山先生那時的意見也只是把國民黨列爲兩個以上政黨之一，雖則他當然希望國民黨成爲最大的政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國民黨便拋棄了議會政治的主張而採取了一黨專政的理論，倣效蘇俄的共產黨而希望成爲一個「壟斷政權的政黨」(Monopolistic Party)。這種政黨觀念一直維持到今日，使得國民黨中的人對於民初國民黨都表示不滿，說「當時祇圖黨勢之擴張，不求主義之貫徹」。

在過去的歷史之中，國民黨同外國許多大黨一樣，曾

把小黨吸收了進來。譬如現在國民黨若干元老，從前曾爲無政府主義派的領袖；十三年容共，後來的反共，及近日「根絕赤禍案」所列的條件，都是小黨被國民黨吸收的實例。今後國民黨是否仍然不許人批評主義及遺教而別組政黨呢？抑或是從現在「壟斷政權的政黨」回復到民初的「議會制度下的政黨」呢？甘乃光先生這樣推測：

國民大會開會後，若容許他黨存在，則由一黨制而變爲多黨制，其趨勢至少有兩個可能，一爲國民黨自己分爲若干派，一爲容許國民黨以外之他黨發生。在目前時局之下，從容分別黨派以議政，恐非國家之福。但事實上已不能不容納異己者之存在。其結果則不論其仍爲一黨制或多黨制，想不外以大黨統馭小黨，或大派統馭小派而已……不過國民黨之前途，與將來政黨之活動，究竟如何，自有時間與事實爲之決定（「政權運用與行政效率」，行政研究，一卷三期）。

講政治制度的人，無論何人均承認多黨制或一黨制爲規定一國政制性質之根本標準。一國政制的性質爲何，是民主抑是獨裁，是傳統的自由主義抑爲「新興的專制暴政」，繫乎其政治由一黨壟斷抑有多黨存在。我國的當政者

，逃避了這個根本問題的抉擇，只等待着「時間與事實爲

知所從。甘乃光先生批評說：

之決定」，一方面倡導國民大會的選舉及憲法之制定，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得不贊成國民黨的人喪失其國民之資格（例如不肯爲公民宣誓的人們），實令現在熱心中國政治的人時覺悲觀。從前在一黨專政最熱烈之時所通過的「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第六條規定：

此次選舉，既非兩黨制或多黨制之分頭公開競選，又非一黨制之統制選舉。并無政策政綱之宣布，使選民（不）知所選之代表，究爲何種主張，代表何物。選民僅以其良心上之主張，爲正人君子之選擇。被選之代表則亦只有對自己負其責任，并非對黨之政綱負其責任。

中華民國人民，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誓行三民主義，接受四權使用之訓練，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

換言之，現在競選者固然宣誓過信奉三民主義，選民也宣誓過信奉三民主義，因此關於中國政治，他們彼此間無話可談，不能提出任何與競選之對方不同的主張。試問參加

現在關於國民大會的諸種法規，斤斤於公民宣誓及代表宣誓，而在憲法草案中把國民黨的主義揭發再三，而一方面則要「弼成全民政治」，在民主與獨裁之間，竟不知何去何從，對於政制的根本立場竟缺乏明晰的主張。一般人——包括國民黨員在內——對於國民大會缺乏清楚認識，黨員而亦公開批評指摘中全會及中常會的決議，非黨員則淡然視之甚或譏諷笑罵，其造因均由於政制根本之未嘗解決。

這個根本問題之未經解決，不特使得我國成爲一個缺乏明晰國基的國家，就在國民大會的選舉一事上便茫然不

競選者除了自詡其本人爲「正人君子」自吹自擂外，有何方法去競爭？這樣的選舉是逼着中國人去盡量運用其本來便根深蒂固「對人不對事」的劣根性，是使得不使自誇的人裹足不前的方法。西洋人并不見得天生便「對事不對人」，但西洋的選舉制度使得對人的方面不得不被對事的方面所抑壓。國民大會的選舉却適得其反，其結果自是「不無可慮」。汪精衛先生前天說，指定的二百四十名代表是「所以濟選舉制度之窮」。我們固然也會想到由人民選舉的代表未必能人人完全令人滿意。但是有政治意見的人，在國民大會選舉之中便根本沒有發表其意見之機會，不肯

宣誓的人根本便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而事實上政治意識而又服從三民主義者亦早已加入了國民黨，所以餘下來的只是一般本無政治主張而希圖藉此鑽營者，或一般庸碌渾噩的「老百姓」，以不敢或不便違背政府的功令而宣誓而投票，造成了官僚士劣威脅和誘的材料。此種流弊在去年候選人推舉時已表現得「令人齒冷」，其原因一部分由於惡棍土豪在地方上橫行，一部分是上述立國基本缺乏鮮明抉擇的衣徵，也是使我們覺得此次國民大會選舉沒有意義的埋由，雖則我們贊成憲政，贊成「全民政治」。

在這個時候，我們誠懇地希望負有領導中國政治責任及設想的國民黨當局，以最鄭重的態度考慮中國政治所應走的方向，在兩條背路而馳的大路選擇一條。這個選擇須要極大的果斷與胆量，但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應該沒有果斷與胆量。國民黨要領中國走上民主之路，便應該實質開放政權，容許并保障反對國民黨的政黨之存在，國民黨退為諸黨之一，按期舉行選舉，國民黨與其他黨公開地競爭選舉。在初辦的時期，人民選舉權不妨加以限制（如張佛泉先生所提議的教育程度限制）；以打倒國家

，公開組織政府及軍隊與正式政府對抗的「政黨」（其實這樣便不能稱之為政黨），當然不必容許其存在或活動。但是根本方針得清晰鮮明，然後所謂人民選舉之時方不至演成競選者與選舉者無話可談的現象。國民黨要領中國走上獨裁之路，便應該用暴力鏟除撲滅一切反對勢力，嚴厲地箝制輿論機關，監禁，鞭撻，放逐或撲殺一切表示反對國民黨的人。但同時也可以學希特拉來舉行所謂「國家總投票」（*Reichstags*），強迫着人民對政府表示擁護的熱誠，居高臨下，除了謳歌政府外不許人民發表任何政治意見。這是兩條大路，必須選擇一條。現在國民黨並沒有做這個根本的選擇，此次國民大會的選舉，「既非兩黨制或多黨制之分頭公開競選，又非一黨制之統制選舉」，而兩種選舉的成分都有，其結果只為官僚士劣造活動的機會，讓無知的「老百姓」受賄賂受愚弄，選出的是一班沒有明確政治主張沒有正當政治意識的所謂代表而已。這樣的選舉又有什麼意義？

二六，四，二五。

預算法之新修正

陳岱孫

三月十九日，立法院開第九十五次會，當將修正預算法案，照法制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報告，修正通過，並議決該法應于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按自民國初元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只有民國三年，四年，八年，及十四年有以全國收支彙集成冊的預算書。然而這幾年的預算書其實都是形式上的預算，編製的時候，既然草率得很，審核決定執行等等預算制度上必要的程序，也賦缺如，所以其效用幾等于零。至于其他年份，則並此形式上的預算也無法編製。國民政府初成立，無暇及此，所以民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年度預算制度還是大部分仍照前北京政府時代所用的格式與手續，而在這幾年內，政府各部辦理預算，因為制度不立以及其他困難，不能有一個稍為滿意的結果。民國二十年成立一個主計處，直隸於國民政府。主計處內設一個歲計局，以向日由財政部辦理全國預算的職責移歸之。同年，又將十九年財政部呈由國民政府頒行十九年預算章程加以修改，作為預算章程，頒行。這個預算章程算是國民政府預算根本法規的初步。到民國二十一年

，立法院所起草的預算法成功，由國民政府明令頒布，凡九章九十六條。新近的預算修正案，就是根據着這個預算法而加以修改的。新修正的預算法包括通則，中央政府編算之籌劃擬編及核定，中央政府預算之擬定，中央政府預算之審議，中央政府預算公布後之執行，中央政府追加預算及非常預算，地方政府預算及附則等，共八章八十六條。

新修正的預算法與民國二十一年所頒布的預算法，在程序上，並沒有若何的變更。編製預算的初步還是由各機關編製概算，附具計劃，送達中央主計機關。中央主計機關彙集各機關擬編的概算，並財政部所擬的歲入總概算，編造中央政府總概算書。這個中央政府總概算書得經中央政府概算之最高機關核定其概數。概數核定後，各機關就此概數，編成擬定預算，彙送中央主計機關，由中央主計機關編造擬定總預算書，送由行政院，提出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預算法定程序纔算成立。以上所述主要的程序，新修正法並沒有變動。

新修正預算法所更改者屬于手續及技術者居多。最容易引起注意的似乎是會計年度的變更。現行會計年度是七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新修正法改爲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這個更改是根據國民政府前幾個月命令而更改的。預算上會計年度開始的日期各國情形並不一律。固然財政上的方便是決定會計年度開始日期的要素。然而因襲習慣未嘗不是一個理由。據主張改用歷年爲會計年者的意見，以七月一日爲預算會計年度開始之期，不適合于國民之會計習慣，且與財政收入盈絀時間不甚啣接。國民政府改用一月制的命令也是根據這個理由。修正案中改用一月制無非採納政府已發表的命令。究竟會計年度的更改就法制上言不過影響及于舊法中所規定之編核審定概決算等之日期，與法的本身並沒有若何影響。

預算種類增加是新修正預算法中另一新變更。舊預算法規定預算應具備下列三種：(一)總預算，(二)機關別之分預算，(三)基金別之分預算。新修正之預算法規定預算分下列五種：(一)總預算——各級政府每一會計年度歲入歲出全部的預算，(二)單位預算——在公務機關，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及在特種基金，應于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本預算，(三)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在單位

預算內，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之各機關或各基金之預算，(四)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中，應以其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入總預算者之預算，(五)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內，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之各機關或各基金之預算。上面單位預算一級是新加的。因爲政府會計制度中有此一級的會計，所以在預算中也應加上這一級，以與會計制度相應。還有附屬單位預算與分預算也是新增加的。這一類預算的目的在於區分普通預算與特種預算以其歲入歲入之一部列入總預算者。例如，營業預算在總預算內只列其歲計盈虧之淨額及資本之增減額，而附屬單位之預算則列其歲入歲出之總額。這樣然後此機關本會計年度財政全部的實況纔能表白。這兩項的增加都較舊法規定的爲細密。

修正法第三個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各主管院部會之概算及預算的責任，及行政處分的權限，而減少中央主計機關駐在各機關辦理歲計事務人員對於各該機關之概算及預算干預的權力。根據舊預算法，駐在各機關辦理歲計人員，對於概算及預算事件，有下列的權力：(一)對於其所在機關施政計劃之籌備及收支概算之編擬，應將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辦法報告于該機關，如對於該機

關所屬各機關間認爲有財務上應合辦或統籌之事務，應研究辦法建議于該機關。(二)按照該機關施政計劃，依據其主管長官所主張之數額及理由，擬編概算及預算，再按科目，逐項，依據其自己主張修正之數額及理由，簽註之，待同主管長官會簽後，呈送上級機關。(三)在上級機關的主計人員，于收到下級機關概算及預算時，應同主管長官會商，假決定其概算及預算之各數額，意見不一致時，應分別記錄，再于擬編機關單位全部概算及預算後，送達主計處。(四)對於各駐在機關分月行政預算之編造，修改或核定，非經常門經費支出之請求，分料經費之流用，常備金與國庫預備金之動用及追加預算等事項，均應登記，並註明之。其駐在第三級以下各級機關者，並應簽註意見，呈送該管上級機關。(五)對於不合法之支出，收入，契約或營業，應向所在機關主管長官以書而聲明異議，並將其實報告于該管主辦審計事務人員，及該機關之上級機關主管長官並其主辦審計事務人員。如果不爲此項之異議及報告時，該主辦審計人員應連帶負責。照上述情形，駐在各機關的主計人員的權力實在不小。不但在編製概算及預算的時候，各機關主管行政長官得與他會商，徵取他的意見，並且在預算執行的時候，他還有從旁監視並表示異

議及報告事實上級機關的責任。新修正之預算法就大不相同了。駐在各機關主計人員，除關於擬編概算時，有明文規定應按照各該機關施政計劃，依據該機關長官所擬定之數額及理由編就之外，其他條目一概刪除。于是主計人員的權力，驟然減少，而概算及預算的擬議與執行一變爲各機關長官的責任。這個修正我們以爲是個進步。原來在獨立歲計制度之下，中央歲計機關與行政部分的關係很是微妙。根據舊法，各機關的主計人員，對於概預算，幾與各該機關長官分庭抗禮。預算是一個計劃，是以財政的觀點，表示一個政府或一個機關，在一個會計年度內，行政的計劃。一個機關的行政責任是屬於該機關的主管長官，那麼，至少理論上，我們得承認他是對於他所管機關的情況最爲熟悉，而一切的計劃應當由他決定。無端的，跑出一個主計人員，不負行政的責任，而可以干預一切行政的施行與計劃。二者之不能融洽，自是不可避免。新修正法把主計人員干預概預算的權一起取消，即所以明行政當局的责任，是較爲合乎邏輯的。然而舊法中規定駐在各機關主計人員對於概預算案的應當表示意見，未始沒有以之爲中央主計處于擬定全部總概算及預算時的參考的理由，因爲中央主計處對於各機關內部情形是不易熟悉的。修正法

把他取消了，是不是中央主計處于擬編總概預算時有點困難呢？然而這問題牽連到獨立歲計制度本身上面去，此處暫且不去討論它。

新修正法中還有一個新增改，就是第一章通則中第二十六條，「各級立法機關審議擬定預算時，不得於擬定預算外爲增加經費之議決。」這條的規定是舊法中所沒有的。舊法類此條的規定，只有在主計處以擬定預算書送行政院核定時，非有重大事實發生，行政院不得爲內容之修正，而行政院對於內容之修正，非經中央政治會議之議決，不得增加數額。所以舊法是限制行政院隨意于總預算案擬定後增加經費數額。而新修正法不提行政院，而禁止立法機關於審議擬定預算時隨意增加經費。按諸各國的經驗，禁止立法機關任意增加預算的辦法似乎較爲合理。然而新修正法既然把舊法中關於行政院修正預算內容增加數額的規定刪除，則行政院在舊法中核定預算的權也就消滅，而只變爲主計機關與立法機關間之傳遞機關。似此，則預算的編製擬定，既然不屬於行政院，行政院又無所謂核定權，這個傳遞的手續豈非此一舉。

中國歲計制度一個特點便是所謂超然主計制度。超然主計制度就是把編製預算與實行行政監督的職權歸于一

個直隸國民政府的中央主計機關。據主張這種超然主計者的意見，這是五權分立制下事實上的需要。因爲如果編製預算及行政監督的機關是行政院內的財政部，則行政院有控制及監督其他四院之權，與五院各自獨立的精神相逕庭。並且各院所編的概算有時非與以削減不可，如果這個削減的權出自行政院之財政部，則易生爭執，而超然的主計處便可免此實際的衝突。舊預算法及新修正法都是在這個基本原则之下訂定的。所以舊預算法中對於財政部這個機關一字不提，而修正法也只規定第一級機關于呈送擬編概算及計劃于中央主計機關時，須將是項概算及計劃另送由行政院交財政部，擬編歲入總概算。中央主計機關彙集各第一級機關單位擬編之概算，及財政部擬編之歲入總概算，編造中央政府總概算書，由中央政府概算之最高機關核定其概數。審核前項總概算書時，由中央主計機關主計長及財政部部長列席說明。在五權憲法之下，是否五院是五個孤立自滿的機關是一個政制上一個問題。只就預算編造監督上說，即使行政院中的財政部行使這個職權，也未必便是破壞五權分立的制度。院與院之間之互相控制，不但早事實所不可免，恐怕也有理論上的需要。我們並不因爲在三權分立制度之下，預算編造及行政監督二者在行政機

關職權之內，便認其與三權獨立的精神違背。固然，一個獨立主計機關的制度並不是絕不可行，不過這個機關與行政院及財政部的關係似有詳加考慮的必要。新修正預算法中，特于擬定概算時提出財政部之地位，未始不是感覺到主計處與財政部不能不相為謀。然而僅僅是這一點的增改，恐怕還是不夠的。

除開上述數項外，新修正法中其他的更改大致是細節，無須敘述。簡核的說，新修正法的精神是增重行政機關對於歲計的權力，而減少主計機關的控制。這個趨勢恐怕是事實與理論二者所要求的。然而法是一件事，實行與否又是一件事。舊預算法是民國二十一年通過的，于今已六年，而不能見諸實行。如果在其他種種理由之外，法本身的難行也得負一部分的責任，我們不知道在討論修正法的時候，是不是把這些障礙已經加以刪除。新修正預算法是

定明年一月實行，我們希望它能夠如期試行。因為只有經驗能折服錯誤的理想。然而在新修正法通過後不幾天，報載中央擬定下年度財政計劃，有所謂建設事業專款預算，由行政院編製，提請中政會核定施行。國府並將另立建設事業專款帳，處理收支事項。建設事業專款的審核將不適用通常審計程序，而另由行政、監察、立法三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財政部長，主計長，中政會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組織審核委員行之。如果這一個辦法切實推行，則預算法中之規定只適用於通常或例行之政務收支。凡特別重大之收支都可以放在建設事業專款預算之下。這個辦法的用意也許是為統籌建設事業，增加行政效率，而與行政院以自由處置的權力。然而這個辦法的採取，不無反射及于預算法本身的價值，而增加我們對於它實施的懷疑也。

由武昌到開封

陶希聖

三月十九日上午九點，我在天津參加河北省立工業學院三十四周年紀念會。下午四點由天津總站上車回北平。六點半到東站，上電車回家，到時已經七點半了。水如已

經買好明天早七點往漢口的普通快車票。行李衣服亂紛紛的。桌上放着一張電報紙。我立刻明白是久病的岳丈的危篤消息到了，心裏立刻就慌了起來。六歲以下的三個小孩

子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也從來沒有長遠離開過父親。他們一定是要跟去的。水如暈車，又得了心瓣破缺的久病，一得着電報，已經頭痛腳軟，必定不能在車上招扶小孩子們。到了夜間十一點，我決定一道上車送他們去。我預想留在武漢三四天，我單獨回到北平來，轉到綏遠或前往廣西去作春假旅行。我又想從漢口坐江船去南京，轉徐州往開封踐河南大學的約講演。這時我也沒有一定的計畫了，走着瞧吧。三點，把北大方面應辦的文件，食貨要發的稿子，都辦齊封起來，留在車夫手裏預備天明以後送去。五點我們叫起小孩子們，烤烤火，就到西站。武昌之行，就是這樣起身的。二十日上午十點以後，北平朋友知道我走的才有二人，一是周枚蓀先生，一是桑伯華先生。他們是受託爲我請假，爲我借薪水匯去的。別的朋友便很少知道的了。

二十日晚間七點到漢口，水如的幾位姐姐到站接着我們。我們在車上商量過，最怕的是一到就過江到萬家，一陣哭聲把小孩子給嚇病了，所以很遲疑，想讓三個疲倦的孩子先休息一下再過江。我們先到東方旅館，歇了半小時，才知道老人家還在等着他的女兒和外孫，還有話付託。我們把預定的已別心情改換成臨別心情，更難過，更

哀戚，很沉默的過江，很沉默的到萬家，一切都靜靜的。二十二日，我們到我的老母那裏去看他老人家。以後兩家的情形都一樣的單調的過音，沒有可提的事了。二十四日天氣忽然冷了，下了水雪。我的左膝神經痛發了。最小的范生病了。我在武昌的日程也就延長下去了。

中華大學陳叔澄先生在去年有預約要我特到他手創的大學講學，我沒有工夫沒有答應。這回無意的到了武昌，我去看他。他很高興的，他約了一個時間——二十五日晚七點，找我講兩小時。題目是中國社會的特徵。武漢大學是我離開之後十一年長期間建設的，我早想去看看。這回我竟然可以有工夫去看了。我預先通知吳子馨李劍農兩先生。他們又決定約我便中爲歷史學會講一個題目。二十六日下午三點，我去講從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觀察兵制的沿革。二十六日晚八點，在民衆科學實驗館，又和夏棟生潘作之兩同學賒下了二女中及省高中兩次演講債。由此以後，便是每天一兩次演講，一兩次宴會。也沒有可提的大事。兩星期裏看到談到的地方事情很有一些。四月二日匆忙的回到黃岡故里，也多接觸一些鄉土現象。先從社會經濟說起。湖北的鄉村，受水的影響最大。水有江水山水兩種。好田好地都是山水經過的山凹河岸平原。不受山水冲

刷的高地沒有多少好田地。山水下來是很快的。洗刷過去，往往不損多少苗稼。民衆在山水的衝路，多築堤圩。全省這種堤圩約計有一萬公里。除了堤圩防水之外，要緊的是塘堰儲水，塘堰也能減少山水的沖積量。全省塘堰很多，沒法估計面積的總數。江水是在春末到秋間漲起來，冬裏落下去的。全省江堤約計二千里，長不過民堤五分之一，而重要是一樣的。如果長江水漲，山水又發，鄉間的山水沒有消洩的地方，漢江的水也沒有去路，便成了大水災。或是山水沖刷，江水不倒灌；或是江水倒灌，山水不下來；水災是不會大的。農村經濟全靠這兩種水的遭際。好田地能有好收成，完全靠天。水災一成，好田地受水無收，高田地受旱也無收。譬如天門沔陽，十年九不收，只要一收，景象便斗然好轉，不過這好轉是太少了。

江水山水的堤圩，都含有社會問題在內。堤圩防水，水打不破堤圩，仍然要走到別處去。除去大圩子裏的小圩子以外，大堤的修築往往引起社會衝突。有利于東，便有害於西。西東兩利是很少的事情。即如河南鎮平內鄉的水利建設，把漢江上游的支流用柳樹逼得窄狹了，二十四年的夏季，漢水便泛濫爲災。最大的社會問題還在湖。

匯積山水江水的低地。湖的容水量越大，水災是一定越小的。湖的容水量減少，便是水災的增大。湖北人正在反對洞庭湖裏的天祐垸的建築，便是湖的社會問題的表現。天祐垸如成，減少洞庭湖十分之一的容量，又把長江上游入湖的水路堵成曲綫，減少江水入湖的速度。江水沒有充分的湖收容一下，收容又不能快，湖北的水災當然要加大的了。湖北人在先也沒有起來反對，近來洞庭湖內圍田的小地主自己起來反對天祐垸的大豪宗，湖北的人纔聞風而起。行政院已有命令要湖南停築這三十公里的大堤，却沒有生效。湖北的人不少抱着滿懷的憂慮和憤慨，却也沒有辦法。

湖北省內沿江的幹堤也含有不少的社會矛盾。如樊口堤，便是大家攻擊的目標之一，不過，近來治水方針，全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沒有計畫水的去處的。王安石想填梁山泊，還愁水沒去處。劉原父很幽默的說道：「如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掘一個大泊與梁山泊一樣，那就成了。」湖南的洞庭湖填成了肥田，湖北只有再掘一個洞庭湖，不然就有水災。樊口堤的對江如不掘一個大泊，江水也只有成災。這事決沒有這樣辦的。梁山泊旁邊的田地不是人種着的麼？長江的整理必不能聽命於豪宗強族，這是很明白的。

去年一年，湖北在二十年二十四年大水災之後得到豐收。可喜的是去年豐收，並沒有成爲豐災。鄉下人固然靠天吃飯，也更要靠都市的繁榮。

去年一年，都市在幾年來死氣沈沈裏，一轉繁榮。除了與我最有關係的出版業仍然死氣沈沈之外，百業（應當說九十九業）都起死回生。豐收固然是一個成因，但重大的成因，漢口商場中人說是法幣制度。法幣制度在工礦業家看來，好處是籌碼加多，周轉靈活。在二十四年年終，大冶縣裏，二十萬噸煤堆積成山的大礦，和從漢口的銀行周轉十萬元，都做不到。去年這礦每月有利七八萬元。這是由於一般社會景況的好轉，也由于籌碼加多。至於一般社會景況的好轉，也不單由于豐收。國際貿易的繁榮，洋米進口的限制，都是重要成因。這國際貿易的繁榮又一般的由於世界經濟恐慌的渡過，而特殊的由于法幣的實行。洋米進口的限制由於出入超的調整，這也是法幣實行的條件之一。

湖北的財政，就收入說，由於田地的田賦，和由於商業的鹽稅附加及營業稅，是最大的項目。在從前，商業稅之釐金是地方可以自由支配的。鹽稅附加又是地方收入。反之，田賦是中央的收入。張居正胡林翼在明末清末兩

次減少湖北的田賦。但這在清末並沒有阻礙張之洞的建設，他動用的是大量的釐金。近來，釐金撤了，商稅改歸中央。鹽稅附加雖以地方名義征收，也劃歸中央去了。只有每年二百萬元的田賦歸于地方。保安團的捐比田賦加倍，每年四百萬元。兩共每年實收約五百餘萬元。省政府無法維持，單靠六百萬元的中央津貼，及特稅。黃季寬主席離到省政，他感到最困難就是這一點。要做事，必先有財政的收入可供開支。情形是這樣的困難，事業便沒法做了。其實湖北的財政並不是沒有辦法。在開支方面，可以節省不少。最痛苦的是保安團費，在人民是負擔重而治安仍沒法維持。現在又有更苦的保甲費了。在收入方面，第一要田地有收。田地搭了無收，田賦就無從說起。田地有收無收，要有水利的自然與社會問題有沒有相當的解決方法。第二要平均負擔，假如這個能夠做到，稅率不必加高，收入却可增加。第三要整頓吏書，這樣不獨增加人民負擔，還可減少人民負擔，增加政府收入。這樣的意思，我曾同季寬先生略談一兩句，但是否能這樣做，是否能做動，却成問題。

教育是湖北的最大耻辱之所在。在清末，湖北是很早辦學的一省。即如河南，中學校最早的教職員十分之八九

是湖北人。現在，河南有省立中學七十，私立中學六十之譜，各縣都有中學一兩座，對於小學生升學者還不能收容。湖北呢，每縣有小學的很不多，有完全小學者更少。中學除了武漢有幾座之外，各舊府區還不能盡有。不多的教員人材，集中在武漢爲了職業競爭個不休。其中物理化學教員還要從外省人裏去請。教育，湖北有教育麼？我會向教育廳，省主席，行營主任痛切的陳述，但事情却是難有辦法的樣子。

中學雖少，集中武漢的却不在少數。我在八個中學講演過，還逃了兩處的預約。四月七日，我很快的上了北上的平漢車。忍痛的別離了肋下疼痛的老母和垂死的岳丈。很難過的躲過了從不久離的三個小男孩。四月八日到鄭州，晚車轉開封。蕭一山先生在站相候。魯若恆劉季洪兩先生也在候車室匆匆的見過面。

在開封整六天，但是我遇着了四十年未見的大風和黃沙霧，又遇見了半年未見的兩天大雨。大風起在四月十一的一早。這早晨我醒的很晚。我看錶知道已經八點了，我很詫異爲什麼不天明呢？事實上一直到晚上還沒有天明過。在房裏吃飯還得快點吃，不然就要在後半碗飯裏吃着黃沙。在房裏坐着，只見衣服上一層一層的堆起黃沙來。出

了大門，對面便看不見人了。可是一到晚上，雨意就濃起來，半夜就下起大雨。十二及十三兩日，大雨不止。十二晚在省政府公宴席上，大家都說這叫做「天雨金」。河南的棉花種植最盛行的有兩區。去年單是安陽一區，棉花出口值三千萬元。今年正感乾旱，又下了這場大雨，棉花出口又有同樣的希望，可以叫做「天雨金」。

開封景文洲是相傳以狐仙賜錢起家的大汗綢商。我小時在開封，還看過他店後的汗綢作坊，最叫我不忘記的是綢機上工人的汗滴。我在席上問起這個字號。我才知道汗綢已經衰落，魯山綢也不成了。機器工業品尤其是毛織物和人造絲，把綢緞打倒，狐仙縱有神力，也無能爲用的了。第三天天氣放晴，我在街上看見兩三家景文洲的鋪子，真正是「閔其無人」，饒有鬼氣。

開封發達的只有馬路。新建築看不見煙筒高聳。古建築都被壞了。我坐車走過二會祠的後面及龍亭的前面，這都是小孩時候認爲最華貴的遊覽地，現在都舊到不堪的程度。龍亭上雖抹了灰粉。只有增加其不堪。

演講，宴會，演講，宴會的日程，把十四日的大好天氣就跌在講堂上去了。十四日最後的一講，我頭昏心跳，險些沒有倒下來。十五日上午九點半動身上車，七至八還

找補了一次演講。從十四日午間起，一直到轉車回到北平，一直到寫成這知篇的回憶，頭昏心跳還沒有停止。以講說爲業的人何嘗怕講說，可惜我這二十幾天心境太壞了。眠食都無快適之感的時間以內，小小的勞碌終於小小的損

壞了我的健康。在頭昏心跳之中，這回憶也只好從短的真下來。

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續）

吳景超

（四）外貨競爭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以爲中國的工業化是很困難的，因爲中國的市場中充滿了外國的貨物，他們有大力爲後盾，中國廠家的出品是無法與他們競爭的。這種見解未免過于悲觀。我們可以提出許多事實，證明中國的工業大有可爲，只要我們肯好好的埋頭苦幹，外貨的競爭是毫不足畏的。先拿紡織業來說。外國人不但以他們紡織品運到中國來銷售，而且還在中國各商埠設廠製造，與中國各工廠發生正面的衝突。假如外國的貨物真可摧殘中國的工業，那麼紡織業應當在中國已無立足之地，但實際的情形大不然。中國紡織紗廠雖然有許多關門，但那是因爲本身腐敗所致，正如一個生了肺病的人，就是沒有風寒的襲擊，也有一日會壽終正寢的。反是，如自己的基礎穩固，那麼

外人即使在上海青島再多開幾個紗廠，也不能動其分毫。我所參觀過的紗廠，便有許多在過去的不景氣時期中依然年年賺錢的。舉一個例來說，常州的大成紗廠成立於民國十九年，我搜集到他們歷年的報告書，知道他們除在此短時期中增加了許多的資本外，十九年盈餘凡七萬九千元，二十年盈餘四十五萬，二十一年盈餘三十六萬，二十二年盈餘二十四萬，二十三年盈餘二十四萬，二十四年除盈餘二十四萬外，另提折舊二十八萬。二十四年年底，大成的資本已由五十萬加至二百萬，折舊準備已存有七十三萬，歷年還分給股東那麼多的贏餘。外人對着這個管理得法基礎穩固的大成，還不是眼看着他繁榮嗎？又如中國的絲業，在過去自然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大家都歸咎于日本絲的競爭。但在過去最不景氣的數年中，無錫的永泰絲廠

于民國二十二年只經營三廠，二十三年便添至五廠，二十四年添至六廠，本年度便添至十五廠。永泰所出的廠絲可以與任何國外的絲廠出品比擬，在紐約永泰有直接的經理，在倫敦里昂等處永泰也有代辦，所以價格不受中國出口商的操縱。由于永泰司辦者及其同事的努力，所以別的絲廠雖然失敗，而永泰却有欣欣向榮之勢。又如中國所消費的酒精，以前大部均求給于外洋。自中國酒精廠設立以後，外洋輸入之酒精數量驟為減退。據黃江泉先生說，中國酒精廠的勝利由于下列三原因：一因該廠出品品質優良，較之國外輸入之酒精有過無不及；二因價格較賤；三因該廠隨時可以出貨，無青黃不接之虞。以上所述的三點，是由中國人自己努力便可達到的，外人亦無可如何。又如調味之物，國人以前多喜用味之素，民國十二年，吳蘊初先生于工餘之暇，着手研求，先購舶品，詳為分析，嗣依學理，試行製造，不到一年，便告成功，不但品質可與舶品相頡頏，即成本廉平，亦足匹敵，于此將此項製品定名為味精。以前舶來品的銷路，每歲不過數十萬，現在味精的銷路已經超過他許多倍。舶來品的主人也無法加以壓迫。又如亞浦耳電器廠，以一百五十萬的資本，來對付荷，德，美，匈合組的中和燈泡公司，中和的燈泡賣三角一隻

，亞浦耳只賣兩角一隻，現在亞浦耳燈泡的銷路還在逐日擴充中，而且在南洋羣島以及南非洲等處，凡華僑足跡所達之處，胡西園先生總採取猛進政策，設法推銷出品。所以雖有外力的打擊，胡先生總覺得前途是光明的。又如兒童玩具在中國素來是外貨獨霸，但康元製罐廠自添設玩具廠之後，據云只靠十餘萬元的出品，便可抵製舶來品八十萬，將來康元的出品如能加至三四百萬，則外貨將在中國市場中絕跡。康元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便在價廉，如小汽車是兒童最喜歡玩的，德貨價在二元以上，日貨價亦九角，而康元出品只售四角，其餘知此的例，不勝枚舉。工業界的先進，現在不但怕被人打倒，而且還有打倒別人的勇氣。這種現象，實可令人樂觀。

上面所舉的例，至少可以證明一點，就是外貨的壓迫雖然兇猛，決打不倒那些自知發奮為雄的工業家以及他們的工廠。在外貨的壓迫之下，中國的工業還是可以發展的，我們決不可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所以一般流俗者的判斷，把一切中國工業上的失敗歸咎于外貨的壓迫，我們決不可輕信。

在恢復我們的自信心之後，我們應當平心靜氣對於外貨競爭的影響，略加分析。我們先說在外國製造的外貨。

這些外貨與國貨在中國市場中競爭，其能佔勝利之點有五

：一爲利息的担負低。外國的工廠資本雄厚，不必時刻向金融資本家乞憐，即向銀行借款，其利息亦常在三四厘左右，中國工廠如向銀行借款，利息常在八九厘以至一分，故担負較重。二則外國工廠之生產常爲大量，較中國工廠之小量生產爲合算。開成造酸公司的林大中先生，關於此點，曾舉一例，彼謂現在大阪所製硫酸，成本爲八元一箱，中國成本爲十四元一箱，差異之唯一原因，即在日本爲大量生產，如中國需要硫酸之數量加增，可以大量生產，那麼中國造酸的成本也可減低與日本一樣。三爲外國工廠對於原料的採用甚便，凡工業中之一切需要，均可取給於市場。中國工業化的歷史甚短，有許多原料自己不能供給，臨時向外國採購，費錢而且費事，如亞浦耳電器廠有時向外國購買電料，原料只值三四元，而電報費可以花到三四十元，這是歐美的工業家不會感到的苦痛。四爲外國工廠中的技術較中國一般工廠爲進步，且國內科學發達，技術設備常日新而月異，中國環境不同，尚不足以語此。五則外國的政治已上軌道，秩序安甯，法治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故非法稅捐，土劣敲詐，軍隊破壞，土匪騷擾等事，可謂絕跡，中國現在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所以難免給

工業家以額外的負擔。

以上所述的五點，國貨雖然比外貨吃虧，但國貨也有八點是佔便宜的：第一，國貨有關稅的保護。第二，外貨運華，須付運費及保險費，始能達到中國的市場，國貨可以不必有此負擔。第三，外國工人生活程度較高，所得的工資常數倍或十餘倍高於中國工人，當然在成本上要加增許多。第四，外國不但工人的工資高，就是職員的薪水以及其他營業上的開銷都較中國爲大。第五，外貨在中國行銷須假手於買辦階級，國貨工廠可直接與各地商人交易。第六，外人對於中國內地市場不如中國人之熟悉，即費鉅款調查，終以言語不通，習慣不同，而有隔膜。第七，近來國人民族思想之發達，已非十餘年前或數年前所可比，喜用國貨的人已逐漸的增加。第八，政府對於國貨的提倡，數年來不遺餘力，對於成績優良的國貨還有免稅及運輸減等計算等優待，近又籌設國貨公司，對於國貨的推銷加了不少的助力。

外國製造的外貨在中國與國貨競爭，有五點佔勝利，八點吃虧，爲減少吃虧的程度起見，所以外人紛紛來華設廠，這種在中國製造的外國貨，雖然可以減少吃虧的程度，但決不能與國貨佔同樣的便宜。上面所述國貨佔便宜的

八點，前三點國貨工廠與外國在華所設的工廠共之，但自第四點以下，外貨工廠終因係外人經營之故，享不到國貨工廠所享的利益。我們把這個問題分析一下，已經發現中國的工業并非身臨絕境，只要我們儘量用我們的優點，設法避免我們的缺點，那麼在中國市場上與一切的外國貨競

爭，勝利也許在我們這一方面。由於這種分析，並且在各地看到了勝利的榜樣，我們深信中國工業的前途，是光明抑是黑暗，大權是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外貨的競爭是不足畏的。足畏乃是自己的退縮，自己的氣餒。

(未完)

編輯後記

適之

△陳之邁先生的「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將來」(這題目是我改定的，來不及徵求作者的同意了，要請他恕罪)是一篇很懇切的，善意的批評。此次國民大會的組織法和選舉法有了重交立法院的機會，我們很盼望立法院的諸位先生索性利用這個機會澈底修改一次。例如陳先生指出的「宣誓」兩種，看來似是小事，其實在我們書獃子的心眼裏是有關人格的大事。(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學說裏曾有一章專論宣誓，可見他也把此事看作大事。)假使我要宣誓，我得先想想誓詞是不是我的理智所能完全承認的。假使我得說「從此去舊更新」，我要先問問：去

什麼舊？更什麼新？我的「舊」包括我個人的信仰主張等等，是不是都得丟去？又假如說「接受孫先生之遺教」，我也得問問：孫先生遺著有幾十萬字，那一部分的「遺教」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是我不能接受的？孫先生的政治主張有早年晚年的不同，而全是遺教，是不是我們全得接受？——以上舉的例，是很淺近的，然而都是有關個人操守的事。如果我良心上不能隨便宣誓，我豈不是就做不到「公民」了嗎？號稱「國民大會」，而拒人於千里之外，這不是很不對的嗎？

(四月廿五日)

本刊前二期要目

第二三〇號

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形勢 胡適
 綏東地勢及其位置的重要 張印堂
 我們爲甚麼要說長道短 張佛泉
 漫遊雜感(五)省府合署辦公 陳之邁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二三一號

中日問題的現階段 胡適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 吳景超
 讀經平議 胡適
 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 陳序經
 賀函之一 復堂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第七冊(第一五一一期至一七五期)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每冊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號費

本廣告價目

地位	尺寸			
	全面	半面	四分一	八分一
前封面內頁	五十元	二五元		
後封面外頁	五十元	二五元	十三元	七元
後封面內頁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上列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者九折，五期以上者七折。長期另議。

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廿六年度第
六次特價書
二十種之一

海鹽張菊生先生致力文化事業垂四十年，其躬自校勘之古籍，蜚聲士林，流播至廣，對於我國學術之闡揚，厥功尤偉。近值張先生七十生日，蔡子民胡適之王雲五三先生以張先生素極反對世俗慶壽之舉，但為社會學術努力數十年如張先生者，社會應有一種敬禮的表示，因發起徵集論文，刊行專冊，以為紀念。本集共載論文二十二篇，分為總類、哲學、社會科學、語文學、自然科學、藝術、文學、歷史八類，執筆者俱屬國內雅負時譽之專家，各文內容均係著者研究之結晶，廣博精深，自不待言。全書計三十餘萬言，布面精裝一鉅冊。

◀ 目 篇 書 本 ▶

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	張君勱
歷代藏經考略(附圖)	葉維綽
周易三陳九卦釋義	蔣維鈞
老子這部書對於道家的關係	唐君毅
述陸賈的思想	胡適
多元認識論重述	張東蓀
唐代經濟景况的變動	陶希聖
中國戰時應採的財政政策	張天澤
走私之背景及對抗方策	馬寅初
過去立憲運動的回顧及此次制憲的意義	吳經熊
己未詞科錄外錄	孟森
近代寶文學校制度變遷考	謝國楨
甲寅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	吳其昌
十二辰考	傅運森
關於鑄別書籍考略	周昌壽
南易漢畫像石刻之歷史的及風俗的考察(附圖)	滕固
汪龍莊先生致湯文端七札之記錄與說明	蔡元培
廿五史篇目表	蔣元培
西魏賜姓源流考	朱希祖
中國文化之回顧與前瞻	王雲五
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	王雲五

▼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開本 硬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六元
 郵費在內 郵費另加 二角三分
 特價四元二角 特刊期九月二日至六月

特價書每星期日期公布一次目錄備索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零售每份六分 每月一元八角 半年八元二角 全年十六元

獨立的觀察與忠告

曉湘

從刑災談到中國的統一

君衡

中日外交調整的途徑

王信忠

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

張佛泉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續完)

吳景超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徐州	漢口	南昌
天津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天津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南京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蘇州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無錫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徐州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漢口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南昌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天津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天津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南京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蘇州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無錫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徐州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漢口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南昌華泰廣告公司北平分店

獨立評論

第二三三號
日九月五年六十二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南寧	梧州	貴陽	重慶	成都	西安	石家莊	保定	開封	太原	濟南	青島	煙台	威海衛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長沙	衡州	昆明
開通書局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開通書局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上海華泰廣告公司

獨立的觀察與忠告

曉 湘

復刊後的獨立評論，適之先生在「編輯後記」的末段有一句話：「獨立」還是原來的「獨立」。「獨立」是一切公正的先決條件；希望有公正的主張，必先要有「獨立」的立場。獨立的立場，最難於站住，站住以後，尤最難繼續保持。繼續保持住「獨立」的立場，便是成功的秘訣。獨立評論與讀者小別了四月，四月來整千萬的讀者眼巴巴希望這個刊物的復活。現在「獨立」生命是回復了，「獨立」主辦人並沒有長篇大論的宣言，而只是「還是原來的「獨立」」一句話。這一句話，意義給人們多大的興奮與安慰！

四月來的國事，各方面的氣象，不能不說有極大的轉換——好的轉換。統一基礎的穩固，就是好氣象中最顯著的。在「獨立」休息的幾個月中，國內發生西安事變；由西安事變前後顯露的人民意識，證明中國的復興工作確實有根基有希望。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央的各種處置雖然經過不少的曲折，畢竟忍耐戰勝了一切困難，至誠征服了全盤虛偽。這種效果，一般人一時不能完全了解，過後各

種事實表現，自然會使人感悟。中國這幾年的國運，真是年災月難，我們民族的稟賦，以及民族精神力量，自然能漸漸渡過重重難關。

獨立的批評和建議，真是救苦救難最効的藥力。大家不可因為四月來國事若干可喜的現象，漸漸遺忘國難發生前各種教訓。今天各種政治上社會上基本原則之重新被人重視，各種政治和社會上的活動慢慢向基本原則的路上走，都有極大的代價；文明的民族不可無端浪費這種代價。關心時局的人尤不可不處處喚起各人的責任心。不錯，最近兩月來對內對外似乎是風平浪靜，或者有人會說是一個小康局面。但是，在獨立的立場觀察，各種事態的準備，正要在這個小康局面中下功夫。去年一年內外太多事，莫說政治局中人物應付得精疲力盡，便是一個公民亦覺得精神上眼花撩亂。兩月來的時局雖然比較平靜，可是在敏銳的觀察家眼中，這個情形，好似天氣一般，恰合中國詩人咏歎「春陰」的情緒。大週圍的環境不容許天氣這樣沉悶下去！

先談外交罷；以中日近事而言，廣田內閣倒後，林內閣上臺，經過佐藤外相的幾次演說，同時兒玉經濟考察團到京滬一番周旋，所謂日本對華政策再檢討的空氣無形中使多少人沉醉。我們的看法，其注意於日本國內政治的演進，日本七十屆議會的被解散，我們外國人尋不出政治上的大問題是什麼。紛擾三月的大選舉，本月三十日就要揭曉，照目前的推測，政友民政兩黨聯合的形勢是必然的，

兩黨聯合在未來議會將佔絕對多數，也是必然的，政府方面所經營的組黨運動，憑藉雖然優厚，成敗的把握太難說。在選舉沒有揭曉前，日本政界已大放再解散議會的空氣。日本帝國憲法雖沒有不許再解散的限制，但日本的憲法事例上，再解散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記得十餘年前的清浦內閣，議會解散後選舉的結果，反政府派佔多數，內閣便辭職了。日本人心目中也認這種場合的內閣辭職是應當的。照現在日本國內的情形，政治上越出常軌的行動或辦法，可能性甚大，內政上越出常軌，對外的行動自然跟着走，或變本加厲。所以我們最笨的看法，日本對華的如何，關鍵要看他們國內政治的變化，變化得多上一分軌道，外交上或可多得合理的進行。在這種外交上醞釀季節，我們政府或者不可聽其自然，沒有一點自動的打算。我們

的愚見，外交猶如內政，不可自止於靜態，靜態便養成被動，我們幾年來吃被動的虧還不很夠麼？今天的外交當局姑不談中日兩國根本問題，若干枝節問題而貽害不小的，應該有事實上的努力。抓住機會，儘速進行，辦外交是最現實的，最忌唱高調，唱高調是最無用的外交官。這並不是影射任何事實，冷靜觀察時局的人們，甚恐懼這種傾向的發達，又其擔憂坐視時機的過去。

在國內方面，前天中央常會所通過的國民大會兩大樓規，當然是今年第一大事，兩大法規修改的要點，大家在報上早經看到。這裏面幾個修改要點：第一，本屆國民大會性質及任務的變換。這點修改最合理，本來從前的辦法，將這次國民大會執行憲法上第一屆國民大會的職權，理論上太牽強，聽說當初所以有這樣的變通，主要原因不想省去一次大選的麻煩，民治原是最麻煩的也是極笨重的。這次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及憲法草案，將今年將行召集的國民大會，職權只限於制憲，在理論既通順，事實上且可使憲法實質上更充實，過去憲草會議不能採取的意見，將來或可再得一機會去嘗試。第二，取消中央圈定候選人的辦法，理論上極講得通，然在事實上，此點在競爭選舉中或最易引起糾紛，因為去年初選的陣勢，競選人各人心

目中預先有此存心，競選實際戰略上的布置都對準這個場合。現在場合搬亂了，競選的人要再製造一種新秩序，產生這種新秩序的時候，便是糾紛的起源。現在候選人既不圈定，複選究竟怎樣選？由已選出的候選人互選呢？還是將候選人名單統交選民去投票？這一點中央至今還沒有規定。若求比較公平的辦法，使競選人機會均等，應該是後一種辦法較前一種合理，且能貫徹理論上的根據。第二，中央指定代表二百四十名的辦法，或須有許多人會不滿意，說這是反民主，我們却反對這個見解，民主不民主，是事實不是理論。在目前情形之下，中國的賢人君子沒有方法去競爭選舉，要去競爭也決沒有勝利的把握。過去的各省市議會選舉不談，過去的新新國會等選舉也不談，單拿去年的競選來看，賢人君子那個不望而却步。若說借此學習經驗，這裏面的經驗沒有絲毫公平角逐或公開競爭的成分，所以民主政治的最後引人入勝，還要靠民治序幕時代多數人的榜樣來做楷模。在訓政憲政交關的時期，政府指派一部份代表，結果人選上一定比烏七八糟的選舉結果要整齊優秀。二十餘年來的事實，可以使多數人接受這一個真理。當然政府指派的時候，標準要嚴格，分配要公平，如果指派而忽略這兩個基本條件，結果不會比選舉高明，

且精神影響更壞。我這一段話不是想把黨的獨裁身上加一層民主的外衣，而是注意在民主實質上逐漸補充其細胞組織。將來的國民大會，必做到一部分代表確能代表各種利益及意思的集體，其人名址出來，也至少可以使人首肯而不至於搖頭，我們堅認訓政的理論是政治上的一個發明。若干年來事實的不滿足，都是方法的問題，方法連累了理論，理論並不負責任。第四，這次修改國大法規及憲法草案，對於今年將召集之國民大會的職權，明定為制定憲法及決定憲法施行日期，這個問題，性質比較嚴重，憲法的施行——實行憲政，中央當局的宣示及各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早已三令五申，一般人民心目中似乎再沒有這一個施行日期的問題。在外國憲政史上的往例，制憲會議終了後，當然接着按照憲法去執行，大戰後歐洲各國新憲法雖或間有憲法內若干條文加以施行日期的規定，可是整個憲法若加一個施行日期的規定，那末制憲會議勞民傷財的選舉開會，不亦徒勞？若果未來憲法中再參照建國大綱的條件加以施行憲政的規定，那又何必多此一舉？直截痛快由中國國民黨再訓政幾年，豈不省了多少紛擾？關於這一點，我們希望中樞當局要對人民表示多量的誠意，不可使人民發生疑慮，今年十一月的國民大會，不可使他像民國二十年

的國民會議或二十一年的國難會議。國民會議還正式通過公布訓政時期約法的。

內政方面的問題甚多，上面文字太冗長，不能在別方面多發揮。我們冷眼的觀察，這幾個月或未來的幾個月，一般政治上停滯的趨向甚大。在今天的環境中，精神事業

從川災談到中國的統一

君 衡

在近來內政外交略呈平靜狀態的時候，最引人注意，也最值得關心的大事，無過於四川空前的災荒。災情慘重的情形，各處報紙已經有了很詳細的報告。如像災民煮食死屍，路斃設爐火化一類的新聞，使得讀者感覺「天府之國」已成了人間地獄。在陝甘災情尚然嚴重的時候，川黔又繼續發生災荒，真是川黔陝甘人民與全國的大不幸。我國歷來救濟的辦法，總是偏重於直接的賑款。這次應付川災也是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籌措賑款，進行已有相當眉目。我們也希望受災以外各省市的人民，援往年的先例，本「己憐己溺」的同情心，自動捐款助賑，以為政府的援助。（五月二日報載，綏遠民衆已發起救災運動。）然而「急賑」或者「工賑」都是救急的辦法，不是根本的辦法

兩方那能容許我們有一日的停滯？小康局面下的今天，正是內外要政積極準備的時期。鄉村書塾裏，老師打一刻午睡，學生放手躍足到外面場子上偷閒放肆一番，老師出恭或會客，學生千載一時把功課一股腦兒忘了。我們希望政治上沒有這種現象。這又是我們獨立的忠告。

我國歷史上的和近年較大規模的災荒，並不全由於「天時」，而至少有一半「人事」的成分。古人說「盪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這幾句話真是至理名言，我國不能實行而面洋先進國家比較能夠體會的道理。我國以往的政府對於民生有益和切要的建設，從來不曾措意。祇要消極地能夠不禍國殃民便算是明君良臣。北伐成功以後的政府雖然以努力建設自任，但是因為「國難」期中內憂外患和人力財力的限制，對於深人民間，直接扶助民衆生計的建設尙少成績。這種根本問題不解決——如何開發農田水利，安定鄉村生活，增加農民收入等的問題——一過天時不利的時候，嚴

重的災荒是永遠難避免的。

民生建設是人所共認關係全國命脈的一個大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本文所要討論的祇是目前災荒區域一部分的川災。我特別注意川災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我在幼年及少年時代曾久居川省，西蜀差不多成了我的「第二故鄉」，但同時也因為從川災中可以認識當今政治機構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所以「不揣謏陋」，也來談一談川災。

四川在從前一籌是號天府之國。物產的豐富在全國各省稱當中，可居前幾名的地位。因為天氣和地勢的關係，可耕地的面積，居各省的首位，每農戶平均耕地面積亦超過江浙等省，（按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江蘇耕地總積五六三，二一四，〇〇〇公畝，每戶耕地，一一一公畝。浙江，二五三，一八八，〇〇〇公畝，八〇公畝。四川五九一，四九五，〇〇〇公畝，一一九公畝。）更不是陝西甘肅省所比比較。（陝西雖有總積二〇五，七九九，〇〇〇，戶積一四九之數目，然以旱田佔其中之絕大多數，且以自然界之種種原因，實遠不如川省。）加以農民勤奮而聰敏，利用地力之方法，也每為中外遊歷該省人士所稱道，在清朝末年的時候，各地均有備荒穀倉之設（普通之程度如何，無統計數字可據，這是傳之傳說），所

以就是遇著艱難的年歲，農民也不至於毫無辦法。我在川省寓居約十四年（光緒壬寅到民國四年），從未聽見有大範圍的饑荒，達到今年所遇著的程度。天府之國的佳名，並非「溢美」。但是自從民國改元，袁氏帝制失敗以後，因為全國失去了統一與政治的重心，川省軍閥割據一隅的局面，直到北伐成功，還未曾打破。「羣魔」互相殺伐吞噬，川民除不時受內爭禍害之外，還要長期負債徵募敵的重擔。黑暗的情形，久成國人共喻的事實，不待贅述。「天府之國」經過如此破壞已成了空虛的準餓鬼地獄。穀倉固然早已蕩然無存，農民交納預徵數十年賦稅之後，真是朝不保夕。天災一來，無怪要死亡枕藉了。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應有的結論是：川災的嚴重，由於政治的破壞，政治的破壞，由於國家的不統一和地方的割據，所以要希望民生建設的進行，必需先求統一，剷除割據。當然，在歐美政治已上軌道的國家，地方政府往往在建設事業上表現絕大的成績，不必待中央政府的主持。然而在中國近年的環境當中，這種情形尚難有望。因為（一）地方政府的人力財力有限，（二）地方當局間或不免有私心自利或眼光短小的事實。我們如果拿國軍入川剿共以至最近川軍與國軍發生「誤會」的一些事實來看，就可了

然於在統一中求建設的必要。大凡知道四川情形的都知道國軍入川後川省政治，軍事，金融，社會各方面均呈一種較興奮較有秩序的現象。後來因剿匪重心他移，國軍多數外調，舊日的不良姿態又逐漸的恢復了。（例如前此煙苗已拔，今又再種。）聽說地方當局對於中央籌劃的建設事業，竟設計阻撓，尤其是交通命脈的鐵路建設。用心如此，真可慨歎。但是經過國軍入川後的一番整頓，在甚短期間，農民的自生力已然可以看見。（例如川友某君近回川北來，曾說在情形較好的地方，田價已然漲起，從前賤價難售的田地，近來高價且易出售。）祇可惜不能照前繼續猛進罷了。

近幾年來中國政治情形好轉，不但國人爲之樂觀，奮興，就是國外人士，無論友敵，也都交口稱許或承認我國統一的完成，然而一經仔細分析之後，就知道現在已經完成的統一，大體上還是消極的統一，不是積極的統一，僅

中日外交調整的途徑

中日外交自廢田的三原則交涉失敗後，即陷於停頓狀

態，現在日本當局正在計議打開僵局的方策，將有新的轉

是不內戰，不分割的統一，不是上下一心，中央地方完全

同力合作的統一。我希望川省當局能夠明瞭割據夢想之有損於國，有害於民，而終久無利於己，翻然改圖，從此與中央誠心合作，在政府指導之下，努力建設，以定救災治本之大計。我也希望中央政府當局能夠知道對於割據惡勢力的妥協讓步就是延長人民的痛苦，遲緩建國的工作，從此加緊統一的努力，以謀各地方的復興和發展。從前有句老生常談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清末革命的爆發，差不多爲「天下未亂蜀先亂」作了一個事實的證明。民國二十多年以來的經驗，似乎又要爲「天下已治蜀未治」作證明了。然而我們也不必因此氣餒。共圖禍川，結果引起國軍入川的因禍得福。也許這回天災禍川的結果是中央與地方合力建設，更可欣喜的因禍得福。我不禁要爲川民「馨香禱祝」了。

（五月二日）

土信忠

向。林首相登台後，即宣佈此後對華政策，將「刺激民間之接觸，以發揚日華提携之實」。東京的「朝日新聞」和

「日日新聞」指出政府的政策將展向促進兩國人民的接觸，先解決兩國的經濟文化問題，然後再進行解決政治問題。佐藤外相更率直的宣言對華外交政策有轉變的必要，在貴族院答辯外交問題時，公然說「前內閣所採行之方策，有充分加以檢討之必要」，指出過去外交的錯誤在於「忘却對方，以爲一切要求苟能以強硬態度出之，必可如願以償」。主張「改變方法，從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林內閣的重心結城藏相未就任前也曾對報界發表談話，謂「日本對華政策現已達嚴重之轉變期，故單恃舊關外交之方針，應予清算，並以經濟外交代之。再者將來駐華大使之人選，應於經濟財政界中遴選經驗才識豐富眼光遠大之人充任，外務首腦部對此問題現已開始考慮。余以爲苟非從經濟方面努力，調整中日關係恐終難成功。」最近來華選聘的經濟考察團回國後，先與佐藤外相會見，報告考察經過，林首相更於十六日閣議散後，邀請兒玉等向各閣僚詳細報告考察情形，研討對華政策之根本方針。據同盟社電，佐藤外相將本兒玉等之考察報告，作成以經濟提攜爲中心之對華政策，最近將開關係開僚會議，並將在月底以前召駐華大使川越回國，着手考究具體方案。二十日中央社東京電，謂聞佐藤外相已決定在日本駐華大使館駐滬辦

事處內附設對華經濟調查機關，並增強外務省內現有中國經濟情形調查課組織上之力量。又稱佐藤外相於晨九時邀陸海兩相至外相官邸，討論對華對蘇政策，聞於對華外交討論之核心，置重於日本此後是否竭盡全力於對華經濟之擴張，或順從中國之願望，准行談判政治問題之一部，結論將提交閣議。由此種種，可見此後日本的對華外交，至少在方法上，將有新的轉變，這個轉變就是暫時整個的或部份的放棄政治問題的交涉，先談判「經濟提攜」。雖然日政府內有一部份人認爲調整時機尚早，而軍部之意見恐亦未必能與政治當局相合，故「經濟提攜」究竟如何實現？實現至何程度？尙屬疑問。不過在現時的僵局下，這種轉變在日本方面實係必要，而且是必需的。原因可以分爲三方面講：

第一是中國近數年來因爲國難的煎逼，漸漸造成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各項建設也有飛突的進步，一方面使我們增加了不少自力更生的自信力，同時也使我們堅強了維護和擴大這點新希望新生命的決心。中國現在正努力於內政建設，對外希望絕對和平，但若第三國要防礙我們的自力更生，剝奪我們的生存權時，將不惜拚命抵抗。過去的對外軟弱，讓步，不但未能滿足敵人的慾望，反增他們

的騷縱暴戾，引起更進一步的脅迫和侵略。我們現在覺悟了，綏遠的抗戰，南京交涉的堅持不屈，都不過是維護生存權的悲壯決心的表現。日本如果有挑戰的決心，逼中國挺而走險，自當別論。如若僅憑威脅恐嚇，恐怕未必能奏效，徒然深化我們的憤慨，更增抗拒的決心。外交武力的威嚇既然失效，不得不另找一個外表和緩而實利相等的方方法打開僵局，于是便變出一個新花樣，美其名曰「經濟提携」。

第二是日本鑒於國際地位孤立，蘇俄、美國及在太平洋沿岸有殖民地的國家都在汲汲軍備擴張，軍部雖然儘等向國內宣傳着日本將不懼與中俄英美抗戰，實際也頗有自知之明，無論就軍備，經濟，戰鬥力方面言，都無此微勝利之把握，而況農村經濟的破產，社會的不安，更使軍部有所顧慮。過去日本軍人的橫蠻強幹，似乎是在毫無顧忌地鬧亂子，其實並不盡然，以前日本軍隊在東三省不是常向俄軍挑戰嗎？報紙上不是常常宣傳着「膺懲」俄軍嗎？但不幸遇到了堅決的抵抗，「膺懲」人家反被人家「膺懲」了。爲什麼現在沉默了，不再進一步公然對俄作戰呢？所以日本軍部的現階段的對外行動，所以說是在不促起大戰的前提下，遂行侵略政策，小戰蠶食的伎倆既不能如願，

便只得中止，等到以後準備好了再說。對付中國的策略也是一樣，不幸我們沒出息，不抵抗，于是日軍得暢所欲言，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小津察北，現在我們讓無可讓了，綏遠的抗戰總算替我們爭了一口氣。日本要對付一個中國，也許在他們想來是不會感覺困難的，不過事情不是如此簡單，動一髮而牽全身，日本的盲目對華壓迫侵略，不能不顧及國際情勢而有所躊躇。最近英俄的接近，中英經濟合作的進步，更使日本焦灼難安。這也是使日本不得不轉換對華政策的原因，至少是在方法上。

第三是日本鑒於中國的覺悟，國際的孤立，無理的政治要求既辦不通，于是先且擱置不談，從經濟方面攫取權利。一方面可以擴大對華貿易，使中國成爲日本到處碰壁的過剩商品的推銷場，同時又可藉口經濟提携，向中國攫取戰爭上必需的資料，如煤，鐵，棉花，羊毛，食鹽等，作未來戰事的準備，和是近軍部與財閥妥協後所倡導的戰時經濟準備政策很相吻合。這還是從善意方面的推測。如從日本歷來所持的大陸侵略政策方面推想，日本當局也許在希望利用經濟提携的美名，擷取中國的金融，產業，交通，經濟等的領導權，使中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提携其名，侵略其實，與政治武力的侵略方式雖有不同，而結

果則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由上種種的事實和推測，日本的對華外交，在最近的將來，必將趨重所謂「經濟提携」。林內閣縱使因此次選舉不利而場合，繼任者如無掀起國際風波的勇氣，如欲和平打開中日僵局，仍必遵此途徑。經濟提携究竟如何實現？具體條件如何？日本政府正在擬議之中，凡須視軍部外部財界間之諒解至何程度而定，現時無從預測，也無這種需要。不過就中國方面說，在原則上，如若真是平等互利的經濟提携，並無反對的理由。但是日本過去的種種對華行動，太使我們喪失信仰了，所以如果要談中日經濟提携，要打開中日外交的僵局，有兩個先決條件，希望日本當局注意：

(一)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日本是工商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兩國即使本平等互利的原則合作，日本得將遠勝於我。日本這次對華政策的將由政治問題轉向到經濟問題的交涉，使我發生一個感想，就是日本覺得某種利益不能得到中國的承認，且另轉方向，要求旁的利益。這種損人利己的外交正是佐藤外相所說的「忘却對方，必難順利進行」。具體地說，日本對於中國所要求解決的華北問題，不是推諉為中國自身問題，不願過問；就說事關軍事

，無法干涉。對於已往武力擷取的不法利益，藉口已得權利，中國不承認，儘可停止磋商，要求解決旁的問題，另求新利益。這豈不是於非法的武力侵佔之外，又要藉口經濟提携，擷取新利益，武力經濟雙方並進，中國當不致若是愚闕！所以我們認為要談經濟提携，首應解決華北問題，取消冀東偽組織，交還察北主權，調整平津畸形狀態，駐軍不得干涉政治外交，嚴格取締走私毒販，阻止浪人騷擾，華北問題概由中日雙方外交當局磋商辦理，以免支離割據之弊。滿洲熱河問題也希望先定一個可以圓滿解決的原則。總之我們願意和日本經濟合作，尊重日本的對華經濟利益，諒解日本的經濟需求，但必須日本放棄領土主權的侵略政策，清算過去的非法掠奪，純粹從經濟合作着手。兒玉謙次回國後曾向當局建議考慮華北問題，最近川越回國，亦將轉達我政府當局解決政治問題的意見。希望日本當局慎重考慮，更希望軍部熱權利害輕重，反省過去強橫行動的影響，分割華北的政策反而促進了中國的統一，破壞幣制改革的行動反而助長了法幣的流通，收買漢奸分解離間的詭謀反而增強了全國意志的統一，我敢說中國有人心悅誠服地被西洋人利用，決沒有一個人心悅誠服地供日本人驅使，就是漢奸們也不過是暫時利慾薰心，或

爲生活驅使，決沒有衷心誠服的，綏匪的陸續歸正便是極好的例證。得失判然，日本軍部當知所覺悟吧！清算過去的非法侵掠是經濟提携的先決條件，否則無論就實際利害上，感情上，都不能容許我們放心合作吧！

(二)老實說，日本過去的對華種種行動太使我們喪失信仰了，使我們對於日本的經濟提携不得不發生懷疑。中國現在正努力着經濟建設，產業開發，極誠意地需要和他國提携合作，我們歡迎歐美各國的資本和技術的贊助合作，我們也歡迎鄰近日本同樣贊助和合作。不過問題是我們所希望的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合作，而不是變相的侵略，我們所希望的經濟提携是有無相通的互相提携，而不是對方片面的提携，我們不願任何國利用經濟技術來攫取中國的經濟產業的領導權，我們更戒懼着含有軍事政治作用的

片面提携。所以日本如欲誠意經濟合作，必需遵守幾個根本原則：第一，不得利用提携美名，企圖控制中國的產業經濟；第二，不得藉口合作，攫奪中國的資源；第三，不得祇顧自身的利益，防礙中國的工商業發展；第四，不得於經濟提携之中，含有軍事政治的侵略作用。倘若提携其名，侵略其實，非所敢問也。

以上兩個先決條件，我想不但是作者個人的意見，可以說是我們國人的最低限度的希望，日本當局如有調整中日外交的決心和誠意，應該加以考慮容納，否則徒勞口舌，空費心機。不要儘說人家無誠意接受，應該先自想想自己的要求是否合理化！

四月二十三日晚

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

張佛泉

月前胡先先生在上海國聞周報有一文論及我國教育的力量。

問題。胡先生所論都極中肯。我個人平常也很注意到我國的教育，但既非「教育專家」，所以所談亦非專門技術問題。我腦子裏所有的教育問題是，如何能使教育成爲建國重心的錯誤。這便是對中小學等基礎教育的相當忽略，而對高等教育却時常想加以嚴格的統制。譬如民衆讀物，平民

學校，初高小學校的讀本，可以不很過問，却侈言統制思想。我以為，言統制基礎教育還可，言「統制思想」便等于名詞的矛盾。何以說思想不能統制呢？我們可以隨便舉兩個理由。第一，統制思想是不應該的。學術知識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全仗着思想能變化，能立異，能互相競爭，以期得到一種選擇。思想如定於一尊，即等於歷史的停滯。漢以後的中國，和西洋的中世紀，是最好前車。第二，我們說，思想是不能統制的。思想之爲物無形體，無蹤跡，如風之不能捕，影之不能捉，請問如何統制。並且凡有權統制思想的，在思想智識方面，必遜於被統制的人。那末統制者被愚弄的事便不可免了。

但是基礎教育方面，則與上層思想問題不同了。一個社會如想得到秩序與安全，必須有牠的一致性。上層社會須求其異，基本方面則必須求其同。盡同固不可；盡異亦不可。在今日的社會裏面，欲施行大規模的民治，衆民必須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已故的丁文江先生曾在大公報寫過一篇論及此問題的文章。建議若下共同的基本概念，無疑地是今日中國所最需要的。中山先生曾用「心理建設」這個名詞。這個名詞很有意義。可惜孫先生所講祇限於「知難行易」一說。梁任公先生曾倡新民說，他有洋洋數萬言

的大文，極言「新民爲當務之急」（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冊十二頁三十七）。他引西哲之言曰：「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同上），「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絲毫不容假借者」（前書頁四十一）。欲求新政治，「舍新民末由」。梁先生並曾將「吾國民所當自新之大綱小目，條分縷析」地舉出來。他指出我們所最缺的，爲「公德」，爲「國家思想」，爲「進取冒險」精神，爲「權利思想」，「義務思想」，「自由」觀念，爲「自治」，「自尊」，「合群」，「生利」，「毅力」，「尚武」等精神習慣。（參閱前引書冊十二至冊十五。）梁先生這裏所提出的實是一個很大的教育計劃。但是梁先生的新民說，如他的全部思想一樣，仍是折衷的。譬如他說，「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足以立於大地也。」（前書，冊十二。）他的新民說却仍是「半新」，而非「全新」。我以為我們的若干基本概念改造應是很澈底的。

教育部本會屢次有「教育宗旨」公佈，但這祇是具文。教科書完全是由書賈包辦的。近幾年來教育部對這類關

題比以前注意了。爲各級學校及各類課程都訂出標準。這已經是長足的進步。但這仍限於形式。

近來很有些人見到我國基礎教育需要澈底改革，不祇形式與方法的改革，而是內容方面的改革。譬如梁漱溟先生的「村學須知」，即代表一個新的「教育哲學系統」。顧頤剛先生等正在改寫平民讀物。張蔭麟先生正在改寫中小學的歷史。楊振聲先生沈從文先生等正在編著中小學的國文。又聽說上海的大書店也想聘請學者重編教科書。我們覺得這實是很好的現象。這證明大家都已承認中小學教科書的內容，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但是他們所做的，與我個人所理想的仍未相合。何以呢？我恐怕有兩件事是他們所忽略的（也許是他們故意忽略的）。第一，他們改寫中小學的教科書，其目的也許祇在爲兒童預備下幾種較好，較美，較正確，較有趣的讀本；而未嘗直接有政治成分在內。我以爲這究竟是一種缺欠。我亦不是主張把中國的教育弄成今日意大利或蘇俄的教育那樣子。教育如辦成那樣，便變成了大的騙局，於兒童的心理健康最有損處，於國家前途亦未必是有好處的。但是我始終却信，我們如欲實現一個新的社會，從教育入手是最有力的方法。第二，改著教本內諸賢雖然沒有一個明

白的教育哲學系統，然而却無法免掉若干涵蓄的基本觀念；我說，此種觀念若不經過有意識的推敲，批評，調協，這也是一件很不合理想，甚至是有害的事。

我們現在很需要一個中心的教育哲學。但在今日中國，因爲在文化上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沒有現成的教育哲學可以宗依。論及怎樣產生這種教育哲學，那却又是一件很難的事。我曾與吳俊升先生對此問題做過討論。我以爲由教育部添設一個「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這應是個超政治的機關，由學界的重鎮組成，用幾年的工夫，比較詳細地訂定一個基礎教育哲學系統。然後再由教育專家依此種理想寫爲教本，分發中小學採用。這樣方纔希望教育利用成一種救國的力量。去年有許多人倡行國難教育。如果有所謂國難教育的話，我這裏所計劃的才正是國難教育。

馬志尼在創建新意大利的時候，很看重教育。他把品格教育與知識的灌輸劃分得很清楚。他以爲祇對人民灌輸知識是不夠的，所應注重的乃是品格教育（參閱 *Life and Writings of Mazzini Vol. IV pp. 316-317*）。今日我國的教育問題正是馬志尼時的教育問題。讓我引他一句很有遠見的話，來結束本文。他說：

「沒有民族的教育，那民族便沒有道德的存在，祇有藉着這種教育，民族的良知方能形成。」(前書)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 (續完)

吳景超

(五)政府與工業

政府與工業的關係可以分作兩方面研究。第一，我們可以研究政府對於工業採取一種什麼政策去鼓勵他，發展他。關於此點，政府當局已屢有言論表示，現在也還有各種設計在進行中，本文不擬加以討論。第二，我們可以研究工業界對於政府有什麼希望。關於此點，我願意把此次考察所得到的意見歸納為下列數點。

第一，工業界希望政府制定有關工業的法律時，要儘量採納工業界的意見。過去的法律如公司法，工廠法，在實行時發生許多阻礙，就是因為不甚切于實情。以後政府起草各種法律規程，如在事先博採各方面的意見，這種困難當可減少。

第二，工業界希望政府早日取消轉口稅，地方特稅，修改進口稅率，使原料所納的稅較製造品所納的稅為低，并且修改統稅徵收的方法，使外廠無從偷稅，政府的財務

行政費也可減少。查轉口稅的廢除，本已由行政院二〇四次會議通過，又經中央政治會議第四四九次會議核定，原來本擬于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實行的，只以一千三百萬的稅額無法抵補，所以延至今日還未見諸事實，但財政當局對於此事已在籌畫之中，預料不久便可裁撤的。地方特稅有許多是不合法令的，如厘金早已明令廢止，而類似厘金的通過稅在甘肅，甯夏，青海，陝西，江西，湖南，廣東，廣西等省依然存在。這種事實，預料地方財政上了軌道之後也可消滅。至于原料所納的稅高於製造品所納的稅，對於國內工業當然是一打擊，如美亞織綢廠指出國外綢貨進口只納稅百分之八十，而織綢所需的人造絲則納稅百分之二百五十；又如亞浦耳電器廠指出變壓器之進口稅不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製造變壓器所需之原料如紗包銅線納稅百分之二十，鋼片稅百分之一二·五，絕緣物納稅百分之二十，對於國內的電器工業似有不利。我會把這個問題

提出來請教國定稅則委員會的專家，據他們說，原料所納的稅應較製造品爲低的原則是他們所願意維持的，但原料與製造品的界限有時亦不易分，每有一種貨物，甲業認爲原料，而乙業認爲製造品的，所以稅則的制定，欲其盡如人意，亦正不易。但政府方面總在時刻設法，使大多數的人對於稅則能夠滿意。關於統稅徵收方法的修改，紗業中人提出來的最多，他們以爲與其派駐廠員在廠收稅，不如每月查考紗廠的綻數收稅，如此可以不必派駐廠員，而外廠亦不易偷稅。這是值得財政當局考慮的一點。

第三，關於技術人才，工業界都希望政府多加培養，特別是中級的技術人才。關於此點，教育部早已顧及，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教育部在行政院第一二六次會議中曾提出一案，請確定各省市中等學校設置及其經費支配標準。據教育部聲述，在民國十九年，職業學校數目不及中等學校總數十分之一，經費才及十分之一。教育部的議案即想矯正此種缺點，在提案中規定各省市中等教育經費之分配，限至民國二十六年度達到下列標準：職業學校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五，師範學校約佔百分之二五，中學約佔百分之四十。此案已經通過，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遵行。教育部并擬自二十五年起，就首都及其他適當之地點，逐年籌

設規模較大設備充實之模範中等職業學校一所或兩所，其設科以各地不易舉辦之學科，或確能開發當地原料與改進當地固有職業與企業之學科爲主要標準。我們希望這兩種計劃能順利推行，使不遠的將來，工業界對於中等技術人才不再感無處聘請的痛苦。

第四，工業界希望政府多做檢驗的工作，對於原料加以嚴格檢驗，以免購入劣貨。麵粉公司所運的小麥，毛紡公司所運的羊毛，常在原料中發現大量的沙石及廢物，花費許多金錢，運輸此種廢物，實爲不經濟之舉，如檢驗嚴格，當可減少此種弊端。又有小規模之工廠，對於製造貨品，偷工減料，廉價出售，用戶雖受朦蔽於一時，但終會發覺被騙的事實，於是對於國貨減少信仰，正當工廠無形中大受損失，故政府應對於每種製造品定一標準，在標準以下之貨物應嚴格取締，對於運往外洋之國貨尤應嚴厲執行檢驗。如是則作偽的人有所顧忌，而國貨的名譽，在國內以及國外，當可蒸蒸日上。

第五，工業界希望政府扶助各業，實施統制。統制的必要，在生產過剩的工業中最易感覺得到。過去有些工業因出產毫無計劃，以致貨品充塞市場，彼此跌價競爭，以致一敗塗地。眼光靈敏的人便提倡由同業自動統制，現在

如火柴業，煤業，及水泥業，已有相當的統制方法。關於供過於求的工業，政府自應利用同業公會，統制生產數量，同時對於評價一事，政府的代表應注意消費者的利益，以免自私自利利用統制之名而行壟斷之實。關於出產尚不能滿足國內需要的工業，政府亦應設法利用保息等政策促其發展。惟工業界對於有些省政府利用統制名義，私定省的保護關稅，排斥外省貨物，則均一致反對，希望中央政府設法制止。

第六，工業界希望政府發展水陸交通，使製造品得以廉價輸入內地。并應早日開闢南洋航線，以免在南洋市場中與外貨競爭立於不利的地位。現在我們自己沒有直接的南洋航線，以致一切貨品的運輸，往南洋的都要在香港轉手，加增運費常在三四倍以上。如中國欲在南洋華僑中保持國貨的市場，則南洋航線的開發實為急不可緩之圖，至如歐美航線之開發雖然也很重要，只好俟諸將來了。

第七，工業界希望政府能集中若干專家替新興事業設計。此點王雲五先生言之最詳，他說：

與辦實業開始時之計劃，較成立後之經營為難。前者需要深遠之眼光與廣博之知識；後者祇須在規定範圍內忠實進行，或從事局部之計劃足矣。以故各

種實業之經營專家尚易羅致，而計劃專家則甚難得。我國人材本已缺乏，與其希望每一實業均能獲得計劃之專材，毋寧集中此少數之專材備公眾之顧問。最好能由中央政府就國中主要都市分設實業顧問機關，網羅專材，為當地之實業家担任計劃而酌取手續費。此項機關自當搜集各地方各業之產銷資料以及物價情形，於從事計畫之時，并可以擬辦實業之利害得失忠實相告，俾擬辦實業者知所去取。如是則於代辦計畫之中，兼寓統制實業之效用矣。政府果能舉辦此事，將於實業界協助不少。

王先生所說的實業顧問機關，私人已有辦的，但都是規模的，且限於某種工業，如大規模的幹，自然要由政府來負這個責任。

第八，工業界希望政府能多設試驗工廠，以解決製造過程中的各種難題。現在紡織業已有此種試驗工廠之設備，將來可由各種同業與政府合作設立此種機關，則開工廠的在技術上遇有困難當可迎刃而解。

第九，工業界希望政府設立產業股票交易所，使工業資本得到更大的來源與流動。現在的證券交易所，過去并未能盡此種職責，以致一般有資本的人不敢投資於工廠的

股票，因購買此種股票後，則資金呆滯，如有急需，不能變現。如有股票交易所，則股票立刻可以易現金，變換既易，資金的來源自然加增，對於新興事業需要資本的，股票交易所可與以很大的幫助。

第十，工業界希望政府對於在海外出售的國貨，將金錢匯回本國時，給以較優的匯率。如絲廠將絲售於紐約，所得美金，匯回中國時，如市價為美金二十九元半，可易法幣百元，此絲廠希望得一較優的匯率，即美金二十八元半或二十九元，即可易得法幣百元，有此種獎勵，則國貨之出口將日漸加增，而入超問題亦可得一解決之道。惟此事是否可行，及如何行法，恐須經一嚴密之考慮。

第十一，工業界希望政府能以低利貸款於工業界，或使其他金融機關實行此點，表示此種希望者甚多。惟實行時恐最困難，一因政府現無銀款可以出借，即有款可以出

編輯後記

△「曉湘」先生是一位最熟悉我國政情的人，承他於百忙中從南京寄來這篇稿子，從「獨立」的復刊談到中國內政外交的近狀，值得細讀。

△「君衡」先生的「從川災談到中國的統一」（題目是編者改定的，來不及徵求作者的同意了，要請他恕罪），從四川的災荒論到政治割據的局面所能產出的慘劇，及全國統一的必要。在全國正捐款助賑的時候，這個根本問題值得我們的地方當局深省。難道他們竟沒有一點惻隱之心

借，如市場之利息甚高，而政府故意將利息降低，則此舉等於對接收借款者加以津貼，一家有此要求，他家亦可作同樣要求；一業如此要求，他業亦可作同樣要求，如此種事情發生，政府必無大力以滿足衆望。而且市場之利息如高，政府以低息貸款於工業，則金融業必先受打擊，因金融業之存款，係以高利息吸收來的。如政府以低利貸款於工業，金融業不步其後塵，將無生意上門，如步其後塵，則必破產。所以低息貸款一事，在理論上困難甚多，殊難實現。不過中國市場上利率之高，實為工業化一大阻礙，如何可以使其降低，實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以上所舉的十一點，雖然不是每個工廠都有這些要求，但每一點總有好幾個工廠表示希望過的。現在政府正在注意扶助中國的工業界，那麼工業界的意見是值得細心考慮的。

二五，十二，九日。

編者

，而不惜以成千成萬人民的生命為其政治野心的代價嗎？「君衡」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曾久居川省，那時的政治據他觀察比現在昌明得多；難道革命的結果便是這樣的麼？這一點值得以革命自任的政府當局想想。

△王信忠先生研究中日外交史多年，現在清華大學教授關於日本的課程。我們感謝他為本刊寫這篇長文。

△吳景超先生的文章第一部分在第二三期，第二部分在第二三二期刊登，本期已將這篇長文登完了。

貌全化文示揭 料史國我理整



王雲五
傅緯平
主編

敝館輯印 中國文化史叢書，就文化之全範圍，區為八十科目，分請專家擔任編纂，視範圍之廣狹，每科目分別以七八萬字

乃至二十萬字，為有系統而詳盡的敘述；分之為各科之專史，合之則為文化之全史。上年底為供讀者先觀起見，先將已成之稿二十種，訂為第一輯發行，備承海內外人士稱許。現在續成之稿漸集，另選二十種為第二輯，即日開始發售預約。本輯各書仍依前例，分裝二十四冊，定期出版，其已出版者隨按特價分別發售，以便分購。

第二輯二十種書目

- | | | | |
|---------|------|---------|-------|
| 中國目錄學史 | 魏名達著 | 中國訓詁學史 | 胡樸安著 |
| 中國倫理學史 | 蔡元培著 | 中國音韻學史 | 張世祿著 |
| 中國道教史 | 傅勤家著 | 中國漁業史 | 李卜榮等著 |
| 中國稅制史 | 吳兆莘著 | 中國建築史 | 一冊 |
| 中國政治思想史 | 楊幼炯著 | 中國音樂史 | 陳清景著 |
| 中國水利史 | 鄭肇經著 | 中國韻文史 | 王鶴儀著 |
| 中國救荒史 | 鄧雲特著 | 中國散文史 | 陳柱著 |
| 中國教育思想史 | 任時先著 | 中國俗文學史 | 鄭振鐸著 |
| 中國日本交通史 | 干輔五著 | 中國地理學史 | 王庸著 |
| 中國婦女生活史 | 陳東原著 | 中國疆域沿革史 | 顧頡剛著 |

第二輯 二十種廿四冊 六開本
 硬布面精裝 道林紙印
 全輯定價 三十元
 預約價 二十二元
 國內郵費二元
 國內郵費四元
 預約期 四月一日開始 七月月底截止
 全輯分期出版 自四月起 每月出版一次 已出之書另售特價

第一輯十二種零售特價另詳廣告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沉寂的局面

陳岱孫

建設與統一

顧毓琇

鄉村建設工作的一方面

陶葆楷

施行憲政之準備

蕭公權

中國憲政之前途

宋士英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鎮江	南通	徐州	漢口	南昌
天津華北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上海華北書局	南京華北書局	蘇州華北書局	無錫華北書局	鎮江華北書局	南通華北書局	徐州華北書局	漢口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北平華北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上海華北書局	南京華北書局	蘇州華北書局	無錫華北書局	鎮江華北書局	南通華北書局	徐州華北書局	漢口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獨立評論

第二三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南寧	貴陽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平涼	寧夏	石家莊	保定	南陽	開封	太原	綏遠	蘇州	無錫	鎮江	南通	徐州	漢口	南昌	昆明	
開通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號二同胡元且北國華北門後平北：址社

沉寂的局面

陳岱孫

近四五個月的時局真算得上沉寂二字。去年秋冬間，一方面國際的情勢，自日德防共協定引起人心極度的不安之後，即繼以綏東的匪警，雖然表面上綏東的事件是一班喪心病狂的漢奸土匪出頭串演，而幕後有人也是有目共賞的事實。惟其背景如此，而過去熱河，錦州，長城諸役喪師失地的回憶復明顯的指示不戰與無計劃抗戰失敗的代價，國人情感的緊張憤懣當然是不言而喻。百靈廟一戰之後，匪氛雖然稍殺，而察北根據地內述調頻繁，顯有再舉之勢。正在這個時候，國內又發生了巨大的西安事變。個人的恩怨，主義的是非，我們姑且不去理論，而在內政未定，外侮方般的時候，忽然中樞失主，危險何可言狀。當時一般人的推測，都以為如果這個事變不能圓滿解決，則中國整個局面真的要土崩瓦解，就是過去貌合神離的統一局面都要變成回憶中的至治盛世了。

西安事變出乎意料之外的解決了。時局真的有點像海上的氣候，暴風大雨之後，忽然有一個清明靜寂的境界。一身兼負軍政兩要責的長官，一直到今日，還未能恢復健康，仍在假休養。主持財政大計的孔部長，僕僕長途到英國，代表中國賀英王的加冕。國府主席林先生，也在這時候，南巡鄂，湘，粵，桂。中樞負責者優暇的氣象都可以表示國內沒有急切緊張的情形，而政府數月來政事大部分是例行的事件。中樞以外的情形似乎也是如此。陝北的問題算是解決了，十年腹心大患一旦得以消弭，自然是一件稱心的事情。西安事變的主事者也蒙政府從寬議處，此後西北與東北軍的問題也只餘手續與枝節。西南方面的問題，自廣西表示絕對擁護中央之後，也算告一段落。這是數月國內的情形。至于邊防的情形也沉寂得狠。綏東匪僞本為烏合之衆，其所以敢于發動者，恃其有幕後勢力。百靈廟戰役之後，烏合之衆自然難於維持，所以這幾個月來雖然時常有死灰復燃陰謀再犯的情報，而事實上除小股匪徒沿邊劫掠外，並沒有大舉深寇的模樣。至於中日的關係，自調整兩國關係的會議擱淺之後，就沒有甚麼新的發展。日本國內明識之士近月來也稍可以表示較為正確的意見，而其國內政黨與政府的鬥爭，更減輕對華計劃的注意。

經過去年冬初極度緊張之後，這幾個月沉寂的局面，算給我們一個蘇息的機會。

然而這個沉寂的局面是此後一個通常的永久的狀態嗎？我們能設長此鬆懈下去不至于再遇見甚麼危難的事件嗎？暴風雨之後固然常有一個清明的天氣，可是暴風雨之前也未嘗不常有一個平靜的氣候。最近幾個月沉寂的局面，安知不是風雨前夕的情況？困難的發生是根于危險因素的存在。我們對內對外危險因素如果沒有根本斬除，困難是隨時可以爆發的。

西安事變給予我們的一個教訓就是過去政府中樞機構之過于集中化。因為一切的事情都集中于一人身上，所以一人的安危，關係全部的時局。西安事變發生之時，政府中樞倉皇失措運用不靈的情形，是無容諱飾的。所以常時關心國事者，就怕事變如果遷延不決，政府中樞不能運使機能，那整個的政府便要瓦解了。所以在事變幸而解決之後，有人主張為防患未然計，政府中樞的機構必須改善，必須使中樞這個機構能設機械的運使它的機能。這並不是減少中樞的權力，也不是一個分權集權的問題，不過是要減少中樞的因素，而增強機構組織的力量。關於這個問題的呼聲雖然很多，然而實際的改善似乎沒有進行。當然這件

事並不是短時間之內可以作到的。然而我們現在是否望這條路走還是一個問題。只要一天我們還沒有作到中樞機構健全的地步，這個危險因素總沒有消滅。

近來「統一」辭盛行得狠。自國難日趨嚴重之後，國人都感覺到非統一不足以圖存。政府以此為倡，人民也以此責望政府。尤其是各地方的政治領袖特別感覺到這種責望的力量。現在總算是表面上統一沒有甚麼問題了。國外的觀感也覺得中國今日統一的局面是民國以來所沒有的。這當然是一個可喜的進步。然而我們現在的統一局面並非已經十分穩固。我們近來所謂統一，只是形態一方面的進步。軍閥時代割地自雄公然另立政權的割據方式是沒有了。然而割據的意識是否也隨之消滅確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況且就是只就形式一方面說，我們只能說它有進步，而不能說已經是完全消滅。事例甚多，無須列舉。這個割據因素的存在是國政上一大創傷，它是隨時可以為患的。

國際的情形更是不可靠了。日本近日政黨與政府的競爭使得他們一時無暇外顧。兩者之爭勝負何屬現在無從斷定，而勝負之結果當然要影響于日本對外，尤其對華的政策。然而無論何派得到勝利，總不能完全放棄侵略的政策，與前此的行為相背而馳。所不同者，也許只是緩進與激

進的區別而已。所以此後對日的折衝還要強烈化的。過去我們對外都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固然以一個國力微弱的國家，想採取主動的方略，是不太容易的事。然而被動也有個程度，「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敬候宰割，是一種被動，「水來土掩」，也是一種被動。二者結果可以大不相同。對日問題是我對外最主要的方面，人之未能忘情于我，是不容掩飾，那麼這個問題恐不能以不了了之，而總要得一個解決。至于綏東匪人，它們行動既然隨着幕後人指使，任何一天指使者又恢復侵略工作，戰事便馬上可以爆發。再等而下之，舊都臥榻之旁，竟容冀東組織的存在。這不但是國家的羞恥，也是一個擾亂的種子。這都

建設與統一

顧毓琇

建設可以促進統一，統一可以促進建設，所以建設和統一的關係可算最爲密切。這幾天我們聽見兩個關於建設的好消息：第一個是南京同濟南的長途電話已經通話，並且不久南京同天津北平都可以通話。第二個是湘桂鐵路決定於本年雙十節開工，路線業經測定，經費亦已商妥，由中央擔任半數，湘桂二省擔任半數。我相信大多數國民聽

是隨時可以產生的困難，而未曾得有具體解決的方法。

以上不過略舉國內外幾個較爲重要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從這些問題所孕育的危險因素上看，我們前途的荊棘正多，最近短期的蘇息恐怕只是暫時的狀況。然而這短期蘇息的時間未嘗不可以利用。這一切對內對外的事情都得有個對待的辦法，都得有個踏實的預備。多一分的預備，便多一分的力量，將來事態的演變便不至使我們一無所措。所怕的就是沉寂的局面反而養成一種泄沓的心理，只希望這平靜的局面繼續下去，那麼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這是我們的主政者所當自省的。

見了這兩個消息一定感覺到興奮和愉快。興奮和愉快的主要原因，並不因爲由南京到濟南或平津的長途電話是電訊工程上的什麼奇蹟（孔特使近在倫敦同上海的蔣委員長通無線電話，距離要遠得多），或湖南到廣西的鐵路是鐵路工程上怎樣艱難的工作，是因爲這些交通計劃乃是國家統一的實際證明。西南問題倘若不能圓滿解決，那麼不但湘

桂鐵路無從談起，就是粵漢鐵路亦恐怕難以通車。華北情形倘若不幸而趨於特殊，那麼不但南京同平津難以通話，就是濟南方面或者亦多顧慮了。

近年以來，平津已經在國防的前線，所以我們實在希望南京同平津要趕早通話纔好。我們不但希望何敬之部長能有機會同平津的秦張兩市長暢談暢談，並且我們更希望宋明軒將軍能同上海的蔣委員長南京的馮副委員長有充分報告華北現狀陳述應付方針的機會。一切的事情，尤其在我們中國，最需要當面懇談。而在一切事情之中，尤關於政治外交軍事的，最需要秘密，最需要敏捷，最需要傳達情報，交換意見。記得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南京的何敬之部長馬上就同各地的高級主任將領通長途電話決定一切，而孫哲生院長同湖南何主席亦曾用長途電話詳細談商。這些談話或者對於當時的軍事和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因而對於維護國家的統一便無形中發生了力量。這便是建設促成統一的一種例證。

以中國地域的廣大，交通的不方便，生產的不發達，各部分對於中央的關係，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說，本來不十分密切。近年交通網絡日漸完成，金融組織日漸嚴密，生產事業亦日漸發達，各地與中央，或是局部與整個國

家的關係，自然亦日漸密切。自然的趨勢，便是整個國家的團結與統一。倘若違背這個趨勢，地方同中央，局部同整個，都受其害。倘若依照這個趨勢，我們民族的危機或者可以挽救，國家的難關或者可以渡過。我們試以廣西而論，廣西年來建設固然努力，但整個的經濟問題並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從前一部分經費要仗着特貨的通過稅，後來此項收入逐漸減少，省財政便感覺到十分困難。以人民經濟而論，廣西已有的出產不算很富，礦產有待開發，工業有待振興，而資本同人才自身都感缺乏。總之，廣西為整個中國的一環，廣西的政治經濟必須同整個國家打通一氣，方有辦法。西南問題解決以後，廣西的省會便搬到桂林，湘桂公路馬上通車，而湘桂鐵路即由該省軍政當局提請中央興建。這些建設的計劃便是西南同中央打成一片的有力表現。

再看飢饉遍野的四川。據聞四川當局的代表在三中全會開會的時候正預備提出政治提案請人副署，有人問起旱災情形，主張應提一救災案，後來方始加提救災案（見五月七日大公報載南京四川同鄉會開會時徐堪氏報告）。不顧民間疾苦，但想問鼎中原，到今日災象已深，哀鴻遍野，急賑已覺無從措手，救災尚少根本方案，實可慨歎。但

推原早象之所以日深，災民之所以無救，不外二大原因。

第一原因便是沒有完全統一。報載旅京滬川人對裁軍與刷新川省政治有具體意見，向劉湘提出，主張進一步打破軍區，所有軍隊由中央整理，餉精亦由中央統收統支（見五月七日益世報）。按西安事變以前，中央本決定調川軍四十團出川。倘若此四十團川軍早下三峽，半年以來亦可以節省許多餉精。目前當着三千萬災民嗷嗷待食的時候，倘若川省當局毅然把軍隊支出由中央整理供給，則不但川災較易救濟，川局前途亦有希望了。第二原因便是沒有充分建設。據南京川災救濟協會提出治本的意見，為振興農業同興辦水利。試想四川從民國以來，內戰不知打過多少次，近來在劉甫澄先生主持之下，雖然內部比較安定，但軍費浩繁，人民負擔很重，而建設經費仍然很少。（據陳長蘅氏談，川省預算每年八千萬元，而軍務費約占五千萬元，債務費又占二千餘萬。）倘若四川的經濟建設早達某種程度，則經濟充裕，存儲富足，雖遇旱年，亦可以早自設法採糧辦賑。現在全國各界對於川災自應一視同仁，趕速賑救，中央對於地方一面固應根本整頓，一面亦應趕發賑款，多採糧食，星夜運川，以救民於水火。須知統一建設雖還沒有做到，但此時減少破壞，維護元氣，將來建設固

有較好基礎，而民心既得，統一自然容易促成了。

統一與建設關係至為密切，已如前所論及。但是破壞統一的，不一定由於國內某一部分的主動，每每亦由於國外另一部分的策動。所以一切建設，我們不但求其對內，還要求其對外。建設的範圍本來很廣，包括心理的建設，經濟的建設，國防的建設等等。以心理的建設而論，我們必須培養擁護統一的心理。無論怎樣困難，我們應當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在國家同個人的利益衝突的時候，我們便應當三思而行。任何特殊化的心理，我們都應當早放棄。倘若我們有了統一的心理，我們便自然而然會歡迎統一的建設。就以軍事而言，統一的建設便不外軍隊國家化，一切編制訓練槍械給養乃至駐地任務必須接受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報載舊東北軍將加以整理，使成勁旅，我們相信現在舊東北軍心理建設的條件已經齊備，進一步或者可以做到軍事建設的實在工作。在國家目前情況之下，經濟同國防建設彼此互相關聯，很難分開討論。總起來說，倘若經濟同國防建設都能向前邁進，那麼對外的不屈不撓，對內的自力更生，便都有了具體的後盾。國家的力量增加以後，外面的侵略或者可以減少，而內部的團結自然亦會凝固。倘若經濟同國防的建設都不能有長足的進步，

那麼外人覬覦的野心必定不會減小，而威脅利誘的策略必定加緊進行，倘不幸而內部認識不清，誤入歧途，國家的統一便成問題，而國家的力量亦受影響了。所以，建設固可以團結內部，促成統一，建設亦可以抵抗外侮，維持統一。無論從內外那一方面看，我們需要建設，而建設的目標和方針，無疑的應當是對內求團結，對外求生存。

對內統一，對外便增加了力量。建設可以促成對內的統一，而國內愈加統一，建設愈易進展，所以對內的統一又可以促成建設。對外倘若可以謀自主，求獨立，內部的

統一便不容易受外力的破壞。建設可以增強對外的力量，

而對外愈有辦法，國家的利益便愈可以保得住，建設的工作亦就愈可以進行得順利。我們要促進統一，我們更要維持統一。建設可以通達聲氣，團結意志，開發富源，充裕民生，所以可以由團結內部而促進統一。同時，建設可以強化軍隊，嚴密組織，改良武備，充實給養，所以可以由加強對外力量而維持獨立統一。無論救災抗敵，我們需要建設。建設而後可以求統一，建設乃所以求統一！

二十六年五月七日

鄉村建設工作的一方面

陶葆楷

陳序經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二三一號又發表了一篇「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的文章，裏面有下列一段話：

在這兩天迎接的報告中，大概我們可以看出一種傾向：就是大多數述說各團體的功績，和他們是怎樣努力鄉建，怎樣的認識鄉建，對於實際問題似乎很少很少提出。

陳先生太悲觀了，他覺得國內的鄉村建設工作都只是「有名無實」，所以我願意把我最近負責主持，向來沒有發表

的工作，借「獨立」的篇幅報告一下。此項工作只能看作鄉建工作的一方面，至於是否「實際問題」，請陳先生和其他關心鄉建問題的人批評。

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和江甯縣政府合作，在江甯縣辦理鄉村衛生。全縣人口有四十五萬，面積有七三五〇方里，分爲七區，包括鄉鎮八十八個。現設衛生院一處衛生所六處及衛生分所九處。我所主持的只是衛生工程部份。這部份工作之目的有三點：（一）我們有一個公共衛生

人員訓練所，訓練醫師，護士，衛生工程師及衛生稽查等，江甯縣是他們的鄉村衛生實驗室。(二)我們想以江甯縣爲實驗區，研求中國鄉村裏關於衛生工程各項問題的解決途徑和方法。(三)我們想改進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環境。我們是去年七月起負責的，在我以前的是楊銘鼎先生，我們除掉負責這項工作以外，都還有其他極繁重的工作。在我初接管的時候，只有一個衛生稽查，後來才添了三個衛生稽查和一個工程員。這位工程員的主要任務是衛生院新屋的監工，他對於衛生工程所費的時間是極有限的。我現在可把過去一年內的工作說一說。

鄉民所用的糞坑，大都是露天的土坑或磚坑，或用糞缸，每家必有一個，大家視糞如命。採用這種糞坑的結果，當然是蠅蛆叢生，胃腸病的傳染，糞可算是最重要的媒介。他們住的房子大半沒有窗，屋內的空氣和光線僅靠一扇門來供給。瓦房只有百分之五十，其餘都是草房。有時人家合住一室，又因屋內都是土地，下雨日子非常潮濕。這種不合衛生的環境，知識階級向來在都市裏生長的人是不能想像到的。

(一)環境衛生調查 我們頭一步的工作是做農民環境衛生狀況之調查，包括給水，糞便及住屋等問題。據我們調查所得的結果，江甯縣居民有百分之七十四用塘水，百分之十七用河水，百分之九用井水作飲料。井水的不能普遍採用，一方面是經濟關係，打井須要一筆款項，而塘水則取來極便。一方面也是因爲迷信的關係，農民認井水爲「陰水」，塘水爲「陽水」，並且打井有碍風水，這種見解，須用教育力量逐漸把牠除掉。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家裏沒有水缸，塘水取來就用，沒有沉澱的機會，更沒有一家用明礬使水發生混凝作用，以提高沉澱效能的。至於

(二)房屋的改良 我們在江甯縣做環境衛生的工作，開始就認定必須引起老百姓的興趣。和老百姓最切身相關的問題是他們的住屋，所以我們就把房屋改良作第一步。最初他們當然是堅決反對，後來我們出錢改良了幾處，使他們明白改良是對他們實在有益的，我們竟得着了他們的同情。陳國鈞先生說：「辦鄉村建設而不得到老百姓的同情，總是一個最大的缺點。」這話我非常贊成。老百姓的最大痛苦是窮，他們肯自己出錢——不是強迫的——總該算同情了吧。江甯縣第二區板橋鎮各村的房屋改良，老百姓出了百分之四十的費用，第五區湖熟鎮各村的房屋改良，老百姓出了百分之五十的費用。赤貧之家，由我們供給材料，他們自己修補，還有老年的婦人參加粉牆的工作。

每所房子的改良，平均大約花四元二毛錢，每間房子大約化一元七毛錢。目前我們改良的有四點：（一）粉刷牆壁，不特延長牆壁的年齡，且改善室內的光線，每方牆約需洋二毛。（二）開天窗，使陽光能充分的射進屋內，每個約需洋五毛。（三）在牆上打氣洞以通空氣，洞約四吋寬十吋長，每個需洋五分。玻璃窗太貴，不能介紹。（四）修補草頂，防止雨水的滲漏，每方平均需洋四毛五分。現在改良的已有十三村，共二百家，大部分都是去年七月以後的成績。

普通草房的壽命大約不過五六年，我們正在進行一種調查和設計，等草房毀壞，鄉民自己願意修理的時候，由我們監督指導，使符合環境衛生的標準。我們想就農民的經濟狀況和房屋的式樣，繪成各種標準圖樣，以供老百姓的採用。

此外，我們對於屋內的地面，屋頂和牆的材料，窗與烟囪的做法，正在試驗，想以最省錢的方法，達到防濕，防漏，防鼠，防蚊，防蠅，和防烟的效果。問題比較複雜，此處不再討論了。

（三）給水的改良 塘水和河水的污染情形太劣了，我們認為只有打井的一法才可以解決給水問題。打深井自然

可以得到清潔可飲的水，但在鄉村裏不是經濟上許可的。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要以最低的價格鑿井而得清潔的水。在過去半年裏，我們已在江甯縣打了六口井，深約三十五呎，井徑十六吋，裏面放九吋洋灰管，管外放砂子以資滲濾。井上裝置人工抽水機，並用混凝土板封蓋嚴密。每井工料總共不到五十元（連抽水機在內）。井的出水量和水質都試驗過，每分鐘出水二至六加侖，足夠一村居民的需要，水質雖然還不能完全符合衛生的標準，但較普通的井水和塘水確好得多了。現在我們正在研究進一步改良的方法，使井水可以完全符合我們的衛生標準。

老百姓對打井的意義亦漸漸的了解了，尤其是缺乏大塘的地方，打井不但可以解決他們的飲料問題，還可以幫助他們灌溉上的便利。在湖熟鎮打井的時候，老百姓出了三分之一的費用。

（四）糞便處理的問題 現在鄉村裏所用的糞缸，無疑的是蒼蠅繁殖的場所。我們暫時試用一種爪哇式廁所，是十六吋口徑的鑽洞，深約十五呎，洞內有地下水約二呎，糞便經過腐化作用，體積和臭氣都減少，蠅蛆也不易繁殖。不過我國鄉村裏的糞是農民的寶貝，一定要用作肥料，這種爪哇式的廁所，因為有地下水的關係，糞內的肥料成

分要減少，並且污染地下水亦不能認為圓滿的辦法。因此我們正在進行一種試驗，用各式的廁所，研究怎樣可以保存糞便裏的肥料成分，同時使蠅蛆及寄生虫卵可以死滅。

附帶可以報告的，濟南齊魯大學溫飛德先生也在做性質相仿的工作，不過濟南用乾糞，江甯縣用濕糞，南北農民的習慣不同，試驗的步驟也就不同了。溫先生工作的時期較長，已經有相當的結論。據他試驗所得的結果，如用百分之十重量的植物或其他農場廢棄的有機物和糞便混合，發酵溫度可到攝氏表五十度，寄生虫卵及蠅蛆即行死滅

施行憲政之準備

自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日議決國民大會召集日期以後，吾國已漸近憲法實施之光明坦途。近來中常會復通過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一案，該兩項法規已經過立法程序，選舉工作即可積極進行。是憲政實施已踏入實際籌備之階段，尤當為國人所欣慰。雖然，就愚見所及，憲政之預備工作，似尚有在法規與選舉以外者。謹陳一得，以供參考。按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以一省達到完全自治為其憲政開始時期，而自治之程度，除物質之條件外，

。現在他正在研究肥料價值和應用農作物上的效果。

衛生工程和鄉村建設的關係，恐怕很少人注意到。現在剛是工作的起始，除實驗以外，我們還要注意橫的方面的發展。我們要知道，這部份的工作，除衛生的意義以外，還和農田灌溉與施肥發生密切的關係。不過衛生工程師還需要農學，寄生虫學，細菌學和灌溉工程方面的專家合作，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成績。

二十六，五，三，清華。

蕭公權

以各縣人民會受四權使用之訓練為標準。蓋憲政之先，須經訓政之段落，乃能得循序漸進之效。西洋學者亦嘗謂憲政之成功，有賴於人民之良好習慣，而非可專恃政府之法令，故憲法官如草木之天然生植而不可以勉強人為也。今日距孫先生著建國大綱之時已逾十稔。時遷世易，殊不必墨守昔日擘畫之成規。然回首北伐成功，軍政結束，以至今日，為時亦非甚短，而訓政之工作，尙未見圓滿之效果。平心而論，不特三民主義未成爲舉國同奉之信條，即一

般人民之政治程度亦乏十分顯著之增加。揆之「遺教」，似覺歉然。故在今日人民無充分憲政準備之時，開憲政實施之佳音，殊難免有一喜一懼之感。

讀者如疑鄙論之近乎空談，則請以現代之事實證之。

現代之國家，就其立國之根本原則，可以大致分爲憲政與獨裁之二型。此兩類之國家，不特各有其特殊之政制，而其所以能各有成功者，則有賴適合其立國精神之心理背景。約言之，獨裁政治以民衆之信仰爲基礎，故自法西以至共產主義之國家，均以培養信仰，激發感情爲國策中之要圖。其不同者，前者偏重於人格教育，後者較注意於技術訓練而已。獨裁國家之教育既以培養信仰爲方針，勢必輕視理智之自由發展與思想之自由運用。希忒拉嘗謂國家教育之方針，不在灌輸純粹之知識而在培養澈底健全之身體。心力之發展，當在體力之後，而人格之培養，又爲發展心力之先務。故純粹知識之教育，乃最後且較不重要之工作。希忒拉是言雖不足以概括一切獨裁國家之教育原則，其反理智之趨勢則頗足表現其特色，與憲政國家成一對照。蓋憲政以人民之智慧爲基礎，故自由主義之教育亦注重訓練理智。所謂訓練理智者，既非徒在傳授知識，更非培養信仰，而在養成個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評判力，俾其

學成之後，不囿於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獨立之見解與判斷，而又能根據真理無止境之認識，對於一切異己之主張，持寬容之商榷態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強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人民必須有如此之訓練，然後民主政治乃能盡量發揮其優良之效用。吾人實際上雖不能得見完全理智之人民，然人民之程度愈高，憲政之成功愈大，此則凡治政治學者類能道之，無待於贅述。

吾人若一檢討目前國內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恐不免有理智與感情兩乏訓練之感。鄉村不識字之農人以及城市中年以上之人姑置不論，請僅就「知識階級」國家命脈所寄之青年言之。吾人之私見不足據，請舉青年自己之批評證之。例如王芸生先生在國聞週報發表「告北方青年書」所引起關於青年問題之反響，其中即不少透闢精到之認識。鄭遼明君謂今日青年之病在「感情超越理智」，「淺薄勝過精深」，誠一鍼見血確切不易之論。鄭君又舉其親身所見之事實以爲感情超越理智之證曰，「西安事變之前，筆者曾參加近二千人之擴大座談會，遇有教授演說，痛陳政府措施不當，立即掌聲動，憤慨高呼；而間有冷靜言詞，分析時勢，指明強敵虎視的危機，反而無人重視，一著

無足聽取。「鄭君舉淺薄勝過精深之證曰，「我親眼看見許多中學生毫無選擇地買著××生活，××知識一類的雜誌，上課的時候捧着薄薄幾十頁的大綱，講話在偷看。從報紙上，雜誌上，書本上，知道了許多美麗而空洞的名詞，輸入些模糊怪誕的觀念。開口罵人機械，讀書不求甚解。」如此之心理狀態，既表示理智之缺乏，固不足與英法美諸先進民主國家之人民爭短長，復洩露感情之浮薄，亦豈能比擬義德俄諸民族之程度。鄭君所言之現象當然不能包括全體之青年，而自西安事變以後，一般青年之言行已漸趨沉著穩健，不復如鄭君所指。然青年之理智與感情，果已於驚風駭浪之經驗中，得受充分之訓練，足以為將來憲政之基礎乎？此則尚未易言也。

時人論青年問題者對於青年感情激越，理智短淺之病，多歸罪於（一）外侮之凌逼，（二）政治之不良，（三）言論之受壓迫，（四）社會之不安與青年之少出路，（五）教育之不切用等等。凡此諸說，皆有根據，而愚以為清末民元以來教育方鍼之不定，民族結習之未除，當為其最要原因之一。按吾國先秦暨漢以來之傳統教育理想，即與西方現代諸國訓練理智或激發感情之方鍼異趣。其論學也，則重在致用，而致知遂成為致用之工具。其治學也，

亦重先賢之經說，社會之定制，而輕視個人之特識與創解。儒墨以及法家之思想皆難逃此公例。流風所被，遂使中華民族缺乏求知之科學精神，因而亦缺乏自由思想之習慣與乎開明容忍之態度。孔教定於一尊，「邪說勢在必拒」。聖人之言在昔既可以成為決疑解紛之絕對權威，「大綱」之原則？打倒東方聖人周公孔子之後，勢固不得不另設西方聖人如馬克思，列寧，墨索里尼，希忒拉之新偶像而膜拜之。論者每以青年思想偏激為憂，而不知真可憂者乃在根本缺乏思想，缺乏真知灼見，獨到自得之主張也。張東蓀先生曾謂東西文化之分，在彼為「主智」，我為「主德」，其論甚精。然吾人幸勿誤會，以為理智如少發展，感情即自充實。蓋吾國以往之教育，或不注重訓練感情，或求有以訓練之而不得其道。兩宋道學盛行之結果，流為「禮教吃人」，固無論矣。即北宋直學大家之致意於存心養性者亦不能有所貢獻。「吟風弄月」，「酒食用敬」，充其量不過使感情平穩，得成戒靜慮之修養而已。及至天壤人欲，人心道心之說盛，而感情且被視為害性之具矣。有此歷史上及文化上之背景，無怪乎一般國人似尚感情而感情不堅，似多理解而理解不透，既乏殉道苦修之宗教熱忱

，復少明通豁達之智慧，更無休休有容之雅量也。

獨裁之激發感情，憲政之依賴理智，上文已略論之矣。吾國將來之政體，就孫先生之遺教，憲法草案之內容，以及最近政治之趨勢言之，皆明明為憲政而非獨裁，則當今教育之方向為何，可以不言而喻。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條謂：『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在發展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知識，以造成健全國民。』條文之規定雖未明言訓練理智，然既曰『訓練自治能力』，則民主政治根本條件之應培植，已在不言之中。憲法草案固尚不能視為吾國已經成立之根本大法，然此後關於此條所擬之教育大計，或不至有甚大之修改。然則今後教育界努力之方向，在積極培養理智之人生觀，以為憲政之準備，已大致可知矣。

雖然，有二疑問，尚待解釋。(一)教育注重理智，是否忽視道德。(二)訓練思想，是否放任感情。吾人欲釋此二疑，應先說明理智人生觀之內容。吾人理想中之人物，非記誦淵博之學究，而為智慧明達之通人。荀子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者，庶幾略近此理想。若此之人，道德與感情皆應受理智之指導而自然合軌。蓋世不能有缺乏理智之道德，而道德實寓於大智大慧品格之中

。若就『國民道德』而言，則在憲政國家之中，除理智之人生觀外，更不能有較適宜於平等自由精神與乎自治合議制度之公民理想也。感情與理智之關係亦復如是。人類非純粹之理智動物，教育誠不能廢除感情。然理智發達則感情就範，激發感情則理智每因之退化，此憲政國中教育政策之所以不得不根本異於獨裁國家也。

吾人於此又有進焉。自來提倡自由主義者間不免有所誤解。一曰誤解自由為放任，二曰誤解民治為實質上或形式上之多數參政。請先論前項而以言論自由一事為例。時人攻擊政府者概喜以其壓迫言論為口實。夫言論之不自由，固為目前不爭之事實。然徒知提倡言論之自由而不努力培養自由之言論，則其論亦不免偏狹之病。何為自由之言論。發自獨到之思考，根據事理之觀察，尊重他方之意見，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見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試一檢時人之言論，其能虛心持平以立說，合於上述標準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氣用事之談，偏狹無容之見，亦觸目易觀。異己者勢欲打倒，同調者奉若神明，圓通寬大之風度，渺乎其不可尋。此種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論，以較壓迫言論者之器識與見地，實無殊於一邱之貉。且言論自由而無理智之修養以為根基，則各自是以相非，羣言

撥亂而不能收切磋商之益。觀其欲以一人之私見，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與獨裁者之統制思想何以異？使與之易位而處，其行爲殆亦不能殊也。故人民若無理智之修養，言論自由亦失其真正之效用，而培養理智遂成爲憲政準備之要務，傳統自由主義之放任政策，不足以解決憲政之問題。

此誤解之有待糾正者一也。今日談民主政治者動喜以民衆運動相號召。憲政之必以全民參政爲歸宿，自無待論。然吾猶有說焉。民衆參政，祇能充實憲政之量，而未必能改善其實質。佛朗士嘗謂「七千萬人衆口一聲所發之謬論，亦終不免爲謬論。」蓋民治之真髓，在吾人前此所說之理智人生觀，而不盡在參加人數之多少。義德二國現在之政權皆曾得全國絕對大多數選民投票之擁護，而世無認法西或納粹政治爲民主者。假使墨索里尼與希忒拉之政權無限延長，思想統制之政策全部成功，舉國數千萬之人民皆能「尙同」於其領袖，領袖之所是，民必是之，領袖之所非，民必非之，雖全國之民悉數成爲忠實黨員，取得參政之權利，吾知義德之政體亦仍不可與英法相提並論也。列寧及其信徒亦以蘇維埃政體允許國內多數民衆參加，爲高度民

主政治之實現。殊不知從蘇俄人民思想不獨立，理智乏修養之狀況觀之，無論其技術教育之如何猛進，民衆運動之如何熱烈，其政體之實質與吾國古代之愚民政策，甚少顯明之分別。國人欲避免左右傾之危險，不作西班牙第二，或「根本剷除共黨」乎？惟一可靠之途徑，厥爲培養自由獨立之理智生活而已。此誤解之有待糾正者二也。

綜上所言，吾人之大旨不過在闡明憲政之施行，必須有教育上之準備。如以缺乏理智修養與自治經驗之大衆，驟然作憲政之嘗試，窒礙甚多，成效必緩。語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人民政治之智慧，大半祇能於實際政治生活中求之。本此認識，故愚意決不主張緩行憲政。茲篇所論，僅在說明訓練理智之重要，冀政府能於法令與教育之中，雙管齊下，兼程並進，而尤冀負教育之責者勿斤斤於枝節問題，而能對國家百年大計，努力有所貢獻，庶人民於憲政實施之先知所準備，憲政開始之後知所從事，或可從此一洗民元以來具文憲法口惠而實不至之羞乎？

二六，四，二七日。

（五月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中國憲政之前途

宋士英

民主主義乃辛亥革命一貫之目的，在辛亥革命之傳統目的未被另一種革命推翻以前，民主憲政實爲中國革命不易之歸宿，絕不容有任何疑義。所謂一黨專政，充其量只爲訓政時期一種過渡辦法，絕不能與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下之一黨專政混爲一談。三四年來，政府起草憲法，辦理國選，籌備憲政，其意義固更不能只視爲一促成團結，共赴國難之一種辦法。換言之，縱使中國無國難，憲政之實施亦不容爲無限期之拖延，更不應根本放棄。惟理論上之所應然者，事實上或未盡然。實施憲政理論上雖不容疑義，但事實上之成功則另有條件在焉！

政黨政治雖非民主政治理論上宜有之現象，惟一讀近代各國之憲政史，則知其恆爲民主政治事實上必然之結果，有人甚且以政黨政治爲憲政實施所必假之手段，是故政黨之存在與憲政之實施，遂成相輔相成，而不應相悖相害。惟今日之吾國則又有其特殊情形：第一，歐美民主政治發達之國家，其憲政發展程序恆爲由下而上，先有人民要求民治於下，然後爲實現民治乃實行憲政，最後因實行憲

政乃產生所謂政黨。如以吾國「體用」之說釋之，可謂憲政爲體，政黨爲用。今日我國之情形則與此不同。我國多數人民俱不瞭解何謂民治，更不要求所謂憲政，而政黨則早先憲政而存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爲目前之兩大政黨，其產生俱非由於憲政，而係由於革命。革命之政黨以武力爲其後盾，不以和平之競選方法競取政權，不承認國家之權力，不甘受固有法律之束縛，凡此皆與憲政勢不能同時並存者。是以在辛亥革命完成憲政開始之際，國民黨即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放棄其原有之革命性質，而僅以普通政黨之一自居，實代表對於立憲政治一種真確之認識。其後憲政橫遭蹂躪，孫先生復擬以訓政完成憲政爲一種過渡之辦法。今者憲政再度實施，國民黨自應一如民初，再度退爲普通政黨。此固提倡立憲政治之政黨所必應具有之雅量，無足置疑。第二，歐美民治國家之政黨，亦有黨員，亦重組織，亦尚紀律，但在黨之外尚有絕大多數無黨籍之國民爲政權之主人。各黨競選即以此爲其對象，宣傳鼓吹以博取其信任。今日吾國之情形則又異於此。共產

黨主張階級鬭爭，武裝暴動，根本即不承認民主憲政，固無論矣。國民黨革命之最終目的雖在民主憲政，但其已往訓政之工作初不在教導人民如何作國家之主人，而只在宣傳黨義，使爲國民黨之黨員，「訓練」之，「組織」之，冀使永爲該黨之民衆，永服該黨之指揮。在此情形下，訓政愈成功，憲政必愈將失敗，因憲政之下，人民爲主，政黨爲僕，人民政黨之間，其關係之形態與性質，與黨員之於黨，服從也，忠實也……實絕不相侔。

根據以上論斷，吾人以爲今後憲政之前途，應以二事爲斷：第一，國共兩黨必須澈底放棄其革命政黨特有之行為，主張，地位，與性質，而以普通政黨或議會政黨自居；第二，絕大多數無黨籍之國民必須真能担负國家主人之責任。此二事雖分別列舉，實則互爲因果，互爲條件，故其作用意義實仍爲一事。

國民黨向以人民之媒姆自居。既往數年此事已成極神聖之責任。但今後既主實施憲政，而又不甘拋棄此媒姆之觀念仍以特殊之政黨自居，則爲嚴重之錯誤。王芸生先生說：「我從各方面來審查我自己，或尙勉強夠一個公民的資格。我誓願盡忠國家，永不做違反國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舉手宣誓信仰三民主義，却躊躇了。我不反對三民主

義，並且在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若一定叫我舉手宣誓，承認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還得給我一個充分的時間，再把三民主義仔細的讀幾遍。這是一道門坎，遲留在這道門坎外邊的，想來當不止我一個人吧。」此項態度實爲目前絕大多數國民之心理與態度。再如國民大會組織法，雖因多方責難而修正，但修正之結果，反而加重國民黨特殊之地位。國民黨有悠久之歷史，雄厚之勢力，廣大之組織，且近一兩年來之施政成績及其所持之政策主義，亦難得一般黨外人民之贊助與同情。是以即便僅以普通政黨自居，競取政權亦萬無失敗之理，又何須處處保障本身之特殊性而遭人以口實，引人之反感？因此國民黨不論爲自身之政治前途計，抑爲整個之憲政前途計，實俱應「以孫中山先生十三年主張開國民會議之精神，……給國家樹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基礎」，切實拋捨既往之特殊地位與特權，自立爲一個普通之政黨。

共產黨十餘年來主張階級鬥爭，實行武裝暴動，國家爲此而損失之生命財產不可以數計，尤其消耗元氣，分化力量，予外人以乘我之機，幾使國家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今者共產黨受環境之壓迫及經驗之教訓，已覺悟已往之錯誤，而三中全會又許以日新之路，實只應視爲國家八

民之寬恕，不應視為國共兩黨間之妥協，故只應對全國人民懺悔思過，放棄其革命政黨之傳統政策，採取和平之方法與手段；絕不應挾其僅存之殘餘實力，拋開人民，自與政府講條件，要價錢，爲任何不忠於人民不忠於憲政之行爲。如其產黨人能澈底瞭解目前與今後之政治形勢，暨國民黨之潛在勢力，則當知妥協分贓不只對人民爲不忠，抑且對自身爲不智。共產黨如有自知之明，且欲自重前程，亦應循立憲政治之常軌爲政治的而非武力的活動，一方面昭示國人以其改變之決心，取信於此未來之真正主人，一方面亦所以爲憲政奠基，爲其本身創造歷史，奠定前途。

邇來嘗見不少人士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改組政府，以促成團結，共圖抗日，而美其名曰提倡民主政治。實則此種主張爲最反民主之思想。今日如有人欲利用憲政以求各黨各派之「妥協」「合作」，則其竊襲憲政，正與主張聯合戰線而妄言民主者同。所謂憲政，所謂民主，顧名思義，概須以民爲主。如國民黨以憲政下之法定手續，經人民之擁戴，掌得政權，其專權之程度，即使仍如今日，仍不失爲民主之憲政。反之，如拋開人民，或「半開門」或「暗開門」的自行妥協，則所謂「合作」，所謂「團結」，充

其量不過一種分贓政治算頭政治而已，胡能以民主憲政自飾？

黨派間之妥協，爲民主政治下習常之事實，但妥協失敗之時，即爲武力解決之日。矧妥協之方式必須以人民爲主，評是非，判曲直，是者直者進，非者曲者退，而絕非群僕逐主，自行分贓之謂。各黨派彼此間妥協，雖能使其暫時放棄武力鬥爭，但如欲更進一步保證其永遠放棄武力鬥爭，則有賴於真正民主政治之確立。是以目前各黨各派一如國共兩黨，對中國之和平統一苟確係具有誠意，則俱應忠實於憲政之實施，放棄其「以主自居」之錯誤觀念，明瞭黨外尚有真正之國家主人，而共同扶持之，使其真能負起主人之重任。用奸取巧，攫竊苟合，或暗通聲氣，瓜分政權，雖爲政黨之本能本性，即在真正憲政國家亦不乏其例，但各黨各派必須澈底瞭解目前中國之形勢，人民縱易受蒙蔽與欺騙，但蒙蔽欺騙終非保持政權之方法。各黨各派此時亦只有放棄其前此合縱連橫之慣技，循立憲政治之常軌，以遠大之眼光，克己之精神，忠實將事，以培育憲政之發展，而共奠國內和平之基礎。

吾人始終認爲真正憲政之實現，必須以黨外人民，本國民之立場及中立之態度，判別是非，自作主人，爲其基

礎。惟欲達到此目的，絕不能專賴政黨指導下之訓政，政黨只能訓練絕對服從之忠實黨員，不能訓練自由作主之公正公民，是以如將訓導之責任盡畀政黨，勢將各訓練組織其專用之群衆，各大量吸收黨員，其結果仍只有絕對服從一黨之群衆，而無自由中立自作主人之公正國民，如此則今後益將擴大之集團隨時均有作更大規模之決鬥之可能。

根據此種認識，吾人以爲今後訓導人民自作主人之責任，應在無任何黨籍之中立的智識份子。此類人在過去只知責備各黨奴使人民，不忠於人民，但其自身之未能負起其應有責任實亦有以致之。一兩年來，不論在思想潮流上，實際政治上，俱有非「左」即「右」之形勢，令人陷於左右不得極端苦悶之境地。甚而有爲反「左」而不得不「右」，或反「右」而不得不「左」者。此等行爲，不僅自我良知，國運之前途亦將因而斷送。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形勢頓行好轉，所謂左右之爭既息，憲政又將實行

，此等不黨不派之智識份子尤應痛定思痛，悔悟已往不負責任之錯誤，爲自身之前途計，爲國家之前途計，今後更應利用此好轉之形勢，積極負責，領導國民，致以監督政治自作主人之必要能力，以使中國進爲真正之憲政國家。

總之，在中國現狀之下，不論效法蘇聯，或效法德意，其結果俱將畫虎類狗，徒使中國陷入西班牙之絕境。至少在目前，中國實只有一條平實而正確之大道，即遵照孫先生之遺教，實行民主憲政。惟欲達到此目的，有賴於國共兩黨及各黨各派者半，有賴於不黨不派之智識份子者半。前者之責任在消極的放棄武力革命及特殊地位，後者之責任則在積極的訓導扶植國民，使其能爲國家之主人。鄰邦曾譏我爲無組織之國家，法人某更以我爲無政治能力之民族。凡此吾人必將以今後之憲政實施成效爲其反証，有熱情有血性之國人，實應以此爲今後努力之唯一目標。

編輯後記

編者

△陳俯孫與顧毓琇先生的文章，和上一期「曉湘」與「君衡」先生的文章，觀點頗多相似之處。但是編者知道

陳顧兩位先生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并未曾看到前兩篇文章。我們雖然不能據此便說他們四位所說的代表一種普遍的

觀察，但這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陳序經先生討論鄉村建設的文章又引起了許多討論

與反駁。本期先發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陶葆楷先

生的一篇。陶先生來信說他曾在鄉村中實地工作半年，所

以不能認為是一坐在清華大學來談鄉村建設」。他這篇文

章很可以認為瞿菊農先生所謂「以工作答覆批評」之一

種。

△蕭公權先生在津滬大公報所發表的星期論文，對於

當前的憲政問題及思想問題有精闢的分析，本期特為轉載

。宋士英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研究員。蕭先生常用

筆名在本刊發表文字，宋先生也曾數次向本刊投稿。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第七冊(第一五一一期至一七五期)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每冊
售價

甲種(洋裝)
乙種(紙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
號費

行政研究

第二卷第四期

行政效率研究會編

論我國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違警罰法修正草案起草之經過與說明

僑務行政幾個重要問題

陝西省的田賦問題

推進現行保安制度之商榷

土地整理之理論與實際

「論行政處分之拘束力」的討論

陳之邁

陶履謙

李樸生

嚴仁廣

沈鵬

劉家傑

陳汝德

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三分)

。訂閱全年一元

六角八分(郵費

在內)。郵票代

洋，九折計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特價

修學工具書

本館廿六年度特價書於每星期日公佈一次茲將前十六次中列入之修學工具書彙舉於後以便選購(本館出版修學工具書種類繁多詳見本館圖書彙報)

王雲五大辭典(縮本) 王雲五著 特價三元一角 ①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王雲五小字彙 王雲五著 特價一元一角 ②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康熙字典(海考證及四角號碼索引) 陸爾奎等編 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二元二角五分 ③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新字典 陸爾奎等編 一冊定價一元九角二分 特價一元五角五分 ④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學生字典 陸爾奎編 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一元五角五分 ⑤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國音常用字彙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 布面定價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⑥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國語辭典(第一冊)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 定價三元 特價三元一角 ⑦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標準語大辭典(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編)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一元三角五分 ⑧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綜合英大辭典(合訂本) 黃士復等編 一冊定價四元 特價三元五角 ⑨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求學作英漢模範字典 增訂一冊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二元七角五分 ⑩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雙解英文成語辭典 張世英 陸學煥編 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零五分 ⑪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漢英新辭典(縮本) 李士 汶編 一冊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⑫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訂漢英辭典 張在新編 特價二元四角 ⑬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華英德法詞典 王安新編 定價三元 特價二元一角 ⑭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永瑋等纂 定價十元 特價七元 ① 國內郵費四角六分

中國地方志綜錄 朱上熹編 三冊 定價二元八角 特價一元九角六分 ②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漢晉學術編年 劉汝霖著 四冊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六角八分 ③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劉汝霖著 三冊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九角八分 ④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日用百科全書 黃紹緒等主編 三冊定價九元 特價六元三角 ⑤ 國內郵費六角九分

少年百科全書 王雲五主編 廿冊定價七元 特價七元 ⑥ 國內郵費六角九分

古書虛字集釋 裴學海著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一元二角六分 ⑦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古書讀法略例 孫德謙著 一冊定價九角 特價六角三分 ⑧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新文化辭書

英漢百科名彙 唐啟果編 一冊定價四元 特價三元八角 ①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哲學辭典 王雲五主編 一冊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一元七角五分 ②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英漢經濟辭典 何上芳編 一冊定價一元七角 特價一元二角九分 ③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法律大辭書 鄭競毅等編 三冊定價七元 特價四元九角 ④ 國內郵費四角六分

動物學大辭典(縮本) 杜亞泉等編 一冊定價七元 特價四元九角 ⑤ 國內郵費四角六分

礦物學名詞 國立編譯館編訂 一冊定價四元 特價三元八角 ⑥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古今地名大辭典 臧勵詠等編 一冊定價八元 特價五元六角 ⑦ 國內郵費二角五分

中國醫學大辭典 謝觀等編 三冊定價十元 特價八元四角 ⑧ 國內郵費六角一分

五十年中國歷年表(縮本) 劉大白編 一冊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四角 ⑨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半

現代外國人名辭典 唐啟果主編 一冊定價四元 特價三元八角 ⑩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標準外國人名地名表 余祥霖等編 一冊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五分 ⑪ 國內郵費一角三分

(附註)

特價下之數字示公布之次數其特價截止期如下
① 五月二日
② 五月九日
③ 五月十六日
④ 五月廿三日
⑤ 五月卅日
⑥ 六月六日
⑦ 六月十三日
⑧ 六月二十日
⑨ 六月廿七日
⑩ 七月四日
⑪ 七月十一日
⑫ 七月十八日
⑬ 七月廿五日
⑭ 八月一日
⑮ 八月八日
⑯ 八月十五日
⑰ 八月廿二日
⑱ 八月廿九日

倫敦的英日談判

胡適

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和英國外交大臣艾頓，在英王加冕的前一週，曾有關於英日關係的幾次談判，據說其中有一部分是關係中國的。所以中國政府和民間議論都很注意這些談判，並且很有些人表示深刻的疑慮。

據最近倫敦傳來的英國官方消息，艾頓外長在議會答覆質問時曾鄭重聲明英國政府並無贊成恢復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意。昨日中央社的倫敦電也說：

英國官場對於一部分中國報紙所表示英日談話或將成立一種諒解而危及中國利益之惶懼，認為完全無據。至於英國或可贊成恢復在華勢力範圍之說，亦被視為笑談，蓋以此種舉動將使一九二六年前外相張伯倫發表宣言後及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奉命遊華後英國對華政策全部趨向爲之破壞也。且英國全體人民亦決不許英國對華態度有此變更。

……

依我們的觀察，艾頓外長的聲明雖然有空泛之嫌，不能完全消釋我們的疑慮，然而英國政府十年來的政策確有

一個明顯的傾向，這個傾向在最近一年的有力輿論中更爲明顯，就是期望中國造成一個有能力能獨立的國家。我們依常識判斷，英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不會有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疑忌英國的行爲。所以對於倫敦傳來否認英日有危害中國利益的諒解的官方消息，我們是願意信爲可靠的。

進一步觀察，我們可以指出，這一次的英日談話據說是日本方面發動的。如果日本這回真在倫敦提出了關於中國的問題來和英國討論，這在日本方面已可以算是一大變態了。這六年以來，日本的軍部政客總是強悍的不願意任何國家參預中國問題。狂妄的軍人，仰承軍人意旨的政客報紙，天天攻擊他們所謂中國的「以夷制夷」「歐美依存」政策。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久已是日本的俎上之肉，壺中之蠶，只可以由他們自己任意宰割吞嚼，絕不容許中國人敲鑼喊救，也絕不容許任何歐美國家過問中國問題。但這種態度是中國人不承認的，也是別的國家不理會的。這一次日本的駐英大使在倫敦發動談話，如果真談到了日英對華問題，無論其中內容如何，結果如何，至少可以說

是日本外交的一個大轉變了。

五月十日，日本政府舉行了一次檢討對華外交的三省會議，與會的是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據那晚的日本報紙的記載，會議的結論大要有三條：（1）關於中日關係的調整，此後應依照平等互惠或互讓之原則進行；（2）

「關於外傳中國外交當局擬提倡創立太平洋區域之集體安全制一事，日本必採取完全拒絕的態度」；（3）關於恢復日英對華問題的妥協，三相會議認為應保持英國的密切關係，並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中央社十日東京電大意）。

這種報紙記載如有幾分可信，我們看這第三條，可以知道日本在倫敦的談話大概會提出「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的原則來，所以外間有恢復勢力範圍的傳說。

但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那第二條。我們就不知道我

青年的修養問題

——天津「青年生活指導週」講演稿——

我的題目是「青年的修養問題」。修養的範圍很廣，但我今天所講的，是專指青年們在立身行事方面的準備，至于他們在智識及身體康健方面的修養，因與本題無關，

們的外交當局在什麼時候會有「太平洋區域之集體安全制」的提議。如果我們政府有這種提議，我們當然十分贊成。

如果日本抱着「完全拒絕」集體安全制的態度去和艾頓談對華的妥協或合作，我們相信倫敦的英日談判是不會有結果的。日本的政治家應該明白，用「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去和英國商量對中國的妥協，那是「分贓」，那是「以夷制華」的分贓，那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都不能承認的。這種辦法決不能解決中日問題，也不能解決中日英問題，更不能解決太平洋的整個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只有一條大路，那就是由太平洋上的國家，中國，日本，蘇俄，英國（和他的太平洋上的自治領），美國，平等的，積極的參加一個集體安全制，共同的商討解決太平洋各國彼此之間不能單獨解決的困難問題。（廿六，五，十六夜）

衡 哲

故不多說了。立身行事方面的修養，用舊名辭來說，叫做道德上的修養；用新名辭來說，叫做心理上的修養，或是人格上的修養。名辭雖然不一，實際上指的却是一件事——一件雕琢自己，使成爲一個全才的大事。從前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估計人才的條件，他說，「一個人必須兼有才，識，學，三者之長，然後方能成爲全才。」這個看法很不錯，但還缺少了一個條件，那便是度量，我們常見有些聰明人，他有高遠的見解，有豐富的學問，和充裕的才能；但常常因爲氣量狹小之故，白白的把他的才能學問糟踏了，這不是證明度量的一件事在人生中是怎樣的重要嗎？「學」是指的學問，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內，才，識，與度量，驟看上去雖像是天生的，其實却是一大半人爲的。這人爲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智識，二是經驗，三是修養，而其中尤以修養爲最重要。有了智識與經驗而沒有修養，猶如吃了食物而沒有胃汁去消化牠們，不但不能養身，而且還有發生胃病的危險。

大概說來，青年是一個理想的時代，所以需要修養者，正因爲人生的實境離開理想太遠，青年們將受不住那幻覺消滅的來臨，故不得不早作一點準備，俾幻滅來臨的時候，不至於措手不及，弄得生死兩難而已。這幻覺的消滅，也可以比作道路上的陷坑。一個人在人生大道長征的時候，一定不免要遇到許多可以使他摔跤的坑，故摔跤絕不能算是人生失敗的表徵。人生的成功與失敗，是要看他在摔跤之後，能不能立刻爬起來，更加奮勇的向前走去。

人生道路上的陷坑，最大與最危險的，我以爲有四個。現在且依著牠們在人生出現的次序，分別的來講一講。使青年們摔跤的第一個大坑，是戀愛問題。這是一個新坑。從前的人，至少是中國人，在這方面倒是不着操心的。爲了「奉祭祀，延嗣續」的緣故，一個青年到了相當的年歲，自然有他的父母給他安排一間新房，預備一對花燭，再來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來和他拜天地，做夫妻。但現在可不同了，青年們所求的，是他戀愛的女子，而不是一個任何女性。這個情形可以比作「新酒」；但一般社會對於戀愛與社交的觀念，却仍是一個「舊皮囊」。在把這新酒裝入舊皮囊的當兒，酒囊當然是要炸裂的，酒也不免要撒滿一地了。換句話說，即是，在人生大道上開始長征的青年，摔着他的第一交了。

對於這摔跤的修養，我以爲有三點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第一，我們從幼小的時候起，便應該培養一個正大光明的兩性觀念。我常見有些青年男女，甚至于兒童，以爲和異性做朋友是一件可恥的事，這是很不幸的。這種不正確觀念的來源，當然是由於舊禮教對於兩性觀念的不健全和不清潔。青年們因受了這個不健全觀念的影響，對於他們的戀愛問題也就諱莫如深了。而同時，正因爲他們對於這

個切己的問題，面子上不得不持着一種不屑的態度，不能正大光明的把這個問題來和他們的家長與朋友們討論，故他們便只有跑到電影院去領教了。不幸電影院給予他們的，也是一種變態的性心理，一個高度的刺激，一個仍是不健全的兩性觀念。在這個右邊腐朽氣，左邊腥羶味的兩性觀念之下，青年們對於兩性的觀念還能健全嗎？故我們的基本工作，是求從這兩種觀念中解放出來。我們應該擺脫那舊禮教的男女授受不親的手銬，而同時，也應該擺脫那好萊塢性慾狂的腳鐐！我們應該承認，一個人除了他的男性人格或她的女性人格之外，還有一個更可寶貴，更可敬愛的個性人格。假使每一個青年，都能常常以這個個性人格不與異性相見，知道對方不單單是一個女性或是男性，而且是一位同伴，同學，或是同事，那麼，在他們中間的不自然的性刺激還有不逐漸減少的嗎？假使在這個「忘性」的情形之下，愛情的箭仍舊不肯放過兩位正在愛着的青年，那麼，我們也儘可以不必要感到惶恐與羞耻。這是一個極自然的結果，是可以不必去避免牠的。這個以個性人格與異性相見，以及坦白承認戀愛來臨的兩種態度，可以說是青年們對於戀愛問題的第一步修養。

第二步的修養，是對於心理上彈力的培植。常見有些

獨立評論 第二三五號 青年的修養問題

青年們因為失戀而發狂，犯罪，或自殺的，這都是因為他們在心理上缺少了一點彈力的修養。他們對於戀愛，像對於旁的事情一樣，只有理想，沒有經驗，更受不住幻覺的消滅。當一位青年達到他的異性朋友忽然對他變了態度時，我敢說，十個之中，確有九個九是要感到天翻地覆，日月無光的！而橫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把殺人的刀子，也是一條上吊的繩子了。這現象雖很普遍，却也未嘗不能避免。假使我們平時能了解到人類相處的一點普通心理，我們到此便不免要問：做朋友就是一定要戀愛嗎？戀愛就一定不準受到波折嗎？受到波折之後，就一定雙方都要蒙到羞辱嗎？一個青年在他失戀的一刹那，哭一場是應該的；但哭到兩場，就不免太沒有志氣了。這擦擦眼淚立刻又跑到圖書館或實驗室的行爲，可以說是心理上彈力的表徵，也是青年們在戀愛問題上第二步修養的大成功。

第三步的修養，是認清人生最高目標的所在。我們應該知道，戀愛不過是人生的一小部份。牠雖是人生感情的最深區域，但情感的最高巔與最偉大的區域，却不是牠，而是那個對於人類的大愛。這一類愛的表現，方面雖然很多，但在目下的中國，却莫過於挽救國家與民族危亡的一件大事了。這是青年們在戀愛問題上的第三步修養，一個

「更上一層樓」的人生觀。

於是我們的典型青年從摔倒的地方爬了起來，又再向前走了。走着走着，碰的一聲，他又着了一個坑，又摔下去了。這個坑的名字叫作飯碗與理想的衝突。這個坑在有那些青年的生命上，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理想，他們所見的就只是一隻飯碗，當然更不會有什麼衝突。衝突的發生，却是在懷有高尚理想的青年身上的。這樣的青年，是一定有甚高的志向，和那「任重道遠」的抱負的。他們對於人生有理想與信仰，他們覺得天下事都不足當他們的一盼。在他們的眼光中，人人都是高尚的，卑污的乃是例外；事事物物都是理想的，醜惡的乃是例外；凡人的行為都是光明正大的，利人利國的；而虛偽，欺騙，自私，貪慾等等都是例外。故青年最不能容忍，最是疾惡如仇，也最有與惡世作戰的革命精神。不幸社會上的實情，却正與青年們的期望相反，於是他第一次感到人生的醜惡了。這是青年在人生長征中所摔的第二大交，時期大約是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故有些人把三十歲看為人生的一個大關頭，一個幻覺消滅的危險時期，大約也是爲了這個緣故。

對於這個摔交的準備，我以爲可把古人說的「大節不

險固，小節出入可也」的兩句話，作爲我們行爲的依據。故假如與你的飯碗衝突的，是給你上司的太太拜壽的一件事，那麼，你似乎不妨把他當作「小節」看待，自己去定一個「閑」的標準。不過，使一個青年不得不露了趨承去維持他的飯碗，也不能不說是社會上中年領袖的一件責任。語曰，「瓶之罄矣，維罍之耻。」故我雖希望青年們能不因爲固執之故而失掉他們的飯碗，但我却更希望，中年的領袖們能以氣節去與青年們相勉勵，使他們知道，巴結上司是于前途沒有多大補助的，徒然喪失一己的自尊心而已。從前有位學者說過，「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故我說及這人生道路上的第二大坑時，不得不爲那些剛上征途的青年們，向社會上的領袖們要求這一點點的扶助與鼓勵。

什麼是「大節」呢？「小」與「大」本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故我在上面曾說，一個青年應該自己去定一個「閑」的標準。比如說吧，給上司的太太拜壽，在我個人看來，至少是一個「中節」，即使不是「大節」；但在有些人看來，他或者是一個小之又小的「小節」。不過，比如賣國之類的行爲，却不能不說是一個大之又大的「大節」了。在這個和類似這個的許多「大節」上，我却希望，凡

是有志氣的中國青年，都應當做到『甯可失掉一個國土，不能喪失自己的靈魂』的地步。這便是古人所說的『殺身成仁』。這殺身成仁的行爲，有時是完全出于一時的衝動，如淞滬作戰時的胡阿毛；有時是由于多年的修養，如戊戌政變時的譚嗣同。但大概說來，由修養得來的成仁決心，比了一時的衝動，常是格外有價值，格外成熟，格外沒有輕死的危險。故爲了這一個『重於泰山之死』，一個人在青年時代，也不能不學學譚嗣同，做一點不怕死的修養，想出一個最能利用這『死』的好法子。

人生道路上的第三個大坑，是與一般社會同流合污的引誘。這個坑與第二個坑不同的地方，是，第二坑是一個實際上的問題，牠可以使一個青年沒有飯吃；而這個坑却與飯碗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受到同流合污的引誘的，但不一定是沒有飯吃的人，並且有時還是社會上的領袖呢。故我們對於這第三次摔交的準備，是一點道德上的勇氣，俾我們能以流俗的毀譽爲一己成敗的標準，能以無價值的毀謗爲一個正直社會的真正意志。這並不是說，一個人應該剛愎自用。善意的批評與惡意的譏諷，自有牠們的大大不同處，凡是明智之士沒有分別不出的。一個人到漸近中年時，最容易犯那妥協太多的毛病；雖然在青年的時

代，他的毛病常在標異而不在妥協。對於這一點，法國科學大家居利先生說得最爲沉痛，他說：『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社會上的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的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現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堅定了，在那時候，我以爲……一個人不應該對於他的環境讓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個人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之發展他的美德一樣。』我們若肯放平了眼睛去看一看社會，便將看見，有許多人——尤其是女子——是因爲不能到處追逐無聊的生活，而受到惡意的批評，以至于被目爲怪物的。故一個人在青年時代，便應該培植一點道德上的勇氣，俾將來受到同流合污的引誘時，能不至于立刻投降到那社會的昏濁環境裏去。這樣，你雖不免要受到『摧殘』，但却不至于看不起你自己了。

人生道路上的第四個大坑，是消極與厭世。當一個人摔過三次大交之後，他是很少能再樂觀的，他必定感到人生的無味，發生一種厭世與玩世的憤慨。但這是一個消極的態度，一個人的走路若以此爲止，那麼，世界上何必多我這一個人呢？從前英國的哲學家卡萊兒曾說過：『我從一個永久的消極，走入一個永久的積極。當我在永久的消極過程中時，橫在我眼前的只有三條路：一是發狂，二是

自殺，三是解放。我經過了一個「火洗禮」——一個灼骨焚肌的火洗禮——然後方走入那第三條解放的道路，然後生命于我方有了意義。」（大意如此。）關於這一層，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子，牠是辛國女領袖迦因亞當女士的一個經驗與榜樣。當歐洲大戰的時候，亞當女士曾到歐洲戰場去視察。她回來之後，寫了一點報告，說，不人道的行爲，並不僅以聯盟國爲限，即在協約國，她所眼見的戰場中的情形，也是慘不忍言，絕非人道所應容許的。你道美國的一羣無知人民——無知民衆常占人的大多數，是不是？——在那『黃色』報章領導之下，對於她的這個報告怎樣的響應？他們辱罵她，說她是受了德國賄賂的賣國奴，他們用種種無根據的毀謗來誣蔑她，甚至于在她到一個預約的演說台上的時候，她的一位老朋友竟不敢爲她做主席！亞當女士到此也不能不嘆一口長氣了。但當她嘆完了這口長氣之後，她又說：「這樣的社會侮辱，這樣的成爲無價值的嘲罵的

目的物，尚比良心上的譴責爲容易担任。假使我們因爲畏懼侮辱的緣故，對於我們縮短戰爭的工作有一分的怠懈，我們良心上的譴責是要比任何外來的嘲罵爲難受的。」

一個人怎能做到這樣一個積極的地步呢？簡單的說來，第一，他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在上面已經申說過了。第二，他還需要了解，這是要靠智識的幫助的。比如說吧，一個人若能了解爲什麼有些社會上會有『幸災樂禍』的心理，他若能懂得饑荒和人口太多與這個心理的關係；那麼，他將不但不怨恨某種社會對他的惡意，並且還能由了解而生寬恕與憐憫，再由恕與憫而發生救助之心，去想出一個方法，爲那社會謀求減少人口與加增產品的積極工作了。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一個人方能由消極到積極，方能寬恕與憐憫，方能自救救人。這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峯，不但青年們須向此方面努力，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是應該同樣的努力的。

淪陷後之外蒙古

張其昀

外蒙古之現狀，可分爲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敘述之。

外蒙政治已經蘇維埃化，外蒙商務已被蘇聯獨占，又蘇聯

軍隊得隨時駐防外蒙，故外蒙古實際已成爲蘇聯之一部分，與日本之併吞我東北，如出一轍。外蒙古之淪陷至今已

十七年，喪失領土實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四有奇，其中唐努烏梁海之面積，已較熱河省稍大。國人健忘，似未聞有議及恢復北邊失地者。

自民國九年底，我國軍隊退出庫倫後，即失去外蒙古之統治權。翌年因蘇聯之扶植，外蒙組織「國民政府」，十三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同年唐努烏梁海另設唐努拓跋(Tannu-Tuva)共和國，與外蒙分離，庫倫偽政府曾向蘇聯力爭而無效。(按唐努烏梁海人自稱拓跋氏(Touba Tuva)，乃元魏之後裔。)外蒙政治以蘇聯為模型，廢除封建制度及宗教政治。革命以前喇嘛寺擁有外蒙家畜百分之二十，現僅有百分之一。蒙古文已拉丁化，教科書則譯自俄文，中學教員多俄人。各政治機關悉為俄籍顧問所操縱。民國十三年中俄協定，蘇俄雖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實則早有久假不歸之計。其後中俄糾紛迭起，十六年我政府有清黨之舉，國交破裂，十八年因中東路事件，發生中俄戰役，兩國邦交正式斷絕，蘇聯對蒙暢所欲言，至二十一年冬始恢復邦交，但於蒙事迄無進步。二十三年蘇蒙互助協定成立，實行攻守同盟，其協定對象泛指第三國，並未提及宗主權之中國，可見蘇聯已儼然以外蒙為保護國。

據民國十三年統計，外蒙對外貿易總額中，我國佔百分之八十六，蘇聯佔百分之十四，相差六倍以上，至十六年蘇俄與我已處平等地位，即各佔百分之五十，十八年以後，庫倫封鎖，外蒙商業遂為蘇聯所獨占。庫倫華商民國九年以前合計二萬人，時俄人不滿一百，至二十三年俄人已超過二萬，華商減少至二千人，僅及革命前十分之一，近年華北商業衰落，一部分原因即由外蒙市場為蘇聯壟斷之故。中蘇貿易在蘇聯統計常分為四部，即中國本部外蒙古唐努烏梁海與新疆。據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蘇聯政府統計，中蘇貿易總額為九千萬盧布，其中外蒙古百分之七十二，新疆占百分之十二，唐努烏梁海占百分之十，中國本部僅占百分之六。是年外蒙古在蘇聯對外貿易國別中占第三位，次於德英二國，其重要可以概見。蘇蒙貿易二十年以前外蒙居出超狀態，二十年以後居入超狀態，進口貨以布疋糧食金屬製品為主，近年始有機器之輸入，出口貨以皮毛牲畜為主，其中羊毛一項佔蘇聯進口羊毛四分之一。外蒙古人口九十萬人，烏梁海人口七萬(其中俄人佔一萬二千)，牲畜總數外蒙現有二千四百萬頭，烏梁海有一百萬頭，又外蒙富於森林，狩獵業之重要僅次於牧業。外蒙消費食糧目前產於境內者僅占四分之一，將來勢

地推廣，預期可以白給。外蒙古行政區域，二十年起重新劃分爲十二州，大都依據地理環境而定，如前杭愛，後杭愛，庫倫州（河名），庫蘇古州（湖名）等，其中有一州定名曰農業州，位於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爾坤河流域，甚可注意。礦產可稱者爲那賴哈煤礦，在庫倫東三十五公里，每年可產煤七萬噸，供給庫倫之用。庫倫現有一混合工廠，包括毛織製皮等業，爲外蒙有機器工業之始。要之外蒙地力富饒，農牧林礦均有希望，論其環境，頗與白山黑水區相似，與戈壁沙漠大有優劣之分，即與內蒙乾燥草原祇宜畜牧者亦不相同。

僞外蒙國厲行徵兵制度，凡十八歲以上之男子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現有騎兵四萬，後備軍約十萬人，均爲蘇聯軍官所教導，飛機汽車及軍需用品亦皆由蘇聯製造供給。西伯利亞後貝加爾區域駐有俄軍七萬人，可隨時開入外蒙。東北淪亡以後，從前之省界一變而爲國界，外蒙與黑龍江省呼倫貝爾界未能劃清，頗多爭執，飛機越界及守兵衝突之事時有發生，形勢甚爲嚴重。按我國北方邊防有所謂五倫者，皆屬於蒙古游牧地帶，呼倫索倫現皆屬於僞滿洲國之興安省，察哈爾省之多倫亦同爲日人所奪。庫倫與克魯倫皆在外蒙，蘇聯駐有重兵，克魯倫一名桑貝子，在克

魯倫河上流，爲外蒙東邊重鎮。五倫錯峙，互相牽制，假使五倫盡入日本之手，則日本之滿蒙政策完全實現，不但如此，後貝加爾區之西伯利亞鐵道將有被切斷之虞。故蘇聯與外蒙誠有唇齒相依之勢。就中國言，切望領土保全，外蒙發展，蓋外蒙安則中國北邊亦安。論中蘇關係，此點甚屬重要。自平綏路集寧（即平地泉）至庫倫之鐵道，曾經勘測，從前俄人反對築蒙古縱貫鐵道，以免與中東路相競爭，今則情勢變遷。平庫路長九百六十公里，較張庫路（張家口至庫倫）縮短三分之一，爲歐亞交通之捷徑。鐵道建築問題與漢蒙貿易復活問題均應與俄切實交涉，藉爲解決外蒙問題之初步。我國東北失地合滿蒙而計之，已逾全國面積四分之一，欲同時恢復，恐國力有所不逮，倘使一端獲得解決之途徑，可以促成其他一端之早日解決，望我國民加以充分注意。

（附註）目前教育部審定教科書已將外蒙古區域一律改稱蒙古，按我國外交公文除庫倫協約（係民國元年帝俄與蒙古自治政府私行訂立者）外，皆用外蒙古之名，歷年外交部公報亦然，政府功令兩歧，茲篇仍據外交公文，未去「外」字。近年教育部對於教科書過重形式上之統一，如漢人一律須改爲內

地人，其實漢族蒙族之名本無歧視之意，事實所示，恐亦不能盡廢，若云內地，未始即無畛域之見。

此類正名之例甚繁，特誌於此，希望政府考慮，以免紛歧。

進步的暹羅

陳序經

國人對於暹羅，大概以爲一來是一個蕞爾小國，二來是我們過去的落屬，三來沒有什麼特殊的優高與固有的文化，所以從來不但很少注意，而且很爲蔑視，近數年來，因爲亂經發生了好幾次革命與排華運動，國人對之雖稍加注意，可是蔑視的心理好像並不減少。連了好多住在暹羅的華僑也有這種觀念。

暹羅在幅員上雖遠不及我國之廣大，然而一個國家的富強並不一定依賴於幅員的廣大。歐洲各國可以不必說，我們的東鄰就是很好的例子。又暹羅能從落屬的地位而變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一方面是表示我們的國勢的衰弱，一方面足證明暹羅的地位的增高。至於文化方面，暹羅雖沒有其特殊的優高與固有之處，然恐怕正是因爲了這個原故，所以牠在消極方面，纔沒有像我們的文化的惰性那樣利害，阻止其文化發展，使能在積極方面盡量西化。

其實東亞的獨立國家，除了中國與日本外，只有暹羅

。現在我們看不起我們的南鄰，正與從前我們看不起我們的東鄰一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南鄰的野心未必滅於我們的東鄰。暹羅人近來常常說：「唐代的南詔是他們的故國，中國的南部是他們的故鄉。」他們既是被迫而南遷，他們也許待機而北還。暹羅的第七世皇又對過華僑說：「華暹血統關係很深，即我個人也含有華人血統，故在暹華僑就是暹人，當忠愛暹羅。」暹羅全國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而華僑已有三百萬至五百萬，暹王這些話決非無的之矢。

四年前我到過暹羅，已經覺到暹羅的進步之快。去年又得機會在暹數月，使我覺得只在這四年內，暹羅已有很大的變化。暹羅華僑有了一句俗話：「暹人穿褲，唐人走路。」（意站不住）四年前暹羅人還是穿着他們的紗籠（帕農），現在則很多穿褲子了。去年政府且通令政府機關人員要穿西服。這不過是一個淺明的例子，然而我們從此

也可以明白暹羅近年來的變化的厲害。

據我個人在暹羅的觀察，在進步的暹羅中，有了好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願意簡單的把來說明。

第一，暹羅的天然物產是很豐富的。暹羅地居熱帶，天然物產如米，木，油，煙草，椰子，水菓，樹膠，礦產，至為豐富。目下暹羅出口最多的要算米，約佔全國出口貨百分之七十。此外木材亦為世界著名的出產品。暹羅的天時與土壤極宜種稻，一般農人從放種子一直至成熟收穫，用不着什麼人工。有一種稻叫做水稻，是隨着水平的增高而長高的，所以縱使大水來了，稻也不會為水所淹沒。至於水菓如芭蕉之類，則遍地可見，又如在雨水最多的時候（夏秋兩季），在院子裏，在坡頂上，也可以抽菸。在暹羅，只要一個人願找食物，決不會餓。因為暹羅木料豐富，而房屋多用木造，而又簡單，故關於住方面也沒有什麼問題。在暹羅有一句俗話：「一條布可以過活一生。」現在情形雖變更，可是因為氣候的關係，衣服也是比較簡單的。總之，因為天然物產的豐富，與氣候的關係，暹羅人在衣食住方面沒有什麼問題。我在暹羅跑的地方不少，然而還沒有遇過一個乞丐。

第二，暹羅政治已上了軌道。暹羅本是一個專制政體

的國家，然而經過幾次革命以後，已經逐漸趨向民主之路。國家統一的基礎，經過第四第五第六三個能幹的君主，已很穩固，所以近數年來革命雖有過好幾次，可是不但對於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元氣沒有什麼損失，反足以證明此後是很不容易的發生劇烈的內亂。我有一次從叻搭火車到烏汶，途中見了一對夫婦和三位小孩上車。因為那天二等車很擁擠，那位男的很客氣的請我們給一個位與一個小孩。後來知道他是一位新任的省長。新任的省長不坐專車，不坐頭等，已使我奇怪，然而最使我驚訝的，是他到了目的地的時候，除了省政府三數位高級職員到站迎接外，民衆好像完全不知有其事。什麼歡迎標語與儀式都沒有。不但這樣，在他下車和迎接者握手之後，夫婦兩人以及迎接者一齊跑到行李車裏，幫忙腳夫搬行李。一省之長尚且如此簡單，至於各級政府的組織的簡單是用不着我申說的。

第三，暹羅治安的良善是凡住過暹羅的人都會贊賞。好幾位英國的商人曾對過我說，暹羅的警察制度比起英國的警察制度好得多。在曼谷那麼大的都市裏，重大案件固很少發生，很小案件也不多見，就是有了，也不難破獲。從南邦到青來一帶，差不多都是深林峻嶺，據汽車夫們說

：自開闢長途汽車路後，汽車往來日夜不絕，可是打劫案件從不發生。又暹人住宅多用木板構造，至爲簡單，有了門戶，幾等於無，然而無論在浦都大邑，窮鄉陋邑，也很少有人打劫。這都可以證明暹羅的治民的良善。

第四，暹羅內政固良善，國際地位在實質上也並不低。在暹羅的國境裏，我們找不出一片租界。暹羅曾失過治外法權，暹羅關稅也曾受過限制，然而暹羅能夠發奮努力，又得了外交部長大來托把攀(Fred. Prachar)與其顧問美人塞爾(Francis B. Sayre)的外交手腕，已使這些耻辱差不多完全廢除。暹羅人自稱爲汰族(Tai)。汰的意義是自由。我們試一看南洋各處，除了暹羅能屹然獨立以外，無一不是西洋各國的殖民地，就能明白暹羅實在不愧爲自由的民族。

第五，在交通方面，暹羅有一條大河叫做「湄南」，直貫南北，而且有好多少支流，故交通很便利。差不多五十年前，政府對於鐵道的建築提倡不遺餘力，現在鐵道網佈滿全國，以曼谷爲中心，至於東南西北各境界都有幹線，此外尚有好多少支線。凡是沒有火車可達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公路。航空事業近年來也很發達。至於各種交通的管理上都很有成績。火車的清潔，公路的平坦，都是在我們國

內所不容易多見的。

最後，關於教育方面也很發達。暹羅教育從前操於寺院手裏，一八七一年後，政府就注意於新教育。除暹文學校外，且別設英文學校。一八九一年已知佈新學制，三年後成立教育部。一八九六年設立大學，女子學校設立於一八九七年。

暹羅自政府實行強迫教育之後教育很爲普及，現在國內無論男女，識字者爲數很多。這固由於政府提倡之力，然猶得力於暹羅的文字。暹文是拼音的，普通人讀了三兩年就能寫信作文。

暹文易讀，不但在掃除文盲與探求智識上有很大和很快的功效，就是在同化異族上也有很大和很快的功效。在暹羅之東北主要爲佬人，佬人有佬人的語言，自被暹人征服後，暹人利用其簡易的文字去同化佬人，結果佬人不但在語言方面逐漸趨於「暹化」，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逐漸的趨於「暹化」。這種同化政策現在已施諸華僑，其施行方法也是從強迫華僑子弟讀中文入手。又如暹文的打字機的簡便與速率，比之歐文且並沒有分別。這也是因爲文字的關係。

物產的豐富，是自然給與暹羅人的。至於政治，治安

，外交，交通，教育種種的進步，却是暹羅人自己努力的結果。暹羅的第三世是在十九世紀的初年已洞識世界大勢的趨向與閉關自守的流弊。第四世皇在未就位之前（一八五一）已經努力學習英文，雖則暹羅人在這個時候，懂得英文的除了他以外，也許不易多找出來。到了第五世皇（一八七三——一九一〇）且親遊歐洲兩次，其子第六世皇，與第七世皇，以至現在的第八世皇，從小即派赴西洋留學。我們從此就可以明白暹羅的維新運動之早與其西化的程度之深。

請政府確立一個通盤計劃的合作綱領

吳承禧

中國的合作事業，現在正在蓬蓬勃勃的時期，表面上看來一帆風順；實際上的一座堅強險峻的壁壘業已橫在牠的面前。越過這座壁壘，前面固然還有一條康莊大道，越不過，牠就只好逗留不進，向後轉，或者被牠壓死。

這座壁壘不是別的，就是合作與現行經濟體系的諸種矛盾。

中國的合作事業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是一種政策而非農民的一種自發運動，這是大家所共認的。有的人頗

四年前，我從安南西部邊境搭火車赴暹京曼谷，車中有一位暹羅移民局局員與我談天。談到中暹關係時，他說：「從前暹羅有好多事情要效法中國，現在不但用不着請教於中國，恐怕有好多事情中國也可以借鏡於暹羅。」我的情感雖使我對於這話很為難堪，可是我的經驗使我覺得這話並非全無根據。我回想七十年前的日本，有好多事情還要效法中國，然而差不多四十年前，國人已有唱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論調。從前俾士麥與黃公度曾勸我們注意我們的東鄰，我願國人今後不要蔑視我們的南鄰。

以此為病，實際不然，因為農民能夠自動的從事合作固然很好，政府拿出財力和人力來指導推進，在農民知識固陋和農村破產的情形之下也許是更好的辦法。問題的中心是：政府將要怎樣的推進合作並希望合作担任一點什麼任務。政府對於合作如果止於章則法規的訂訂，合作的前途當然有限。反過來，政府如果製定一個完備的合作綱領，使合作去担起復興農村的任務，並提供全副精力澈底地來實現這個綱領，那麼，即使中國的合作事業是被動的，外繼

的，牠一樣可以健全的發展並達到牠所應當達到的目的。

不幸的是：政府到現在還沒有給合作界確立一個有實踐性的合作綱領。辦理合作的人不是各自爲政，便是暗中摸索，他們看不見中國合作事業的終極目的和中心任務究竟是什麼，雖然他們自己不乏遠大的理想；他們也不知道怎樣去應付那圍繞在他們週遭的種種勢力和困難，更無法解決那種和合作對立但却與整個經濟體系結爲一體的矛盾。政府只有空泛的原則上的提倡而沒有想到怎樣從現實的環境中給合作界指出一條可走的偉大的道路——這實在是日前辦合作的人所最感覺得苦悶的事。

在三四年前，當合作事業還只局限於信用放款的時候，合作社的內容雖然一塌糊塗，但以其業務性質比較單純，與整個社會的接觸較少，牠並沒有碰到什麼了不得的難題。自從產銷合作推行以來，合作事業的範圍逐漸擴大，合作社的質地也漸漸提高，合作是逐步的踏入正軌了。但是正因爲合作的本質是反高利貸，反商人資本的緣故，當合作事業進一步往深刻處發展的時候，牠就不可避免的要和那種頑固的舊勢力發生磨擦，發生衝突。合作愈是前進，磨擦便愈增多，矛盾也就愈趨嚴重，而解決這些矛盾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但是一個社會經濟政策的轉變豈

是一兩個人或是一縣一省的力量所能決定！因此，在中央沒有毅然採用一個適應時代的合作綱領以前，橫在合作前途的障礙就不是今日辦理合作事業的人所能輕易跳過的。今日合作人員的苦悶在此，合作前途的暗礁也在此。

我們試就事實來看罷。譬如說，「共同耕作」是提高農村生產力的一個有效的辦法，也是今日提倡產銷合作聲中的一種最基本的任務。但是如果你真要去澈底的推進的話，你便要整個的土地問題發生糾葛。在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背道而馳，在富農和貧農劃然還是兩個階級的時候，共同耕作簡直是一種不可實現的幻想：我家田肥，你家田瘦，我的田多，你的田少，我爲什麼同你合作？這是自耕農和自耕農間的矛盾。我的田在東，你的田在西；我的田是甲的，你的田又是乙的，……佃農即便要合作又何必從合作？我替社裏耕種，我便沒有充分的時間再耕我自己的田，我以全力耕種自田，我便沒有餘暇來幫忙合作社，因此我們還是分手罷——這是幾個半自耕農，提供一部份勞力共同租了十幾畝田去共同耕作的結果；在私有財產觀念還是極度濃厚的農村社會理，即使租田共耕，有時也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散夥」的！此外，租田共耕，大部份的收穫要以地租的方式交給業主，佃農們如果要想憑藉了共

耕的盈餘去購置田地，那也是極其困難和極其迂緩的；而

使其得以順利的發展自又為常務之急。

當業主一不高興把租田撤回的時候，合作社便要無形解散

這不過是一兩個例子而已，類此的問題正多，我們也

更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致命的威脅。而且，以水利，

不必細說。我們現在再提出一個人事問題來討論討論。

長期並大量貸款的土地銀行又還沒有設立，佃農們即便要買田共耕也無從說起。這種種都是現社會上合作制度不甚融洽的地方，但這些却都不是辦合作的人所能消除的。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並進一步的使這些田地以集體，即合作的方式，去經營利用實是政府應該及早解決的一個問題。

合作是一個新興的事業，牠是需要人力和物力的幫助的。但是據我們所知，有很多的地方長官並不會在那兒奉命唯謹的切實推行合作事業；有的不懂合作，有的曲解合作，有的却有意無意的阻礙合作。能夠上下一心努力於合作事業之推進的並不是沒有，但那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任合作指導員一個人在那兒埋頭苦幹，地方長官却不聞不問，成功也好，失敗也好，他既不扶助，也不干涉，這是很普遍的，但更要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現象。最不幸的是：

又譬如：合作運銷可以免除中間人的剝削，是為高農

普遍的，但更要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現象。最不幸的是：

民收益的一個有效辦法。但是在推進合作運銷的過程之中，合作社便又不可避免的要和種種商業資本發生正面的衝突了：辦理合作烘繭要和繭行發生衝突，辦理米穀運銷要和米行發生抵觸，統制磚瓦合作馬上更有磚瓦行來和你搗亂。你雖然不聲不響小心翼翼的在實幹苦幹，他們却早就虎視眈眈的對你擺好陣線，一有機會，馬上便群起而攻，使你防不勝防，進退兩難；稍一不慎，不是全軍覆沒，便只好屈膝投降；事業失敗，合作也就隨之瓦解！此中危機與此中痛苦，唯指導人員最為親切明瞭，局外人殊難想像。但是一個根基薄弱的合作社怎能和整個根深蒂固的商業資本家對抗？如何調整此中矛盾並如何扶植此種運銷合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合作事業是沒有希望發揚光大的。法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合作事業是沒有希望發揚光大的。

只有政府提出一個切實的合作綱領來並澈底地責成地方官吏去努力推進，用政府全盤的力量去督促他們，考核他們，合作才會有光明的前路。

現階段的中國合作事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了。事實上需要一個遠大的綱領來提攜領導。政府應該及早指出目標，嚴定步驟，使合作事業負起改造農村和建設新社會的偉大使命來。空談合作是無益的，敷衍合作更不是辦法。合作不能止於「合借」；合作不能只是少數人的合

民主政治的一解

陶希聖

作；合作社也不能只是銀行家洩游資並藉以牟利的一個尾閘；牠更不能被地方官吏看作一種贅疣，被社會當作一種點綴，被當局當作一種粉飾太平的工具。

問題是愈來愈複雜了。合作指導員不能長時期的再在暗中摸索。合作界需要一個進步而有實踐性的合作綱領。我們知道：天下事不進則退，合作也不能例外。合作事業決計不能長期的停留在某一階段上；不是讓牠飛躍的挺進便是讓他中途夭折。何去何從，幸政府慎擇。

民主政治不一定要地方分權。地方分權的國也可以是專制國。假如甲省的政府是專制政府，乙省的政府也是專制政府，丙丁各省也是一樣，甲乙丙丁各省分治的國，

就不能算是民主國。如果地方分權的國要做民主國，必須是各省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換句話說，他們都有民意機關，指導行政。甲乙丙丁等民主省無論是以聯邦的方式或是自治的地方團體的方式，構成一國，這一國是民主國。

民主政治不一定不許中央集權。假如一國的大權在於中央，而中央的權力又掌於專制的君主，這自然是專制國

。假如一國大權在於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又取決於一個最高民意機關，這國不能不說是民主國了。

這些話都是容易明白的。

假如有一國，他的中央政府聽命於一個民意機關，但是地方政府都掌於專制軍人之手。這一國是專制國還是民主國呢？當然他在實質上不算民主國，因為一則人民沒有享受自由，二則中央民意機關不會不受地方軍人的操縱或控制或打擊而終於解散。中央民意機關消滅以後，這國在形式上也成了專制國了。

這些話也是很容易明白的。由上面說過的兩三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與地方分權不是一件事。民主政治與中央集權不一定是衝突的。

在中國的現實情形，地方分權這個名詞又要我們留心使用。如果有一個國，依憲法的規定，地方保留許多大權，中央政府只是有軍事權，外交權等權力，這國家自然是一個統一國家。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的。地方政府各有獨立的權力，連軍事外交權也在內。這不能叫做地方分權，只是地方割據。

中國的政治問題是（一）要打破地方割據，必須中央政府有權。中央政府權大了，又怕不能實行民主政治。（二）爲了防制中央政府的權大，似乎要地方政府保留一些權力。但在地方分權的名義之下，地方割據就無法消除。因之，作政論的人們可以分成兩派：（一）看重打破地方割據而求統一的一派，主張中央集權，而中央集權又等於專制政治。（二）反對中央政府的專制的一派，主張減削中央權力及地方分權，而地方分權又等於地方割據。由於前一推論，甚至於統一就是專制。由於後一推論，甚至於民治必須割據。由此而專制論者藉統一爲口號，割據論者以民主爲辯護。政論界演成觀念混淆的奇觀，在實際政治上發

生悲痛的影響。

兩年前，也許可以說是「統一必須專制」的思潮雲湧的時代。兩年以來，代之而起的是「民治必須割據」的思潮。

統一必須專制的思想是錯誤的。從地方割據的政局求統一，必須中央政府有權。如軍政外交權的收回，財政司法權的統一，中央政府沒有充分的權力，自然沒有成功的可能。如單就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地方軍閥的權力的衝突來着想，自須中央的權力比地方軍閥的權力大些，纔可以收回這些大權。不過，如因此便以爲統一必須專制，却又不對。爲什麼呢？消除軍閥的運動，在中央是一種統一運動，在民間是一種民主運動。如果從中下層民衆的民主運動裏面，消除地方的割據，所成就的政治，固然是中央集權的，同時也是民主主義的。

如果解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訓政爲專制，也是不對的。建國大綱固然主張以軍政掃除地方軍閥，同時也主張建國的基礎在地方自治。換句話說，建國大綱的用意，是想中央政府與地方民衆相併而共除舊汗。這種用意與其是解釋爲專制，無寧可以解釋爲民主。

民治必須割據的思想一樣是錯誤的。割據軍人如不能各行爲民主政治，割據便與民主政治沒有關係。這種主張

，一由於現行中央政府沒有厲行民主制度而引起反感。二由於游談講說之士把地方割據的局面所有的特殊的自由，認成民主。在本年五月九日申報早期論壇，我說過這樣一段話：

游談講說之士最宜於地方割據。不容於齊者可以往秦，而不容於楚者可以居魏。假如民主政治就是等於言論自由的話，不問秦齊楚魏是不是各行民主制度，只要他們四國是互相矛盾的，則游談講說之士可以放言高論於四國之間，不是民主又是什麼？他們可以在齊反秦，在魏反楚，不是民主又是什麼？假如秦齊楚魏成了統一國家，則游談講說之士當然受了限制。即令是民主的國家，也還有內亂的刑章

編輯後記

△張其昀現在是浙江大學的史地系主任，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字，是獨立的一個老朋友。

△陳序經先生現在擱下鄉村建設運動的問題，來和我們談談他去年南遊時不見的「進步的泥羅」。

△吳承祿先生是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研究的，最近在浙江省考察農村狀況，對於合作事業有些感觸

，也就沒有割據時代那樣的自由了。

不過這種爲了言論的自由而擁護割據的傾向，是錯誤的。一個黨派爲了做革命活動，不免利用割據作護符，却不可以因此便擁護割據。譬如在租界裏設革命機關，未始不可，因此使主張租界制度就不對了。一樣的，在地方權力之下，反對別一地方權力，或反對中央政府，未始不可，却不可因此使主張地方割據，替他取一個美名曰民主政治。

在這裏只是把幾個混淆的名詞給解說一下，並不想說我自己的主張。我的主張是地方割據必須打破，民主政治必須實行。也可以說爲了這一點，才有解說那幾個名詞的必要。

適之

，所以有這篇「通盤計劃」的提議。

△獨立第一期是民國廿一年五月廿二日出版的。這一期出版（五月廿三日）正常「獨立」五週歲的日子，只因爲中間「虛度」了四個多月，這孩子只好等到第二百五十期再吃生日糖果了。

貌全化文示揭 料史國我理整

中國文化史叢書 第一輯 發售預約

第二輯 二十種廿四册 六開本
 硬布面精裝 道林紙印
 全額定價 三十元 預約價二十一元
 第二輯 預約價卅八元五角 國內郵費二元
 兩輯合定價 五十五元 預約價卅八元五角 國內郵費二元
 第一輯定價 卅元 預約價廿三元
 第二輯 預約價卅八元五角 國內郵費二元
 預約期 四月一日開始 七月底截止
 全額分期 四月出齊 自四月起 每月出版一次 已出之書 另售特價

第一輯二十種書目

王雲五 主編
 傳統平
 主編
 敝館輯印 中國文化史叢書，就文化之全範圍，區為八十二科目，分請專家擔任編纂，視範圍之廣狹，每科目分別以七八萬字乃至二十萬字，為有系統而詳盡的敘述；分之為各科之專史，合之則為文化之全史。上年底為供讀者先觀起見，先將已成之稿二十種，訂為第一輯發行，備承海內外人士稱許。現在續成之稿漸集，另選二十種為第二輯，即日開始發售預約。本輯各書仍依前例，分裝二十四册，定期出版，其已出版者隨按特價分別發售，以便分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目錄學史 楊幼炯著 一册 | 中國倫理學史 曹元培著 一册 | 中國道教史 傅勤家著 一册 | 中國稅制史 吳兆莘著 一册 |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一册 |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著 一册 | 中國救荒史 郭雲特著 一册 | 中國教育思想史 任時先著 二册 |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著 一册 |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著 一册 | 中國口語學史 王雲五著 一册 |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謙著 二册 | 中國漁業史 李十彥著 一册 | 中國建築史 一册 | 中國音樂史 陳清吳著 一册 | 中國韻文史 王鶴儀著 二册 |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一册 |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二册 | 中國地理學史 王蔚著 一册 |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著 一册 |
|----------------|----------------|---------------|---------------|-----------------|---------------|---------------|-----------------|-----------------|-----------------|----------------|----------------|---------------|----------|---------------|---------------|--------------|----------------|---------------|-----------------|

第一輯二十種書目 特價另詳廣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我們究竟要其麼樣的憲法？

張佛泉

再談談憲政

胡適

從救災談到農業的根本問題

蔡鼎

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

薩本棟

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通信）

顧正本

編輯後記

適之

本刊寄售處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鎮江 | 南通 | 徐州 | 漢口 | 武昌 | 南昌 |
| 天津華泰書局 | 天津華泰書局 | 上海神州書局 | 南京中央書局 | 蘇州現代書局 | 無錫現代書局 | 鎮江現代書局 | 南通現代書局 | 徐州現代書局 | 漢口現代書局 | 武昌現代書局 | 南昌現代書局 |
| 北平華泰書局 | 天津華泰書局 | 上海神州書局 | 南京中央書局 | 蘇州現代書局 | 無錫現代書局 | 鎮江現代書局 | 南通現代書局 | 徐州現代書局 | 漢口現代書局 | 武昌現代書局 | 南昌現代書局 |
| 北平華泰書局 | 天津華泰書局 | 上海神州書局 | 南京中央書局 | 蘇州現代書局 | 無錫現代書局 | 鎮江現代書局 | 南通現代書局 | 徐州現代書局 | 漢口現代書局 | 武昌現代書局 | 南昌現代書局 |

獨立評論

第二三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

張佛泉

近幾年來，憲法草案不知換了多少次，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也屢次更改。現在大會的日期已經決定，大會的職權也已經確定為制憲。但對憲法的內容我們却還得說是沒有定論。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或說我們究竟起始實行甚麼樣的憲政？這仍是個當前的大疑問，至少在我看起來仍是個大疑問。我在這裏對這問題想給一個簡括的回答。

我覺得自清末以來，中國所以不能行憲政的原故，或屢次制憲而不能應用的原故，國人對於憲政的誤解要負大部責任。我們許多有影響或有實際力量的政論家或政治家，在我看起來，對憲政都有一個錯誤的見解。這錯誤的見解影響到我國政治史，影響到我們直接生活。

這誤解是甚麼呢？便是，他們將憲政看得太死板。他們所理想的憲政是硬化了的空洞理想。他們將這理想懸得高不可及，懸在我們生活之外。我們要想行憲政，我們須用幾十年的功夫去準備，伸長了手去摸牠。牠正如一尊金佛，塑得很美，很莊嚴，很冷靜，很難接近，祇有到我們摸着牠的時候，我們方算達到憲政的階段。

梁任公先生在清末以為中國不能立刻行憲政。梁先生的理想是個全民政治。要所有的人都「躬親政治」。這樣高的政治理想如何一蹴而躋呢？所以必先設法「膺進國民程度」。一方面先要實行開明專制，一方面要行「新民」教育。這是梁先生的訓政論。

孫中山先生在這一方面的主張算最清楚。他主張直接民治，不但要人民懂得用選舉權，並且要人民能運用創制權，複決權，和罷免權。他要從最澈底處作起，他要鄉下人都懂得用四權，要從完成地方自治縣自治作起。這種高度的憲政，就是自治歷史最久，政治經驗最豐的國家，恐怕亦談不到。孫中山先生所懸的憲政理想却是如此！這樣的憲政如何能立刻達到呢？於是有訓政之說。我們暫不行憲政，先訓練人民。等着達到某一程度時，再宣布憲政開始。

現在有許多講鄉村建設和縣政建設的人，也自己承認是由政治問題逼出來的，而他們的鄉建運動並且也是為解決整個政治問題而來的。我們可舉梁漱溟先生做這派的代

表。梁先生雖與梁任公孫中山兩先生很不同，但他的憲政概念一樣是高懸在外，是死板的。他雖然不主張西洋式的民治（他對孫中山先生的自治論有很嚴刻的批評），但是他却同樣希望鄉村社會中之「各分子皆有參加現社會，並從而改進社會之生活能力」。他所想像中的改革並且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舉凡經濟，社會，教育等問題，他們都一齊下手改造的。這是最奢的改造計劃。目前當然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梁先生明白地說：「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他也承認他們不想對「一時的時局上用力，不在眼前爭短長。」他爲達到這個高遠的理想，只得回過頭來從最低處最小處，一步一步慢慢做起。他們這樣作，與訓政論正如出一轍。他所想像的憲法「文章」也是太「美」了（梁先生曾有這樣的話：「一則文章不厭其美，一則事實不堪其陋。」），此美境一時不可幾，惟有回頭從最低處壘台階，希望總有攀到月中桂的一日。

這些賢者所遇到的困難是一樣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各自備下一個憲政牛角尖，懸在高處，想鑽到裏面去探尋世外桃源。這自然不可能。於是回過頭來慢慢準備階梯。

☆ ☆ ☆

現在讓我說，這樣的憲政觀念根本便錯了。民治決不

應是個懸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個空鶻的。牠應是個活的生活過程，決不是個死的概念。法雷特女士曾有一句語道：「我們必須將民治當做一種過程，而不能將牠看做一個目標。」話說得不能再比這中肯有力了。幾年來我曾屢次爲文，指出我們應該努力養成一種民治的精神，氣質。我們不能先預懸一個空的完美的理想憲法，說，這既達不到，我們祇好先過幾天黑暗的政治生活。這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我們在今日要設法，在可能範圍內，得實行一分（這「一分」兩字很壞，提到「一分」，似乎仍涵蓄着一個理想的「十分」，但爲方便才這樣用牠做形容詞。）民治使實行一分民治，得實行兩分民治使行兩分民治。在可能範圍內我們要過民治的生活，而不把牠懸作生活以外的一個空洞理想。這裏所謂「在可能範圍之內」，便指民治力量而言。社會裏面有了一分民治力量，即要過一分民治的生活，有兩分民治力量，便過兩分民治生活。

我這個論題，含着很豐富的意義。牠可以推翻幾十年來幾派影響人最深的憲政理想。

任何訓政之說，都受不了我們這論証的批評。依我們的說法，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起始。有了一點憲政力量，便容牠發揮出來；再有多多的，再容牠發揮出來。這在起始

也許範圍很狹，規模很小，但祇能做到有力便容牠發揮的一步，便算養成了民治氣質。

依着我們這裏的論証，至少有兩點可以具體指出。第一，我把「政治能力」常做參加政治的資格。我以為有這能力的人即須容他參加政治。但沒有這能力的也不能相強。這能力的計量器是甚麼呢？我以為最好是教育程度。

這不是最理想的辦法，但大體上是可能範圍內最好的辦法。我深信中國幾十年來的新教育，已經爲我們貯存了很大的一份新政治力量，如能儘量容這力量發揮出來，使很可能以打破現有政治的局勢，很可以奠定下「制度」的基礎。

這一點的反面意義，便是不容普選。此點許多人都不能接受。因爲我知道自然權利說已深入人人的潛意識。這很不幸。自然權利說與神權說，同樣值得拋到九霄雲外。我們將參加政治看成一種義務，一種責任，一種負擔。嗎

志尼早就有此主張。約翰密耳也早有此主張。密耳說：如果選舉祇是權利的話，我們有甚麼理由罵人家將票出賣呢？在我們今日，祇有在證明某人有相當政治能力時，方能將政治重擔放在他肩。這是實事求是。近年來的零碎的政治歷史逼得我們取此態度。人民沒有政治能力時，必依空洞原則賦予他們這種權利，其結果不是官方把持，便是

七豪劣紳包辦一切。

第二，就大體上論，我以為自治應由城市起始，漸而推之於地方。而不能由地方自治作起。受過比較完全的新式教育的人多半在都市，都市吸收西方文化最早，這裏自然應是新政治的發起點。並且証之以西洋憲政發展的歷史，這程序也是不錯。

要之，這裏所提示的，是個一切簡單化的憲政開端。憲政要從少數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參政的方法也務求其單純，選舉如不可能，祇許說「是」與「否」的公決，也無妨試用。我們所需要的，在養成一種民治氣質，開始一種有民意基礎的新政治制度。

☆ ☆ ☆

上面所論，雖然不是個憲法大綱，但指出一個新憲政原則。

我以為在今日如想制定一個能行能守的憲法，並不是不可能，但先決條件在能否顧及客觀事實，放棄三四十年来把憲政看的太高的錯誤見解。如果這一點做不到，那麼，所謂憲政的實施，也許只添一個裝飾品的憲法，反可以使人對憲政更失望。

再談談憲政

胡適

我讀了張佛泉先生的「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我很贊同他的意見，所以忍不住要寫一段短尾巴在後面。

我十分佩服張先生大膽的指出：我們三十年所以不能行憲政，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國人對憲政的誤解，在於把憲政看作了一種高不可攀的理想。張先生要我們明白民治憲政不是個「懸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個空鵝的」，只是個「活的生活過程」。因為如此，所以「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開始」。因為如此，所以張先生主張憲政開始時規模不妨很小，範圍不妨很狹，只要做到「有力便容牠發揮」的一步，就算是奠定了民治的基礎。

在三四年前，我和蔣廷黻先生討論「建國與專制」的時候，我曾發過一個「很狂妄的僻見」，大致如下：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

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獨立第八十二期）

我這個「僻見」，蔣廷黻先生不屑答覆；有一天他對我說：「你那一段議論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過了一年之後，丁在君先生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裏引了我這一段話的第一句，他的批評是：「這句話是不可通的。」（丁先生的全文轉載在獨立第一三三期）這大概是因為我不是專學政治學的人，所以我的「僻見」，廷黻先生說是「笑話」，在君先生說是「不可通的」。

我自己相信，上文說的僻見並不是笑話，乃是我在美國七年細心觀察民主憲政實地施行的結論。我也曾學政治理論和制度，我的運氣最好，我最得力的政治學先生是曾在 Ohio 做過多年實際政治改革的 Samuel P. Orth。例如他教我們「政黨論」，從不用書本子；那年正當一九一二的

大選年，他教我們每人每天看三個大黨（那年羅斯福組織了進步黨）的三種代表報紙，每週做報告；並且每人必須參加各黨的競選演說會場；此外，我們每人必須搜集四十八邦的「選舉舞弊法」，作比較的分析。我受了他的兩年訓練，至今看不起那些從教科書裏學政治的人們。我對於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完全是因為我曾實地觀察這種政治的施行，從實地觀察上覺悟到這種政治並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過是一種有伸縮餘地，可以逐漸改進，逐漸推廣政權的常識政治。我在三年前答了在君的論文裏，曾發揮這個意思：

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樹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 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獨立第一三三期）

我在美國看過兩次大選舉；去年在美國看了第三次大選舉，看了第二個羅斯福在那個全國資本家極力反對的空氣之下得到總票數百分之六十四的空前大勝利，我的民主憲政的信念又得了一種最堅強的印證。我更深信：民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血脈奮張的自以為「專政」，他們只須逢時逢節，在要緊關頭，畫一個「諾」或畫一個「之」，這種政制因為對於人民責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於人情，最容易學，也最有效果。

現在我很高興，政治學者張佛泉先生居然也發表了一篇和我的「僻見」很接近的論文！如果我沒有讀錯他的論點，他的主張是這樣的：（1）民主憲政不是什麼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標，只不過是一種過程。這正是我當年立論的用意。我說民主憲政是幼稚的政治，正是要打破向來學者把憲政看的太高的錯誤見解。（2）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開始，開始時不妨先從小規模做起，人民有力量就容他發揮。這也是和我的「逐漸推廣政權」的說法很接近。乾脆的說，我們不妨從幼稚園做起，逐漸升學上去！

現在的最大毛病就不肯從幼稚園做起。即如此次國民大會的選舉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年滿二十歲經公民宣誓者，有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之權」，這就等於「普選」了！

(因爲不識字的人也可以教會背誦公民宣誓的。)又如初辦憲政就規定一個一千四百四十八的國民大會，這又是不肯從幼稚園做起的大錯誤。

現在政府把國民大會的職權縮小到訓令和規定憲法施行日期兩項，這確是一個救濟方法。但我們要注意，國民大會的組織法第十條規定大會會期爲十日二十日，必要

時得延長之。既說是「制憲」，就不應該是僅僅通過那已成的憲草。我們希望，在國民大會召集之前，大家能多多的，細細的，想想「我們究竟要什麼樣的憲法」一個大問題。我們希望，國民大會應該有長時期可以從從容容的制憲。我們更希望，國民大會所制的憲法是一種「能行能守」的幼稚園憲法。

廿六，五，廿三夜

從救災談到農業的根本問題

蔡 鼎

我國農業近幾年來真是坎坷運蹇。先是二十三年的全國大旱災；繼之以二十四年的水旱，全國秋收作物的受災土地面積共達九三，六二〇，〇〇〇市畝，損失數量達一三二，三四五，〇〇〇市担；乃閱時不久，又復聽說各省紛紛向中央報災乞賑。據最近各報所載，被災區域包括四川貴州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河南廣西等八省。其中尤以四川的一百四十一縣和貴州的五十七縣爲範圍最廣，損失最大，情形也最慘。在短短的四年期內而接連的遭受三次大災，這對於國計民生是如何的一種打擊！爲拯援災黎以培植國家元氣，救濟工作誠屬刻不容緩；但關於救濟的種種方針，不無可以商榷的餘地。

救濟災荒無疑的應以災民爲對象，而由公私兩方面趕籌賑款入手。但經驗告訴我們，災區以內「米珠薪桂」；與其散放微額現款而無裨於事，不如大規模購運食糧，縝密辦理平糶，以免週折間接諸弊。可是無論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如何的努力籌款，社會個人如何「踴躍輸將」，賑款終屬有限。所以這些治標的急賑辦法祇可救濟於一時，而決不能支持於久遠。

急賑既難徹底救災，那麼，公私上下各方面自不能不另策所謂治本的方法。依一般普通的見解，根本救災總不出農貸，工賑，積穀，水利，造林和墾荒的六法。先言農貸：各省被災區域因久旱之後，耕牛被宰，田具房產出賣

，種籽無存，雖幸得甘霖，也不能補種雜糧。故公私上下各方面所倡議贊助之經由合作社而舉辦的農業貸款，限制其用途於耕種（贖田具房產，贖牛馬種籽等），「亡羊補牢」，不無裨益。言工賑則川貴陝甘寧青豫桂等八省交通本欠便利；一遇歉收，其他各省米糧因轉運費時，運價又昂，往往與「遠水不能救近火」之感。現在行政院和全國賑委會之擬議利用一般災民於那些業已籌得的款和已經縝密計劃的工程——修造公路，建築鐵道，開浚河道等等，既可推進國防和國民經濟性質的交通建設，又能使災民衣食無虞。一舉數得，那裏還有訾議的餘地呢？言積穀則我國以往對此實在過於忽略。「豐年爲災」，幾已成爲我們經常所聽到的慣語。遇着這種的時候，農人雖或不致將餘剩的米穀燬滅，但大量輸出國外，亦非得計。農本局之會同關係各省當局經由合作社而普遍設立倉庫，實行「積穀備荒」，自然多少可以減輕將來災荒的嚴重性。言水利則我國農業本爲純粹灌溉性的農業。農田斥水差不多要算是耕種上一種很主要的工作。徒因以往對於灌溉設施，農人各自爲謀，系統紊亂，設計陳腐，稍旱則灌溉水竭，久雨則河道潰決。當局誠能有組織的有系統的按照一定計劃，乘時推進水利設施，不獨可免田地之受赤旱氾濫的浩劫，且

能積極增加和調劑田地的肥沃，提高它的生產數量。言造林則當局早已提倡有年；但因新種的株數不敵每年之被濫伐踐踏拔掘的株數，提倡儘自提倡，成效至微。我們知道森林由於它涵養水源和防止土砂崩壞的兩種機能，能夠積極的改良耕種土壤。此後於鼓勵造林外，如當局能更辦得到保林（使林木不致被濫伐，樹苗不致被踐踏拔掘）的地步，土壤的改進和農產的增加不難逐漸實現。言墾荒則盡人皆知這係一種助長農業發展最直接的方法。當局在實施時如能對於墾殖地區，墾殖方式，墾殖人民，墾地面積和墾殖金融的選擇與設計，作適當的解決，墾荒的結果又豈祇限於消極的預防災荒而已？因耕地面積擴大，農產將有大量的增加。

由上所述，這六種所謂治本的方法果能如我們所期望，和急賑同時由公私上下各方面切實推施，未嘗不能減少將來災荒發生的可能性；然稍經仔細探討，亦未必就能由此徹底的消滅我們農業之所以成災的真正因素。統觀上述的前五法，都似失之消極。蓋貸與辦充其量祇能幫助災農及時補種雜糧；而收穫之能否如願，還須待決於天。我國年來各地食糧生產時陷不敷自給狀態，常有限制輸出省外之舉。故工賑成功，交通固可大形利便；食糧暢運（外

米例外)有時亦殊未敢預卜。至於造倉積穀，因近數年來災荒頻仍，農產萎縮，每年輸入大宗洋米麵粉纔夠週濟民食，那有餘以備積儲？即令此後風調雨順，每年豐稔，然積儲終有限制；再加歷時稍久，虫蝕損腐在所難免。一旦災起，以多年的累積也祇能救濟於一極短時期；故積穀非絕對可靠的根本辦法。造林和水利以表面上看來，無疑的

是兩種比較積極而又直接增加農產的方法。可是要知道我國耕地奇小散碎，多數已經十分集約的利用。縱令土壤因適當的灌溉和有效的造林而有改進，但在固定面積的現實耕地上多加勞力和資本，生產不能比例增加；勞力和資本的費用有時反逐漸超過所增加產物的價值。由此而知造林和水利的舉辦祇能防止許多水旱災害(過大的亦非造林和水利所能防止)，避免農業生產的低減；如要希圖可因此而大量增加生產，那恐怕還是一個疑問罷？至藉墾荒以推廣耕地，前途亦頗難樂觀。據去年內政部統計，國內可耕荒地，就二十一省之五百六十七縣而言，共有二二八，一一〇，二二〇畝；其中遼寧黑龍江熱河三省所有荒地已達二一七，六一八，四一二畝，而吉林和察北綏西之被侵佔的荒地尙未計入。自「九一八事變」以後，非但我們不能移民前往東北四省，而且每年尙有大批同胞因不堪「友邦」

和「偽滿」的壓迫而陸續向關內移入。東北四省移民墾荒暫時無望，於是大家都轉向西北方面謀出路。據翁文灝氏的估計，西北最好的六個農業區域有一萬九千餘萬畝，至多可容納墾民一千萬人。張心一氏的估計更少，以為西北祇有甘寧青三省的四十八萬英方哩能容納農人九百萬人而已。固然西北的林地牧地和礦地面積比較農地爲大。但森林畜牧既需地極廣，容納人口必少；礦業以我國資本之缺少，同時交通不便，開發後是否有利，頗費考量；而況這三種事業都需時甚久，益以西北氣候奇冷，雨量稀少，人民能否毅然前往久住，也難預言。剩下來的就是黃河以南各省的可耕荒地，面積有限。如能適當的墾墾，充分予以利用，未始不能增加農業產量；但決不易由此而能徹底的消滅農災。

然則我國農業之所以易於成災的真正因素是些什麼呢？我以為第一是我國農民每人所用耕地面積過小。依中央農業實驗所二十四年的報告，國內八九一縣農地經營面積的分配情形如下：平均有地不及十畝的農家佔農家總數百分之三五·八；有十—二十畝的農家佔總數百分之二五·二。兩者合計已超過農家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據主計處的統計：我國農民平均每戶所有耕地也祇二十一畝；以每

戶五人計算，則每人所得平均不過四畝。翁文灝氏以爲如將地畝內所包括不少的山巒江湖第宅道路等面積除去，專從耕地而言，我國農民每人實得的田地大約只有三畝。美經濟學家倍克氏的估計數字更低，以爲我國在一九一九年每人不過有〇·四英畝（合二·四華畝），不及美國每人所有的九分之一。另據專家的計算，一個農民要維持他適當的生活，平均約需四十華畝的耕地。以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每人所賴以爲衣食生活資源的耕地面積如此微小，無怪他們日常總是在飢寒線下掙扎生存。無論如何興辦水利和擴大造林以改進土壤，無論如何灌輸農業智識和改良耕種方法以增加收穫次數，充其量也祇能希望一畝地能出產二畝地的作物，而使每人實際所用耕地平均倍增；但這距每人維持適當生活標準之所需的畝數尙遠。豐年也許因此幸能剛夠溫飽；天時稍形逆轉，凍餒立現。所以在現實農地面積狹小的狀態下，我國農業決難因實施上列六種治本的方法而能永久消滅災荒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農災之所以不易根本消滅，不特由於農田面積過小的緣故，抑且因爲田場耕地分佈過於散碎。據金大教授博克氏調查七省十五地方的報告，每一農場的耕地平均約分散爲八·五塊。田場耕地分割如此散碎，經界陡增，佔

地必多，那豈不是使面積已小之每人的耕地愈形狹小麼？耕地分割愈甚，地形愈趨歪崎；這不但有礙良好器具和機械的應用，抑並舊式犁耙也無法予以充分有效的利用。而且田場散碎，耕地之相互距離遼遠，在所難免。據博克氏的調查，在那七省十五地方的田場耕地，每塊相互平均的距離約爲一里；而前北平社會調查所在河北深澤縣七十八個農場調查所得結果，發現每塊耕地距離之遠更可驚人，平均竟達一·七八里。距離遼遠，豈獨工作往返之所枉費的勞力和時間增多而已？平時對於勞動者的指揮和監督既難週到；一遇氣候變化，更難爲迅速有效之適宜的處置。凡此種種均足明示在我國田場耕地如此散碎的現狀下實不易期望農業生產效率如何提高，產量如何增加，而使農戶或每人年有大量剩餘的收穫以備災荒。

我國農災之所以難於根本消滅的第三因素就是「不在地主」和大地主太多。據二十四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報告，在二十三年我國農民總數百分之二九是佃農，百分之二五是半自耕農，百分之四六是自耕農。換句話說，我國過半數的農民所耕田地的一部分或全部分須向地主租賃。這些大地主十之八九是「不在地主」。佃租制之影響於農業，端由於租額奇重，租期無定和租約苛刻。租額奇

重則佃農終歲勤勞結果率被攫取大半。苟免飢寒，已屬萬幸，那裏還談得到積餘備荒呢？租期無定則佃農時恐地主撤佃，遂不願對於耕地多加投資，以致耕地生產效率無從提高。租約苛刻則佃農因處處受剝削，生趣索然，必逐漸對其工作發生厭惡；由厭惡而消極的祇求維持殘生，不更圖進取。那麼，農產增加和農業進展的希望，其不等於幻想者幾希。我國土地法對於這三種因佃租制而起的壞影響雖都已針鋒敵對的訂有種種救濟的條款，為限制土地所有的最高額，限制「不在地主」減低租額和保障佃權；但那些都是些表面上頗為嚴厲而缺乏實效的規定。土地法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固已明白限制大地主的佔田面積；可是並未明定限制的畝數，而予地方政府以伸縮的權利。我們知道一般大地主大多是當地的「土皇帝」，地方官吏須仰其鼻息，難免不狼狽為奸。土地法對於所謂「不在地主」的身份，附以家屬及全體等字樣，解釋得已是過於狹小，使一般有地而不自耕的地主們不易榮獲這「不在地主」的頭銜（同法第三二九條）；而且同時却一面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因兵役學業或公職離開土地所在地之市縣者」概非「不在地主」（同法第三三〇條），一面又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雖常川

屬回到土地所在的市縣（不必一定在鄉下）居住三個月或一年，仍非「不在地主」（同法三三四條）。似此則佃農不但無從依照土地法第一七五條請求徵收土地；即土地法所訂按年遞增地價稅和倍征土地增值稅以限制「不在地主」的條款（同法第三三一和第三三二條）又何嘗不是形同虛設呢？土地法關於租額奇重的救濟，也有「地租不得超過正產收穫總額千分之三七五」的規定（同法第一七七條）；但什麼叫做正產物？如何實行？終費猜度！這恐怕又無異於口惠而實不至的一種幌子。至於為保障佃權所列關於限制地主撤佃七項情形（第一八〇條）之前六項，誠能嚴格執行，或可減少一般租期無定的壞影響。但最後一項之承認地主於地租積欠達二年總額時即有撤佃權，是直將前六項規定對保障佃權的功效全盤推翻了。現行土地法對於由佃租制所遺留下來的三大惡果既未能切實予以矯正；所以即使當前人們所倡議的種種救災防荒治本方法能如期按步推進，得大利者為「不在地主」，得小利者為一小部份的農民——自耕農，而與過半數以上的農民——佃農和半自耕農無涉。故現行佃租制度延存一天，農業發展也一天感受着種種阻礙，農災發生的可能性也就一天難於徹底消滅。

綜合前論，我們知道在現今耕地過少，田場分散過甚

和「不在地主」及大地主過多的情況之下，如單獨實施上列六種治本的方法，縱可救濟災荒於一時，不能消滅農災於永久。爲今之計，當局於實施那六種治本的方法而外，宜對症下藥，同時乘機再採行更根本的對策。這種根本的對策包括徵收災區「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土地，重劃災區自耕農的土地和廣設國防和國民經濟性質的工業三項。先言徵收災區「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土地：從社會福利的觀點看來，農地私有權之成立無非是給利用者以種種便利，使耕地者有地後肯努力耕種，增加生產量，提高生產率；這於個人固有利，同時於社會亦屬有益。如有地而不自經營耕種，放租與人，坐享地租，則耕者因不能獲得地權，不願充分改進土地。農地私有權的發生本爲發展生產，裨益社會；而至今反爲阻碍生產的利器。農地私有權的真諦喪失已盡，則又何貴乎維持它的存在？土地法雖有種種關於徵收「不在地主」田地和限制大地主田地的條款，但在平時既因條款規定的不妥貼切實，復以「不在地主」和大地主之種種可能的阻撓，恐難實施。現在川貴陝甘寧青豫桂等省發生災荒。在災區內的田地因收穫無着，地價不免下落；一般「不在地主」和大地主希望繼續保有它的情緒，也必逐漸減退。關係各省當局似宜乘此時機援用土地法條款

，實行徵收災區一般「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田地。徵收付價可就現已低落的水準，而再按各該省特殊的環境酌增若干以爲標準，庶不致使他們受大損失。至付價的財源，則最近第四十三次中政會所議決的「國家爲實施土地政策及調整土地分配……得發行土地債券」條文，關係各地方當局可商同中央各院部會立予實施。土地徵得後，爲貫徹扶植自耕農的主張，關係各省當局應各參酌地方情形，將其適當的分配於一般需地而確事耕種的佃農們；務使他們每戶或每人所得爲一戶或一人在最經濟情形下所能耕種的面積，並能維持適當合理的生活。因農戶有大小，農人才能有巧拙，地性有瘠肥，所以各戶或各人所得不可一律相等。承購的佃農一時或缺乏資本，關係各省當局原非殖貸機關注重近利，亦可另定辦法，允許那些承購佃農暫時贖購，於一定期限以後逐年償還地價。苟當局能鼓勵承購佃農先組織合作社，再經由合作社贖購土地，則更可保證地價之按期清還。這樣一來，佃租制度和它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壞影響均可消滅於永久。且於有組織有系統的分配之下，一般新自耕農所得的土地面積不致過小，地形不致歪畸散碎；那麼農業進展，個人所得大增，積餘備荒，要非難事。

除了「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外，災區尚有關於那些舊自耕農所有的土地也應予適當處置。這種土地多病狹小而又歪斜散碎。土地法一再訂列關於土地重劃的條款（第一編第三章與第三編第四章），足徵中央當軸之注意此點。舉行土地重劃自非一蹴可就。耗時費財且不論；有時甚或遭受種種無理的阻撓。現值災荒發生，關係各省舉辦施賑，非需用大批工作人員不可；加以災區的地主（專指舊自耕農，因「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土地已如上法被徵收而分配於新自耕農了）感受切膚之痛，如曉以重劃的利害，較易領會，不致固執謬見而妨礙重劃工作。故我以為關係各省當局正宜及時責令各地政機關，商同各辦賑的機關於施賑時推行土地重劃工作；遇必要時就可隨時利用放賑人員協助舉行種種關於土地的必要調查。實施土地重劃，一切自應按照土地法第三編第四章的規定；而以於重劃分配後得消除舊有自耕農耕地狹小歪斜散碎等弊點，增進土地利用程度為目標。如此策行土地重劃，不特費用時間較為節省，抑且收效宏遠，成功可期。

徵收「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田地，以及重劃自耕農的田地，同時並行，尙未足以根本消滅農災。「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田地被徵收分配後，並不能使全體的佃農有田；

就是那舊有自耕農的田地經過重劃和合理的重分配後（此每戶或每人所新得的土地面積足以維持他們適當合理的生活），也必難如以前之能完全安插這些原主（即舊自耕農）。故實施這兩法的結果，必不免添出一批於土地重分配所被淘汰下來的佃農和舊自耕農。為培養國力和顧全人道起見，關係各省當局自不可不替他們另尋出路。近二三年來，國人漸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對於救亡圖存的關係是非常重大。國民經濟建設千端萬緒，自以工農並重為最妥；但就現階段我國所處的環境而言，工業建設尤為急圖，因推進工業，不僅是增加人民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標準最迅速而又最直接的捷徑，且同時也是使國內有限耕地面積能容納過密人口而免貧窮的唯一妙訣。前面曾經提及我國耕地面積本極狹小；墾荒前途又極黯淡。以全國面積百分之一五·四的土地（劉大鈞氏估計數字）而維持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的生活，每人所得如何能增大？人民那裏能不貧窮？即無災荒發生，中央和各省當局也不能不積極的設法矯正這種畸形發展的經濟情形；而況現在災區為進行徵收重分「不在地主」和大地主的田及重劃調整自耕農的田地，發生了剩餘的農夫呢？現今災區的農人除已因實施那辦法而獲有田地者外，其餘剩的出外就食，關係各省當局似

宜聽其自然，不加阻礙；同時並切實樹立適應國防和國民經濟性質的種種工業建設，以便盡量吸收這些剩餘的農民。誠如此則有地可耕的自耕農由於田地面積完整擴大和收入增多，必有餘積備以備災荒；無地可耕的剩餘農戶可從事工業勞動以謀衣食。一面靠着農業直接維持生活的人口

大減，一面積極促進國富增加的速率；則雖此後偶爾天時欠順，作物歉收，絕不致如現今之造成很嚴重的局勢。廣義的說來，這豈不是徹底的消滅了我國的農災麼？

二五，五，十一，杭州

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

薩本棟講
葛庭燧記

本文薩先生於五月四日在清華大學實用科學研究會上的講詞，當時經記者筆錄，事後蒙薩先生詳為

校閱，謹此致謝

記者，五月九日

(上略)在理學會與工程學會之外，諸君復組織了實用科學研究會，我想諸君所謂實用科學，恐怕是我要叫作有用技術的。最近同貴會負責人談話，知道貴會的目標確是學習有用技術，現在為避免更改貴會的名稱起見，我仍用實用科學一名辭，不過我所指的實用科學是有用技術。

要明瞭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的關係，我們應該從到應用科學。簡單的說，純粹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自然界中各種物理的或生物的現象，以求得他們所遵循的律例，並明瞭牠們的相互關係。應用科學，例如各門工程學

，是應用這些現象或律例去增加人類在物質上的享受與舒服。在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就有許多技術的問題發生。要解決技術上的困難，有時又引起了我們去研究純粹科學之某一特別方面。由此看來，這三項，純粹科學，應用科學，與實用科學，牠們的關聯是很密切的。所以無論學那一方面的人，都應當對於其他方面加以適當的注意。

目前國內頗有些人因感於國難的嚴重，就認為我們不應該研究目前還應用不着的純粹科學。他們甚至於用「洋八股」三字貼在純粹科學的問題前面。在這些十二分愛國的志士心目中，最好現在從事於科學的人們，能像封神榜中的英雄一般，祭起科學的法寶，把我們的敵人一網打盡

。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現代的國防利器是許多純粹科學家，應用科學家，及實用科學的人，辛苦研究，經過長久的時間與屢次的改良才成功的。這些東西的基礎都是建在以前人們所認為未能應用的純粹科學之上。如果只知道國防利器的重要，而不知堅固純粹科學的基礎更為重要，結果恐怕又如前清買鎗炮造兵船的成績一樣。現在立志於學應用或實用科學的人，應當特別注意自己在純粹科學方面的基礎是否穩固。

基本的純粹科學不外算學，物理，化學，與生物。理化生物在應用與實用方面，大多數人恐怕不會懷疑牠們的重要。至於算學，許多人以為牠只是一種純粹的科學，可以給我們以嚴正科學的訓練。有些算學家也以爲他的工作不應以應用爲主體。這回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就有了一位很有名的算學家向報館記者很得意的說他很高興他所發表的理論完全毫無應用。其實在應用與實用方面，算學也有牠的重要位置。例如算學中有虛數——負數的平方根——一項，當純粹算學家研究這種數的時候，他們的心理就可由「虛數」這名詞看出來，他們以為這些數是虛造的，不是真實的東西。但是學過電機工程的人就可以告訴我們虛數在電機工程上的重要。

各門科學與知識的組織現在都有趨於數量化的傾向。

以前愷爾文（英國一個第一流的物理家）說過如果我們只知某現象的性質，而不能用數字去表顯牠的因果關係，我們對此現象只能說懂了一半，或竟是一小半。要表示出數量關係，算學在應用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因爲算學在應用方面的重要，現今就有了許多種計算機器的發明。較常見的如計算尺，如數機，而積儀等；規模較大的如微分方程分析機，與聯立方程解答機等，都可看作是純粹科學，應用科學，與實用科學的聯合結晶品。

無論所要學的是純粹科學或是應用科學，純粹科學的基礎是要打得穩固的。至於基礎打好之後，各人所特別注重的問題就有分別了。學純粹科學的所注重的偏於有國際性的問題，而學應用科學的則偏於有地方性的問題，當然，有些純粹科學如生物學與地質學等，牠的問題是富於地方性的。中國的生物或地質問題，由中國生物學家或地質學家去研究是再妥當不過的。至於理化與算學中的問題，大部是該門知識所特有的，各國科學家都在埋頭研究，所以我說他有國際性。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工作的人，在國際上多有供獻，不必因爲他們所研究的問題與目下國計民生無關，就勸他們改行。國計民生問題絕不是叫學文法學科

的人都改學農工就能有辦法的。同樣道理，學純粹科學有成就的人改學應用科學，有時也是格格不相入。要對國家有供獻，各人應先有自知之明，然後就他才力優劣所在，

貨品，所以公司所出的題目是：如何可製好一種刀片，用牠刮一次臉是再好沒有的，但刮了一次以後就不堪再用第二次。

去決定終身事業的動向。千萬不要感情用事，盲從時髦。純粹科學家如果能夠把他的尋求真理的方法，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精神，作一般人的處世的楷模，他對於國家社會的功勞就不可埋沒了。倘若學純粹科學的人，在他們主要的工作之外再注意些應用和寔用的問題，我相信就是膚淺的社會人們也會對這些科學家的純粹研究肅然起敬。

學應用科學——工程學——的人，要特別認識所有工程問題都有地方性的。前些時候，在一個美國工程雜誌上看到一位美國工程師誇獎中國人利用老法子來合攏黃河決口的壩堤。這些老法子，用二十世紀的眼光來看，確是很缺少效率，但是在現在中國環境下，反而要靠這老法子才能成功。去年我在美國看到他們所研究有地方性的應用問題甚多，現在舉出三項頗有意思的與諸位談一談。

美國男人差不多個個天天刮臉，更有人一天刮兩次。因此刮臉刀的需要是很大的，兩年前，有一公司特地請了一位科學博士去研究刮臉刀的造法。公司的目的是在推銷

美國西部有很多大農場專爲畜牧之用。農場多圍以籬牆。但牲畜往往會把牆撞倒，所以牆之建築費與修理費都很大。於是就有人研究出一種電牆。電牆是用幾根金屬線釘在三四尺高的木柱旁，把農場圍起，然後再加以高電壓。這樣牲畜就逃不出那個圈子以外。因爲一碰了電綫被電打了一回之後，牠們再不敢作第二次的嘗試。據說牲畜們很會利用牠們的經驗，牠們常沿着電綫兩三寸以外的地方去吃草，而不去碰電綫。爲免掉電牆高電壓傷害人類起見，電綫連接于電源的地方另有設備，使電流每秒鐘斷續幾次。這樣，無知行人雖然碰上電綫，也不至有何等危險。

去年美國奇異公司有人造了一種電被，這種被是用不着火的石棉摻入棉紗中織成薄被面。被裏縫有高阻電綫。電綫通以電流後就能發熱。在電流出入之處，且用節溫器以調節被之溫度。被極輕而暖。且溫度能隨各人的需要而調節，可說是增加我們享受與舒服的新東西。

以上三個問題，都是有了美國那種的社會才會發生的。在中國，我們如果處處留心去觀察社會的需要，也可以

得到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

中國工業不發達的原因甚多，就中有一兩項是一般人常忽略的。現在簡單說一下，希望大家注意。第一工業的發達，是靠機械。外國人從小就與各種機械發生關係，他們對於機械構造等等都像有先天的領悟。中國小孩很少有與機械接觸的機會，並且中國的父兄們對於子弟都希望他們讀書成名，而不知現在工業界所需要的人才並不是只讀過書的人。要使中國工業發達，應使我們的小孩與青年多與機械接觸，多有用手的機會。諸君設立實用科學研究會，來學習各種技術和手藝，以補充幼時所受教育的缺憾，我是十二分的欽佩的！

第二在目前中國工程界情況下，我們尚無需很多學理研究深淵的人員，因為我們大部份的工業問題尚嫌太幼稚。我們工程界最需要的人才恐怕是所謂生產工程師（Production engineer）。生產工程師的職務是去造物美價廉的物品。有些人看了舶來品，以為其中有許多東西是國人現在尚不會造的。其是許多東西，國人早已會造，不過因為製造時未曾用大量製造的技術，並且出品沒有受國家關稅的保護，所以很難在市場中與外貨競爭，因而市場中就看不見這種國貨。生產工程師雖然無需有高深學問，但他應有豐富的常識。他在純粹科學方面的基礎固要堅穩，即在經濟學與人事管理方面亦應有健全的認識。他對各種技術雖不必項項都是拿手，但是總得知道各種製造技術與機器應該如何去施行和運用。諸君現在大學求學，有時覺得在大學讀完四年之後，專門學識仍嫌不夠。其是大學四年所能給諸君的訓練只能注重一般基本的問題。諸君不能希望太大，諸君畢業之後，才是開始專門研究的時候。如果在大學中能充分的利用大學的設備，把基本知識打得堅固，把有用的技術和工具學得完備，多涉覽些專門功課以外的學科，以增加個人的常識，多思索些與人情世故有關的問題，以培養個人的裁判力，諸君出校之後就可以無往而不成功，諸君事業的前途是無限量的！（下略）

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通信）

顧正本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 第二三六號 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通信）

一七

我有一個問題，要就教于先生，並希望先生領袖詳倫

，造成風氣。我的問題是，我們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不要專提空疏無當的理論或原則。「獨立」上文章我相信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的結構，但有時我覺得理論是美麗的，動聽的，終是沒有提出辦法來。我希望我們討論某一個政治，經濟，教育或外交的問題，談理論，引証歷史，批評他人的意見都可，但最要緊的是不要忘記自己提出辦法來！例如近人寫文章論中國憲法，每每舖陳一大套議論，說某一個外國的憲法如何如何，有時還引了許多外國統計，結果對於中國憲法的利弊還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有時將文章通篇一看，種種引經據典，與其中心見解並無關連，完全是 unnecessary 的多餘的廢話。又如第二三三號「獨立」上張佛泉先生的「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一文，我反復讀過，頗生了一種迷惘之感。第一，張先生的題目所謂「從政治觀點」就不免令人費解，因為他所論的內容實際是「中國中小學教本內容問題」，而不是什麼政治觀點。第二，張先生並沒有提出辦法來。張先生曾批評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是「半新」而非「全新」，並且說「我以為我們的若干基本概念的改造應是很徹底的」。我不知張先生所指的「基本概念」是些什麼東西，應是怎樣「很徹底」

的「改造」？張先生又說，「他們改寫中小學的教科書，其目的也許祇在為兒童預備下幾種較好，較美，較正確，較有趣的讀本；而未嘗直接有政治成分在內。」我不知「政治成分」是個什麼東西？怎樣直接放進去？也許張先生的辦法是「由教育部添設一個「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比較詳細地訂定一個基礎教育哲學系統」。我不知道一個「教育哲學系統」或「教育目標」除了中國的教育宗旨，與如梁任公先生所舉出的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精神等觀念以外，還有什麼「很徹底的」「基本概念」可以依據？以上不過我引一個例來證明近人做文章常踏空疏無辦法之弊。我的意思是要討論任何題目能提出辦法來，不要在一串抽象名辭裏翻筋斗。而且還要用一番深刻的分析工夫，對於所提的辦法問一問是不是這是最合理的，實際行得通的辦法。我常常看了人的理論很美麗的文章，覺到那文章的作者似乎在那裏說「我不過提出一個原則罷了，辦法如何讓你們想，我是不管的！」所以我希望先生能領導我們，轉移風氣，不作文則已，要作不但能提出通達的理論，更要有合理的辦法！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張佛泉先生討論憲法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我也寫了一篇短文做他的文章的跋尾。我相信，我們兩人提出的一個觀點雖然很淺近平易，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我們要謝謝清華大學的葛庭燧先生記錄薩本棟先生這一篇很有價值的講演。

△蔡鼎先生是杭州之江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曾在獨立上發表過文字。這一次他寄來的長文提出一個根本問題發議論人的一個毛病，我們很感謝他的指教。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一期至一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每冊 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拼號 另加掛號費

本刊前兩期要目

第二一三四號

沉寂的局面
建設與統一
鄉村建設工作的一方面
施行憲政之準備
中國憲政之前途

陳岱孫
顧毓琇
陶葆楨
蕭公權
宋士英

第二一三五號

倫敦的英日談判
青年的修養問題
淪陷後之外蒙古
進步的暹羅
請政府確立一個通盤計劃的
合作綱領
民主政治的一解

胡適
衡其昉
張序經
陳承燾
吳承燾
陶希聖

讀書界之好音



字書界之創舉

辭源為我國字書中之最高權威，早已風行全國。正續編各附四角號碼索引，檢查益覺便捷。茲為更求便利讀書界起見，採用次道林紙，印行「種普及本」（六開版式）。自四月十五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發售特價，視原本定價不及半數；而紙質光潔，字跡明顯，並無遜色。以廉價購備要籍，此為僅有之機會。

〔正續編〕三册合售 定價七元五角

特價五元二角五分

（比原本定價便宜六元七角五分）

〔正編〕二册 定價五元

特價三元五角

（比原本定價便宜三元五角）

〔續編〕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二元四角五分

（比原本定價便宜二元五角五分）

▲國內郵費掛號費每册二角三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全國書店均有發售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 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上軌道的政治

陳之邁

英日談判與華北

論開放黨禁

從民衆教育立場檢討合作事業

盧廣綿

太原之行

顧一樵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二三七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滄州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歸綏	太原	西安	蘭州	西寧	成都	重慶	昆明	衡陽	廣州
佩文齋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廣州	汕頭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開通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開通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地址：北平後門外西便門

上軌道的政治

陳之邁

論者每謂中國的政治未上軌道。什麼樣的政治才能稱得起上軌道的政治呢？怎樣才能達到上軌道的政治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一般的意見頗為清顯。甘乃光先生以爲「過去政潮每以軍事爲轉移，以致每有政潮，即繼之以內戰，誠屬政治未上軌道難達民治之徵」（中央日報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汪兆銘蔣中正兩先生向四屆五中全會所提「劃分中央地方權責之綱領案」中也說：

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惟和平而後能得真正之統一；亦惟有真正統一，而後乃有永久之和平。……而和平統一之途徑，必須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衝突，增進團結，充實國家之力量，乃爲今日全國所應共

守之惟一方針，不惟中央與地方應澈底樹立互信共信之基礎，推誠扶掖，同循政治之正軌；即凡國人之有正當政治之主張，而不恃武力與暴動爲其背景者，亦應使其依法有言論結社之自由，而不加妨制。（中央黨務月刊，第七十七期）

這兩段話表示的意思是：上軌道的政治是用和平而不用武力來解決問題的政治。具體言之，約有兩端：其一是切實厘定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劃分其範圍，以免權責之爭；其一是制定一個政權更替的常軌，使得有心從事政治的人得循一定的軌道來競爭政權，發揮其政治主張，而不必用秘密結社等「下層工作」的方式來爭取政權。這兩點意思恰好是這次中國制憲的動機。二十一年四月孫科氏發表「救國綱領草案」，總綱第一條說：「爲集中民族力量，貫徹禦侮救國之使命，於最短期間籌備憲政之開始。」二十一年十二月，孫科伍朝樞馬超俊等二十七中委向四屆三中全會提出「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主張開放政權，實施憲政。提案說明書裏說：

今日最重要而待決之問題，莫過於禦侮救亡，然欲澈底禦侮，必須內部一致，而欲內部一致，又必須澈底禦侮而後能，因果循環，難判先後。其實兩事即爲一事，解決其一即解決其二。……竊嘗思之，政府之所以未能積極禦侮，實在當局厄於環境複雜

之顧慮，而環境顧慮之中心，則在內部之不能一致。顧內部何以不能一致，試分析言之：則（一）爲國內政派分歧，互相攻擊，此緣於政治主張不一致，而政權未公開，言論無自由之故。（二）爲國內軍事力量互相疑忌，彼此牽掣，此緣於中央與地方未能實行均權共治之旨，中央又無適應民意之方針以領導全國之故。是以欲救危亡，對症下藥，則關於內政方面，第一當使政權日漸公開，俾國民有參與國事，行使政權之權力，將以和平合法方式，盡量發表其政見主張，日進於憲政民治之軌道。夫然後今日各派用不正當手段之攻擊可以消除。第二當使各方軍事力量威能相安，而聽令於中央公正之處置。夫然後今日各方軍事當局之疑詐猜忌，互相牽掣之現象，可以泯除。中央果能於對外確定抵抗方策，對內政治開誠布公，則內部自臻一致，決不如今日混沔之局，可斷言也。

這一段話說明他們都以立憲政治爲達到上軌道的政治的方法。中國此次立憲的目的便在樹立一個法律上的常軌，一方面企求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能循這個常軌來競爭政權，一方面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有一種權責的劃分，而兩

方面都是希圖不用武力而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

近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異常激烈，其爭論之點每在民主與獨裁的難學或易學問題。年前我曾爲文說明民主與獨裁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有和平的方法來更替政權的政治，後者是只有武力與暴力來更替政權的政治（見獨立第一三六號）。羅斯福與墨索里尼的區別，不在其所運用的政權之大小，而在羅斯福每四年一定得舉行一次選舉，而墨索里尼則可以不必舉行任何選舉；定期選舉之需要與否說明二者之異同，亦爲民主與獨裁區別的標準。只有用武力或暴力才能更替政權的政治不是上軌道的政治，所以獨裁政治總是未上軌道的政治，而唯有民主政治才是上軌道的政治。因爲民主政治不過是一種政權更替的和平「方法」，不必一定是全民政治，或一種含有平等性質的社會組織，更不必是厲行放任主義反對集權主義的無爲政治。民主政治只在人民享有政治上的自由而不在人民享有經濟上的自由。

本着這個信念來觀察去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所公布的憲法草案，也便是本着這次立憲運動倡議最積極的孫科氏的信念來觀察憲法草案，則我們未免失望。第一，這部憲

法草案對於最關重要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未爲清晰的厘定，實有失立憲的原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是中國二千多年來內政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多少朝代因這種關係之失調而傾覆，多少的外患由於這種關係而孳生。在民國初年，因種種實際政治的原因，中國曾有一度擬效法外國的聯邦制度。孫中山先生有鑒於這個問題之嚴重，更創爲「均權」的學說，「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以求中央地方關係之調整。汪蔣兩先生的「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之綱領案」也說：

吾人果堅定和平統一之信念，而爲分工合作之努力，則挽救國難，復興民族，當可操券而待。顧數年以來所以未能收分工合作之實效者，蓋因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劃分未清之故爲多也。其最顯著之弊害，則在地方之責任未明，中央之運用不靈，以致行政效能趨於低落，各項建設艱於發展，故重新厘定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力謀政治設施之適宜，實爲當前之急務。

按現行的訓政時期約法，本已將這個原則寫在條文之中

（第六章第五十九至第六十四條），但是歷年來中央的法令，則一味趨向於中央之集權，而置孫先生的遺教與約法的明文的规定於不顧。所以在近十數年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迄在幾微的狀態之中，無正當的軌道可循，時有訴之於武力解決的威脅。立法院對於這個最嚴重的問題，在初稿中原有「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一章，列舉屬於中央的立法權二十五項，但又規定中央得自濫其職權，本已失却劃分中央與地方權力的用意，但即此規定，自修正稿以後即付闕如。王寵惠氏對於這個問題則極爲注意，故主張在憲法案之中增入條文，以期充分表現「均權制度」的精神。這種看法是最值得稱許的。但是據立法院的報告，王氏這種主張，按目前情形，中央地方間似難辦到，省縣之間可略作表現（見國聞週報十三卷十八期），故加增了「凡事務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爲地方自治事項」（第一百零四條），而置此條於「縣」的一節之下。這個辦法是最不妥當的，其不妥當的原因有二：（一）將「均權」的原則應用到省縣之間而不應用到中央政府與省政府之間，是誤解了孫中山先生的原意，當然更不是汪蔣兩先生上述的提案的精神；（二）「因地制宜」云者，普通係指有特殊地方性質的事務而言，若果地方自治事項只限於有地方性質者，

豈非普通性質之事項，如教育、衛生、地方保衛等等，均不在地方自治的範圍以內！何況這種的「均權」并不能解決中央地方的關係呢？

我們主張國民大會應將這一點切實注意，審察國內的實際情形，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爲之厘定，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加以劃分，至少也應做到汪蔣提案中所舉關於（一）官吏之保薦與任命，（二）官吏之任期與保障，（三）地方行政及經濟，（四）中央與地方之財政，（五）國防軍及地方兵警，（六）法制之制定，六點。

第二，一部納政治於常軌的憲法應當是一字不苟嚴格執行的根本大法。那裏不容有任何空洞的理想或過於抽象的主義與政綱。美國的憲法詳細的規定政府的產生方法及其各部分的組織，但絕未立定任何的政綱政策。它的功用，在規定美國政治的常軌，將政權作一種的分配。我們不必贊成其分配的方法，只要明瞭這種辦法代表一種憲法的典型，在這種憲法下，憲法的條文應是一字一句都得嚴格遵守的，美國憲法學者及解釋者（最高法院）早已立下一個原則：「憲法的每一個字每一句都有同等的價值，憲法上沒有一句廢話，沒有一個廢字。」這是提倡法治最好的方法。蘇俄的憲法與此不同。該法的條文規定都是社會主義的

理想，明知其一時爲事實所阻是不能全部徹底實行的，却用憲法寫了出來爲其共同努力的方向及目標，這是另一種典型的憲法，在這種憲法下當然沒有提倡法治的可能。（其實今年的蘇聯憲法也廢棄了這個舊的典型；斯太林在演說中且明言憲法不是政綱而是既成事實的規定。）我國現在的訓政時期約法模仿蘇俄的典型，國民黨的主義政綱雖明知其不能立刻實行，却全部寫在約法之內，以爲政府施政時的座右銘。美俄這兩種憲法典型都有其道理，但是我們既希望以憲法爲政權更替的常軌，蘇俄的典型是不足取法的。過去六年在訓政時期約法下的情形足爲殷鑒。

當前的憲法草案將美俄兩個根本不能相容的憲法觀念融會兼收，關於政府產生方法及組織的規定遠較訓政時期約法爲詳細，但國民黨的主義政綱亦大部分列入其中（在初有國民經濟，教育，財政，軍事等章，後中央刪去後二者）。這個辦法實將美俄兩種典型的意義全行失去！用法治一點來說，這部憲法的一部分（關於人民權利政府產生及組織方法等章）應該是嚴格執行的，而後一部（關於國民經濟教育等章）則是無法嚴格執行的，前一半要提倡法治，後一半無法提倡法治。這種兼收的辦法適足以表示草憲者不明瞭他國憲法的精義而胡亂抄襲，其結果不是「兩

全其美」而是「兩敗俱傷」！我們既主張以憲法來規定政權更替的常軌，所以一定得主張將憲草中國民經濟及教育二章全部刪除。

以上兩點是憲法草案中最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國民大

英日談判與華北

崔書琴

日本在英王加冕禮以前發動的英日會商，現在已快轉入正式談判的階段。遠東問題毫無疑問的是她們談判的主要題目。英國雖一再向我們保證在這次談判中尊重中國的利益，但我們看了本月二日倫敦泰晤士報星期外交訪員所報告的日本方案，無論如何是不能不疑慮的。這個方案計包括下列數項：（一）日本保證中國領土之完整，（二）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經濟與軍事策略及利益，但滿洲國之承認並不為主要條件。（三）英日美法以債款貸華。（四）以文化社團之發展增進中日交誼。我們祇作一簡單的觀察，便知道這個方案於我們不利。第一項是日本的詭計，因為如果不解決偽滿問題而祇聲言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無異企圖獲取「既成事實」的承認。第二項很明顯的是日本想誘使英國承認華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第三項自日

會是全國人民選舉出來的制憲機關，享有修改憲法草案的大權。我們希望它能將這兩點切實修正，一來是令將來的憲法能符合此次立憲運動的原旨，二來也令其能領導中國政治走上軌道。

本看來好像是一種讓步，因為她已不再堅持四一七宣言所含的主義，但從中國看來則是想恢復四國銀行團以壟斷對華貸款。這一項對我們的利害還有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研究的必要，不能武斷的認為決不可行。第四項我們是不必反對的，但如果日本不變更對中國的態度並停止侵略行動，我們祇能視發展對華文化社團為延續傳統政策的非軍事的手段。以上四項中我們認為日本的主要目標還是在華北，因為第一，近兩年來日本對華交涉就側重在華北，去年張羣川越八九次談判也因對華北問題意見不一致而無結果。第二，日本現在不但無意取消冀東偽組織，並且又要大舉侵綏，以完成對於冀察綏三省的控制，日本無非希望藉此對英談判能有把握。

☆ ☆ ☆ ☆

日本要求英國的是使她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利益。

假使英國答應這個要求，就無異恢復在中國的「利益範圍」制度。雖然近兩年來中英關係特別友好，英政府也聲明無意恢復勢力範圍，但我們還是覺得不安。第一，在過去曾有一個時期，列強彼此換文或訂立協定相互承認在中國有利益範圍或特殊利益，而且劃分勢力範圍也是已往英國慣用的方法。一八九八年英德關於威海衛換文，次年英俄關於劃分鐵路投資區域的換文，以及一九〇七年英俄關於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劃分勢力範圍的條約，都是很好的證明。第二，英國鑒於歐洲緊張凶情勢，這一兩年很想穩定遠東的局面，希望中日兩國能早日妥協，因為惟有如此，英國才能以比較集中的力量注意歐洲問題並應付意大利的威脅。李滋羅斯來華時曾勸告中國承認滿洲的現狀而保全華北，不過那時日本在華北的地位還不像今日這樣強固，在今日情形之下，英國雖不承認日本在華北有特殊的地位，但以華北為談判問題之一，而成立一種妥協的諒解，還是可能的。因此我們對於英日談判應隨時切實注意，不可過於信賴英國的外交辭令。

☆ ☆ ☆

在英日進行談判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一種澈底的覺悟

獨立評論 第三三七號 英日談判與華北

。在近代外交上，有些國家是主體，有些國家是客體。前者多是帝國主義者，而後者多是些弱小民族或落後的國家。在滿清時代，我國很明顯的是外交的客體，因為列強曾以我國為對象而相互成立了種種不利於我國的協定。迫民國成立，我們的民族意識漸強，所以不容許列強再不得我國同意而成立影響中國權利地位的諒解或協定。一九一七年美國以換文形式「承認日本國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而於日本所屬接壤地方尤為其然」，我國民衆立即表示反對，外交部也聲明我國的立場。在華盛頓會議席上，我國代表曾列舉出上述的種種協定而要求廢止，英法兩國代表終於表示她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已成過去。在這個時期我們雖力求外交主體的地位，但最大的努力還是在國民革命以後纔開始。我們首先否認了素有太上政府之稱的外交團而使它變成一種正常外交儀節的團體，繼而又從事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關於此事政府進行時所用的策略雖不無可以討論的地方，但我們的方向並沒有走錯，因為非如此我們不能脫開外交客體的地位而求得自由平等。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們的復權運動雖不得已暫時停頓，但我們決不能從此就放棄的，一旦機會成熟，我們便應繼續積極努力。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革命外交所得的成績失去了。那

就是說，我們絕不容許列強再以我國爲外交的客體。因此在英日談判的時候，我們應該表明我們的態度，反對英日以中國的利益作她們妥協的犧牲品，尤其反對英國承認華北爲日本的勢力範圍。我們須使她們知道，以中國爲外交的客體已成了「時代過去」的事情。她們的談判如果涉及中國的利益和地位，必須隨時通知中國，非得中國的同意，不能訂立影響中國權利和地位的協定。

☆ ☆ ☆

日本對英交涉側重華北，既如上述，則我們應使英國注意日本的要求無理。「華北」這個名詞就很含混，我們在這裏姑且說華北是指冀察兩省。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合法的權利祇限於條約所許她的，事變以後，我們並沒和日本訂立任何給日本權利的協定。日本在冀察兩省常依據以辯護其不法行爲的有兩個文件，一是一九一八年塘沽協定，一是所謂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的目的祇是在使中日戰鬥行爲停止，並不在給予日本永久的權利。其第二項規定「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中國軍退出戰區）不再前進又不爲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與「便利」，並不是給日本一種隨時任意飛行的權利。中國一旦實行完了第一項，日本行使第二項權

利的理由就不存在。自然塘沽協定成立了已快四年而我外交當局未能交涉廢止，是一種遺憾，但無論如何日本不能根據一種臨時協定而要求承認特殊地位。至於所謂何梅協定，自始可謂不成其爲協定。日本所依據的是日本傳說何部長給梅津的一封信，其文曰：「逕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假使此信真確，我們當然不能不責備我們的當局疏忽。但酒井所提各事項不能構成對於中國行政權的永久束縛，祇能視爲中國方面合於日本希望的一種臨時措置。中國既未給日本以干涉地方行政的權利，日本也不能據以要求承認特殊的地位。

日本的要求雖無條約的根據，但日本現在在冀察兩省的勢力較任何外國的都大則爲不容否認的事實。不過我們要請英國注意的是：事實的存在並不是承認這個事實的理由。現在日本在冀察以及其他華北省份的地位，可以說是集不法行爲的大成。第一，日本鼓動並援助殷逆成立冀東偽組織，又維持其存在，是濫用塘沽協定而破壞中國領土行政完整的行爲。第二，日本縱容（並且有時她的軍人協助）日韓浪人在華北走私，不祇是一種國際過失，而且違反中日間的條約。所以日本在華北因走私而增加的商業利

益祇能認爲是不法的收稅。第三，日本在華北增加駐軍，顯然超出一九〇一年最後議定書所規定的範圍。第四，日本在華北各重要地方設置特務機關，毫無國際法及條約的

根據。以不法手段造成的特殊勢力，祇應使其消滅，不能遽予承認。

論 開 放 黨 禁

陶 希 聖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黨專政綱領，參酌蘇俄的制度，確定一個主張，就是「以黨爲執政之中樞」。當時在形式上是取一黨專政的制度，實則共產黨潛在於國民黨內，共有政權。在共產黨的看法，以爲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而共產黨以無產階級黨的資格，在聯盟中應居領導的地位。他們把國民黨當作蘇維埃，把他們自居爲蘇維埃裏面的黨。

分共以後，我曾有一個見解，以爲黨治制度應有一回變改。國民黨應當潛在於民衆的裏面，領導民衆以民主制度來運用政權。國民黨不應在法律上執掌政權，由黨來直接產生政府。這種見解也有不少的人現實的主張過，却沒有實現於實際政治。

九一八以後，許多人爲了開放黨禁和民主制度爭鬪。六年之久，國民大會的召集，才漸漸的在實行的途中。開

放黨禁的辦法也正在商議。不獨許多的人感覺愉快，我個人也是很高興的。

開放黨禁，不用說是法律上許可國民黨以外的黨公開的地位，參加國民大會，決定國策。依憲法召集的首次的國民大會開會以後，國民黨自己也退居多黨之一的地位，即令能繼續組織政府，也必須競爭選民，在國民大會裏取得多數的選席才行，不能夠和現在一樣，直接以黨的議決來組織政府。

開放黨禁與國民大會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動機，自然是在野黨最有力者的放棄武裝暴動，在對外抗爭，對內民主的前提之下，他們不再與國民黨作武裝的爭鬥。國民黨自去年八九月以後，已開誠接受他們的要求，籌畫具體的方法。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這種影響，不獨消極方面使開放黨禁的問題可以解決，積極的方面又可使國民大會的威權加大，興趣加高。

這裏的基本問題是那些黨可以公開呢？據我推測，國民黨中央是在遵守三中全會議決案，主張消極的不反三民主義，積極的放棄階級鬭爭的黨，始可公開並參加國民大會。不過，國民黨中央對於三民主義放寬解釋，以民生主義容納社會主義，以民權主義容納自由主義，以民族主義容納國家主義。以至於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何嘗不可以一民或二民主義而一一容納？但是這在國民黨三民主義者看來，雖已盡寬容之能事，在在野黨看來，却仍有一些不便。如在野黨承認三民主義的條件，至少他就不能再攻擊國民黨及所組政府了。這在最有力的在野黨並不能覺得什麼，尤其是他已經放棄對抗國民黨的武裝行動。如在那些正在形成的小黨，就極感不利。他們正在利用陝北問題解決後青年左傾分子的煩悶來發展黨勢。他們不得不標出更左的綱領，不得不做出更左的行動，藉打國民黨來吸收黨衆。因之，有些人比某黨更左，是勢所必然的。如以不反國民黨政府爲條件而容許他們公開，他們只有以單純孤獨的黨幹部來公開了。

有力的在野黨方面，主張凡是有一年以上的歷史的黨

都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又以爲只要他們不反對國家，即令反對政府，也可以公開取得參加國民大會的地位。這個條件是比國民黨中央更寬的。科學社會主義本來把國家與政府看成一物，這回他們主張不反國家而反政府的黨的公開和當選，是依實際情形來說的。換個話頭來說，只要不反對中華民國，即令反對國民黨政府，也可以公開和當選。這在上述小黨是很方便的。十年來反國民黨的政黨政派一齊可以合法而當選，又可以引導那些煩悶青年入黨以張黨勢。不過在國民黨看來，是不願意的。國民黨人要問，爲什麼讓那些打國民黨專家合法化又參加大選？黨的感情是不許的。加以統一初成，隨地有摩擦發生，如果讓反對運動立時又高張起來，客觀上也不利于國呀！

我個人的意見，以爲要集中國力對外，必開黨禁。要開黨禁，便須放得極寬。反政府的言論，在國民大會裏得到發揮的機會，可以減少非法活動和分裂運動。如以爲反對黨可以公開，便加黨勢，這是不一定的。公開的黨，失去了神秘性，便是失去了誘引力。尤其是青年，不見得有一個投票黨員的興趣，却有做一個秘密黨員的興趣。小黨都公開了，也許煩悶青年大部分就可以坐下念書了。至於在選民裏能獲得多數票的，一定只有歷史悠久而基礎雄

厚的黨才行。這樣的黨在中國算來算去也不過兩個。這兩個已經不開了，又誰能大鬧起來呢？況且刑法裏面總有內亂一章，保障國家的完整。分裂運動始終是要受制裁的。所以我主張要開黨禁，其原則應當是「是黨就可以合法，是黨就可以當選」。

在野黨方面曾提一個消極限制，就是漢奸除外。這在國民黨中央是不會不同意的。民權主義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解釋為革命民權，首先要排斥帝國主義的走狗。不過，有些以謾罵起家的小集團，說國民黨是

漢奸。我想這個是不可憑信的吧！沒有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並不像「沒有漢母烈的漢母烈」的戲好排。我以為「凡是企圖分裂中華民國領土及破壞中華民國完整」的黨派，如般汝耕之類，是沒有公開及選舉權的，此外一律可以公開當選。

希聖注：這個討論，可以參看五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第一條新聞，又西安寄來「我們對於國民大會法規修改的意見」。

從民衆教育立場檢討合作事業

盧廣綿

我國合作事業發展較晚，不過是最近十年內的一種新興運動，然而合作事業在數量上的發展快得真是驚人。按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在民國十七年全國祇有合作社七二二社，民國二十五年竟增至三六，三六三社，合作運動漸有普及全國之趨勢。過去合作倡導者多側重經濟觀點，期以合作方劑立愈民衆貧困之沉疴。政府當局以及社會團體均努力倡導推動此種事業，因而在最近數年有突飞猛進之發展。但發展過快則成功與失敗互見。關於組織

，業務，指導以及合作理論種種方面，發生許多問題，各方探討此類問題時，因各人經驗及主張之不同，爭辯紛紜，莫衷一是，結果卒不易獲得適當有效的解決。我們須知中國鄉村問題是整個的；經濟，教育，政治各方面，有密切的互相關係，是連帶循環的問題，此一問題不解決，彼一問題決不能單獨的得到根本的解決。

我國民衆最大的病痛是貧和愚。因為窮到生活都不易維持，自然沒有餘力來顧及教育；因為缺乏教育，就得不

到現代化生活的常識，謀生活的能力遂以減低，經濟能力自亦因之而薄弱，所以窮和愚在中國實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爲因果，關係極密切，不能單獨解決的兩個問題。從過去辦民衆教育者的經驗，深覺中國一般民衆終日孜孜工作，尙難得一溫飽，教育並不是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所以在從事民衆教育時不能不先顧及民衆的牛計，民衆在經濟方面稍有喘息的餘地，然後能樂於受教。同時合作倡導者在用合作方劑謀提高民衆的經濟能力時，發現一般民衆不但知識簡陋，且缺乏經營合作之能力及興趣，不得不先作一初步教育工作，解釋合作意義，訓練其辦事能力等等。在中國辦民衆教育的人，必須先着眼於民衆生活情形，而欲謀求解決民衆經濟問題的合作指導者，也決不能忽視教育的價值和功用。合作事業與民衆教育之重心雖有不同，但在今日之中國則二者必須相輔而行，不能單獨的求解決。所以研討我國合作運動各種問題時，不能完全以經濟觀點爲出發點，同時必須站在民衆教育的立場來觀察分析，或者可以得到比較圓滿正確的答案。

在我們檢討問題之先，應當認清教育上兩個基本原則，或者說教育家所當具有的兩種最低的認識和信仰，以作我們討論問題時理論上的根據。

一，對於民衆要有信仰。中國教育家是相信「有教無類」的，就是世界各國的大教育家也都是相信教育是要發展充實人的生活，教育是能使受教者在生活中起變化。鄉村建設工作即是一種「民衆運動」，參加工作者必須具有教育家的修養，對民衆要有堅決的信念。中國一般鄉村民衆「勤苦耐勞，安分樂業」的精神，在在都可明示潛伏於他們生活中間的偉大力量。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們目前所沒有的是教育——知識和組織，我們有了這種信仰，在工作上方有耐心，不失望，繼續不斷的啓迪教育，自然會發生偉大的力量，鄉運方有成功的希望。

二，教育家應當具有的第二个基本認識，就是教育不是要代受教者解決他各種問題，而是要教育他訓練他使他能得到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和能力。今日中國鄉村的問題雖然千頭萬緒，不過最大的根本問題，就是一般民衆缺少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鄉村建設最大的使命，不是在幫忙農民們解決每個單純的問題，乃在於解決其目前較爲迫切的問題的時候，注意充實其組織，扶植其運用組織自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基於以上兩點的認識，則在辦理合作事業時所遇到的以下幾個問題，都易於得到相當的解決。

一，信用合作社問題。在我國合作運動中，信用合作社佔合作社數之大多數，但一般人往往不重視信用合作社，以爲他的業務太簡單，除借款還款以外就無事可作，所以主張少提倡單純之信用合作社。實在呢，一個真正信用合作社任務正多：如鼓勵社員儲蓄以增加資金，提倡節約以保存農民經濟能力，使合作社得以自力隨時供應社員各種資金之需要等，都是信用合作社當盡的責任，當負的使命。我們辦理信用合作社，不要使他祇在放款還款時活着，而要注意充分發揮他的功用。信用合作社業務比較單純，經營方法易於明解，當此農村經濟枯竭之時，極爲農民所歡迎。合作倡導者站在教育者的立場，正好利用此簡單業務予農民以辦理事務之訓練，並養成其合作之真精神，使其對於合作真締有深切之瞭解。譬如開會討論社員借款問題時，各社員因距離很近，彼此熟識瞭解，就容易盡量發言討論，以求問題之解決；合作組織亦彼此關係密切而易於健全。同時信用合作社業務較爲穩妥且極單純，無失敗之危險，不識字者亦能參加，實爲訓練民衆，組織民衆，教育民衆一個極好的工具，因此信用合作社應當在合作運動中佔着重要地位的。

二，兼營問題。我國合作社組織宜於兼營或單營，爲

獨立評論 第二三七號 從民衆教育立場檢討合作事業

數年來合作事業中爭執難決之問題。目前合作社多爲兼營之組織，尤以信用合作社兼營者爲最多。主張兼營的理由，第一以爲信用合作社業務簡單，必須兼營其他業務，合作社始能充分活動；第二是認爲鄉村中人才有限，資力有限，兼營業務比較經濟，且社員同居一村，需要一致，不必組織幾個不同的合作社分別辦理，最好由一個合作社來兼營。根據第一段的討論，我們知道兼營社的業務比較繁重，各種事務辦理比較複雜，不能如信用社之簡單，使社員易於明瞭，且可參加社內一切活動；因爲不明瞭，社員就不能全體參加活動，合作力量減弱，社員對合作社態度將漸冷淡，合作社難免不變成少數人或指導機關的合作社，失掉合作社民主的真義。同時驟然加給未受訓練的農民一種繁重的兼營業務，自難勝任裕如，實至違反教育原理。鄉村工作者往往討此錯誤，而反失掉對於農民之信仰，以爲農民能力不足；是非顛倒，莫此爲甚！至於說是需要相同，此亦不過是一種假定，就購買運銷兩種業務來說，往往社員間利害衝突，興趣不能一致，種種困難問題因而發生，致各種業務俱不易得到充分發展。年來合作專家如屈格蘭（C. F. Strickland）甘貝爾（Campbell）等於考察各省合作事業後，均認爲單營較兼營更適合中國之環境。

我們從教育的立場來看，爲着要訓練民衆，引發民衆的自動與自覺，顯然不應主張兼營，而當極力提倡單營的合作社。

三，合作事業是一種政治政策抑是一種民衆運動，從理論方面來講，合作社是由於民衆感到共同的需要而自動結合起來的團體，社員都有自動經營自動組織的能力；他的發展是自然的，耐久的，而且是一種有聲氣的自覺的民衆運動。合作倡導者不過處於從旁指導輔助的地位。但今日從事合作事業者，頗多視合作事業爲一種政治政策，而不視爲一種民族運動。他們的理由是：（一）民衆過於愚昧無知，缺乏自動組織的能力，合作社必須由政府提倡推動；（二）從過去辦理合作社種種失敗的經驗，認爲農民的能力太薄弱，離開外力不能自存；此外也有別具政治野心的人，視合作社爲政爭的工具，自然也同此主張。中國今日的合作事業所以基礎不穩固，隨推動力的進退而消長，合作社往往爲少數領袖所把持，民衆雖名爲社員而實際並得不到合作的利益，這就是因爲從事合作事業的人對於民衆沒有堅確的信仰，未能站在教育者的立場認清自己的使命。所以從教育的觀點來說，合作運動絕對是一種民衆運動，而不當視爲是一種政治政策，在政府或社會機關着手指

導推動時，就當着眼合作在教育方面的價值，而注意於引發訓練民衆自動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合作運動成爲一個有生命的民衆自覺運動。

四，辦理合作是社會改良抑是社會改造。合作事業會被人視爲是一種社會改良工作，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實則合作運動究竟是社會改良抑是社會改造，就要看我們的着眼點在那裏。「改良」是注重解決發生之問題，不注重探究問題發生之原因，而「改造」則是不祇注重解決發生之問題，而且根究問題發生之原因，以求澈底之解決。我們倡導合作的人，在農民感覺高利貸的壓迫，缺乏生產上所必需的資金的時候，就幫助他們組織一個信用合作社，集合大家的信用，利用團體的組織，就可以免受高利貸的壓迫，得到資金週轉的便利，這樣我們固然暫時解決了民衆目前一個迫切的問題，但對於他們的窮困和受壓迫的原因不會解除，對於他們整個問題的解決並無大裨補，這就是所謂「改良主義」，是一時的救濟工作而已。但倘使我們能更進一步，利用解決民衆迫切問題的機會，啟發其自覺意識，訓練其如何運用「合作」與「組織」，使其認識「合作」「組織」之重要及意義，並自動的去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樣就不能視合作爲社會改良主義，而

是具有甚深意義的社會改造運動。

從上面的幾個問題的討論，我們很清楚的看出來，中國合作事業倡導者於以合作方式解決民衆的經濟問題時，必須同時認清合作事業的偉大的教育意義和使命。合作倡導者唯有具備教育家的遠識和信仰來推動指導合作，方能

太原之行

顧一樵

新近到太原去了一趟，沿途走過定縣，石家莊，井陘等處。旅行的時間，一共不到一星期。匆匆的走馬看花，說不上有什麼深刻的印象，精密的觀察。

(一) 定縣的實驗

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前上，我們同行三個人上了平漢車。第二天清早三點多鐘，我們到了以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馳名中外的定縣。對於一般老百姓，定州的眼藥是有名的，在白天，車站上便可以買，並且有人當場代爲上藥。對於我個人，定州是三十年前我外祖父的舊治，或者更增加了一種連繫。我們在黑暗中上了洋車，直奔平教會去。到了那裏，因爲天還不亮，休息了一會。清早六點多鐘，陳志潛大夫來會見我們。經過短時間的談話，我們使出

使合作運動充分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以及心理建設上的重大使命，並能爲合作事業樹置一鞏固的基礎，在最近的將來，成爲一種有生命的，基于民衆的自覺與自動的社會運動。

發，先到牛村。路不大寬，亦不大平，但是同伴之中亦還有人在洋車上打盹。記得陳序經先生批評鄒平的路。我們倒不覺得平教會應該負責修路，但是因此聯想到平教事業倘若沒有政府做後盾，許多開路挖河的工作恐怕都是沒有法子推動的。

牛村是平教會實驗區二十幾個村中的一個，在城外的東南。我們參觀了合作社同幾家表証農戶。合作社記賬配得很清楚，表証農戶有的以養雞見長，有的以選種見長。我們看見的有吳雨農家的鷄同劉玉田家的麥種。據說全村的鷄房都已經改良過，可以通氣，可以防濕。

關於教育的實驗，我們參觀了西平朱谷村的小學校。這個學校的學生，採用了軍事的組織，有大隊長，大隊副

，中隊長，隊長，工作隊員同普通隊員。工作隊員分爲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四組。工作隊員便是普通隊員的「小先生」。隊長隊副又是工作隊員的「小先生」，而學校教師方是隊長隊副的「先生」。我們親自看見工作隊員教普通隊員上算術課，覺得很不差。我們又看見隊長隊副教工作隊員，教完之後，還要預先表演怎樣去教普通隊員，覺得這些「小先生」亦真不容易。全體集隊作清潔檢查，做紀念朝會，秩序都很好。他們遊戲，他們喝水，他們報告，他們上課，都有條不紊，亦就不容易了。

這種「小先生」制，實在便是利用二四年級學生教一二年級學生，另外再利用高才生教三四年級學生。在鄉村小學裏，學生多而教師少，這應是一個經濟的辦法。利用軍事的組織以求兒童的守秩序，守紀律，亦是很有成效的。

關於成人教育方面，我們參觀了婦女青年班。平教會的教育家們希望兒童同婦女們受了教育以後可以影響到整個農村的各家庭。這自然是一個理想，理想的成功那就有待於長時間的努力了。

關於鄉村的衛生的建設，各村有保健員，工作很簡單。各區有保健師及保健院分診所，全縣有保健院。這個工

作乃是普及於全縣的。保健院住院的病人每人每日只收費三角。保健院不但爲人看病，並且注重預防疾病，對於砂眼等病亦很注意。現在聽說協和醫學院，北平大學醫學院，河北省醫學院都預備派學生去實習。新式的醫生可以下鄉，實在是大家很希望的。

平教會現在同時在湖南的衡山同四川的新都進行實驗工作，兩處實驗的時間很短，我們還不知道確實的結果。但據定縣方面的朋友談起，兩處大約都注重全縣的建設，並且經濟同教育並重。我們覺得無論結果怎樣，定縣已有的實驗很值得大家的注意和研究。平教會在定縣的工作是以教育爲起點的，所以結果比較遲緩，範圍亦不很大。近年對於經濟農事衛生方面注意較多，全縣的人民對於合作社的組織，棉麥的種子，醫藥的設備，似乎都很願意接受。這些工作，自然成功不必定歸於平教會，政府同金融機關，農業機關，衛生機關，都可以盡很大的力，但是平教會能在定縣推動這些工作，亦就可以說是達到了鄉村服務的目的了。

(二) 正太路和井陘礦

二十二日的午刻，陳志潛先生孫伏園先生本來預備約張蔭梧先生同定縣的新縣長同我們談談，後來我們因爲時

間不夠，便趕車到石家莊去。

據正太路的朋友陸振軒先生說，石家莊本來是十家莊，只有十家人家，後來正太路通了，正太鐵路局同井陘礦務局便吸引了許多人來。還有許多貨物，從前不能聯運，所以商人亦很多。石家莊沒有古蹟可說，只有爲革命而犧牲的吳祿貞將軍的墳墓。聽說河北省政府不久預備把專員公署搬到石家莊來。

井陘的煤礦現爲國內第三煤礦，出量每年約九十萬噸，僅次於開灤和中興，是河北省政府辦的。現任礦務局局長是谷鍾秀先生，因爲他號叫九峯，大家都稱他谷九老。井陘礦新近添了新機器，同時同正太路商最新築了微水到礦區的支線，預定二十三日井陘礦務局同正太鐵路局聯合舉行開機通車典禮，所以石家莊的正太飯店便住滿了客人。我們到了旅館以後，便由谷局長引導參觀井陘礦務局的煉焦廠。井陘礦務局從前有四分之一資本是德國的，所以這個煉焦廠亦是德國工程師創辦的。焦炭之外，還有柏油，汽油，鉸水，樟腦等副產品。井陘的焦炭質地很好，據說還超過開灤的。前幾時聽見開灤的朋友說，日本有些鐵廠每年定買開灤的煤去煉焦，最近亦有向井陘定買的。井陘煤礦最近的出量打算增加一倍，煉焦的出量亦可由三萬

噸增加一倍，但是將來恐怕仍舊供不應求呢。

正太鐵路是三十幾年前中法合資辦的。法國人辦得很經濟，並且所投的資希望中國償還，並不像別的國家眼光遠大，存心多化錢希望我們永遠不容易還清。所以幾年以前，這條打通娘子關的鐵道的主權居然完全收歸國有了。正太路是窄軌，所用的軌道是二十八公斤（約六十磅）的。全線彎度很小，有些地方的半徑不過一百公尺。寬軌的半徑至少需要二百六十公尺，所以就原來路線改爲寬軌，很有困難。現在火車開行的時候，頭尾可成S形，寬軌便有危險。車輛的接法亦同普通鐵路的接頭（俗稱「磨天佑」）不同，因爲彎度太小，容易脫開。同蒲路亦用窄軌，但軌道還要輕，不過十六公斤，將來聯運起來，仍有困難，因爲正太路的車頭太重，不能過去。

正太路一向管理得很經濟，所以法國方面可以收回債權，而我國亦可以得到一條不負外債的鐵路。收回以後，路局方面亦很努力，所以經濟情形很好。最近添築井陘支線，長約十二公里，完全由原有員工擔任工作，不過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建築費共六十萬元，半數路局自籌，半數由井陘礦務局墊付，以後在運費中扣還。這條支線雖然不長，但是從此以後井陘煤礦每天最多可以有一萬噸的運輸

量，比較從前的輕便鐵路可以增加五六倍了。

正太路是國營事業，井陘礦是省營事業，雙方合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尤其在國防前線的華北。近年娘子關以內很努力於建設工作，而緊靠着娘子關外的井陘煤礦亦能於三年以內謀開礦設備同運輸設備的增加，未嘗不算是一

編輯後記

△崔書琴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教授，是研究國際法及條約問題的專家。他的一英日談判與華北」一篇論文裏的主張是我們大體贊同的。

△最近我們接到周恩來先生從西安寄來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雖然沒有月日，我們看其中的說話，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之前發表的。現在修改這兩法規的機會雖然已成過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裏有一些主張至今還是值得討論的。我們現在發表陶希聖先生的「論開放黨禁」一篇文字，其中討論的就是周君的主張的一部分。這是周君文中所謂「陝甘寧蘇區改成邊區後」我們第一次公開的和平的討論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一個政治主張。我們希望這樣開始的政論新風氣能得着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

件可以欣慰的事。

二十三日我們搭正太專車到井陘礦去參加開機通車典禮。觀禮以後我們便搭太原開來的專車進娘子關去。

(未完)

適之

△盧廣綿先生是在河北省主辦棉業改進事業最有成績的，他來談「合作事業」，當然最親切有味。

△上期登出顧正本先生的一篇通信，其中有批評張佛泉先生的話，我們匆匆的不曾送給張先生作答，現在接到張先生來信，我們摘鈔其中的一段：

「在上一期本報，有一位顧正本先生批評我的「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一文沒有指出具體辦法。其原因在我的那篇文章寫得太簡括。像那樣的題目，總要一兩萬字方能將意思開展出來。這樣比較長的文字，我會寫過幾篇，登在前幾年的國聞週報上。我在「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文中曾建議添設「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這是很具體的辦法。我在署名的文字中早就建議此點，在某

大報的社論中也建議過此點，並且曾與教育部長王雪艇先生面談過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大問題沒有費過思索的，自然難見到那建議的具體性。我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從政治觀點看，我國的教育有如何的缺欠，而未能藉基礎教育儘量養成建國的力量。」

△張佛泉先生的答辨使我今天又去讀他在二三三號的論文。我讀了之後，也覺得張先生的答辨是對的。他所謂「政治觀點」就是「使教育成爲一種救國的力量」一個觀點。他的具體辦法就是要「由學界的重鎮組成一個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用幾年的工夫，比較詳細的訂定一個基礎教育哲學系統」。至於那個教育哲學系統是什麼，那當然不是今日所能具體推測的；即使張先生發表了他的主張，那也只是一個人的私見，而不是他所期望的「學界重鎮」共同長期研究的方案。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冊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號費

本刊前兩期要目

第一二三五號

倫敦的英日談判
青年的修養問題
淪陷後之外蒙古
進步的遲滯
請政府確立一個通盤計劃的
合作綱領
民主政治的一解

胡適 衡哲 張其昀 陳序經 吳承禎 陶希聖

第一二三六號

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
再談談憲政
從救災談到農業的根本問題
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
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

張佛泉 胡適 蔡鼎 薩本棟 顧正本

取精用宏 溫故知新

中學科目較繁，各科要旨非複習難於熟記。敝館為謀中學生複習便利起見，曾分請各科專家，編成初高中複習叢書各一套。各書編制新穎，多用表解，便於記憶，並搜集試題，詳加解答，使學者無須重讀教科書一遍，而各科要旨自能熟記無遺，收得溫故知新之效。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起，將各書定價減低，茲更發售特價，益便購讀。



初中複習叢書			
書名	冊數	減低定價(元)	特價(元)
算學	二	三·三五	二·八
物理學	一	三·三五	二·八
化學	一	三·二	二·八
動物學	一	三·三五	二·八
植物學	一	三·二	二·八
衛生學	一	三·〇	二·四
本國地理	一	五·〇	四·〇
外國地理	一	三·五	二·八
本國史	一	三·五	二·八
外國史	一	二·五	二·〇

全套定價三元五角九分 特價二元五角一分

高中複習叢書			
書名	冊數	減低定價(元)	特價(元)
代數	一	三·〇	二·四
幾何	一	三·五	二·八
三角	一	二·二	一·八
解析幾何	一	二·五	二·〇
物理學	一	三·五	二·八
化學	一	四·五	三·六
生物學	一	五·〇	四·〇
本國地理	一	三·五	二·八
外國地理	一	五·〇	四·〇
本國史	一	四·〇	三·二
外國史	一	五·〇	四·〇

全套定價一元四角七分 特價二元九角二分

中學科目較繁，各科要旨非複習難於熟記。敝館為謀中學生複習便利起見，曾分請各科專家，編成初高中複習叢書各一套。各書編制新穎，多用表解，便於記憶，並搜集試題，詳加解答，使學者無須重讀教科書一遍，而各科要旨自能熟記無遺，收得溫故知新之效。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起，將各書定價減低，茲更發售特價，益便購讀。

全套特價照減低定價七折
零冊特價照減低定價八折
特價於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底止

商務印書館 印行

每套 一角五分 每冊 二分 掛號 外費 加 (費郵)

獨立評論

第二三八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編輯後記

看不懂的新文藝（通信）

太原之行（續）

推動鄉村建設工作的一個新方式

一個應該消除的貨幣幻景

會考的檢討

憲政的條件

適之

絮如

顧一樵

曹康伯

陳岱孫

明生

君衡

本刊寄售處

南昌	漢口	武昌	南漳	徐州	徐州	蘇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江蘇	上海	天津	北平
南華書局	漢口書局	武昌書局	南華書局	徐州書局	徐州書局	蘇州書局	無錫書局	鎮江書局	南京書局	江蘇書局	上海書局	天津書局	北平書局
南華書局	漢口書局	武昌書局	南華書局	徐州書局	徐州書局	蘇州書局	無錫書局	鎮江書局	南京書局	江蘇書局	上海書局	天津書局	北平書局

廣州	汕頭	梅縣	梧州	南寧	濟南	青島	煙台	威海	安東	蚌埠	蕪湖	徽州	太原	開封	鄭州	保定	石家莊	西安	蘭州	平涼	寧夏	成都	重慶	杭州	福州	廈門	沙市	長沙	衡州
廣州書局	汕頭書局	梅縣書局	梧州書局	南寧書局	濟南書局	青島書局	煙台書局	威海書局	安東書局	蚌埠書局	蕪湖書局	徽州書局	太原書局	開封書局	鄭州書局	保定書局	石家莊書局	西安書局	蘭州書局	平涼書局	寧夏書局	成都書局	重慶書局	杭州書局	福州書局	廈門書局	沙市書局	長沙書局	衡州書局
廣州書局	汕頭書局	梅縣書局	梧州書局	南寧書局	濟南書局	青島書局	煙台書局	威海書局	安東書局	蚌埠書局	蕪湖書局	徽州書局	太原書局	開封書局	鄭州書局	保定書局	石家莊書局	西安書局	蘭州書局	平涼書局	寧夏書局	成都書局	重慶書局	杭州書局	福州書局	廈門書局	沙市書局	長沙書局	衡州書局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廟北牙胡同二號

憲政的條件

君 衡

兩星期前張佛泉先生曾在本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胡適之先生也寫了一篇「再談談憲政」，和張先生的主張相呼應。我覺得兩先生的主張包含許多確切不易的重要真理，很值得國內留心憲政人士的考慮。但我又覺得兩先生的議論似乎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所以不揣鄙陋，也來參加討論這個問題。

憲政的理論和制度，不容諱言，是歐美的創造品。自清之以來國人對於憲政有錯誤的見解，如張先生所指出，是無足驚異的事實。張先生以爲國人的錯誤是把憲政看得太死板，把憲政的理想看得太高遠，非用多年的功夫去準備，沒有實行的可能。張先生又舉出三四個人的錯誤見解來作佐證。梁任公先生是第一個例。因爲他先立了一個全民「躬親政治」的理想，所以他認爲必先實行開明專制，「躡進國民程度」，才可以談憲政的實行。孫中山先生是第二個例。因爲他立了一個人民運用四權的理想，所以他認爲在施行憲政之先，必須有訓政之階段。梁漱溟先生是第三個例。因爲他的理想是鄉村社會中「各分子皆有

參加現社會，並從而改進現社會之生活能力」，所以他承認「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這幾種見解（也可以說這一類的見解）都是錯誤的。因爲憲政「應是個生活的過程，決不是個死的概念」。「憲政隨時隨地都可以起始」。我們根本用不著訓政。

我個人也相信憲政是一種政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高遠玄虛的理想。但如說它毫無理想的成分，却又似與事實不盡相符。現代憲政國家的憲法中不乏包含政治理想的實例。我覺得較妥當的說法似爲：憲政是過程也是目標，而目標即是過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達目標，須經過過程。要實現較圓滿的憲政，祇有從較幼稚的憲政做起。張先生說我們不能在達不到完美憲法理想的時候，「先過幾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關之言。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句話，也可以做一切「訓政」論的答覆。但是有一點值得我們的注意。訓政的理論雖可以推翻，政治程度的事實却不容否認。以往政論家的錯誤似有兩點：第一，他們以爲憲政是高度的政

治，低程度的人民不能嘗試。第二，他們把預備憲政和實行憲政打成兩槓，以爲必先有訓政，然後能有憲政。張胡二先生和他們不同之處在主張憲政可以讓低程度的人民去行，並不需要經過訓政的形式。但兩先生並不否認人民政治程度有高低分別。胡先生說，「我們不妨從幼稚園做起，逐漸升學上去。」張先生更具體地提出了「逐漸推廣政權」的辦法。第一，因爲一般人民的程度不夠，所以不要普選。張先生說：

我把「政治能力」當做參加政治的資格。我以爲有這能力的人即須容他參加政治。但沒有這能力的也不能相強。這能力的計量器是什麼呢？我以爲最好是教育程度。

第二，因爲受過比較新式教育的人多半在都市，所以憲政基礎的自治應由城市起始，逐漸推行之於地方。總之，「憲政要從少數有政治能力的做起」。我以爲張先生的說法，實在也包含一種訓政的觀念，不過他的訓政觀念，與國民黨的訓政觀念不同。孫中山先生相信國民黨員是少數有政治能力的人，所以要他們去訓練一般人民。張先生相信一般都市人民的當中自有少數具有政治能力的人，我們應當先讓他們實行憲政，然後逐漸養成全國人民的民治氣

質。

我所以不憚煩瑣，指出此點，並不是想爲訓政論張目，而是想說明人民程度高低的事實既然存在，訓政論在以往受一部分人士的擁護，並不是毫無理由。梁先生等的錯誤祇在不知道於實行憲政中求憲政之進步。所以我對於張先生這方面的主張，擬提出如下的補充意見：（一）憲政隨時可以開始，但比較完美憲政的實現需要經過相當時日的推廣與進步。（二）由低度憲政到高度憲政實行的過程，在實質上包含一個學習的（也可以說教育的）過程，而且學習的過程和實行的過程融爲一片，不容分割爲先後的段落。（三）憲政是過程，也是目標。由幼稚園的憲政「逐漸升學上去」是過程，大學的（或研究院的？）憲政是目標。「從少數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是過程，養成多數人的「民治氣質」以達到「全民」「普選」是目標。

☆ ☆ ☆ ☆ ☆

張先生提到過政治能力與教育程度的關係，但他沒有詳細告訴我們用甚麼標準來測量教育程度。張先生說，「我深信中國幾十年來的新教育，已經爲我們貯存了很大的一份新政治力量。如能儘量容這力量發揮出來，便很可以打破現有政治的局勢，很可以奠定下「制度」的基礎。」

張先生的意思顯然是要拿學校教育做政治能力的標準。這個看法，在原則上是不錯的。但我覺得「知識階級」的民治，不過是憲政的起點，而且這個「階級」的本身尚有缺乏「民治氣質」的現象。例如不久以前「五四」紀念會場上一部分青年的動武，便是知識階級缺乏憲政能力的佐證。因此我想到：實行憲政固然可以（並且應當）隨時起始，而培養民治氣質的教育也應當時刻注重。不然的話，倘如我們果然實行城市中有政治能力者的自治，又如果這般憲政的「先進」依舊保留近年的「文人結習」，每逢政見不合的時候，小則相罵，大則相打，恐怕幼稚園憲政的升學要屢經波折，不易實現了。

我以為幼稚園的憲政也應當有最低限度的條件。讀書識字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兩個極端重要的條件：（一）一般的人民有尊重法律的習慣，（二）一般的人民有依法發表政見並服從多數的習慣。何以這兩個條件是重要？我們要注意，所謂憲政不但包含民治並且同時包含法治的要素。（所以專制，獨裁，和暴民政治都不是憲政。）我們並不把「法」和「法治」看成高遠玄虛的理想。憲政中心的憲法，在政治生活當中的效用，其實也不過像足球籃球或任何運動或遊戲的規則。除非參加的人員大致遵守規則，運動

或遊戲必至於無法進行。除非參政的人民大體遵守法律，憲政也難於維持。民主憲政還有一個要素：一般人民了解和平集議及多數表決方法的運用。憲政是多數同意的政治（Government by Consent），也是多方議論的政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們也不要將同意與議論看成高遠玄虛的理想。用胡先生的話來說，只要「絕大多數的阿斗」，「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但是如果這些阿斗根本不肯到場，或者到場之後，不畫諾，不投票而罵人打人，不做臨時諸葛亮而表演「西班牙主義」，我們的憲政也要不能維持了。

我們的知識階級是否充分具備上述的兩個條件，拿最近一二年文化界的行為來看，似乎不容過於樂觀。但我再確切的聲明，我對於張胡兩先生隨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見是同情的。我認為除實行憲政外，別無其他訓練憲政能力的方法。我們不能再蹈襲前人「訓政論」的錯誤。然而我們也不要輕視了我國人民的弱點。我們雖不可於實行憲政之外求訓政，却必須於實行憲政之中努力「養成民治氣質」。知識階級應當時時注意提高自己「參加政治的資格」，以為一般後進民衆的先趨和榜樣。張胡兩先生的言論已經給我們的知識階級以有力的鼓勵，我現在要向他們敬獻一點鞭

策的意見。兩先生或可不嫌我妄想「續貂」的多事罷？

六月五日

會攷的檢討

明 生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畢業生會攷的部分。這個部令後來經過了若干次的修正。其中關於中學會攷最重要的修正有兩個：就是會攷有兩門或三門不及格者亦得投攷高中或大學（二十一年十二月），與各中學可以用會攷代替畢業攷試（二十四年）。一年一度的中學生會攷馬上又要到了，我們想乘這機會對於會攷這個制度作一番檢討，以供教育當局的參攷。

教育部設置會攷之目的在使全國中學授課標準化，依會攷所表示的成績取締那些不能稱職的中學。現在國內大多數之中學辦理不善，無人否認，這些中學急待整頓，也無人不首肯。但是會攷果然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嗎？現在積四年乃至五年之經驗，似乎可以對它作一個公平的估價了。

對於會攷的一個根本的批評就是它只是事後的，而不是事前的，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攷察。會攷乃是等着一個學校於辦理三年乃至六年以後纔設法攷察它的成績，

而攷察的方法並不是直接的視察它的設備，旁聽教員的講授，以及檢查教員之資格與能力等等，乃是間接的攷試它在三年乃至六年間所造就的學生。如果會攷的目的是在取締不良學校，使中學教育標準化，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繞大圈子的辦法，而且未必能得到預期的效果。何以言之？會攷是於三年或六年之後，對於既成事實的檢察，既使會攷的結果足以使從事中學教育之人物知所改進，過去三年或六年的大錯已經鑄成了，在這些年間在學的學生已經白白的犧牲了。況且會攷實在不能改進教育。攷試自身並不是促進教育改革的良法。人都知道攷試是人類一種少不了的笨法子，只在或種場合之下，必須用它。但若用攷試來完成或改進某種事業，則不會收到效果。試看自從有了會攷以後，有多少中學是在那裏認真的澈底的改善教課，有多少中學每年到了四五月（早的從一二月），便停止正式授課，而專為將畢業的學生預備如何參加會攷，便可以明白會攷之效用與原來設置之目的相去如何的遠了。會攷

的作用只是使校長，教員，學生，一齊專注意考試，注意如何可以平穩的會考及格。這樣的中學，並不是給青年男女一種適當的中學教育，不過訓練他們如何可以應考而已。這豈是中學教育的本旨。

如果會考不能改進中學教育，它對於中學生還有更壞的影響：它加重了中學生考試的負擔。初中高中畢業的學生於本校畢業大考之外，都多加了一次考試。高中畢業想要投考大學的——現在高中畢業生幾乎沒有不想投考大學的——除這兩次考試以外，還要受一次，有時乃至兩三次的（因為中學生同時常向兩三個大學報名投考）的考試，而這三種考試，最少三次，多者五六次，又是在海暑的時候，短短的二三個月的期間裏舉行的。在全年裏氣候情況最不適於工作之條件下，對於青年男女，接二連三的施行這樣繁重的考試，單從人道講，也是說不過去的。若說中國的青年，必須經過這樣的超乎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方可以有所成就，我想總不會有人相信吧。為會考作辯護的人或者要說，教育部二十四年的部令准許用會考代替畢業考試，已經減去了一次考試。但部令自部令，事實却不盡然。近年各省市會考及格所需要之程度頗低，無可諱言，因此有許多自重的學校，或者也可以說是自命不凡的學校

，完全看不起會考，不肯用會考代替畢業考試。我們雖然沒有調查，但我們敢說現在各中學校還是本校畢業考試與會考並行，雖然教育部准許免除一次考試，但很少有違行的。一個學生受了三次乃至六次的考試以後，身體與精神上都要受莫大的損害，自不待言。至於精神脆弱的學生們還可以養成神經病的「考試恐怖症」呢。

我們檢討會考的成績，我們相信會考不能對於中學教育之改進有何幫助。我們認為會考給從事中學教育的人們一個錯誤的目標，引導他們努力於一個與教育宗旨相反的途徑。我們尤其為每年幾萬的青年學生抱屈，為這個不幸的制度，斲喪身心的健康，而無補於事，有害於己。

那麼用什麼來代替會考呢？換句話說，如何整頓中學教育呢？我們的答案是：認真改進教育，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便是設立一個效率高的視學制度。一大批有專門學識與經驗的視學——他們有過教課的經驗，知道各種學科的教授法，明瞭現代教育的趨勢，同時還可以對於改進作出提示與表演——按時視察各校，指示改進，這是事先的直接視察，同時還可以希望得到多少預期的效果。中學視學制度之發達，可以說是中國的中學改善的關鍵，因為一般人是等着考核，指示，監督，而很少有能夠自動的

求改進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建議。我們知道這個建議，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我們還知道設立中學視學制度不是教育部所能辦的，而是各省市教育廳局分內的事。我們雖然盼望視學制度的逐漸設立，但我們知道它一時還不能代替會攷，至少在一般中學校還沒有充分整頓以前，還應該攷核它們的成績的。

我們第二個建議是請各大學參加或主持會攷。這個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如現在一樣仍由教育廳或局主持會攷，但出題與閱卷事務應由大學教授主持，由中學教員贊襄。一種是會攷完全由大學主持，加入中學教員與否聽便，如果地方教育行政當局肯放棄這個職權。無論採用那一種辦法，關於會攷的題目，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爲投攷大學的，一種是專爲高中與初中畢業的。及格前一種的，即是同時得到兩種資格，會攷與大學入學及格。及格後一種的，便是會攷及格。這個建議，推行起來，固然也不見得容易，因爲這裏有許多「老大帝國」所特有的人事的，機關的麻煩夾雜其中，但我們相信它是有大大的實現可能性的。

專門教育的先生們討論到中學教育的時候，常喜歡說中學自己是一個單位，它不是專爲升大學的預備。作這樣主張的人聽了我們第二個建議，一定搖頭。我們却以爲這完全是理論之爭而不合乎事實。因爲中學裏所教的科目不過是那些，教法也不過是那樣，一個學生無論將來投攷大學與否，在中學裏所學的沒有什麼差異。理論上儘管要將升學與不升學的分別看待，事實上兩種人所受的教育都是一樣的。至於高中畢業生，近年來一則因爲大學與專門學院增多，一則因爲許多大學都設置獎學金，得到不少升學的機會，差不多全抱着升學的希望。

這個建議雖然仍然不能對於中學教育改進有直接的貢獻，但至少它可以對於升學者免去一次的攷試；以大學來主持出題與閱卷，總可以提高會攷的程度；再者由此或者（這僅是希望）可以使大學與中學相溝通，由大學提示中學教育應該如何改進。

會攷的作用，經過這四五年的嘗試，已經顯明了。現在是討論它的代替的時候了。我們提出兩個建議來供大家的討論。

一個應該消除的貨幣幻景

陳岱孫

在過去六七年，世界經濟恐慌尙復嚴重的時期，我們常常聽見「貨幣戰爭」一個名辭。尤其在一九三三倫敦經濟會議失敗之後，國際經濟的衝突驟然尖銳化，而各國貨幣政策之針鋒相對，更爲一個明顯的事實。在這個時候，凡是一個國家對於本國幣制有所更張，都引起其他國家的嚴重注意，甚至有時被認爲敵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攻擊。這種態度似乎根據於一個新發見。就是一個國家的貨幣的策略可以作爲對外經濟競爭的工具，消極的可以抵抗他人的侵略，極積的還可以侵略他人。

這個以貨幣策略爲對外經濟競爭工具的新發見並不是完全沒有事實的根據。過去數年，國際經濟的情況確與這個發見以證實的事例。第一個就是世界經濟恐慌前的法國。法國，在歐戰之後，國內經濟危機日甚一日。到一九二六年夏天，法國金融大有不可收拾之勢。普安嘉賚 (Poincaré) 佛郎穩定的政策算是挽救了法國金融的厄運。然而普安嘉賚所定的一英鎊等于一百二十四佛郎的匯率，據一般專家的意見，不是一個適當的匯率，而是事實上貶抑佛郎

對外幣的價值。其結果使法國在國際經濟上得到一個優越的地位。所以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之後，法國經濟地位驟然增高，有進而與美英二國爭雄的野心。固然，我們沒有十分把握，坐實普安嘉賚一九二六年一百二十四佛郎等于一英鎊的匯價，是一個有意的有遠見的策略。然而事實明指着法國後此國際經濟地位的增高，與一九二六之後貨幣政策是有密切的關係。再近一點的例就是日本。日本是隨着英國而放棄金本位者。隨英國而放棄金本位者不止日本一國，然而日本放棄金本位之後不但並不急急求匯率之固定，且其所維持之匯率實等于貶抑日金對外之價值。換句話，就是日本在放棄金本位之後，日金對外價值的減低實超過于其他放棄金本位之主要國家的貨幣。因此不少的人以爲日本在世界經濟蕭條期間，獨能受害最輕，而在國際貿易上反有突飛猛進的趨勢，應該歸功于此時期內的貨幣政策。這個看法固然太簡單，日本近來物質的進步自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然而貨幣政策與其對外經濟似乎不能一無關係。法日二國的例都是產生積極的結果。中國前年十一

月新法幣政策則是一個消極運用貨幣政策的例。因為英國白銀政策的推行，再加我們一向入超的不利地位，中國金融界到前年冬初漸有山窮水盡的境況。在大多數國家幣值減縮局面之下，我們還努力維持舊有的本位匯率，是一件勞而無功的事。十一月新法幣法令的頒行是環境所迫出的辦法。然而這個辦法確是鬆解了我們前此一步一步緊張的局勢，白銀國有雖然不能做到十分，而準備外流的情況算是停止了，對外貿易也從此逐漸好轉，入超雖未能免除，而其成分確有減少，國內的企業也漸呈復蘇的希望。在抵抗應付外來經濟壓力上，這個新貨幣政策不能說不有他的用處。無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以上所述的例子都證實許多人對於貨幣政策之為對外經濟競爭工具的發見。

因為有這些證明的事例，這一個發見便有時變為一個信仰，以為前此沒有利用貨幣策略來作國際經濟競爭的工具是胡塗，現在既然經此發見之後，就不應輕棄這個工具，而不去利用它，並且猜度這工具的用處既經發見，一切國家一定都不肯後人，自動放棄者，即是自甘于不利的地位。這一個信念的廣佈，就是造成一個幻景，把貨幣政策看成一個神妙的萬能的東西，給它一個特殊的地位與力量，而反把國際經濟看為附庸了。這一個幻景是近年來國

際經濟正常關係一個阻力。它的信徒在中國恐怕也不在少數。

一個國家，推行某種貨幣政策，以致影響及于這一個國家對外的經濟關係是可能的。在某一種環境之下，採取某種貨幣政策以為抵抗的工具，也是一個適宜的手段。甚至利用人家的無備，單獨採取一種貨幣策略，而居然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也不是不經見的事。不過我們以為這些情形都是在反常狀態之下的情形，而其利益都是暫時的。在國際經濟正常狀態之下，這些情形都不能讓其存在。我們所謂幻景者，是指相信這些反常狀態之下的情形，能假在正常狀態之下存在的意見。

經濟恐慌最甚的時期，就是利用貨幣策略為國際經濟工具最盛的時期，也就是這個幻景誘力最強的時期。從國際經濟觀點來說，經濟恐慌是一個反常的狀態，貿易的減少，信用的動搖，金融的紊亂，貨值的低跌，都是損害本國經濟的現象。恐慌心理便只問何者為有利于我們的辦法，何者能較輕減上列現象的辦法，初不計所採取辦法是否只是暫時的利便，而非長久之計。一九二九起一直到今日，我們都是在這一個狀態中經過。中流失船，片木斷桅都變可貴。所以在這幾年之內，世界各國對外的經濟政策，

都是在急不能擇的情況之下胡亂應付的，只要能救目前之急，日後的結果在所不計。輸入額的制度，匯兌的控制，輸出入貨互易的協約等等，都是急迫中亂抓得來的片木斷椽。所謂貨幣策略，其實也事同一律，是一個臨時救急的東西。若只以救急而論，則此數年來所發明之國際經濟新制度，如輸入額，互易協約等等，也各有其所期待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能夠緩解一時的苦難，並不是不可能，也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事。

可是這個臨時救急的辦法乃逐漸造成一個幻景，以為貨幣政策是國際經濟政策的主幹。這種看法使我們追憶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初葉所謂重商學派的理論。重商學派也是想借重政府法令及政策的力量，謀本國國際地位的增進，而所主張的政策大都不惜以損人利己為目的。重商學派是經濟國家主義的產物。歐戰以後，經濟國家主義死灰復燃，而經濟恐慌更與以藉口的機會。過去數年，世界各國所採取制裁國際經濟關係的制度，都是適合于經濟國家主義的辦法。貨幣政策之變為國際經濟競爭的工具，也就是一個徵象。所不同者，十七八世紀的重商主義是要以其他

國際經濟的政策達到吸收貨幣的目的，而現在我們所論的貨幣幻景是要運用貨幣政策達到增益本國國際經濟地位的

目的。推翻重商主義者，其實不待于十八世紀末葉的自由主義，而為重商主義本身造成的事實。因為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是假定只有一部分的國家採行這種政策。如果所有的國家都一律採這同樣的政策，它的效力便互相抵消，沒有一國可以佔便宜了。我們現在所論的貨幣幻景的消滅也是有待于所謂國際貨幣政策本身所造成的事實，因為國際貨幣政策的運用，也得假定只有一部分國家採用這政策。如果所有國家一律採用同樣的政策，它的效力也互相抵消了。故所謂「貨幣戰爭」，實是互相砍殺的政策，即使經濟力強盛的國家似可佔些便宜，而最終的結果總是兩敗並傷。這一二年的情形已經可以證明這一點。各國都放棄金屬本位，都貶抑幣值，都節制匯兌，凡是一國可作的事，他國也一律效尤。經濟恐慌前期那一種參差的狀況已經沒有，在前期參差狀況之下，貨幣運用所產生之特殊優越地位，也自然隨之消滅。這個情形之逐漸明朗化，就是這個幻景致命的打擊。

我們以為，在正常狀況之下，國際經濟的關係必須放在互利的條款之上，方能期于永久。在這個狀況之下，如還有所謂貨幣政策者，它的用途一定是在于維持國際經濟的均衡，而不是藉以破壞國際經濟的均衡，而從中取利。

恐慌期間的貨幣政策，是利用國際經濟的不均，而作損人利己的打算。這種政策當然不能在正常狀況之下存在的。近數月來頗有國際貨幣會議及合作的呼聲，雖然一時未必

成熟，然這個運動終久要具體化的。這個貨幣政策幻景的消滅，是國際經濟合作一個先決的條件。

推動鄉村建設工作的一個新方式

曹康伯

——青島市的鄉村建設——

建設鄉村來發展都市呢，還是發展都市來救濟鄉村，

這個問題最近已經漸漸為國內討論鄉村建設問題者所注意了。個人覺得我們除掉在理論上討論之外，應當多注意一些實際的例子，因為由一些實際的例子裏面，才可以發現今後鄉村建設工作在推動方式上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同路綫。作者現在用青島市政府的鄉村建設當作一個實際的例子，把它的推動方法，組織機構，同工作情形作一種客觀的敘述，也許可以提供關心鄉村建設問題者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參攷資料。至于這種推動方法是否是真正效率化，將來是否是一條確實能夠走得通的路，那就不屬於本文範圍之內了。

青島市政府的鄉村建設工作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開始的，不過因為青島市在這方面的宣傳較少，所以一直到

現在外面注意的還不算多。建設工作開始的時候先在青島市附近的李村陰島滄口三處，各設立一個鄉村建設辦事處。後來因為李村區所轄範圍面積過大，遂畫出東北一部另設九水鄉村建設辦事處。海西方面又在薛家島成立鄉村建設辦事處一處，此外為救濟水靈山島居民的經濟困難，又在該島上設立救濟專員辦公處一所。總共青島市的鄉村建設機關是五個鄉村建設辦事處同一個救濟專員辦公所。

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是由青島市政府的工務局，社會局，教育局，公安局，同農業局五局中各派一人組織而成的。辦事處主任在這五人中間由政府指定一人充任，以統管全區的鄉村建設事宜。各鄉村建設辦事處政策決定的最高機關是市政會議，市政會議每年于一定期間內舉行一次，包括市長，各局局長，同各鄉村建設辦事處主任。政策決定後交與市政府，市政府再轉交與各主管機關——工

務，公安，教育，社會，農林五局。各局根據市政會議已決定的政策就主管範圍編定具體方案，然後發交各鄉村建設辦事處執行。總觀青島市的鄉村建設機關完全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組織，市政會議是一個立法機關，各局是一種設計機關，鄉村建設辦事處是一種執行機關，至于市政府則是處在一種監督同指導的地位。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的經費來源全部由于青島市政府，每屆會計年度開始時期由各辦事處編製預算呈由市政府核定支給。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青島市的鄉村建設在推動方式上與組織機構上有三種特殊的姿態：第一它是由都市而推廣于鄉村。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的一切建設工作全是都市已有工作的範圍之擴大，都市的工務，教育，公安，社會等一切工作凡是合乎鄉村情形為鄉村所需要者，就可以把它推廣到鄉村去，所以兩種工作在性質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至于各區的鄉村建設辦事處不過是一種由都市而推廣于鄉村中間的引渡機關罷了。第二它是完全利用政治力量來推動鄉村建設工作。市政會議，市政府，公安，教育，工務，社會，農林各局，以及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全是一種政府機關的組織。這種辦法的優點是能夠促進一切鄉村建設工作效率化同一致化，缺點是缺乏一種自動精

神，不能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的鄉村建設運動。第三它是利用政府機關的人力財力來作鄉村建設工作。在上面我們已經談到青島市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的經費是由市政府撥給，工作人員是由公安，教育，工務，社會，農林各局委派，所以一切鄉村建設工作可以說間接都是由都市的力量在那推動。都市在今日是人才和經濟的重心已經是一種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利用都市已有的人力財力來作鄉村建設工作，當然不會像其他鄉村建設機關那樣時時感覺到經費不夠，同人才困難了。

青島市的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的建設工作可以分爲自衛，自給，同自治三大項。自衛工作是利用稽查戶口，成立保衛團，來解決鄉村的治安問題。這方面的工作由市政府的公安局負責設計同指導。自給是利用改良農業，發達園藝，提倡工商業，來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由農業同工務兩局負責設計同指導。自治工作是設法謀鄉村道德的增進，風俗的改良，同教育的普及，來解決人民的知識問題，由教育同社會兩局負責設計同指導。各區鄉村建設辦事處自從民國二十一年成立以後，各種鄉村建設工作無論在公安方面，工務方面，教育方面，社會方面，同農林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績，尤以李村區最可觀。這裏因爲限于篇幅

不能把它各種鄉村建設的工作同成績詳細加以說明了。

近來國內從事于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好像有點過分忽視了都市同鄉村中間所必然發生的一種互相關係，往往把鄉村建設工作看作了一個孤立的單獨的整個。試問在現階段國內政治，經濟，同社會的各種條件下，單純利用鄉村固

太原之行（續）

顧一樵

（三）娘子關內的新建設

進了娘子關不遠，便是陽泉。陽泉有煤礦，有煉鐵廠。我們沿路看見許多火車裝着煤，其中亦有裝生鐵管子的，據說便是陽泉鐵廠出品，預備運銷到天津去的。

山西現在正進行着十年建設計劃，今年乃是第三年。

大部分的工廠，是西北實業公司所經營的，都在太原附近。就以機器廠而說，使包括十八個分廠，軍事時期可以造鎗砲同子彈，平常時候可以造農具同其他機器。我們僅僅

留了兩天，參觀的只有毛織廠，製革廠，發電廠同煉鋼廠。煉鋼廠的規模很不小，籌備了已經兩年，現在大部分機器已經到齊，正在裝置。一部分機器便是太原機器廠自己造的。煉鋼廠所用的火磚乃是山西窯廠自造，以後自然可

有的力量來建設鄉村是可能的嗎？即使可能，是一條最捷便的路嗎？個人覺得像青島市政府所採取的這種推動鄉村建設工作辦法，由都市漸漸的推廣到鄉村，好像是一條比較捷便而省力的路罷？

以源源接濟。洋灰由洋灰廠供給，洋灰的各種原料太原城外都有，所以很便宜。（綏遠的防禦工事，亦是由山西供給洋灰，很有幫助。）我們參觀煉鋼廠時候，沈光遠工程師同我們講閻百川先生怎樣參加籌備會議主持一切，初聽見的時候覺得閻先生在百忙之中竟有精力及此，不覺詫異，但是我們細想這七百萬資本的大廠，倘若沒有地方最高當局主持，當然是無從辦起的。在我國建設工作的現階段，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恐怕非強有力的人不能擔任吧。

除了太原附近幾十個工廠以外，山西近年的偉大建設自然要推同蒲路了。在我國近年鐵路的建設運動裏，北方的同蒲路可以同南方的浙贛路同佔重要的位置。浙贛路的杭江段乃是張靜江先生創辦的，本來是浙江省省辦，後來

歸銀行界投資，成立鐵路公司，乃展築到武昌，現不久可接通粵漢線。杭州到江山一段雖是寬軌，但用輕磅，車頭不能過大，行車因而遲緩，現在打算改為重磅，等錢塘江鐵橋完成，便可實行京粵聯運。同蒲路南達蒲州，現風陵渡正造鐵橋，將來可以渡黃河通潼關。北段已修過雁門關，預定八月可通大同。同蒲路同正太路都是窄軌，可以互通，但是同蒲路鐵軌是輕磅，所以正太路的火車頭不能過去。聽說山西當局正籌備聯運，並且等煉鋼廠完成後先造鋼軌，以便把同蒲路改換重軌。關於窄軌問題，上節已經提起。實際上正太路同平漢路在石家莊連接的地方，一部分車輛在高處，一部分車輛在低處，利用人工轉運貨物，成本還不算很貴。將來大同風陵渡自然亦可以同樣辦理，總比沒有火車便利得多。尤其從軍事的立場看起來，同蒲路的完成，實在是很有價值的。最近晉綏當局計畫綏綏鐵路，預備由歸綏經殺虎口通朔平，以便由晉北另有一條路線直通綏遠，萬一平地泉受了威脅，仍可以保持聯絡。這些鐵路計劃倘若可以趕早實現，我們相信晉綏的抗戰力量更可以增加。

(四) 生聚與教訓

古人說：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近閻百川先生倒是

決心在實做。閻先生的抱負，可以他自編的「希望將來歌」為證：

無山不樹林 無田不水到

無村不工廠 無區不職校

無人不當兵 無人不入校

無人不勞動 無人不公道

閻先生的經濟和教育主張，簡單說，可以列成五點：

「按勞分配」的分配原理，

「資公有產私有」的經濟制度，

「物產證券」的貨幣制度，

「土地村公有」的土地制度，

「做甚學甚」的教育制度。

以上每一個主張都可以供給專家討論的資料，我們現在不預備加以檢討。在我們旅行期間，知道西北實業公司是公營的，但是同蒲路究竟是省營或是民營，我們沒有能調查清楚。全省的土產，有一個專售商場，名為「產銷合作商行」，那裏可以用「物產證券」。「土地村公有」大概還沒有實行，但是全省人民現有救國捐，大約照資產抽百分之五(?)。我遇見一位朋友談起來，他家產不算很多，大約應抽一千餘元。這項捐款要交現錢，不能交不動產。山西

省銀行的鈔票同中，交的鈔票差不多一對一，有時差百分之五。「物產證券」乃以物產做準備，既不是法幣，亦沒有法幣做準備。有些人因此爲山西的財政擔憂，但是山西本省的人亦承認閻先生近年在山西的建設經費已經花了至少二千多萬，倘若所建設的鐵路和工廠都是生產的，那麼算起總賬來，山西還是值得的。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山西每年人超大約達三千萬元，其中布疋九百萬元，煤油四百萬元，五金機器五百萬元，捲烟二百萬元，染料一百萬元，糖一百萬元。近年山西的當局很苦心的要設法彌補這個大量的人超，彌補的方法便是多運土產到外省去換法幣回來。所以從經濟的立場看，山西的農工建設本來很重要，何況現在又增加了國防上的需要呢！

據太原綏靖公署潘連茹參事告訴我們，閻先生最近有所謂三色主義：一是白色，便是植棉。二是綠色，便是造林，三是黑色，便是採煤。預料三色主義成功的時候，山西便可以出入相抵了。

山西一致的口號是「守土抗戰」。閻主任在許多演講裏，曾經指出「收復失地」是利害的問題，有力量方始可以收復，不量力或者反而有害。「守土抗戰」乃是是非的

問題，大家應該明是非，盡責任，不應該顧利害，放棄一尺一寸的土地。況且「守土抗戰」不但從是非的立場是對，而且在利害的立場有利，所以是一舉兩得。這種分析很簡單清楚，不是高調，却是正經的道理。

爲着要「守土抗戰」，所以要「集中人力和充實物力」。這句話我個人非常贊成，因爲同我近年來發表許多文字的主張相合。「集中人力」的方式便是「全民武裝起來」。山西實施的方法便是軍訓。公務員大都已受訓練，進一步便是全省村長的訓練，就在六月一號開始。

太原有一個國民師範學校，聽說民國初年閻先生創辦的時候便想施行軍國民教育。後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發動，「娘子關外的新精神」闖了進去，許多年沒有能照原來計畫實現。現在因爲外患的逼迫，全國都在提倡「新武化運動」，太原以國防重鎮，於是使有青年軍訓的實施。這些青年都是志願投効的，各省都有。據負責主持的人說，這些青年有的本來思想極右，有的本來思想極左，但是在「守土抗戰」的共同認識之下，他們在一起接受訓練。他們有所謂「抗戰先鋒隊」，有所謂「犧牲救國同盟會」。除了軍訓之外，他們還受政治訓練；政治訓練便是根據閻先生的各種主張。我們親自參觀了這一兩千青年的軍

訓以後，覺得他們精神十分飽滿。有血氣有義憤的青年，與其任情奔放，不如嚴格鍛鍊。所謂「養其志毋暴其氣」，乃是愛護青年培養元氣的办法。這裏在太原，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實驗。我們希望這個實驗經過鄭重的嘗試可以得到美滿的結果。

閻先生的口號是「守土抗戰，加緊準備」。在守土抗戰方面，綏遠已經有了驚人的表現。在人與力的準備方面，山西亦正在開始了。

(五) 晉祠與晉渠

太原城外的古蹟，最著名的要推晉祠了。晉祠的殿宇雖然很多，但是主要的是唐叔虞和他的母親邑姜的祠堂。從歷史上說，因為汾東是桐葉封地的所在，所以這裏很早就有唐叔祠，附祭着他的母親。後來鄉間的人把邑姜附會為水神，求雨求子漸漸成了一方人士香火所歸，於是大家只曉得有聖母殿，不曉得聖母的前身便是唐叔的母親。直到閻若璩從草間搜出宋朝的殘碑，方始重新證明聖母殿所供奉的乃是邑姜。現在聖母殿旁，難老泉上，另有水晶宮水母廟，可見水神已經屈居配享了。但是好事的皇帝，早就勅封唐叔的母親為「廣惠顯靈昭濟沛澤聖母」，年年香火不斷了。

晉祠的古蹟首推唐碑，係貞觀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所立。相傳唐高祖出師以前，曾經在此禱祝，所以太宗親自撰書「晉祠之銘」立碑於此，祠前的金人台有金神四座，有一座比較最古，刻着「紹聖四年三月朔日立此金神用彰陰報」同「維大宋太原府故綿州魏威」字樣。

此外有周柏二株，唐槐一株，不知道植物學家可以同考古學家與以鑑定否？

晉祠的名勝，不僅因為有晉祠唐碑，亦因為有古柏清泉。古柏的年代雖不可考，但是「難老」「善利」「二泉倒」是很有歷史了。相傳懸壺山為晉水發源之處，智伯曾過此水以灌晉陽，稱為晉渠，實在是古時灌溉工程之一。唐叔祠有一副對聯，是：

唐國桐封七百年功存王室

晉渠水灌三千頃澤及生民

我們相信晉祠的所以能保存到現在，乃是因為這個水源。

在難老泉前面，水分為兩路，從此達到田間。鄉人希望泉水沒有一息的停留，所以稱為難老泉。泉水清瑩如鏡，琤琤有聲，遊覽到此，實覺心曠神怡。山西今年亦鬧旱荒，幾個月來沒有下雨，我們遊晉祠的一天，居然很有雨意，回太原以後，居然傾盆大雨。許多人說我們帶了雨到

山西來，我們笑着回答他們說：「我們剛到晉祠去了。」

我們到石家莊的一天，忽然刮大風，許多朋友抱怨說是我們北平帶去的。現在太原得雨，或者可以將功贖罪吧。

一場雨不知可以抵得多少黃金，無怪乎鄉下的農民在沒有雨的時候要求雨，而愛民的官員在得了雨以後要造「喜雨亭」了。太原的一位朋友告訴我關於趙戴文主席的一段軼事：天太旱了，這七十幾歲的老主席時刻在就寢。忽然天陰欲雨，他老先生便跑到天井裏站着等雨。等到雨大

了，他還不進來。有人告訴他雨大了，衣服濕了。他高興的說：大的好，濕的好。據聞當天晚上各地的長途電話忙極了，因為省政府急於要知道各地下雨的情形。

在沒有下雨以前，我們見過趙主席。他忙着在開會，抽空同我們談了一回。他手上拿着一串佛珠，充滿着勤政愛民的虔誠。

我們在雨後匆匆出了娘子關，帶了山西的酒和醋回到古老的北平來。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看不懂的新文藝（通信）

絮 如

適之先生：

我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已然教了七年的書了。雖與先生沒有什麼認識，但是由種種文字及行動上，確是十分欽佩你的。現在寫這封信的目的，並無別事，想請求先生救一救中學生！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提倡語體文的，不能不以先生為最出力。提倡語體文之目的，就為是把那艱難晦澀，勞時費神的文言打倒，使文學普遍化，使人民的文化水準提高

。可惜不幸的很，現在竟有一部分所謂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種只有極少數人，也許竟沒有人，能懂的詩與小品文。自然，人人有發表文字的自由，旁人是無法干涉的，可是因為刊物上流行了這種糊塗文之後，一般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因而閱讀，模倣，於是一個清清楚楚的學生，竟會作出任何人不懂的糊塗文字。作教師的如果為他改正，他使說這是「象徵派」，這是某大作家的體裁。一個小小的教員，自然比不上大作家，因而中學生便要

走入這個魔道。假如入了這個魔道之後，我相信他一輩子也不會明白了。

我所說的糊塗詩文，和先生一定見過不少，現在我抄幾段作參考。

(1) 第一盞燈

鳥吞小石子可以磨食品。

獸畏火。人食火乃有文明。

與太陽同起同睡的有福了，

可是我貸美人間第一盞燈。(見文學雜誌創刊號)

(2) 扇上的烟雲

「你說我們的聽覺視覺都有很可憐的限制嗎？」

「是的。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農場上

，順手採一朵紅色的花給他，他說是藍的。」

「那麼你替他悲哀？」

「我倒是替我自己。」

「那麼你相信着一些神秘的東西了。」

「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遼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

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

。我說不清有多少日夜，像故事裏所說的一樣，對

着壁上的畫出神逸走入畫裏去了。但我的牆壁是白

色的。不過那金色的門，那不知是樂園還是地獄的門，確曾爲我啓過而已。」

「那麼你對於人生？」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唉，自從我乘桴浮於海，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我是很久很久沒有和人攀談了。今天我却有一點說話的興致。」……(見畫夢錄)

也許是我沒有文學修養，我簡直的不知道作者說的是什麼。這樣演變下去，這樣的文體絕不會有前途的，但可惜一般青年相率墮入魔道，却是教育上，也可說是社會上的一個大問題。現在此地流行的學生們辦的刊物，已然有了這種傾向了。再抄下幾句來：

願你赤虔的矯認我作瑪利亞，

我也或許能夠勉強的垂下這條，

耶和華 御賜的

聖潔面紗；

不久定能聽到一句：

「攀信西方的宗教學者！」

於是！一部偉厚的情誼，

終成屏障我穢身的紫霞，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夜，

附託這「處女時代的產兒」

苦你——爲之勞動：

你可曾看見我緋紅的羞顏嗎？（望益二卷十期）

說也慚愧，像這樣的句子，我真是無法猜想的。然而一般青年却大半要走入這條狹窄糊塗的道路了。

像這樣子演變下去，豈不是語體文前途上一個大大的

編輯後記

適之

△君衡先生是政治思想的專門學者，他來響應張佛泉先生和我的憲政論，使我們對於中國政治思想的前途發生無限的樂觀。君衡先生提出補充的幾點，我都充分接受。我在八年前（人權論集頁二七）曾說過：

「民主制度的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訓練。這便是中山先生說的「行之則愈知之」；這便是中山先生說的「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這正是君衡先生特別注意的川憲政作「學習的過程」的意義。

危機嗎？我和我們幾位同事的都有這種感想，終是因爲「人微言輕」，即發表出來，也不爲人重視。先生是提倡平易語體文的先鋒，如果加以糾正，效果一定大的多，不知以爲如何？

不過，也許因爲我自己對文藝沒有修養，有眼不識泰山，所見者錯誤，也希望先生加以指示！

黎如。廿六，六，三，保定。

△君衡先生指出，我們的識字讀書階級現在還沒有守規則（法治就是守規則）的程度。這一點也不足使我們悲觀。我們需要的訓練還只是民治的訓練。中山先生當時把會議規則叫做「民權初步」，真是一種遠見！我常想，中學大學裏都應該廢止「黨義」一科，都應該用「民權初步」來替代「黨義」。我相信，凡能精通「民權初步」的青年人，都有實行法治的準備。

△明生先生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他討論「會考」制度的失敗，和如何替代「會考」的方法，我們都十分贊同。我們十分誠懇的盼望教育部能把近年視察高等教育的精神逐

漸轉移到視察中學的路上去。中學是大學學生的來源。中學辦不好，大學是無法辦好的。我們不信教育部沒有視察中學的權力。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曹康伯先生寄來的論文，是報告青島的鄉村建設工作的。青島市的鄉村建設工作，據各方面的觀察，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個新方式」。

△「絮如」先生來信指摘現在最時髦的「看不懂的新文藝」。這個問題確是今日最值得大家注意一個問題。明朝的文學大家李東陽曾說：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麓堂詩話）

這句話說的最公平。我們覺得，現在做這種叫人看不懂的詩文的人，都只是因為表現的能力太差，他們根本就沒有叫人人看得懂的本領。我們應該哀憐他們，不必責怪他們。

△「絮如」先生舉的三個例子，我們不能不說，他的第一個例子有點冤枉。「第一盞燈」是看得懂的，雖然不能算是好詩。其餘的兩個例子，都是我們所謂應該哀憐的例子。

△金名蘇先生鑒：我們不能發表沒有真姓名與真住址的文字。投稿和通信都可以用筆名發表，但我們必須知道作者的真姓名和住址。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冊
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
號費

胡適之的書

胡適文存……	定價	洋裝二元八角
胡適文存二集……	定價	洋裝二元四角
胡適文存三集……	定價	洋裝三元二角
胡適文選……	定價	一元一角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	定價	一元三角二分
四十自述……	定價	七角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	定價	七角五分
知篇小說第一集(選譯)……	定價	三角
知篇小說第二集(選譯)……	定價	三角
嘗試集(新詩)……	定價	四角五分
藏暉室劄記……	定價	四角五分

上海馬路 亞東圖書發行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白話文學史(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章實齋先生年譜……	定價	七角
淮南王書……	定價	四角
戴東原哲學……	定價	學生本一元二角 精裝本一元四角
詞選……	定價	學生本一元六角 精裝本一元八角
胡適論學近著……	定價	精裝四角 平裝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册四元
平裝二册二元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刊前兩期要目

第二二二六號

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
再談談憲政
從救災談到農業的根本問題
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
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

張佛泉
胡適
蔡鼎
薩本棟
顧正本

第二二二七號

上軌道的政治
英日談判與華北
論開放黨禁
從民衆教育立場檢討合作事業
太原之行

陳之邁
崔書琴
陶希聖
盧廣縣
顧一樵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冀察平津舉辦國大選舉

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

論準備中之國勢普查

關於讀經

再談黨禁問題

「蘇維埃共產主義」(書評)

編輯後記

胡適

張熙若

劉南溟

梁實秋

陶希聖

陳之邁

適之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鎮江	揚州	南通	漢口	武昌	南昌	南昌
天津華北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上海華北書局	南京華北書局	蘇州華北書局	無錫華北書局	鎮江華北書局	揚州華北書局	南通華北書局	漢口華北書局	武昌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北平華北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上海華北書局	南京華北書局	蘇州華北書局	無錫華北書局	鎮江華北書局	揚州華北書局	南通華北書局	漢口華北書局	武昌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南昌華北書局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南寧	貴陽	重慶	成都	寧波	杭州	福州	廈門	沙市	長沙	衡州	岳州
廣州華北書局	汕頭華北書局	梅縣華北書局	瓊州華北書局	梧州華北書局	南寧華北書局	貴陽華北書局	重慶華北書局	成都華北書局	寧波華北書局	杭州華北書局	福州華北書局	廈門華北書局	沙市華北書局	長沙華北書局	衡州華北書局	岳州華北書局
廣州華北書局	汕頭華北書局	梅縣華北書局	瓊州華北書局	梧州華北書局	南寧華北書局	貴陽華北書局	重慶華北書局	成都華北書局	寧波華北書局	杭州華北書局	福州華北書局	廈門華北書局	沙市華北書局	長沙華北書局	衡州華北書局	岳州華北書局

獨立評論

第二三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北平後門慈慧殿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冀察平津舉辦國大選舉

胡適

六月十日中央社的保定電報報告給全國一件最可喜的消息：

國民大會選舉，冀察平津四省市均決定依法舉行。

冀總監督處十日成立，總監督民廳長張吉墉同時就職。……

六月十三日平津報紙報告：

津市國民大會選舉事，即籌備進行，張自忠市長任選舉事務所總監督。

又報告：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平市即將開始進行。我們預料，這一期獨立出版的時候，北平天津市和察哈爾省的總選舉監督都已就職了，兩省兩市的初選都已進行辦理了。

我們十分歡迎這些報告，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國民大會他有他本身的意義，但冀察平津的國民大會選舉是在這國大本身意義之外還有他的特別重要性的。我們試懸想，在那個包括全國並且包括海外華僑代表的國

民大會裏，若沒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個什麼樣子！所以冀察平津的舉行國大選舉，至少有三層特別意義：（一）讓全世界知道這兩省兩市當然是整個中華民國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二）讓我們的強鄰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陰謀是必須失敗的；（三）讓全國國民知道冀察平津的軍政當局是擁護國家的統一，是不受浪人漢奸的煽惑離間的。

從這件事上我們還得着一個教訓。在這樣龐大而交通不方便的國家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總不免時有許多隔膜之點。消除這些隔膜之點，最笨拙的莫如近二三十年來的「代表」往來的辦法。代表往往是无權的，無較遠大的國家眼光的小政客，他們奔走往來，往往成事不足，而債事有餘。現在全國的交通比較便利了，中央與地方之間若有什麼意見的隔閡，利害的磨擦，環境的特殊，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不用代表往來，而由中央或地方的負責領袖親自往來訪問，當面談論商量。古人說的好，「百聞不如一見。」負責的領袖聚會於一堂，一切疑猜都可消于一

席話，一切是非都可決于片言，一切間阻挑撥都無所施其技，所以是最滿意的方法。近年蔣介石先生的時時往來各省，以及韓復榘先生的南下，居正先生與蔣作賓先生的北來視察，都是最好的例子。就舉國民大會選舉一件事來說，當初冀察平津因環境的困難而緩辦選舉，結果是全國初選不能完成，決選不能不展緩。當時中央與地方好像都覺得這裏面的困難真是不容易解決的了。然而內長蔣作賓先生北來巡視各省市，和各省市的當局開誠相見，大家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觀察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國民大會決不可沒有冀察平津的代表，這麼一來，一切隔閡遲疑都消釋了，

大家都決定非趕辦國大選舉不可了！原則既然一致，其餘的細節子目都不難解決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無論任何地方政府當然不應該自居於被屏棄或被疏遠的地位，中央政府也不應該先存一種成見，認定某人為不足與言，或某局勢為不易改善，因此就不去圖謀疏導改善的方法。我們必須認定，在外患嚴重壓迫之下，在中央政府能維持全國秩序的局勢之下，中央與地方之間只要大家能推誠相見，只要能避免一切離間挑撥，決沒有不能互相諒解而同力合作的事。

廿六，六，十三。

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

張熙若

凡是向來注意胡適之先生的政治理論的人都知道胡先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民治主義者。在近年來獨裁專制一類思想風靡全國的時期中，胡先生居然還能抱殘守缺的提倡自由，鼓吹民治，雖不見得真能有中流砥柱的效力，但他那種敢信敢言的精神和態度真值得我們大家尊敬。我自己也相信自由主義和民治主義，所以對於胡先生這種精神更覺得格外欽佩。

不過胡先生在結論上雖然信仰自由，主張民治，但他得到這種結論的理由，在我看來，却是往往不大正確，有時甚至完全錯誤。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証，便是他那「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一套的議論。我認為這種議論是一種對於提倡民治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議論，是容易給反對者以攻擊的機會而與贊成者以「以辭害意」的遺憾，所以我現在將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寫出來，作為

對於胡先生提倡民治的意思的一種修正，不知胡先生能接受否？

我們可以先徵引胡先生下列一段議論：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量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獨立第八二期及第二三六期）。

胡先生說蔣廷黻先生說他這一段議論簡直是「笑話」，丁君先生說他這議論是「不可通的」。蔣丁兩先生的話雖似不大客氣，但意思却是非常對的。胡先生這幾句話不但鼓吹專制的蔣先生和提倡獨裁的丁先生不以爲然，就是我們贊成民治的人也覺得不敢苟同。（這與學政治或不學政治並無關係。）

胡先生錯誤的地方似有以下數點。第一，民主憲政有

各種程度的不同。借用君衡先生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民主憲政有「低度」與「高度」的區別（獨立第二三二期）。胡先生似乎以爲民主憲政可以由低度開始，便認爲它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這在邏輯上發生問題。因爲若是在低度時可以稱之爲幼稚園的政治制度，那麼，等它到了高度時，豈不是又要稱它爲大學的政治制度嗎？何以同一制度竟有兩種性質相反的名稱？若謂低度時的幼稚園可以概括高度時的大學，那麼，高度時的大學又何嘗不可以概括低度時的幼稚園？照哲學上的「歸宿論」(Telology)講，後一說似乎還比較的合理點。胡先生說，「我們不妨從幼稚園做起，逐漸升學上去！」（獨立第二三六期）我要問：升學後所升入之「學」是高度的民治呢，還是專制與獨裁呢？若是高度的民治，那時是否還算幼稚園？若是專制或獨裁，難道在胡先生的心目中民治的用處竟是如此，竟是替專制與獨裁作預備工作？

第二，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材……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又說：「我們這樣一個智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

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佔一個絕重要的地位，

——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材的。」（獨立第一三〇期）我在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六期中「一切政制之基礎」一文裏會對這個見解有所批評，不妨摘錄其中一段：

關於智識條件，有一點值得有些人注意，那就是智識的數量與政制的關係。一個政府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是完全看那個政府所要辦的事業的範圍大小而定，與那個政府的體制是無絲毫關係的。假如一個政府的職責只限于普通所謂政治問題而不包括經濟問題，或者只管極少的經濟事業而留大部分的經濟事業于社會私人之手，那麼，不管它的體制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獨裁，它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一定比較小一點。反之，若是它的職責是于政治問題之外兼管經濟問題，而且這樣國營，那樣官辦，管理很多很大的經濟事業，那麼無論它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獨裁，它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一定比較的大一點。從前的政府比現代的政府需要智識少，完全是因為那時社會沒有工業化，經濟問題比較簡單，政府採取放任政策的原故。現在需要智識多，完全是因為工業發達，經濟關係複雜，政

府不能不採取干涉主義或國營政策的道理。這與政制問題沒有絲毫關係。君主國家如此，共和國亦如此；民治國家如此，獨裁國家亦如此。譬如你要修一條鐵路，開一個工廠，設一個醫院，辦一個學校，假設其它條件相同，不管你的政制是那一種，你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都是一樣的。冷硬的事實，無知的物質，是不講人情，不看面子的。

丁在君先生對於胡先生這民主政治不需要大量的專門技術人材，只要叫平凡的人去應付就行的議論也有一段批評，我認為很透澈。丁先生說：

他（指胡先生）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胡適之先生似乎以為專門技術人材是行獨裁政治纔需要的。事實上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民主也好，獨裁也好，如果國家是現代式的，胡先生所舉的一百五十萬個專家一個也少不了的！英美政治以前比較的簡單，因為他們是實行正統經濟學的放任主義的，與政制無關。現在英國也要有專家政治，美國也要有「智囊團」了。因為放任經濟主義在英美也不能存在了。豈但英美，連落

伍的中國銀出口也要加稅了。這都是時代的表示。

(獨立第一三三期)

以上是胡先生的「幼稚會」的兩大弱點。此外還有許多次要的論點，如謂民主政治曾經實行于許多幼稚的民族及民主政治宜行于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等，更覺與事實不符。第一，幼稚的民族曾經實行過民治者並沒有「許多」。中國，印度，巴比倫，希伯來，波斯，埃及，都沒有實行過民治。曾經實行民治者只有古代希臘幾個城市國家，其中只有雅典算是有成績的。但是雅典的民治並不是我們今日所謂民治。雅典的民治是直接民治，用不着代議制度。我們今日因為國家並非古代的城市國家，無法行使直接民治。我們今日所能行的民治是近代英美式的民治，近代英美式的民治離了代議制度根本就無法運用。然而一講到代議制度，各種困難就立刻發生，而且這些困難並非任何幼稚方法所可解決的。第二，民主政治適宜于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之說也不見得正確。就今日歐美各國說，德意俄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但是它們却偏偏都不能行，都不願行民主政治。能行的反而還是那些政治經驗最豐富的英美法各國。

照上面所說，民主政治既不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

那麼，胡先生何以又如此主張呢？我以為胡先生所以如此主張的道理，至少一部分道理，是與他的實際政治見解有

關係的。他鼓吹這個議論的時期有二。一是三四年前反對獨裁的時期，一是最近希望實行憲政的時期。在三四年前，他因為反對專制與獨裁，所以不惜和他的老朋友蔣廷黻先生和丁在君先生對壘，互相批駁。在最近，他因為希望結束所謂訓政，立刻開始憲政，所以他贊成張佛泉先生的「憲政隨時隨地都可以起始」和君衡先生「要實現較圓滿的憲政，祇有從幼稚的憲政做起」的議論。他又恐怕人家以為或藉口民治理想太高，不易實行，所以便說民治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極易實行。

但是我覺得我們儘可以反對獨裁，儘可以主張立刻實行憲政，却用不着拿「民治是幼稚的政治」一類不妥當的理由去證明我們的主張的合理。我所以要修正胡先生的議論的理由如此。

至于民主政治既非幼稚的政治制度而我們的政治程度又很幼稚，那豈非我們便無實行民主政治的可能嗎？這當然不然。不然的道理，除過張佛泉先生及君衡先生所已言者外，我自己還有其它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道理，隨後再

說。

論準備中之國勢普查

劉南溟

月前中政會第四十一次例會通過籌辦國勢普查案，並將所需經費列入二十六年度預算。此舉關係正在開始之建設事業乃至國家百年大計者至重且大，而欲其事在現狀下之中國進行順利又至繁且難，是不可以不論。

據報載，主計處將於今年下年即開始舉辦試查事宜。大約先從江蘇，浙江，山西三省着手，更於其他各省抽選二十縣以為代表。籌備經費已規定為三十萬至五十萬元。全國普查，將於民國三十年舉行。現時吾人所知關於國勢普查之消息大概如此。

此實中華民族之恥辱。國勢普查，本為近代國家之產物。必具備近代國家之條件而後足以言近代的國勢普查。歐美諸先進國家之近代化，始自十八世紀。故各國之普查，多於十八九世紀開始。如瑞典施行第一次普查在一七五〇年，美國在一七九〇年，法英二國在一八〇一年，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其比較後進之國家，如日本普查始於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始於一九二七年皆是。由以上所舉之年代觀之，足知一國初次普查之舉行，絕非偶然，蓋必在建設

大業完成或近代化之工作已經開始以後。此如美國普查之實施在獨立戰爭勝利聯邦組成之後，德國在普法戰爭勝利德意志統一之後，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土耳其在戰勝希臘獲得國家獨立自由之後，皆其例也。今日之中國亦不能例外。中國建國之工作方在開始。從歷史進化之跡觀之，其普查大業，延至今日始行準備，正不足異。抑不獨不嫌其遲，且有人以為我國於今日談普查失之過早者。此說並非無理由。蓋如吾人所言，近代的國勢普查，必先具備近代國家之條件而後方有實施之可能。其與普查最有關係之基本條件至少有四：（一）全國行政系統之絕對統一，（二）人民生活之絕對安定，（三）全國交通網之完成，（四）人民知識水準之提高。四者缺一，普查即難於實施，如勉為之，亦難有何效果。此四基本條件，中國目前已完成其一部分，其餘一部分正在努力完成之中。然則現時吾人將以此等條件尚未具備而遂主張普查暫緩施行乎？是又不然。吾人不主張因此等條件未全備而緩辦普查之理由，正與今日一般人不贊成因人民程度不夠而延遲實施立憲政治之

理由相同。歐美各國最初實施普查，亦嘗遭遇無數困難。所得結果，並不盡滿人意。各國之普查制度與方法，殆無不經過多次之試驗與改進而後漸臻於完善。故第一次普查即使不能獲得預期之結果，而由初次試驗所得之教訓，必能改善第二次普查之實施。況在吾國開始建設之今日，一切施政方針，需要國勢普查供給數字為其根據者甚殷，故普查之準備，尤不容緩。如以民國三十年為正式普查之年，則距今尚有數年之時間。吾人竊望政府能於此數年內完成上所舉之基本條件，俾普查之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以上略述吾人對於此次政府通過普查案之感想。以下更試舉吾人對於準備此次普查之意見。

普查為極端繁複之工作。主計處負籌備之責，其任重而其事甚難。中國固亦嘗試辦近代的普查矣。宣統二年民政部之調查，民國元年國務院之調查，民國十七年內政部之調查，其本意皆欲效法歐美，實施近代的普查，而結果皆不免於失敗。其故雖由於當時基本條件之未備，然主持者之不得其人，尤其統計知識技能之缺乏，亦為其大原因。自二十年主計處統計局成立，於茲數載，規模粗具，各種統計事業亦逐漸進行。同時一般國民之統計知識亦頗有進步。例如普查方法之必須一致，普查時間之必須確定

，此今日稍談統計者殆能言之。蓋無論政府與國民，現時皆已對統計有較充分之認識，其情形遠非十年前可比。吾人相信今日之統計當局必能以最善之努力，為普查之準備。然茲事體大，且屬創舉。容於以往歷次調查之失敗，必須十分審慎從事，以免人力財力之虛擲。謂宜於充實內部組織以外（查各國舉辦普查時，有設臨時機關者，有將原有統計機關加以擴充者。若現時我國統計局之組織，恐不足以應普查之需要。）更應將有關普查準備之計劃公開，廣事宣傳，以喚起一般民衆對於普查之注意，而表示其意見。蓋普查有待於人民合作之處甚多，此在現時之中國尤有必要。本此立場，吾人對於此次普查之準備就其舉大者謹陳數事，用備當局者之參攷：

第一，關於試查範圍之確定 報載主計處將在蘇浙晉三省及其他各省之二十縣先辦試查以為民國三十年普查之準備。此項消息如屬正確，則吾人對於此種三省二十縣之辦法，竊有所疑。夫試查最要之目的有二：其一在於獲得經驗，發現問題，俾日後正式普查實施時有所遵循。其二在使試查所得之結果有代表全體之作用。此中實包含一統計學上所謂「代表調查法」（或抽樣調查法）之問題。查統計局於兩年前早有選定二十市縣為試查區域之計劃。就其

所選定之各市縣觀之，除南京市外，各省僅選定一縣（共計十九縣）以爲代表。夫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衆，風俗習慣之懸殊，地理環境之差異，僅選二十市縣，實難以代表全國。吾人習知中國一省等於歐洲一大國。同屬一省之各縣，其氣候，地理，經濟，社會，文化諸狀況可以相差甚遠。例如統計局以無錫縣代表江蘇，萍鄉縣代表江西，三水縣代表廣東，吾人衡諸統計學上之大數法則，竊恐其未當。但統計局前此所以不克多選數縣者，乃爲顧慮經費困難之故。現中政會已將所需經費列入二十六年預算，而蘇浙晉三省且將實施全查。統計局會規定二十市縣試查之經費約爲十三萬餘元。今於二十市縣之外，更作三省之全查，則所需經費恐將達百萬元之數。政府既有如此大規模之計劃，使吾人想像其在經費方面已有相當把握而不

如兩年前統計局預期之困難。因此吾人主張將原有之二十市縣擴大其範圍，而於較大之省各選四五縣，較小之省各選三四縣，合之約得八十縣。如是試查所得結果，必更有代表全國之性質。反之，全查之省，似嫌其太多。夫就全國言，蘇浙晉三省之調查固可謂之試查。但此三省共有之面積人口，足與歐洲最大之國相比，或更超過之（蘇聯除外）。此即言如斯大規模之試查，實等於歐洲各國之普查

。吾人目的如欲得一全省之結果以資參攷研究，則調查一省可耳；而以其餘二省試查之經費，用於所選定之其他各省之縣市。總之，從準備全國普查之立場以觀，三省二十縣之辦法，似不如一省八十縣之辦法爲妥。至於究以何省爲全查之省，則江蘇因政治經濟等關係，自當膺選。但如就代表全國之性質言之，則江蘇並非最適宜之省，因其經濟文化諸狀況，在全國各省中較爲特殊故也。

第二，關於調查對象之規定 據統計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國勢普查本包括人口，土地，資源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項。吾人不知此次國勢普查究將包括若干部分。以常情揆之，在目前人力財力狀況之下，只能先完成最基本的人口普查。但如就現時建國之需要而言，毋寧承認農業，工業，資源諸調查之更爲急迫。土耳其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後，續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實施一農業普查，更於十二月完成其工業普查。此蓋由於當時之需要，故土政府決心於短期內繼續完成三種基本的普查。中國建國之情形，頗有與土耳其相似之點。尤其在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高潮之際，吾人不妨考慮此次普查可否擴大其對象而與土耳其一九二七年普查採取相同之步驟。如以力量不及，亦不妨考慮同時實施人口與農業兩種普

查之計劃。查各國施行人口普查時，多有附及人口以外之問題，而以附查房屋及工業建築物爲最普通。今吾人亦不

之經驗有同等被重視之價值，此吾人對於試查應有之認識也。

過於人口普查中多附查若干農業方面之問題而已。此舉在

第三，關於全國村市數目之調查與門牌之編釘 在準

目前之人力財力狀況下，誠有非常之困難，但徵之土耳其普查之往例，亦非絕不可能之事。爲獲得圓滿結果起見，

備普查之程序中，其應辦之事本不勝枚舉。吾人所以特提出此二事者，實以此舉頗不爲今日談普查者所注意，而其

政府在籌措經費方面，固應盡最大之努力。同時負責籌備之主計處無論在組織與技術方面，皆須有嚴密完善之計劃

事又爲準備普查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查各國於實施普查之前，必先將全國劃分爲若干監督區與調查區。每一區內之

，務以最低代價換取最高效果之目的。此如調查表中，僅能規定少數最基本的項目：人口普查應以居住，性別，

村市數與戶口數，均須於普查日以前，作一大概之估計。主持一九二七年土耳其普查之加密爾赤伽在其視察全國一

年齡，職業，婚姻狀況與教育程度六項爲限；農業普查只可詢及最主要作物之面積與產量，土地之分配與利用及

般情況之後，即着手於編查全國村市表冊與編釘門牌號數之工作。宣統二年民政部之普查，係將戶數調查與口數調

牲畜諸項。其餘次要之項目應一概刪去。若統計局在江甯縣試查所擬用之表格，恐失之太詳。然此乃就全國普查言

查分別舉行。所謂戶數調查，即是編釘門牌。（調查戶口章程第十條：「調查戶數應由調查員就區分段以內，按

耳。其在試查，則項目不妨稍詳，有時且有增加特殊項目之必要。吾人在上節已聲明試查於獲得經驗以外，尙有其

照部定門牌格式，按戶依號編釘。」）該次普查可議之處甚多，而此種規定却不爲無見，特恐其未曾認真實施耳。

自身之使命。即試查所得之結果，應視爲一可作代表之樣本，而保留之與將來普查之結果相比較。其不能在初次普

我國今日除較大城市與毗連城市之少數村鎮外，不僅房屋未有門牌，即街巷並名稱而無之。此正與施行普查以前七

查中調查之問題，可於試查中查之。例如在試查所用之人口調查表上，不妨加問過去一年間生死之人數，以爲計算

耳其之情形相同。故此大普查之準備，應以編釘門牌（較大村鎮之街路並須給予名稱）及調查村市數目爲主要工作

生育率與死亡率之用。是以試查所得之結果應與其所昭示

之一。此一步如不能及時完成，則普查區域之劃分，普

查人員之選派，普查表冊所需數量及其分散諸端，皆將因缺少根據而難於決定。抑不獨事前之準備不能少此一步，即事後之校驗工作，如檢視各地普查實施時有無遺漏，亦非有一完全之村市表冊以爲依據不可。雖然，以我國面積遼闊，戶口衆多，此種準備工作，亦非有精密之步驟與從容之時日不爲功。欲其事之輕而易舉，或不妨利用現有之

保甲制度以達此目的。按保甲爲我國特有之組織，其在將來之普查中究竟能有何種效用，爲一極值得討論之問題。據吾人所聞關於各省保甲之現狀，無甯承認其不能担负近代的普查之任務。惟以具有長久歷史而又如此普遍之地方組織，似亦不能一概抹煞。逆料將來普查實施之日，勢難

關於讀經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經的人，對於讀經問題只能說一些真正門外漢的話。

第一，我覺得經書需要整理。所謂五經，其中有文學，有歷史，有民俗，有雜記，內容很複雜。文學的困難，那是不用說，有許多字句有許多專門學者還弄不清楚，沒有師承沒有訓練的普通讀者自然更感困難。歷代的學者雖

與保甲絕緣。吾人以爲莫如將現有之保甲制度加以整理，健全其組織，慎重其人選。此不僅有裨於地方自治之推進，或竟能因此而成立一種特殊的中國普查制度亦未可知。此自爲一種理想，未必即能實現，但無論如何，吾人在上所舉之調查村市數目與編釘門牌兩事，似不難假手於保甲長以完成之。

上述三事爲吾人認爲此次普查準備中可以商榷之點，其中包含之問題已不少。此外與準備工作有關之諸問題，如普查法規之擬訂，普查機關之組成，調查人員之訓練，宣傳工作之舉行，皆爲當前要務。度當局已在縝密計劃之中，毋待吾人之喋喋矣。

梁實秋

然給經書做了不少的註釋考證的工作，其中有很大的部份是沒有用的，往往不但不能解釋疑難，反倒更埋沒了真相。我覺得現在時機已經到了，應該有專門學者，不妨畢生專治一經，澈底清算以往的所謂經學，給我們編纂一個完好的本子，——這個本子要有豐贍的注釋，要有明晰的編排，要有精確的考証。有這樣的本子出來，讀經便比較的

是容易了。例如「詩經」，有關的文獻太多了，搜求已經不易，其中又有很多沒有價值的，不是專治「詩經」的人就很難充分理解「詩經」。我覺得外國的「古典」似乎是較爲倖運，似乎是經過較好的處理。爲什麼我們不可以把我們的經書也整理得像個樣子呢？當然，這種工作不是一般村學究所能勝任的，必須是有文字學考古學民俗學等近代智識的學者纔能負擔。

第二，小學不必讀經。我且講我自己的經驗。我在宣統二年進端方所立的陶氏學堂，教國文的先生也不知怎樣選中了那風的一節，不加講解的要我們背誦，我們在課堂裏唧唧呀呀的誦了半天，算是背下來了。一直到如今，「擊鼓其鐘，跗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這一段，我還能背得出來，因爲印象太深了。但是這詩的意義，到如今也還覺得是迷迷糊糊。童時的記憶最牢，但是這樣無意義的強制記憶，有什麼用處呢？民國以來的小學教科書，便不選經書了，我記得我小時讀過的國文修身一類的教科書，裏面頗有良好的教材，有幾篇對我留下很深的印像，影響到我以後對於做人處世的道理之理解。我覺得民初的小學教科書比現在流行的教科書還要好些。現在的小學教科書，有些實在太不好了。我很希望楊振聲沈從文

先生編的小學教科書早點印行，補救這個缺陷。但是現行的小學教科書無論怎樣壞，却不能做爲主張恢復讀經的一個理由。

第三，中學應選讀一點經書。中學的國文教科書不妨大量的選讀經書，選的標準應該注意這幾項：宜擇文字上沒有問題的，宜擇真正可以代表我國古代之健全的思想並且足爲國民道德修養的資料者，宜擇有文學價值者。胡適之先生在「讀經平議」一文裏對於時下教科書選擇經書之不得當曾加指責，我以爲是對的。據我所了解，胡先生所反對的並不是讀經，他所反對的是漫無抉擇的令中小學生讀經。我完全贊成胡先生的見解。不過我願提出這一問題的另一面，那就是，我們不妨把經書當做「古典」來看，假如一個國民對於本國「古典」毫無理解，那也不是好現象，所以我們儘可一面抨擊現下讀經方式之不得當，而在另一方面也不可不強調聲明讀經的重要性。我們現在需要注意的不是讀經或不讀經，而是讀什麼經，並怎麼讀。我覺得傳統的思想不見得全是壞的，裏面固然有陳腐荒謬的，但也有很大部分是健全的思想，或有價值的經驗的結晶。假如我們承認文化是聯貫的，文化是不能全部推翻而由外國的文化來代替的，那麼，作爲「古典」的經書應該令

每個國民都有相當的認識。以我個人來說，我在中小學沒有好好的讀過經，我對經書的知識都是什成年以後隨時拾檢起來的。我的職業使我一直沒有拋開書本，所以我還能陸續的彌補我的智識上的缺陷。大多數人未必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主張在中學裏，經書的精華不妨大量的選進教科書裏去。至於應該選多少，選什麼，這是專家的事。我的門外漢固不敢發言，八股出身的老學究也沒有資格置喙。

第四，讀經與國文程度的高下沒有多大關係。有些人說現在的學生國文程度低下，於是歸罪於不讀經。其實程度低下是否事實，尙需待攷；卽令是低下，和不讀經也沒有關係。我知道有許多讀過經的人，能做濫調的八股，能諷肉麻的歪詩，但是讓他寫一篇簡單清楚的記事文却寫不好。現在年青一輩的人，頗有能運用文字從事創作的，不僅是通順，而且是好。可見讀『人，手，足，刀，尺……』

再談黨禁問題

在陝變以前，人民陣綫很堅決的反對「制禮作樂」式的憲法草案。近來，在野黨却熱烈討論憲法及制憲的國民

而沒讀過經的人也能寫好的國文。以提高學生國文程度而主張讀經，是錯誤的。

第五，如以經書爲與三民主義不相容而反對讀經，也是錯誤的。提倡讀經的人往往以爲天下思想應統於一，如有不同於一的思想便是離經叛道。歷代帝王之所以尊經崇孔，其心事也不過如此，意欲箝制人民自由思想而已。假如以爲經書與三民主義不相容（是否完全真不相容尙是疑問）便從而反對讀經，那豈不是把三民主義也當做經？其心胸之狹隘，與盲目提倡讀經者又有何異？我是反對盲目提倡讀經的，但是我是在自由主義的立場，我不是要擁立一個新經來打倒一個舊經。

總結一句：我是把「經」當做「古典」看待，我們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令國民對這「古典」有適當的理解。

六月九日

陶希聖

大會問題。最重要的討論，是國民黨以外的黨，怎樣遣派代表出席於國民大會這一點。在野黨主張凡是有一年以上

的歷史的黨派，都可以派代表出席。代表的數目按各黨的人數和影響來比例計算。代表的產生由各黨自己選舉，不由政府指派。各黨代表總數不超過全會代表總數七分之一。中央的意見是怎樣，還不甚明悉。由以往中央領袖的言論推測，中央對於各黨分子是不容納，但只是由中央指派。人數人選當然全由中央決定了。

國民黨外的黨能不能自舉代表而以某某黨的代表資格出席，這是很重大的問題。問題的重大，不在乎人數和人選。問題的重大，是在於這個制度，國民黨外的各黨就合法化了。換句話說，倘如他們能正式派遣代表出席國民大會，那就是十年來不開的黨禁大開了。

回想到國民黨五屆中央三中全會的議案，尤其是根絕赤禍案，裏面只決定中央以外的政府軍隊的取消，沒有決定是不是要開黨禁。却原來，黨禁之開不開，不在乎具體規定，而在乎國民大會選舉和召集時，是不是許別黨競選，即分不許他們競選，如果讓他們正式派遣代表，就是開放黨禁了。

在第一次國民大會，似乎國民黨以外的黨只能夠做到派遣代表出席的程度。但在野黨並不是沒有在選民裏競選的意思。在地方團體方面，他們主張陝甘邊區派代表九人

。在職業團體方面，他們主張加上學生團體代表。他們以為學生代表裏面，總有左翼分子當選的較多機會。不過這都不算是最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乘召開國民大會的時機，取得黨的合法地位。第一次國民大會以後，國民黨以外的黨就可以較為自由的發展。

當前的時事問題，在全國看來最要緊的自然抗敵。抗敵是沒有什麼爭執的問題，問題只在怎樣抗敵。政府以為抗敵必先統一全國的力量。在野黨以為統一全國的力量，必須先開黨禁，實行民主政治。各黨之間又注意之點各有不同。已經取得合法化的可能性的黨，已經討論到國民大會及憲法上各種實際問題。還沒有這種可能的黨，還沒有走到這種程度，還只有為了取得合法化的可能性而爭鬥。也有正在為了結黨而爭鬥的，自然更談不到國民大會和憲法等等了。

我以為國民大會各黨參加問題以至於憲法問題，值得學界熱烈討論。此後的國家組織將要變一個樣子。各黨相處的態度也要變一個樣子。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全在於大家的爭執與互讓到什麼程度。有時，這種爭執與互讓可以促成一個黨派的成敗興亡。在已成黨員固然應當留心，即在無黨派的人們也並不是小問題呵！

「蘇維埃共產主義」(書評)

陳之邁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sation? London, 1936, 2 vols.

費了一二百年才做到的事情。

英國著名的「費邊」社會主義者韋貝夫婦現在已登耄耋了。但他們好學不倦的精神使他們到蘇聯去實地考察該聯合國的情形，回國後寫成了這一千一百五十餘頁的報告書。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對於現在世界的重要是無須說明的；它的面積便佔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便有一萬六千萬。韋貝夫婦畢生研究社會問題，眼光的尖銳，論斷的精確，是找門所能深信不疑的。他們這兩本龐大的報告實在值得細讀。

所謂宗教的革命是消極的。蘇聯當局認為「科學所不能了解或證明的東西是不會存在及沒有存在可能的」(頁一三四)，所以它雖然不懲罰相信宗教的人，但絕對禁止公開宣傳宗教，而同時提倡反宗教的宣傳。「無宗教主義」是科學主義的極端(頁六九九)。

按他們的分析，蘇聯的革命是五重革命：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所謂技術的革命係指蘇聯現在的工業革命的過程，是把蘇聯從一個農業的社會過渡到一個開發天然資源，製造貨品的工業社會。蘇聯天大在宣傳它機械化的建設，但這種機械化是英美等國所早已司空見慣的：蘇聯在這方面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他們要在二三十年裏做到英美等國

男子的工作一律平等，即在女子生育時亦得給假七八星期，且有不收費用的醫院及育嬰院。但家庭的革命并未能完全做到，且有逐漸放鬆的趨勢：蘇聯的女子仍然沒有佔着社會上重要的地位；兒女現在仍然大部分由父母教養。政治的革命是最重要的，因為政治的革命是推動其他

四重革命的力量。蘇聯擯棄了議會民主主義；蘇聯將人民組成公民，生產者，消費者三種功能的組織；蘇聯的共產

組成公民，生產者，消費者三種功能的組織；蘇聯的共產

黨組織是許多別的國家所模倣的。韋貝夫婦費許多篇幅來描寫蘇聯的政治機構，但是蘇聯的政治機構是最柔性的：

「蘇聯的憲法是政治科學中所知道的最柔性的憲法」(頁四一九)。在他們草擬此書時，蘇聯便已有新憲法的醞釀，

現在則已成事實。但韋貝夫婦認為蘇聯政府中最主要的，

不是表面上的機關，而是共產黨——「蘇聯政府結構的棟

樑」。斯大林說：「在蘇聯裏，每一個重要的政治或組織

問題，均由共產黨爲之指示，蘇維埃或其他民衆組織是不

能擅自決定的。由是而觀，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其實是共

產黨的獨裁，因爲該黨事實上領導無產階級。」(頁三七

○)但是韋貝夫婦却認定蘇聯的政府不是獨裁，因爲一切

均由集議才能決定；他們對於斯大林及其他人慣用獨裁的

名辭這樣的解釋：「這些蘇聯領袖真愛獨裁這個名辭呵！」

(第六章)這真有些費解了；難道所謂獨裁是非得一個人

關着門決定一切才能名副其實嗎？主政者同別人商量商量

便不是獨裁了嗎？如果不是獨裁是什麼呢？韋貝夫婦所描

寫的，對於上級機關或上司無條件的服從，禁絕一切反對

或競爭的勢力，例如近數年對於所謂「以打倒共產主義恢

復資本主義爲主張的託洛斯基派」的黨獄，表現的是什麼

呢？

蘇聯最惹人注意的是經濟的革命，經濟革命是馬克

思主義的實行。這個革命有兩點：第一，是取消「榨取」

——一個人以工資來僱用另一個人來製造物品供第三人的

享用；第二，是取消「投機」——一個人買了物品來賣給

另一個人，從中牟利。從傳統經濟學看來這是最根本的革

命；它取消了人類幾千年來滿足其物質享受的方法；它廢

棄了以物價爲生產的指導的機構。

韋貝夫婦這兩冊巨書精細地刻畫所謂「蘇維埃共產主

義」的輪廓及內容。他們的觀察及研究對象，不是馬克思

，列寧，斯大林或其他人的理論學說及主義，而是他們旅

居蘇聯時所目睹耳聞的實際事實。「蘇維埃共產主義」的

內容，可以歸納爲三點。第一，「蘇維埃共產主義」不是

一切生產分配及交換方法收歸國有的制度，因此也不是每

個人均爲國家的僱傭的制度。交通及重工業是國家直接管

理的；但此外有都市政府管理的事業，有消費者的組織管

理的事業；而最重要的是生產者的組織所管理的事業，最

著的便是那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多個集體農場(國家直接經

營的農場只有二萬餘)。現在有無數人自己有生產工具自

己工作。「在蘇聯裏，不是只有一個僱主，而是有成千成

萬的用人機關」(頁一〇二四)，它們也能以工資來僱人傭

工。雖然這是違反主義的，但爲事實所限也只得犧牲主義（頁一七五註）。

第二，「蘇維埃共產主義」並不是工業由工人管理的制度。在一九一八年間，這種制度曾試行過一年多，但是「從苦痛的經驗，當局發現僱主的剷除一定需要政府來統制生產事業」（頁六〇九）。「這樣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意大利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工人佔領工廠的主張，在蘇聯並沒有實現。蘇聯的工業現在不由生產者而由消費者管理」（頁六六二，六八八），而消費者又受政府的統制。

第三，「蘇維埃共產主義」不是收入平均的制度。斯大林認爲那些以「社會主義等於平等，等於將社會各分子的需要及生活程度平均起來」的人爲「左傾的蠢材」！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各有就其能力而工作的義務，各有就其工作質量而受報酬的權利」；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各人有就其能力而工作的義務，各就其需要之多寡而受報酬的權利」（頁七〇二）。

照這標準三大端看來，現在蘇聯所行着的，似乎是一

種新穎的社會結構，與從前的理論——贊成或反對者的理論——都不相侔。這個社會結構，既非通常所謂社會主義，如英國勞工黨或法國社會主義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亦非共產主義，如列寧或斯大林所謂的共產主義。斯大林正是一位美國人所謂「俄國革命熱情與美國實事求是精神的混合物」。一般人以爲蘇聯是一個以純粹理論學說爲基礎的國家，看了他們的理論竟爲之嚮往；其實它是最富有實際精神的，爲事實它犧牲理論，曲解理論，甚至於揭發相互矛盾的理論。有人說，「政治自古便是四分之三空話，四分之一事實。」這句話在蘇聯得到了證明。

但誠如韋貝夫婦所說，蘇聯的確在做着一個廣大的社會試驗，它的一切應是社會科學今後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他們本着一顆同情心會爲這個廣大試驗做了一部最透關的描寫。然而蘇聯的試驗是最顧慮事實的，最勇於犧牲理論的，最肯看風轉舵的。蘇聯領袖不爲理論所限正足表現他們是實際的政治家；他們之所以不能不以理論來遷就事實也正足說明在人類社會中原沒有一個能夠普遍應用的簡單公式。

編輯後記

適之

△張熙若先生剛從四川講學回來，他的第一篇文字就要拿我的政治理論來開刀！他是政治思想史的專門學者，他的鋼刀高高舉起，我如何敢喊一聲「刀下留人」！

△但是張先生這篇文章實在還不會搔着癢處。他引他的「智識的數量與政制的關係」的議論，和丁在君先生的一百五十萬專家論，都和我的議論絲毫無關。我說的只是那代議式的民主「政制」（注意！這裏說的是政制）並不需要很高的智識程度，是一種幼稚園政制，只要我們肯進去學，包管拿得到幼稚園畢業文憑。至於一個現代的「政府」（注意！這裏說的是政府）當然需要專門技術人才，當然需要領袖人才。這一點我從來不否認。換句話說，我說的是：做那英美式的代議政制下的選民阿斗，是不難學到的幼稚園程度。做那獨裁政制下的三五百萬的血脈債張的專政諸葛亮，是最難的事，是研究院的程度，現在沒有一個民族配做這事；將來大概也不會有一個民族配做這事！

△好在張先生還要「隨後再說」我們的幼稚經驗如何

能實行民主政治，我很耐心的等候他的「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道理」。我相信他的結論一定會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現在的文明國家之中，沒有舉行國勢普查的，恐怕只有我們這個古國了！我記得前幾年世界統計學會副會長威而各克斯 (W. F. Wilcox) 到中國來遊歷，在上海的中國統計學會招待席上，一班中國統計學者和他討論中國人口數目問題，他推算中國人口不過三萬五千萬，而中國當時的調查是四萬五千萬。究竟那一個數字對呢？誰也沒有真的可靠的統計來解答。人口如此，其他必須依據人口為基礎的死亡率，人口增加率，文盲百分比，等等，當然都沒有確實數字了。現在政府決定試行「國勢普查」了，如果準備不充分，人員訓練不完備，普查的結果還是靠不住的。我們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調查所的劉南溟先生寄給我們的一論準備中之國勢普查，我們希望這篇討論可以引起大家對於這件大工作的注意。

△梁實秋先生是不用介紹的。我們歡迎他第一次為獨立作文，並且誠懇的希望這一篇「關於讀經」不過是許多

文章的第一篇。

△陶希聖先生在獨立第二三三號有過一篇「論開放黨禁」，這一次他繼續討論那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我們特別感謝陳之邁先生給我們寫這篇介紹英國社會科學泰斗韋貝夫婦的一千一百多頁的大著「蘇維埃共產

主義」的書評。這幾天蘇俄國內清黨清軍的驚人消息又佔

據了世界報紙的首頁地位，又使我們心裏不能不重新估計這個新國家的鉅大試驗究竟有多大的穩固性。在這個時候，一部有權威的批評更是值得大家看看的。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冊四元
平裝二冊二元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胡適之的書

- 胡適文存.....定價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 胡適文存二集.....定價 精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四角
- 胡適文存三集.....定價 精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六角
- 胡適文選.....定價一元一角
-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定價一元三角二分
- 四十自述.....定價七角
-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定價七角五分
-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定價三角
-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定價三角
- 嘗試集(新詩).....定價四角五分
- 藏暉室劄記.....印 刷 中

上海馬路 亞東圖書發行

-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白話文學史(上卷).....定價一元二角
- 章實齋先生年譜.....定價七角
- 淮南王書.....定價四角
- 戴東原哲學.....定價 學生本一元二角 精裝本一元四角
- 詞選.....定價 學生本一元六角 精裝本一元八角
- 胡適論學近著.....定價 精裝四元 平裝二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學雜誌

朱光潛 編主

特價辦法

▼ 每月一册 定價二角
 ▼ 零册特價 一角六分
 ▼ 預定全年 定價二元
 ▼ 特價一元九角二分
 ▼ 特價期 五月一日起 八月卅一日止

國內日本 郵費在內
 香港澳門 郵會各國 郵費外加

創刊紀念 特價預定

本館在二八兩所刊行的小說月報，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歷史，向來被認為專載文藝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後，又成為傳播文藝作品的有力的機關，自一八停刊到現在五年多時間內，屢得愛好文藝的讀者，來信要求我們復刊。本館為適應讀者需要計，遂決意來編印一種文藝刊物，定名「文學雜誌」，不再襲用小說月報的舊名。

文學雜誌的內容包含着詩、小說、戲劇、散文各體的創作，以及論文書評。論文不僅限於文學，有時也涉及文化思想問題。主編者是文藝界極負時譽的朱光潛先生，特約撰稿的，也都是文壇上成名的作家，無須我們再來一一介紹。

本雜誌每月發行一册，全年十二册，已出創刊號及第二期。創刊之始，特價徵求預定，至八月底截止。

創刊號目錄

我對於本刊的希望 論新詩	詩 月亮的歌 新作二章 近作四章	小說 賣生 「火車」 拋鏢 大國之風	戲劇 一個未登記的同志(獨幕) 梅真同他們(第一幕)	短篇散文 談筆記 談交友 陰 隨筆	評書 賽金花劇本的寫真性 望舒詩稿 活的中國	編輯後記
朱光潛 葉公超	胡適 戴望舒 卞之琳	沈從文 老舍 楊振聲 西澗 西澗	李健吾 林徽音	鍾鍾書 楊季康 程名 程名	周煦良 孟實 常風	

第二期目錄

談俳文 莎士比亞是詩人還是戲劇家 語言的化裝 宋代殘存的詩話	詩 詩三首 雜樣的五拍詩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二首	小說 黃心大師 破車上 大小阮	戲劇 梅真同他們(第二)	散文 老人 房東太太 落葉	評書 讀里門拾記 北平情歌 牛津現代詩選 出近小說四種	編輯後記
知堂 梁實秋 于了一 郭紹虞	廢名 陸志章 梁宗岱	施蛰存 蕭乾 沈從文	林徽音	何其芳 朱佩弦 程名	劉西渭 周煦良 公越 常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我爲甚麼相信民治

張熙若

我們要怎樣開始憲政

張佛泉

冀省合作事業之調整

鄭林莊

談提高行政效率

李樸生

妙峯山雜感

溥鳴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濟南	青島	煙台	威海衛	安東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長沙	衡陽
天津華北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濟南華北書局	青島華北書局	煙台華北書局	威海衛華北書局	安東華北書局	蘇州華北書局	杭州華北書局	福州華北書局	廈門華北書局	長沙華北書局	衡陽華北書局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北平分館

獨立評論

第二四〇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廿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我爲甚麼相信民治

張熙若

我在上期獨立裏「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

一文裏指出胡適之先生「民主政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那種奇特的見解的「不可通的地方。在那篇文章裏，我指出胡先生那種議論在邏輯及事實兩方都不可通。但那還只是拿胡先生自己的話去駁胡先生，只能認爲是消極的證明民主政治並非幼稚的政治制度。本篇第一意旨乃是要拿普通一般贊成民治的人的理由，連我自己的包括在內，去證明民治並非幼稚的政治制度，去證明民治，在原則上及大體上，乃是人類的聰明，至現時止，所發明的最高明的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所以不是幼稚的而是最高等的政治制度的理由甚多，舉其要者言之，約有以下數端。

第一，民主政治的最要精神便是在它是以所謂「被治者的同意」（爲方便計，借用政治學中一句熟語，希望胡先生能原諒）作一切政治設施或活動的根據。十八世紀中國革命時最足以代表那個革命的口號是「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出代議士」就是被治者表示「同意」的一種方

法。法國革命也可以說是爲反對「朕即國家」一類的專制精神的。反對「朕即國家」就是反對抹殺人民，就是反對蔑視「被治者的同意」。這都是近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幾件公認的事實，用不着多說。

但是「同意」的反面就是「不同意」。民主政治的真精神，在消極方面，就是治者能夠允許被治者不同意，就是政府能夠接受人民異于自己的主張的主張。假如人民對於政府不同意，而政府又不能允許人民不同意，結果政府自然將用武力強迫人民，使他們不能不服從，不敢不服從。拿武力壓迫出來的服從是所謂「以力服人」。拿「同意」作根據的服從是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的服從，是「以理服人」。自古以來，只有民治是適用「以理服人」的原則的政治制度。其它一切政治制度，尤其是獨裁，各種形式的獨裁，都是「以力服人」的政治制度。亞里士多德說，統治和其它許多東西一樣也有高等下等的區別；統治奴隸是下等的統治；也就是這個道理。

做人的困難就是他有講道理的義務。我們不講道理則

已，若講道理，就不能不承認「理」比「力」在道德價值上是高一等的東西。既然如此，那「以理服人」和「以力服人」的兩種政治制度，那一種是「幼稚」，那一種是「高等」，還有爭辯的餘地嗎？這是我贊成民治的最豐理由。若是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其它任何理由就都更難成立，也就都沒有成立的必要了。

第二，民主政治雖然在原則上是比其它任何政制都高明的一種政治制度，但是在事實上它須在兩種條件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一)一般人民須要有相當的智識，須要有了解普通政治問題的能力。有了這種智識和能力，才有贊成這個政策或反對那個人選的資格，才能認清宣傳的真假，才能不為另有作用的政客們所欺騙。這本是民主政治最難的一點。民主政治，在現在或將來，若要真正成功，必須克服這一點。這不但是反對民治的人所樂于指出的一點，就是贊成民治的人也應該時時讓大家注意這一點。羅素，韋爾士，拉斯克，杜威，黎蒲滿幾位英美贊成民治的理論家，也都認為這是現在或將來民主政治成敗的最大關鍵。承認這一點，並不見得就須反對民治；反之，要提倡民治，便非首先承認並且努力克服這一點不可。(二)一般人對於政治不但要有相當的智識，並且還須有極大的興趣

與關心。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沒有智識，完全不懂，固然不行；有了智識而無興趣，不願管它，不屑管它，也是不行。因為在你不願管不屑管的當兒，別人就會假借你的意思替你管了。常常替你管的結果，民治就變成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要使人民對於政治有相當的智識比較的還容易，要使他們有長久的興趣却就更難了。然而民治要真正成功，又非人民對於政治既有智識且有興趣不可。

可是政治的智識與興趣都是教育的結果，都不是本能的表現，都不是幼稚的反應。所以我以為民主政治並不是一種幼稚的容易的政治制度，而是需要相當高的政治訓練才有實現的可能。

胡適之先生當然不以這話為然。他曾有下列一段議論：

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 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

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獨立了。

第一三三期及第二三六期）

胡先生這段議論雖然可以說相當的代表英美今日的事實，但是我們須知這些事實正是英美今日的民治不高明的地方，這些事實正是提倡民治的羅素及韋爾士等人所最擔憂的地方。胡先生是遇事容易犯樂觀病的，是往往以現實爲理想的。假如讓「不配干預政治」的人「逢時逢節」對於國家大事去糊裏糊塗的「畫畫諾」或「畫畫否」就算是民治，就算是合理的或可能的民治，那麼，這種民治，提倡不提倡，就都無關緊要了。因爲這種政治並非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種「民棍政治」(demagogism)，這些「不配干預政治」的人只是政客們的利用品罷了。我們只應提倡民主政治，絕不應提倡民棍政治。民棍政治或者是民主政治發展史上一種很難避免的現象，但這至多只是一個階段而非終極，是不值得稱讚的。

第三，現代的民主政治離不開代議制度，但是代議制度若要運用得宜，使它真能達到代表民意的目的，却就極端的不容易。在原則上，盧梭在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反對代議政治的理由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假使盧梭有十九世紀以來實行代議政治的經驗，他反對的理由自然就更更多

代議制度有以下數種主要困難。(一)在事實上一個選民不容易選他理想上所要選的人，他只能在各黨推出來的候選人中挑選他反對較少的一個人或一羣人。(二)他的判斷須靠事實做根據，但是政黨所供給他的事實多半是有作用，不可靠。(三)代表一經選出，在事實及理論上，並不能，且不必，代表他。這幾種困難都是不容易解決的，至少並非幼稚的簡陋方法所可解決的。

如此，在政治原理方面，在實現條件方面，在實際運用方面，我都認爲民主政治並非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反之，它實在是一種極高明極高等的政治制度。

這裏立刻有一問題發生，就是：民主政治既然是一種高等的政治制度而我們的政治經驗又極簡陋，如何能實行它呢？我的答案極其簡單，就是：民主政治既然是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程度再低，也應該去學它。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最要理由就是因爲它是一種值得學的東西。別的政治制度，就是容易學，若不值得，也不必學。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不應忽略過去。其次，現在因爲各種工具發達的原故，社會進化甚速，我們增進人民智識的效率也就甚

大，從前數百年作不到的事情，現在十數年或數年便可作到，所以就是在「學會的可能」方面講，只要我們肯真心努力去學，並不是沒有把握的。

民治在原則方面既是應學，在實際方面又屬能學，那我們又何苦不學呢？何況在其它許多事實方面，例如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國民人格及減少革命發生等，又有幾種更應學的重要道理呢？

我們要怎樣開始憲政

張佛泉

日前曾爲文論及「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或說「我們究竟能行甚麼樣的憲政」。我們以爲今日中國的憲政應從受過新式教育訓練（自然不完全限於受學校教育）的人做起，若這樣，憲政是隨時隨地可以起始的。我們不將憲政看成一個高不可及的空洞死板的目標，我們把牠看成一個生活過程，以爲今日中國所最需要的爲民治氣質的養成，有一分民治的力量，便行一分的民治，有二分民治的力量，便行二分的民治。現在依着這個論題，再略加以開展。

從我們的觀點，我們可以見到許多人的憲政理想是錯

獨立評論 第二四〇號 我們要怎樣開始憲政

假如真要學，那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通。這條路就是先由低度的民治做起，逐漸擴充範圍，提高程度，以期在不遠的將來可以進步到高度的民治。我們一方不應因爲民治可以由低度做起，便誤認它爲幼稚的政治制度；同時另一方面也不應因爲它是很高明的政治制度，又不先由低度做起。「登高必自卑」，這是一種不易之理。

誤的。譬如「訓政」論便是講不通的。從地方自治，縣自治，其尤甚者鄉村自治，起始的憲政，也是錯誤的發端。從我們這觀點又可以見到時人的意見中有兩種極端的主張，都是由於捉不着問題的核心，所以也不能成爲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兩個極端是甚麼呢？一是「集中人才」，一是「普選」。

有人以爲欲打破現在這種既非訓政，又非專政，又非民治的畸形政治局面，最要緊的便是集中人才。我們對於這個意念要加以推敲。

所謂集中人才，當非專指技術人才而言。如係指技術

人才而言，則我敢謂祇技術人才決不能衝破目前政治現狀。政府裏面如果增加許多專家，也許實際政治會有若干改善，但這仍未能為這種政府奠定一個民治的基礎。張熙若先生關於此點有一個很正確的觀察，他說：「關於智識條件，有一點值得有些人注意，那就是智識的數量與政制的關係。一個政府所需要的知識的數量是完全看那個政府所要辦的事業的範圍大小而定，與那個政府的體制是無絲毫關係的。」『譬如你要修一條鐵路，開一個工廠，設一個醫院，辦一個學校，假設其它條件相同，不管你的政制是那一種，你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都是一樣的。』政制與技術人才如有聯帶的關係，也祇是這樣的：祇有在優良政治制度下，技術人才方得登用，而技術人才却不易改造政制。

原來所謂集中人才，乃是指集中各界領袖，各黨各派的首領而言。這似乎很實際。但這最多能敷衍一時。這與我們所說的憲政相去仍遠得很。各界領袖不即是各界，各黨各派亦多半祇見黨魁不見黨員。譬如開一個國難會議，一個廬山談話或訓話，或許小有補於當前政局，但這仍以少數可指認的人為中心，這決不是為政治打一個新的制度基礎。解決今日困難的方法，不在容納各黨各派，不在容

納各派意見。凡是不能拋開這個方式的，都是在走着錯誤的路徑。政府裏面沒有若干地方可以容納各黨各派，「分贓」式的政治絕不是我們的理想。各派的意見也根本不能調和，調和亦無用。我們今後要拋開「人治或法治」的方程式，我們要為政治謀一個制度的基礎。我們要從國民（自然是一部分國民，但不是可指認的三數百人）當中演化出一個共同意志。黨派的存在可以輔助這演化過程，但根本不能調和的私見却沒有參考的必要。

現在集中人才，容納各黨各派的呼聲高極了。政府似乎也正努力應合這種要求。但由我們所理解的憲政觀點而論，這些都不必含有重要意義。我們今日的需要是「遂行」一種可行的憲政。

另一極端便是普選。這是一部分人所要求的，也是憲草裏面所規定的。這最不切實際。普選決不是民治的甄驗。在中國尤有其不能行的特殊理由。第一，不行普選，一般民衆不爭，不知爭。第二，普選在事實上不能採用。吃觀音土與草抄樹皮過活的，沒有投票的興趣。還有選舉人無論如何亦須認識票上候選人的名字。有時也需要會寫自己的名字。這在今日中國都成問題。大多數人不識字，不會寫自己的名字，還有許多成人除了有姓及兄弟間降生先

後的排行而外，譬如姓趙行大就叫趙大，一生再沒有正式名字。這光景在婦女爲尤甚。婦女大多數祇有兩姓，譬如稱趙錢氏，普通更無名。無名一事固然不是不能享權利與盡義務的理由，但是增加政府與制法的程序，總也要有相當的條件。欲想參加政府，總須有能力將一時的需要相當具體地表現出來，也須明白甚麼是可能的，甚麼是不可能的。原始的生物的需要是政府第一件須顧及的事，但人如祇有此需要，離着能担当政治責任則還遠得很。現在我們大多數同胞的生存權都已受到了威脅。這正是政治所要解決的問題。但他們却未能幫忙解決現有的政治。第三，今日行普選，不但無益而又害之。劫持，愚弄，舞弊，黨棍與土劣將大肆淫威。

普選在先進國的歷史也很短暫。在憲政發源地的英國，自一八六七年的第二改造法案通過後，方可稱有男人普選權。婦女（人知的另一半）的選舉權之獲得乃歐戰後的事。並且有的國家，勉強行普選制，不知生了多少弊端。我甚至可以說，有幾種選舉方法，都是由於普選行之過早才逼出來的。譬如複數選舉（這制度自然也頗有牠的好處）即爲的來均衡無知識分子所投的票數，不使無知支配一切。強迫選舉是以法律力量強制國民對政治發生興趣。至於

間接選舉更因人民無政治能力，方舉出中人來代辦選舉。這幾種選舉方法，不是行之極難，即是弊端叢生，這都是普選行之過早的原故。

× × × ×

我們以爲中國到今日所以還未能起始憲政的原因，有若干是由於當局沒有懇摯的誠意，主要的則是因爲對憲政沒有正確的理解。因之，在當局使不知有適當措置，在國民亦提不出具體可行的要求。我們不知究竟應行甚麼樣的憲政，更不知怎樣起始這應行可行的憲政。

我們在這裏的擬議是平易簡單的。我們以爲憲政應從城市中受過新式教育訓練的人起始。譬如我們不侈言普選，不談再製造一個憲法，不企圖這些無謂的事，却即刻從脚下目前做起。比如我們容許所有受過初中教育以上（或受過高等小學或高級小學教育而超過二十歲以上）的人，識字的一家之長，有一間門面以上的舖東與舖長等類的人能選他們自己的市長。並且使這件選舉同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直接關係。他們如果選得一個好市長，便可以少納車捐，少納房捐，同時却還可以有好路走，有好電車同公共汽車坐，有清潔的水，便宜的電用；如果選得一個壞市長，則一切適得其反；若這樣，我們敢斷定，凡有政治能力

的都肯出來盡這政治上的義務的。這樣可以將市政放在一個最小的基礎之上，可以把牠放在公共批評控制之下。使牠能有個健全的市政機構，使牠一切可以公開。這種制度在最初行起來，也許要發生若干弊病，但無論如何總比現在各大城市任免官吏的方法還要合理得多。現在的方法根本不是制度。牠是分贓分肥。我們都過着被擄奪的生活。

一切無責任可言。

各市可先行民選主要官員，各省則無寧可緩辦省長與省議會民選。中央方面則可由市代表及省代表組織議會。但各省代表人數應極少，譬如祇要五人至十人；這樣方可以避免士劣爭奪，方可以明顯責任，方可以組成能議事的議會。

我們這裏以比較有知識的分子爲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動者，乃是最實際不過的。我常常感到近年來，社會上太輕易忘記了知識分子在我國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黨之勝利，冀察分裂運動之反對，其發動其推動都是由受過新式教育訓練的分子來做的。我看得很清楚，憲政的開始，除了仍由知識分子發動外，別無他途。

由基礎較狹的憲政再推至基礎較廣的憲政，這是我們

的辦法。凡改革必由少數起，再推至多數。這由少而多的推進過程，無論如何是不能避免的，除了奇蹟而外，世間沒有一法可以在一剎那間使多數人都換了新觀念，養成新習慣。有的拋棄了佔在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到鄉下去從改造老百姓做起，美其名曰自下而上，因之亦以爲是最澈底的改革，可謂不通已極。

我們這樣看重知識分子，有人却不以爲然。他們可以指近來北平教育界的現象給我們看。西安叛變時，竟有人響應張學良，爲開一個五四紀念會還要尋毆。知識分子的行動又豈容樂觀？我對此有回答。知識分子確有許多缺欠。誠如君衡教授所言，知識分子正須受民治生活的訓練。真正的團體生活，我們都不曉得，都未經過。不過年來學生界左右派的鬥爭，却無寧可以說是近年來政治病末期必有的象徵。我們試想，二十年來，學生對於政治有多們重要的貢獻！而每次在左右政局時，除了暴民式的動作，又有何方法？現在學生人數更多了，國難越發加重了，他們是更關切政治問題了。而同時，感覺靈敏的又以爲遊行示威是無濟於事的。但是又有甚麼合法的路徑可尋呢？他們於是組織起比較有永久性的秘密團體，凡興趣濃厚的祇有加入這種組織；又因意見不同，所以有派別之分。這些派

別既成，爭鬥便成了牠們唯一的目標，他們差不多成了爲對立而對立，不過在一起則已，如遇在一起便祇有相打。至於那些不願以分裂方式去進行救國工作，不願爲求分裂而挨罵挨打，更不願爲這事罵人打人的呢？他們祇有失望地退到一旁過那煩悶的生活，於是場上剩下的祇有那些以打罵爲職志的人了。這樣，似乎北平教育界祇剩下了對罵對打的人。但這不是必須令人悲觀的嗎？我覺得這是一種病的末期，如我們下對了藥，轉機即在目前。這樣的鬥爭，告訴我們一件重要的事，即，學生的政治力量必須合法化，暴民式破壞式的行動已不足適應今日的環境！他們的政治力量已蓄得很可觀了，現在必須容牠以正當方法發揮

冀省合作事業之調整

鄭林莊

五月十九日，北平各報本市新聞欄會登載一段關於冀察兩省合作事業的統一調整的消息，說冀察政委會隸下的華北農村合作委員會（以後簡稱合委會）於月之十七日召集冀察兩省各合作事業促進機關舉行聯席會，當場通過「統一指導合作辦法大綱」十條及「調整統一指導冀察兩省合作事業辦法」十二條。

出來。我們即刻可以將開始憲政的責任放在他們肩上一這様，如果使每個正當知識分子的力量都得到發揮時，就可以見到那走左右極端的人是怎樣少而無力了。

要之，我這裏的建議，是我參照事實，經過相當時期的思考摸索才得來的。雖然能推翻幾家很重要的憲政理論，但並非立異逆情之說。牠是平易而切實際的。陳之邁，胡適之，君衡（他雖然有文論及「施行憲政之「準備」」，但主要的乃在指出「憲政的「條件」」的重要。他決不是主張訓政論的。）及張熙若諸先生均大體以此說爲然。我們今後須努力推動我們的建議。

國內合作運動之需要確立一個通盤計劃，凡是讀過本刊二三五期所載吳承禧先生「請政府確立一個通盤計劃的合作綱領」一文的，大概不會不承認。尤其是河北省的合作事業因爲它的歷史最長，演至今日，其中已隱伏了許多不可避免的磨擦和矛盾，更有加以調整統一的必要。如今冀察當局能首先出來創導，我們敢信這種舉動必予一般熱

心於合作運動的人士很大一個安慰。

從當日報紙所發表的消息，我們祇在原則上知道：兩省合作事業的調整辦法，約略如下：（一）今後兩省各合作機關的工作須依據合委會的工作計劃進行；（二）各合作機關如對合作社予以資金上的協助，應由合委會指定投資區域；（三）合委會須與各合作機關保持技術上（合作的和與合作有關的）的聯絡。至其詳細內容——如合委會的工作計劃的內容如何，投資區域之如何劃分，技術上的聯絡之如何實現等，和具體辦法，至今還不見有消息傳出，因此我們爲助成當局此種可喜的意圖，願意就管見所及提出一點意見，以供負責者的參考和對照。

從實際情形看，冀察兩省的合作事業，不論在程度上和內容上，都相差甚遠。察哈爾的合作運動，嚴格點說，祇從政整會設立華北農付合作委員會來負責戰區的救濟工作那個時候纔起始。它的歷史很淺，它的工作很單純，它的問題當不及河北省那般錯綜複雜。所以這次調整計劃的對象實以河北一省爲主，察哈爾之被包括在計劃之中，當然是因爲行政上的便利。因此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祇從河北省一方面來看。

現在河北省在合作事業上之需要調整統一的共有四項

：一是指導機關的調整，二是投資機關的調整，三是合作組織的調整，四是合作運動表現其社會功能的事務的調整。這四種調整工作中，前兩項已爲當局所注意，可由我們所得的消息見及，後兩項却未見提及。現在我們且按項逐一加以討論。

× × × × ×

河北境內的合作指導機關，到現在最主要的有四個：

（一）華洋義賑會，（二）河北省棉產改進所，（三）平教會定縣實驗區，（四）合委會本身。這四個機關都各有其獨自的歷史。華洋義賑會是本省也是全國從事於農村合作之推動最早的社會團體。棉產改進所是省內推行棉花運銷合作具有成績的半官方的組織。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合作實施，即限於定縣一地，它的工作也祇是那所謂縣單位的實驗的一部分。雖然它的範圍很小，但由於力量較能集中，且有其他有關的工作來輔助，也是省內很重要的一股指導合作的力量。至於合委會的歷史即比其餘三個機關全晚。創立之初，其事業範圍祇限於戰區以內。及後冀東成立偽組織，該會的工作受到迫害，纔從戰區退出而轉向冀南發展。

河北省的合作事業，由於有這四個機關的熱心指導，

表面上頗呈蓬蓬勃勃的氣象，可是亦正由於此，其內部亦發生了許多磨擦和矛盾。最明顯的就是各機關間的明爭暗鬥。這種爭鬥而且還往往傳達下面去，使得各機關所指導的社與社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都互相猜忌，而甚至演成正面的衝突。這種合作運動者的不合作現象，無庸諱說，確是合作前途一個很大的暗礁。這個礁石一日不去，合作的將來不容一日樂觀。故此指導機關的調整也可說是本省合作事業調整的最基本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當局的辦法是把各機關的工作盡納入於合委會所定的工作計劃裏去，而同時合委會即表示可以接納各機關技術上的幫助。如此看來，所謂調整者實際上就是一種統制。合委會的工作計劃的內容如何，我們無從知道，也許是盡善盡美的。不過從發表的消息上看來，我們却得到一種印象，就是這個工作計劃是合委會自己預定的，其他機關不見有意見參加。合委會在草擬計劃的時候，也許已經參照了實際的情形，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敢確信它能適用於各方。因為現在省內各個指導機關之間本極隔閡，每一機關的內情恐非另一機關所能完全明了的。如今強其納入另一格律之中，徒然增強彼此間的磨擦而已。

而且就原則上說，合作的指導功能是不宜於放置在政府機關的身上的。這一點已為中外合作專家所共認，無庸費詞解釋。然而現在我們並不出此，却背道而馳，把指導的功能集中於官廳的合委會上。也許有人以為原則有時應該遷就事實，如此我們且就事實來看。河北省內的幾個合作指導機關，除合委會外，是多多少少帶點試驗的性質的。試驗雖非一定必需，但相當的試驗確可以給事業帶來新的意見，新的力量。何況國內的合作運動至今尚未完全脫離試驗時期，如今省內的合作指導既受如此的統制，那麼各機關是否還能保留它的獨特的試驗，實是我們最關心的一點。

所以在調整省內合作指導機關上，我們所希望的不是一個名義上甚或形式上的調整，而是一種真正能使現存各機關一致携手共同努力的調整。為實現這種調整，最好能組織一個超然的機關，把現有的指導機關全包容在內，全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而不要提高一個機關於特殊地位之上以納其餘於下，徒然加深彼此間的磨擦。因為祇有在平等的地位上，各機關的獨特的優點始能化為全體的優點，祇有在聚合的基礎上，各機關的功效始能合為等量的總功效，甚或由於有了更合理的分配——如任務的分配，範

團的分配，工作人員的分配，而發揮出更大的功效來！

× × × × ×

對於金融機關的調整，我們也頗懷疑現提的那種投資區域的劃分果能消弭省內合作運動中金融方面的種種糾紛。這種糾紛的嚴厲程度並不下於指導方面。且因現在金融界都在爭鬥着以農村投資為資金的主要出路，利慾所使，恐其解決更會比指導方面愈為困難。

從大體上說，現時在河北省合作事業上投資較多的有中國，金城，和河北省三行。這三個銀行當以河北省銀行參加本省合作運動最晚，但因為它是地方銀行，却有後來居上的趨勢。金融界肯以大量資金來促成合作運動，當然是種該當歡迎的事，但是不幸得很，由於金融界之缺少聯絡，不能合作，以致弄出許多衝突，且往往由於各行的過份熱心反會做出超越它們份內的事，反而防碍了合作運動的正常發展。這自然是很可惜的。

在這些矛盾之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投資地點的重複。不過這種現象祇是矛盾中的一個現象而已，它並不是造成矛盾的基本原因。它的基因却是在金融界仍然是合作社的直接貸款者的一點上。現在省內大多數的合作機關雖已做到不使金融界向每個合作社直接放款一層，但這絕不能

算做已經做到了間接放款的地步。因為現在的指導機關在替金融界放款的時候，仍然要聽從他們的意旨來決定放款的方針。金融界雖未明目張胆地左右合作放款（這是現階段我國合作運動中的最主要的一種功能），它確在假手指導機關來施行直接的干涉。有了這種基本的錯誤，自然會產生許多矛盾，而造成諸如我們已見到的區域的偏重，和一些尚未見到的放款途徑的偏重的結果。現在我們即使把牠們的投資區域給劃分了，就上述的情形來看，恐亦不能消弭這兩種偏重。因為在一個縮小的區域之內，金融界還可以假手於指導機關來選擇有利的地點和有利事業。如此，省內仍然有很多比較無利的地域不能嘗到合作運動的利息，很多無由立刻見利的事業不能應用合作的原則。這就是我們對於以投資區域的劃分為調整合作金融的辦法不表示熱心的原因。

然而怎樣纔能做到合作金融的徹底的調整呢？或者說，要做成這種徹底的調整應該從那裏下手呢？據我們看，最好先做到不使金融界干涉放款一點。要做到這一點，在合作的機構上勢非有一個健全的中心組織來接受省內金融界一切的合作投資不可，來通盤支配所有的放款，使之發揮最高的效能並助成合作運動最完滿的發展不可。在這種

機構尙付闕如的時候，上節所述的超然的指導機關未嘗不可暫代職權。如此金融界祇要把款項整額地放給這個機關即可。而且如此，金融界就可以免去零星放款上種種花銷，而且因爲是全額地放給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就要對這種資金負債付全責，在金融界亦可免去許多風險。金融界爲應付這種集中放款的辦法，亦可有一聯合的組織。這個組織，爲遷就本省的特殊情形，就叫做合作貸款銀行團亦未嘗不可。

× × × × ×

合作組織的調整也是調整本省合作運動很基本的一個問題。對此却未見當局有什麼意見提出。這方面的調整，首要的一件工作就是高級合作組織系統的設立。據別處的經驗來看，合作運動要實現它的更高的功能，必須依賴那些高級的組織。就本省的情形論，最發達的有信用合作和運銷合作，而這兩種合作就是最需要高級的組織來發揮它的最高效力的。信用合作如果沒有高級的聯合社來存放資金，它永遠是要仰承於外力的援助的。運銷合作如果沒有高級的聯合社統籌大量的運銷，它是永遠擺脫不了商人的籍制的。在河北省，別種合作或者不到可以設立高級組織的程度，但是它的信用合作的歷史最長，辦理亦比較有

成績，的確已有此種需要，它的運銷合作雖然歷史較短，它的技術却已相當有把握，故也有此種可能。我們乘此從旁促成之，當可不費多大力量。

而且這種高級的聯合亦可減低甚至消弭現在省內合作運動上許多無意義的紛爭。因爲合作組織假若能夠納於一個系統之內，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自然就不生歧視敵對。自然，要做到這一層，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要使現在那些指導機關把它的越份的職權歸還給合作的本身組織去。這種調整還可以連帶產生一個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結果來，那就是可以促使省內的合作運動變爲一個自主的運動。固然，對於這一點即使是吳承膺先生也認爲未嘗不可容許合作運動爲政府的政策，但是我們不論從那一方面看，自主的合作運動終歸是最美滿的。政策祇是過渡的，世間無一政府以執行政策爲其終世的職務。一個孩子養大就要放他去自謀生存，合作運動到了長足時期，何嘗不該放它出去自己掙扎呢？因爲祇有這樣，纔能免除社會的浪費，纔能使政府有精力去發展別的功業。

我們再退後一步來說，即爲促成指導和金融的調整，我們也有設立高級合作組織的必要。

× × × × ×

末後我們要談到合作社會功能的事務的調整。這種功能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初級合作教育的實施。這種工作在合作運動的推廣時期中尤為急需。在別處這種工作都是由合作組織的高級機關——尤其最高的總聯合社來擔負的。在國內，由於缺乏上層的組織，這種工作一向是由指導機關來兼理的，即在已有相當歷史的河北省也無例外。現在省內幾個指導機關沒有一個不在分別舉辦着各種「訓練班」，沒有一個不在用最大的精力準備各種教材。教育和宣傳本是合作運動很根本的一件工作，現在各指導機關能向此努力，原無可以非議之處。不過對於這種分別辦理的方法，我們却不能贊同。在合作運動中，教育與政策原是一體的兩端，教育的內容當然要和政策的內容相符。政策在決定了之後每是一件最專制的東西；在一個社會一個時期之中，祇容有一個政策存在——尤其是社會政策。祇有這樣，社會的動進纔能和諧合一。現在省內的合作運動，我們還看不出它有這樣一個政策。然而政策的產生未嘗不可藉重於教育的力量。因此教育的內容又應該是如何的和諧合一呢！然而可惜得很，河北省的合作教育並未做到這一點，因此分歧的教育祇有造成分歧的觀念，如此合作的政策將無日可以產出了。而且如今這種合作教育實施的說

賽狀況也絕不是種經濟的辦法。這些機關為實施合作教育所用去的費用和時間都很可觀，但其效果即絕未到應到的程度。有人說這是所用的教育方法不對。合作社社員幾乎全是教育程度很低的農民，教育他們最好是用示範的方法，現在強迫他們來聽講念書當然不能多收效果。這種看法自然很對。然而，請問為什麼現在這些指導機關不能採用示範的教育方法呢？其理由當然在於示範教材的用費要比這種書本教材高得多，不是一個機關能擔當得起來的。照這樣看起來，合作教育的統一又是如何重要呢！

現在河北省如指導機關所辦的合作教育還往往不止於初級教育，現在更有幾個機關在舉辦中級的合作教育，造就該機關所用的初級指導員。這種設施的浪費當較初級教育的為更大：這是一點。還有一點，就是用這種形式造就出來的幹部工作人員（初級合作人員實是今日國內合作運動的最底層的支柱）絕不會有遠大的眼光，對整個運動有全部的看法。假如我們能稍為明白此種人員對於社員的影響是怎樣的深的話，我們就可以明白這種辦法是會怎樣地阻碍運動本身健全發展了。

所以在合作組織系統尚未完成的時候，我們願意提議在省內另外由各指導機關合組一個專門負責合作教育的實

施的機關，這個機關應該和指導方面的那個最高機關彼此携手，來對省內的合作教育——初級的和中級的——統籌辦理。

× × × ×

談提高行政效率

李樸生

河北省是國內辦理合作事業歷史最久成績最好的省份，我們對它愛惜最深，期望亦最殷。是因為這種緣故，我們才不揣冒昧提出上面這些意見。

中國行政效率的低下，是自古已然，舉世皆知的事實

。提高行政效率的運動最初發動于汪院長，而月來蔣院長把行政效率研究會改爲行政效率促進會，又可見已經進展到一個更積極的階段。不過行政效率的提高，「求辦法，求方案」，固是一種艱鉅的工作（見本年六月六日大公报專電蔣院長談話），而據我的看法，最困難的問題還是有辦法有方案之後如何纔辦得通。這不是辦法和方案的本身問題，而是現實環境的阻礙。所以如果真要辦法和方案辦得通，必要有兩條基本的條件：

（一）當局的決心 決心是經過全盤研究，堅定不移，和一時的高興不同。提高行政效率是會惹起不少麻煩的，所以最初負責行政效率研究會的甘乃光先生曾說明他所以抓着文書和檔案的改革着力的原因是：

……論者謂此乃小問題，其實行政之改革當以改變機構，擴廣文官制度，改革預算制度爲先。此誠重要。會中亦何嘗無所研究，不過均提不出。縱能提出，亦未易生效，以其關係人事太多，很有發生政潮之可能。處前數年之環境，當局別有苦心，非一言可以盡了。（行政研究二卷五期，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現在的時局誠然比從前進步，然是否進步到一切重大改革可以不發生麻煩，我們不大清楚。假如發生麻煩，便需要當局的決心了。否則什麼辦法，什麼方案，只有擱起來，或則如發冷病菌，在負責人的心裏有種周期性的刺激，引起啾啾望治的人們注意。

（二）尊重法令 現在我國的法令本來夠完備，而厲行

法治的文告也不啻三令五申，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希望法令的實質表現不徒有其名，而厲行法治的提倡是要我們的高級長官以身作則，而不把自己本身及有密切關係的人員特殊化，超然于法令之外，而只以法令責人，責老百姓。否則某人某機關是特殊區域，便成了「大規模的走私」也無可如何。這種事實的存在，行政效率的提高是極受打擊的。所以我嘗說要提高行政效率，高級長官縱使事事未必能夠以法自繩，而社會注目的事件最低限度也要有曹孟德割髮代首的風度（行政效率拙著行政計畫的編造與考核）。不能恃勢任氣，公然表示不接受法律的制裁。現在一般對法律的意識只是用來「拍蒼蠅」，最大也不過對付異己，為一種理由化的工具。我們在機關辦事只要能夠盡力，邀好長官，成為長官的「私人」，取得特殊的身份，法律便無如我何。結果所謂「層層節制，級級負責」，變做層層不能節制，級級不必負責，行政效率從何說起？

此外，要提高行政效率，最重要是要鼓勵各機關人員對主管職務的研究，提出改善的方法。因為主管人員對於主管事項有多年的經驗，其中利弊得失必然詳知，比較局外研究或派往調查的人員所提出改善的方法會更絲絲入扣。甘乃光先生在內政部時曾鼓勵內政部人員這樣做過，成

績也不少。但只是局部的做，全部的汽機還沒有鼓動起來，所以現在各機關職員極少見對所主管職務有研究的報告，或有而不便發表。這原因是

- (一) 人是有惰性，可以不研究便不肯多費心思；
- (二) 長官，同僚，未必歡喜你去研究，東建議，西建議，弄出許多麻煩。這在我所謂「公務哲學」的範疇內是有極大危險性的。（見獨立評論拙著行政改革的困難）

然而在國家這是一種極大的損失。我不相信蘇聯的史太哈諾夫運動可使鷄鳴狗盜的人物做勞働英雄，而我們的公務員不少優秀份子，却只有「等因除舊歲，理合過新年」的碌碌因人，徒讓歲月催人老。我以為行政院應該詳定獎勵機關人員的研究辦法，如

- (一) 凡機關人員對於其本身所任職務（行政的或技術的）能提出改善的方法，得向本機關長官或逕向行政院報告。

- (二) 該項報告經行政院審核後，按其貢獻之大小（即使事屬微細，但新方法確是進步的方法，即不能因其微細而忽視。）給予獎金或獎章，或予破格升級，或升任為主管該事項的職位。（如科員升為科

長，科長升爲司長)

(三) 行政院審定該項報告，訓令該機關實行。

(四) 該項報告如有影響長官之不法利便者，由院保障其職位，不許藉詞撤換。

(五) 長官對於該項報告擱不實行者，以失職論罪。這樣一來，我想各機關人員的研究趣味也許增加不少，而從這樣升拔的人才，比較現行考績辦法是真實公平得多了。

還有若干專門的研究，行政機關應該和學術機關有更具體更密切的聯繫。行政機關對於所主管職務往往因爲「當局者迷」，或某種利害關係有「不見與薪」，「不爲長者折枝」的情弊，學術機關人員則以超然地位就事論事，雖有時或失諸空疏，而有時却極中肯，爲長官所不易得的直言諫論。若有具體的密切的聯繫，兩家都有益處。行政院去年暑假曾邀得若干教授分任行政的調查，是極好的辦法。現在有人提議：

各高級行政機關設立民選的審議機關，集合全國人才，討論各種專門問題。例如歐美各國教育部都設有一個審議機關，由文化機關選出若干代表爲委員，其職權在審議教育部交議的案件，或制定教育政

策規章交教育部執行(見六月六日天津益世報時論「怎樣集中人才」)。

我以為辦法雖不一定這個樣子，而用意很可重視。至少，我們現在把若干必要改善的問題，分邀各專家負責作具體的研究，而由行政效率促進會再簽注意見，以作實行的張本。至各專家在研究上所需要的便利，自應由政府負責。

末了，我以為提高行政效率的進行要有科學的計算，如人力物力之如何，不容緩慢，亦不能求治「太」急。太急往往容易陷于「亂」的毛病，今日一度命令，明日一個計畫，急如星火，有時又自相衝突，結果不是不求甚解，草率塞責，就是要成「撒豆成兵，剪紙爲馬」的把戲。現在好些忠實的地方行政官已感「百廢俱舉，一事無成」的苦悶。羅馬非一日的羅馬，只要我們有恆地不斷地積累下去，所謂「泰山之靄穿石」，何況是有計畫的工作！俄國五年計畫能夠提早成功，我們不知有過幾次五年計畫，爲什麼尚在計畫之中，跑不出計畫的圈子？英國人說得好：一個雀兒在手裏，勝于兩個雀兒在樹上。我們不要因貪急而流于空想，貪多而忘却實際。尤其處非常之際，人力物力之艱難，能節省愛惜得一分，即多增一分抗戰之力，更要不慌不忙，然後可以紮「硬」寨，打死仗。

妙峯山雜感

濤 鳴

我上一個月同幾位朋友遊妙峯山，從北平坐汽車到各莊，從這裏坐轎上山，在路上我同一個轎夫有下面一段的談話：

我 你這裏的地可以種什麼東西？

他 這裏可以種小米和老玉米。

我 你家裏有幾口人？

他 我家裏有五口，三個大人，兩個小孩。

我 你家裏有幾畝地？

他 一共有二十來畝。

我心裏算一算，這轎夫（其實就是農夫）家裏大小平均一個人分得四畝。據李景漢先生的調查，定縣人平均每人大約有田地四畝。據陳長衡先生的調查，統計中國全國的人，平均每人所得的耕地也是三畝多不到四畝。這個數目差不多是一個定數，可以表現中國人口和耕地已經到平衡的狀態了。

我 你地裏出的糧食夠不夠你們吃？

他 好的年頭剛剛夠吃，不好的年頭就不夠吃。

我 不好的年頭是不是因為缺水？

他 是因為缺水。

我 為什麼你們不開一口井？有了井就不怕旱。

他 我們那裏有錢開井？

我 并不是用錢開的，是用你們力氣開的。

他 沒有吃飽，怎麼會有力氣開井？就是有了力氣，還得有傢伙有材料才能開井。我們那裏有錢買這些？這裏實在是苦地方，求先生在城裏給我找一個事做。

我心裏想，這真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走到一座廟，轎夫把轎子放下來，我們就伸開腿來散步散步。他們有的喝茶，有的吃飯。我看見一個轎夫吃一種像烙餅的東西，不過裏面有一點菜餚。我問他一天吃幾頓飯，每頓吃多少。他說一天吃二三頓，每頓吃一二斤。這個數目也許不很可靠，我替他先折一個折扣再算一算，每天他至少要吃二斤半的乾糧，比平常人的食量要多一倍。這是因為他們多賣力氣的結果，倒也沒有什麼稀奇

。有一位朋友在旁邊說：他們吃的飯這麼簡單，從營養學方面說，一定不算好的，但是看上去他們的身體很強壯，並且吃苦耐勞的能力大得很，這真有一點奇怪。我說：你不要看錯了。他們耐勞的能力是訓練出來的，他們的體格並不見得健全。我相信假若他們吃的飯能和我們一樣的，他們的體格一定長得還要魁梧，膂力還要大。

在他們所吃的食物裏，有幾種營養要素一定不會豐富的，但是他們沒有營養不良的徵象，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因為他們飯吃的多，所以他們食物裏有幾種營養素的成分雖然低，他們所得的這些營養素的總量却不少。他們熱力的需要，因為賣力氣而增加，但是各種營養素（礦物質及維生素等等）的需要，並不一定隨熱力而增加。所以飯量大的人雖然吃的不好，還可以對付他的營養需要，因為量的有餘，可以補質的不足。但是飯量小的人吃那種飯，就會得營養不良的病。我在聶各莊看見許多女人和小孩子，他們體格矮小，形容憔悴。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看起來好像七八歲的小孩。那大概就是營養不良的表現。

我們一路上山，所看見的風景非常好，只嫌樹木太少。一路上每隔幾里就有一座廟，一直到所謂金頂妙峯山的山頂。這些廟就是迷信的人求福求財求子的地方，在平津

一帶很負有盛名。但是廟的規模很小，建築也不見得華麗莊嚴，簡直沒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只有在一座廟的當中供菩薩的地方，有一個萬壽牌，牌上有一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九字。看見的人都覺得有一點奇怪。這個牌子雖然是舊的，牌上的字還是新近貼金的！

聶各莊那個轎夫，在他的村裏，不算窮也不算富。但是一個人只攤了四畝地，喫的從這裏來，穿的也得從這裏來，人生一切物質的需要，直接間接都得從這裏來，除了每年一次廟會的時候，因為抬轎能掙了一點錢之外，很少別的收入。好的年頭，他也不過度那最低限度的生活，那裏還談得到教育？那裏還談得到衛生？

中國的鄉村居民佔全國人口大約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居民佔百分之十五。城市居民自己不種地，當然要靠着農民養活他們。但是農民之中，大部份是只能自給的，他們除了拏出一種小部份的農產和別人交換他們所必需的物品之外，並沒有數餘的糧食可以供給城市居民。這只能自給的農民，在國家經濟立場上，等於沒有存在。因為他們生活程度太低，忙了一天，僅得餬口，那裏有精神能力去幹別的事？他們在國家文化立場上，在政治立場上，也等于沒有存在。我看了那萬壽牌之後，真覺得他們同中華民國

國一點也沒有發生關係。

這有等於無的農民，好的年頭可以說天下興亡匹夫無責；壞的年頭，他們的生活根本發生問題，就要使社會受累。小的話要別人賑濟，大的話便流為盜賊，擾亂秩序。他們的存在，從國家立場看，實在是有害而無益的。但是

他們的數目恐怕要佔全國人口的大半，所以他們是人力的蘊藏，好像地下的礦產，現在雖然沒有用，開發起來就有大用。但是這人力的蘊藏何從開發呢？開礦要有資本，開發人力蘊藏也要有資本。沒有從農村以外來的資本，而想農村建設的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編輯後記

編者

△張熙若張佛泉兩先生的文章是繼續本刊前幾期討論憲政問題的。

△李樸生先生不但對行政學有研究，並有實際經驗，他有許多文字論行政效率問題。

△鄭林莊教授是農村經濟專家，他在本篇論冀省合作事業一文中，有很具體的建議。

△濤鳴先生是食物化學家，所以他永是關心「民食」。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册
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
號費

本刊最近十期的要目

<p>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p> <p>張印堂</p>	<p>第二二二〇號</p>	<p>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p> <p>陳之邁</p>	<p>第二二二一號</p>	<p>中日問題的現階段</p> <p>胡景超</p>	<p>第二二二二號</p>	<p>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p> <p>吳景超</p>	<p>第二二二三號</p>	<p>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p> <p>陳序經</p>	<p>第二二二四號</p>	<p>獨立的觀察與忠告</p> <p>曉湘</p>	<p>第二二二五號</p>	<p>從川災談到中國的統一</p> <p>王信忠</p>	<p>第二二二六號</p>	<p>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p> <p>張佛泉</p>	<p>第二二二七號</p>	<p>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續)</p> <p>吳景超</p>	<p>第二二二八號</p>	<p>沉寂的局面</p> <p>顧毓琇</p>	<p>第二二二九號</p>	<p>鄉村建設工作的一方面</p> <p>陶傑</p>	<p>第二二三〇號</p>	<p>施行憲政之準備</p> <p>蕭公權</p>	<p>第二二三一號</p>	<p>倫敦的與日談判</p> <p>胡適</p>	<p>第二二三二號</p>	<p>青年修養問題</p> <p>衡哲</p>	<p>第二二三三號</p>	<p>進步的遲遲</p> <p>陳序經</p>	<p>第二二三四號</p>	<p>民主政治的綱領</p> <p>吳承禧</p>	<p>第二二三五號</p>	<p>我們究竟要甚麼樣的憲法</p> <p>張佛泉</p>	<p>第二二三六號</p>	<p>再談談憲政</p> <p>胡適</p>	<p>第二二三七號</p>	<p>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p> <p>薩本棟</p>	<p>第二二三八號</p>	<p>要做有具體辦法的文章</p> <p>顧正本</p>	<p>第二三三九號</p>	<p>上軌道的政治</p> <p>陳之邁</p>	<p>第二三四〇號</p>	<p>英日談判與華北</p> <p>陶希聖</p>	<p>第二三四一號</p>	<p>論開放黨禁</p> <p>盧廣縣</p>	<p>第二三四二號</p>	<p>從民衆教育立場檢討合作事業</p> <p>顧一樵</p>	<p>第二三四三號</p>	<p>太原之行</p> <p>君衡</p>	<p>第二三四四號</p>	<p>憲政的條件</p> <p>明生</p>	<p>第二三四五號</p>	<p>一個應該消除的貨幣幻景</p> <p>陳序經</p>	<p>第二三四六號</p>	<p>推動鄉村建設工作的一個新方式</p> <p>曹康伯</p>	<p>第二三四七號</p>	<p>太原之行(續)</p> <p>顧一樵</p>	<p>第二三四八號</p>	<p>看不懂的新文藝</p> <p>絮如</p>	<p>第二三四九號</p>	<p>冀平津舉辦國大選舉</p> <p>胡適</p>	<p>第二三五〇號</p>	<p>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p> <p>張熙若</p>	<p>第二三五二號</p>	<p>論準備中之國勢普查</p> <p>劉南溟</p>	<p>第二三五三號</p>	<p>關於讀經</p> <p>梁實秋</p>	<p>第二三五四號</p>	<p>再談黨禁問題</p> <p>陶希聖</p>	<p>第二三五五號</p>	<p>「蘇維埃共產主義」(書評)</p> <p>陳之邁</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價目：每册大洋八角，凡直接向北大購買者打八扣。

歌謠周刊第二卷合訂本出版了！

發行者：北平沙灘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及各大書店。

比較教育叢書

全書十二册 四開本 道林紙印 預約價十一元二角 另訂分期付款辦法 已出一册 定價十六元 郵費國內一元八角

本叢書專論世界各重要國家之教育制度，重視其歷史的、社會的及政治的背景。著譯者均為國內教育專家，取材新穎，立論平允，確為大學和師範學生之良好參考書。

〔已出〕美國教育曹炎申著

內容九章：首論美國教育背景，次述殖民時代的教育；再次從獨立初期的教育說起，以至教育意識的改進，公立學校的建設，教育行政機構的完成，以及學校教育發展的概況；最後論特殊教育及新教育的原理和趨勢。

王雲五 章 慈 主編

公民教育叢書

全書八册 四開本 道林紙印 預約價九元八角 另訂分期付款辦法 已出一册 定價十四元 郵費國內一元二角

全書八種，內六種係據美國芝加哥大學公民教育叢書譯成，餘二種由國內專家編著，無不內容翔實，評述精確。欲知各國公民教育的概況及其文化和社會的基礎者，不可不讀。

〔已出〕美國公民教育

Merriam 著 嚴菊生譯
本書旨在研究美國公民教育的需要與其可能性，以期解決此種教育全部的方向、範圍、及性質。全書分為十三章，分別討論民主政體及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公民教育與政府的趨勢，教師及受教者等等問題，而將研究所得的結論列於編首。

公民教育叢書 尚有七種每月續出一種	比較教育叢書 尚有十種每月續出一種
英國公民教育 Gaus 黃嘉德譯	加拿大教育 李勉林著
法國公民教育 Koenig 金樹榮譯	英國教育 陳鶴琴著
德國公民教育 Schneider 胡貽穀譯	法國教育 吳俊升著
意大利公民教育 Brooks 魯繼曾譯	德國教育 鍾魯齋著
瑞士公民教育 Harper 馬復等譯	意大利教育 曾作忠著
蘇聯公民教育 Harper 馬復等譯	比國教育 張懷仁著
日本公民教育 范壽康著	匈牙利教育 Kornig 胡仁源著
	波蘭教育 章懷慈著
	捷克斯拉夫教育 劉鈞著
	蘇聯教育 陳友松著
	日本教育 雷通羣著

預約於本年九月十四日截止 樣張備索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論蘇聯的黨獄

陳之邁

從槍決麻瘋病人談到麻瘋問題

周信銘

四十年前一個讀律學生的生活

滄波

關於看不懂(一)(通信)

知堂

關於看不懂(二)(通信)

沈從文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二四一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本刊寄售處

廣州	南昌	漢口	武昌	南通	徐州	蘇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江蘇	上海	天津	北平
開通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華書局	三友書局	徐友社	民權報社	錦州書報社	鎮江書報社	力行書局	中央書局	南華書局	大光明書局	天華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衡州	長沙	沙市	重慶	成都	蘭州	石莊	保定	濟南	開封	太原	蘇州	蕪湖	安慶
衡州書局	長沙書局	沙市書局	重慶書局	成都書局	蘭州書局	石莊書局	保定書局	濟南書局	開封書局	太原書局	蘇州書局	蕪湖書局	安慶書局
衡州書局	長沙書局	沙市書局	重慶書局	成都書局	蘭州書局	石莊書局	保定書局	濟南書局	開封書局	太原書局	蘇州書局	蕪湖書局	安慶書局
衡州書局	長沙書局	沙市書局	重慶書局	成都書局	蘭州書局	石莊書局	保定書局	濟南書局	開封書局	太原書局	蘇州書局	蕪湖書局	安慶書局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論蘇聯的黨獄

陳之邁

蘇聯近年來各方面猛烈的進步，尤其是斯大林領導下兩次五年計劃敏速的完成，早已震驚世界。在蘇聯成立共產黨的政權的時候，一般人預料它的傾覆；現在不特此種論調已成過去，蘇聯早已躋入世界強國之林，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這種驚人的發展當然要歸功於斯大林所主張的現代化，尤其是工業化機械化的運動。俄國本來是一個農業化的國家，大彼得的「西化」政策并未使它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在世界各國都未曾走上工業化的時代，帝俄是歐洲的強國之一；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之時，俄皇亞力山大幾成爲全歐的中心人物。但是在十九世紀之中，各國競相趨向於工業的發展，龐大複雜的俄國却始終落後，在國際關係上漸漸喪失其指導的地位。世界大戰的前夕，雖有一部分「維新」人物極力提倡工業化，但是在舊勢力惡勢力仍然猖獗之時，他們的主張迄未能得到顯著的效果。所以在大戰之中，俄國雖幸而在協商國之間，但早被工業化的德國打得一敗塗地，竟不能支持到戰事的告終，而個別與德國簽定辱國的條約。這是俄

國付給舊勢力惡勢力阻礙工業化的代價，也是斯大林所以極力提倡工業化的歷史背景。斯太林的政權之成功，俄國便從落後的地位一躍而重返強國之林。

然而在這個猛烈的進步之中，蘇聯內部政治肌理不安的景象，尤其是屢次大規模的黨獄，又在這幅可羨的圖畫上投了一個恐怖的陰影，令人担心底下蘊藏着埋伏着的巨大波瀾也許要搖撼今日蘇聯政權的基礎。斯大林近年來一方面要鏟除所謂左翼的反動（Trotsky, Zinoviev, Kamenev），一方面又要鏟除所謂右翼的反動（Bukharin, Kadek, Tomsky），最近且更進一步的要進行「肅軍」，槍決了所謂「八將」，并且涉及軍政部長 Voroshilov，而每次的黨獄被罪者又自認不諱，放棄一切辯護的權利，異口同聲承認其主張的錯誤，甚至於謳歌斯太林的德政，更使人疑惑其中必有種種離奇恐怖的事實。究竟斯太林在蘇聯的政權穩固與否，這種黨獄的背後的事實爲何，局外人恐怕只能揣測不能確定的。但是我們若從大處著眼，也能得到幾個相當根本的觀察來。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根本是一個政治的而不是一個經濟的革命。帝俄的政府本來便不是一個健全的政府，歐戰慘烈的犧牲使得這個政府疲於奔命卒至無法支持。在這個強敵深入的關頭，帝俄的政府傾覆了：「它唯有的遺產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誠如一位英國人所說，「因為人類社會恐懼無政府狀態好像自然界恐懼真空一樣，帝俄政府一倒塌之後，最大的問題是立刻尋找一個能恢復秩序的政權。」自由主義者嘗試了一番，白色的復辟勢力也來嘗試了一

番，但均遭失敗。在這個危機，德國軍部秘密輸送到俄境裏去破壞帝俄政權的共產黨興起來了。他們提倡無條件的和平，他們主張組織堅強的「獨裁政府」，對於國內當時的無政府狀態加以澈底的解決。共產主義的學說理應在資本制度最發達，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方首先實行，因為只有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裏才有廣大的勞働群衆，只有在資本制度最發達的國家裏才有富於「階級意識」及「共產革命情緒」的勞働群衆。但是首先試驗共產主義的，不是工業化的，資本制度化的英美德等國，而是工業化極幼稚，資本制度方在萌芽的俄國。列寧，斯太林等人雖曾著論說明「爲什麼共產主義適宜於俄國」——其實這便等於否定了

馬克思及正統派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究竟不能掩蓋着明顯的事實：俄國沒有富於「階級意識」及「共產革命情緒」的廣大勞働群衆，俄國一般的人民大部分仍是農民，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及實施不能，不會，亦不必發生興趣。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對於俄國的芸芸衆生并無引誘性；共產黨在俄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共產黨在革命之時是唯一能夠恢復政治秩序組織強固政府的勢力。共產黨之成功，不在其經濟學說之引人入勝，而在其主張及具有堅決意志實行獨裁一點。

共產黨在蘇聯所建立的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其實俄國那時根本便沒有所謂「無產階級」；一般的窮苦人民根本便沒有任何「階級意識」，亦未身嘗或耳聞資本制度的苦痛，自然沒有厲行獨裁的可能。代替無產階級來獨裁的因此便是革命的共產黨。但是就在共產黨中具有「階級意識」的也只有少數真熱烈信仰主義，身經「下層工作」的領袖，蘇聯的政治因此使由少數人的「獨裁」一變而成少數人的「寡頭政治」。共產黨的組織是金字塔形的組織，那裏維持着鐵一般的紀律，服從上級命令成了黨員無上的天職。這樣共產黨的獨裁又一變而爲共產黨魁的獨裁。由群衆的當政走到了黨的當政；由黨的當政走到了少數領

袖的當政；由少數領袖的當政而走到一個人的專政了。

列寧不特有光榮悠久的革命歷史及堅強果斷的意志，在他生時蘇聯的內外各方亦有險惡的環境。列寧逝世後情形漸漸改變了：國際的環境已略略好轉，白色的勢力則已成強弩之末。一個獨裁者之出缺總有劇烈政權之爭奪。托洛斯基和斯大林是列寧逝世後爭權的主角。托洛斯基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上稍弱於列寧，他是紅軍的組織者。斯大林雖然也曾爲主義而五次入獄，五次放逐，但地位却遠在托洛斯基之下。其實列寧臨終之時便認定斯大林不是繼承他的適當人物。列寧說：「斯大林同志太鹵莽……我向各同志提議設法免去他的職務（指共產黨秘書長）而找一個才幹一樣但性情相反的人——比較能忍耐，比較忠實，比較有禮，比較顧惜同志，比較固定……的人。」在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勝利了，他的勝利却並沒有解決蘇聯政權誰屬的問題。蘇聯有許多人的革命歷史比斯大林悠久，或研究黨義比斯大林湛深。他們對於主義都有熱烈的信仰及厲行的決心，他們不甘袖手看着政權被斯大林一手壟斷，更不能容忍斯大林與主義相去甚遠的種種設施。

每一個國家都有政治野心家，每一個國家都有抱持特殊政見的人物。民治的政治制度給予這種人以合法的和平

的活動方式；獨裁的政治制度則剝奪他們活動的權利。在民治下政治野心家儘可公開組織政黨批評政府；在獨裁下他們只能做暗室地窖的「下層工作」，用暴力來爭權。民治政府應付反對勢力是令其公開宣傳與批評，故用不着黨獄放逐與屠殺；獨裁政府既只知用暴力來抑壓反對勢力，故捨黨獄放逐與屠殺外別無其他途徑。這是獨裁政治的特徵，獨裁者所標榜的爲何種主義全無關係。墨索里尼之暗殺社會黨領袖 Matteotti，希特拉一九三四年之「國家鞭撻」(Statstreicht)，與斯大林近年來的黨獄，實具有同一意義。

蘇聯的環境不具備實行正統共產主義的條件，但是政治的形勢却使共產黨在那裏成功。主其政者當然要審察實際的環境來擇要實行主義，或甚至修改主義：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等等，都非正統共產主義的主張。但是一般的黨員及其領袖却是最虔誠篤信主義的人，他們對於斯大林政策自然發生憤慨，他們的政治野心也正好掛起遵奉主義的招牌來爭奪斯大林的政權。他們失敗受刑時似乎是視死如歸的態度也許是真誠的「爲主義而犧牲」。同時，屢次被斯大林入獄處刑的人物中許多都是在共產黨歷史中佔有長久歷史的人物。幾個主要者從前都

是政治委員會的委員。誠如英人某所說，拋擲炸彈，暗室會議等等的秘密「下層工作」做多了可以變成一種習慣，不做往往便感覺生活無聊。革命者永遠是要革命的，他們不能安於公開會議或辦公案前的生活。不能做「下層工作」的人不是好的革命者，但好的革命者却得永遠從事於革命工作；他們不能搖身一變而成爲富有建設精神的實際政治家，有之則爲稀有的例外。斯大林的一身兼有二者，因此他是一個當代的偉人。托洛斯基及許多別人便似乎只有一，所以他們提倡「世界革命」，「永久革命」來擴充他們活動空間上及時間上的範圍。在蘇聯本身他們也要繼續做他們的工作，因爲他們認定蘇聯的革命尙未成功，他們要做第二次或第三次第四次的革命。革命是他們的天性，「下層工作」是他們的嗜好，所以他們要推翻斯大林的政權，恢復第三國際的本來面目，實行「世界革命」及「永久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及斯大林本人一部分的著作，都完成於共產黨秉政之前。有一位歷史學者以爲政治思想的顯著可以分爲擁護現狀者，打倒現狀者，及改良現狀者三種，它們彼此有迥不相同的風格與情調。同時，討論政治者的風格與情調也往往因爲他在當權勢力之

內外而有重要的區別。共產主義的理論既大都完成於實行之前，且其所代表的是在野的而不是在朝的勢力，故其風格與情調處處表現其革命的精神。在共產黨當政以前，這種風格與情調是促進革命必要的元素；唯有這種風格與情調才能吸引不滿於現狀者的同情擁護。蘇聯的領袖全受過這種風格與情調的吸引，他們所崇信的是革命的精神，是理論上完美不顧慮事實的理想。受過這種主義的薰陶，反抗現象的情緒是他們的天性。人類社會既然根本沒有十全的政治，這些反抗現象者因此總會找到可以詭難的目標。革命者總是不能滿意於現狀的；讀慣了革命理論的人總是不能安心於擁護現狀的，擁護現狀便是拋棄了革命的精神。不特如此，主張革命等於反對改革。認定改革無用是一切革命者共同的信仰。所以在激烈革命之後改革的主張總歸帶有守舊之嫌。蘇聯的領袖都是堅忍卓絕的革命者，他們對於改革的建議不願考慮的，他們所知道的只有整個的推翻。

蘇聯的黨獄表示兩點：第一，暴力反抗政府及暴力抑壓反抗是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主義，任何人物在專制獨裁下必具的特色；第二，這種反抗的激動在劇烈的革命後尤爲顯著，因爲革命者的意識形態總是不能安心於建

設的。至於蘇聯近年來的反抗究竟嚴重到如何程度，斯大林是否可以用這種方法解決這個政權之爭奪，當然都在不

從槍決麻瘋病人談到麻瘋問題

周信銘

北平晨報於五月五日登載關於粵省麻瘋病人槍決的一段新聞，略云：

省會警察局長因鑒於瘋疾蔓延，乃下令捕瘋人男女老幼共二百一十五名，當局爲剷除毒根起見，已決意將患瘋者執行槍決。四月二十三晚會將該批瘋人運至白雲山執行死刑。當行刑時，每瘋人只轟一彈，未卽氣絕者，亦命作工拖往灰塚肉葬。

中國瘋人的多少是一個統計的大謎，現在照一般的統計，全國瘋人約一百萬人，然而這祇可從最低限度言之，因爲社會輿論對瘋人沒能主持公道，使患者不能不設法避免統計的計算。至於這一百萬瘋人的地理分佈，亦從沒有人作過精密的研究。廣東和福建因爲地勢氣候關係，正適宜瘋菌的繁殖，所有瘋人，佔全國的半數。瘋疾是中國今日的問題，尤其是廣東人的特殊問題，際此粵局有滅絕瘋人之舉，正使我們合時地把這嚴重問題提出，引起國人的

注意。

我們並沒有聽聞因病下刑的。在社會裏，我們到處可

以找着花柳病人，肺癆病人，我們並沒有把他們提出槍決，我們又何必對瘋疾故意大驚小怪呢？求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借重歷史的眼光。社會對瘋人的仇視，自古中外已然。耶穌說：「把病者醫治，把瘋人清潔」(Heal the sick and cleanse the lepers)，好像病和瘋是兩件事情的。

誠然，瘋人不像病者，病者可用外面的皮膚來隱匿內部的病徵，患瘋病者，因爲桿菌多在皮膚下層活動，敗絮不能用金玉掩飾；獅一般的面孔，無色彩的皮膚，畸形的鼻子，隆起的肌肉，使原人的頭腦，動以瘋病爲天的懲罰，墮落的象徵。瘋病因之被看做道德的問題而不是病理的問題。瘋人不要醫治，而要受罰——向著死路去。社會既不以疾病的觀點看瘋人，中世紀的教令，當沒放逐瘋人前，便請祭司爲瘋人先行葬禮，宣告他的死，然後打起鑼鼓，

吹起響角，使路人得知逃避。社會人都信瘋病是最容易傳染的，祇要一看瘋人，就會接得瘋毒了。其實我們亦何嘗不用非科學的論調來作我們信念的根據。加以以賣瘋的行爲，用非科學的方法想減輕自己病徵的妄念，更足以助長社會對瘋人的一個大反感。癲瘋的偏見是到處可尋蛛絲馬跡的。

但是我們已踏進到文明的路上，就要用文明的眼光對待瘋人。我們要有以下的幾個認識：(1) 瘋是病而不是罪。病的原因是桿菌 (Tuberculous Bacillus) 的活動。(2) 癲瘋是傳染的。(3) 初期的病者是可治的，不用入院醫治的。假使當局者明瞭這點常識，就不致把生命隨意估價。瘋病者雖危及社會康寧，然照醫學者的意見看來，花柳病和結核病的傳染性比癲疾利害得多，癲疾初期的診治比肺病還要容易。若是我們真要提倡優生，剷除疾病，則在病夫的中國，要死者何祇二百瘋人？若我們真要強種，不理人類的感覺，我們最好學效斯巴達人用暴風雷雨來試練新孩子的生存本領，又何需建醫院，講衛生？

我們或許從別一方面猜度粵局槍決瘋人的動機。廣東人口大約三千萬人，瘋人約三十萬，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一百個廣東人就有一個瘋人了，在蛋家（水上居民）的

人口中瘋人至少佔百分之三四。進步的廣東祇有一間小規模的汕頭市立癲瘋院，其他幾間較大的是西教士的創辦和主持。石龍瘋人院收容病人四百，每月支出一千七百五十元，每人每月四元餘。東莞瘋人院收容病人一百三十人，每月支出八百元，每人每月支出六元餘，平均起來入院瘋人每月支消五元餘。若廣東有三十萬瘋人入院，則每月支出至少一百五十萬，這筆大款恐不易籌得，這便給一般人「不幹」的一個大慰藉。他們並不明瞭癲瘋是不一定要入院的。其實用捕賊的方式拿癲瘋人，放逐荒島，不能不謂社會對瘋人的一個虐待。癲疾既不如花柳和肺病的恐怖，社會又何必張惶？隔離 (Segregation) 祇可用於重惡的瘋人。輕而易舉的社會政策，就可到處開設癲瘋臨診所 (Tuberculous Clinics)，施行藥物療治（大楓子油的注射是有效的）和灌注一般衛生常識。若強要輕病者入院，徒使他們把病徵隱諱，不敢留醫，反使瘋病得以廣播。監獄式的瘋人院不必就是社會的幸福。

廣東的瘋人太成問題了，若是我們真實把問題想過，真實行不通的時候，把病人槍決，或許是一個無解決中的一個痛快解決。可是我們要問到底我們有沒想過這問題，作過一點工夫。廣西是一個瘋人廣播區，但還沒有一間瘋

人醫院。全國百萬瘋人祇有十餘間醫院，一共容納二千

人，這大都是外國教士開辦的。

文明的碼尺 (Gauges) 就是人文主義色彩的濃淡。西洋人的牢獄，已被看做醫院，犯人是社會的病者，以幽憤幽的行爲，已被認爲歷史的陳跡。社會工作學已佔了學術的一個地位，社會事業已深入民間，深信人類的進步，

就是洗滌原始弱肉強食的野蠻。祇就麻瘋事業言之，美國麻瘋總會 (American Mission to Lepers) 已立基於宏偉的

紐約五大街一百五十六號中，努力把二千多麻瘋人 (一八

二八) 減到二百人 (一九二八)。這人類的空氣遠播全球，它的分會在倫敦，在巴黎，在上海，在東京。中國麻瘋分

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在上海成立，經十年的奮鬥，上年在上海落成一座偉大的瘋人院，其前途正無可限量。

看着人家，照照自己，使我們慚愧無地，然而這慚愧正應是努力的推動力啊！

四十年前一個讀律學生的生活

滄 波

幼年隨先子居杭州，聽家人呼先子爲師爺。有一天到布政司衙門，又聽人稱先子爲老天子，當時莫名其妙。稍長，方知道「師爺」有錢殺刑名之別，又知道「師爺」在衙門裏所辦事務之重要。弱冠時喜翻閱中西舊書，在舊書箱中翻得注龍莊全書等，閱覽頗成興趣，嗣後趨庭之暇，每得侍談昔日讀律學生生活，及幕府處置公事的情形。後來在大學習政治科，於行政學方面頗饒興趣。後到英國讀書，從佛納教授研究文官制度，間參閱英國行政機關。於各國行政機關內部組織及人事支配，特別留意。英國印鑄

局出版的 White Hall Series 一書，雖頗愛閱，終嫌其簡略，然中國舊籍中，描寫衙門內部情形的書籍，更沒處得到類似的。我從研究行政學，從研究文官制度後，益覺對於中國的「幕府」發生興趣。但是中國舊籍裏這種材料實在不多見，「幕府」生活不易知，舉幕的生活更不易知。「幕府」是實際政治的骨幹，一切行政上的核心；亦可說是真正的事務官。因爲從前的「官」，正途出身的病在空疎，捐班出身的流品更難。進士出身的知縣，能做詩賦八股寫館閣字以外，不能寫信是極尋常的事。不必說公文，更

不必說見解辦法。就是閱歷幾十年的「官」，能自己處理公事的還在少數。所以「幕」是「官」的骨子，「官」沒有「幕」，如有軀殼而無靈魂。幼時曾聽見一位父執談「幕」：『何謂天地君親師，這個「師」就是「師爺」，也就是幕府。』這一套話，既是笑話，也像神話，但也可以看出「幕」在當時一部分人眼光中的看法。從許多舊籍裏面却可以得着不少證據，証明幕府在過去政治上的重要。

「幕府」的重要，既如上述，爲什麼幕府生活的記載甚少，學幕時期的學生生活紀載更少。這裏面有幾種原因，「幕府」雖然在實際行政上的地位重要，然幕道中人，種類亦極不齊，高明的人，可以輔助長官立功立業，整飭庶政，大至方面，小及百里，達到「政通人和」。不肖的「幕」，只能熟讀「則例」，辦理交代奏銷，平時獻媚長官，緩急漁利肥己。前一派的人，志氣傲，識力高，習幕的人本來大半是不得志於科名，胸中必有所激鬱自負，自己以爲不得已而作「幕」，所以視幕客的生活以爲不屑一談，讀律時的生活大半有難堪的境界，艱苦的磨練，回想更覺猶有餘痛，作客得意不願述，作客失意不忍述。至於後一派的人，品類學術，本不高明，學幕作幕，目的僅在衣食，不會夢想到有什麼著述。因爲這幾種原因，所以幕

客對於本身生活的紀述特別稀少。汪龍莊先生後來是中式進士，由幕而官，自謂一吐寄居籬下之氣，若使他終於作幕，或未必有許多興趣來寫各種實驗的著述。然即就汪龍莊先生的著述而論，他的「病榻夢痕錄」，於幕客措理公事方面是有數的紀述，也是從前許多讀律學生必修科目，但是他幾種著述裏，「病榻夢痕錄」一書關於活的方面紀述較詳，可是即以此書而論，只在辦理案件的措置經過有紀述，幕客生活方面極少涉及。汪先生學幕時候的生活更絕少提到。「病榻夢痕錄」卷上第九頁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自記：

……外舅署松江金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樂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修三金而已。

汪龍莊先生年譜上關於幕客生活的開始，只有這麼簡短的紀述。他當時年紀只有二十三歲，而他自述到金山縣署，職掌的是「書記」。他生活的目標還在讀書應考。「書記」在幕道中，嚴格的講，本來不能算「幕」。前清行政衙門裏稱「書契師爺」爲「散席」，「散席」所以別於「專席」。散席並沒有專門的訓練及技術。讀書人個個能做，條件只在書法秀美，能做幾句四六，便可混事。這類人物於行政

上關係絕無，地位既不重要，「官」亦並不重視。汪龍莊先生雖然是幕客中的名士，然而仔細研究：（第一）汪龍莊後來雖然辦理過許多大案，然而在他的著述裏，或者可以推測他並沒有經過學幕的嚴格訓練。（第二）汪所館的衙署，都在下級行政機關；（第三）他是刑名師爺，他的著述裏面只尋得出辦理刑名案件的經過，絕未談到財務錢漕等事。所以要研究幕客及學幕的生活，汪龍莊先生的書並不是理想的著作，此類理想著作太少，中國政治及司法上活的史料真不容易搜集，或是講求行政改革的人一種極大的不利。

過去幕客的種類頗有分別，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的幕客不同，同等機關性質相異，裏面幕客也不同，但是地方行政機關，上自督撫，下至州縣，機關中幕客的主幹，大別有二，一爲錢穀，一爲刑名（當然如臬司一類司法機關除外）。前者掌理一切財務行政如錢漕鹽茶徵課及奏銷等事，後者掌理同於現今司法上一切事務。刑錢兩席幕府而外，其餘幕職雖還甚多，如督撫衙門有文案，鈐選，戎政，州縣衙門有書契賬席等，在廣義上也可稱爲幕客。在過去農村經濟社會，行政上的事務大半是消極的工作，所以政務比較甚爲簡單。地方官除了收糧理訟以外，並無其

他公事可言。地方有教官，但無教育可言。地方有千總守備，但無軍政可言。修橋補路一類建設事業，當時看作慈善事業；育嬰保健等也視爲政治以外之事。行政上情形，在今日看來真是脫不了原始狀態，然而當時行政機關裏面的佐治人員數量上不能與現在比較，一個知縣衙門，庶政集於刑錢兩席，一個督撫衙門，軍財刑法大政也集於刑錢兩席。其餘文案摺奏等職，所辦的特殊事件，性質遠不如刑錢兩席的繁重。督撫衙門裏儘有養着無數幕客，有若前清的兩江總督衙門，歷來幕客最多，幕客的排場也最宏大。但是在刑錢兩席以外的幕客，便有食俸不辦事，如當今顧問諮議等類職事。現在剩餘的南北名流中，尚有幾位是此中出身。此中出身的幕客，有的是科第中人不得志於宦途，有的是負着時望，不肯輕易直接負責去做官。此類人才，文章議論識見也許有特別長處，但於行政經驗及幕中實際技能，多半缺乏，用一句新穎的譬喻，或可說此種人是幕客中的政務官，又可說是高等食客。他們沒有經過學律的嚴格訓練，他們也沒有行政事務上的基本技能。歷史上還有若干佳話可以看到幕府情形的側面，乾嘉詩人黃仲則做了兩句詩：「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寒衣未剪裁」，

陝西巡撫畢秋帆不但派人送幾百兩銀子，並教請他到幕中

府。那時候有種館閣名臣式的封疆大吏，如阮元畢沅，幕中常網羅許多名士，這許多名士並不替他辦公事，——公事本來他們是門外漢。有的在幕中著書修書，「續資治通鑑」便是畢秋帆幕客所成。這許多作家，廣義上都可成幕客，然嚴格的講，這班人真與「幕」毫不相干。我們所講的幕客，專指嚴格的意義，一個衙門裏面的刑名錢穀。他們學生時代的生活和服務時代的生活，是極好的刑法財政上的活史料。本文要想講述的，就是四十年前一個讀律學生的生活。

「讀律學生」俗語便叫「學幕」，「幕府」在行政上地位那樣重要，「師爺」一個名辭在若干人心目中是那樣富有神秘的技能。「幕」是怎麼學的？不說今天，即在過去，也是一個謎。上文已經說過，關於這類的著作實在太少，碩果僅存的汪龍莊先生全書，尤其如「病榻夢痕錄」，還是尋不出讀律學生的生活狀態，據我所研究所知道，這類著作稀少的原因，幕道中人不肯著述並不是主因，讀律時代生活材料也實在不多，可資著述。中國過去在教育上，各種教育都不講教授法，私塾中蒙師教孩子讀四書五經，不講解字義句讀是極尋常的事，然而死念書的玄妙也能產生通人，所謂「斯文」中人已是如此，其他職業教育

範圍內更是有職業而無教育。舊式商店中的學徒，正課是灑掃獻茶，奉侍管事，充量的學習，止於算盤。手藝中的學徒，本來與僕役沒有異致：說句幽默話，勞動服務是手藝學徒最妙自慰之語。然而舊式商店與舊手藝中，在此種方式中，儘能產生精明專家。中國過去教育，各方面有此玄妙，學幕的學生大概也不出這個模型。但「幕客」是豫備辦理最切實的行政工作，他們學生時代的訓練，比較其他方面當然要切實及嚴格。

先父是在甲午年到杭州學幕，距今已四十幾年了。先父的業師是宜興徐質初先生。徐老先生幼時受業於蕭山某君，系統上是汪龍莊先生一派，還是再傳弟子。同光時代撫藩衙門中刑錢兩席並不隨長官為進退，所以有許多「老夫子」在一個衙門辦事常有數十年之久。徐老先生在杭州藩司年代就極長。他在浙江藩台衙門辦理錢穀，江浙田賦夙稱繁重，可是全省財務的實際行政，全在一位錢穀老夫子之手，雖說那時政簡刑清，全省財務行政在一個人手裏，下面縱有書吏，工作不是容易對付的。當時「老夫子」手下並沒有科員錄事等，長官預算中也沒有這項開支科目，他辦事唯一的助手便是學幕的學生，學生中資格最深，住在「老夫子」對房，須負公事的全責，學生初進，

老師先要索閱窗譯，并考詢各種處世做人的問題，徐老先生是一個主品極端方的人，自檢甚嚴，學生學習時期，老師指示的地方並不多，有幾種書是指定要讀研究：第一是「大清律例」兼及會典中章制各門，第二是「戶部則例」，此外如田文鏡「撫餘宣化錄」，「林文忠政書」，「汪龍莊全書」，「曾文正全集」，「歷朝名臣奏議」，「中興奏議」，「陸宣公奏議」，「陸稼書集」，「鳴遠堂論文」等書籍，都是必修科目，珠算除須熟練，有時須問答各歌訣原理。因為習錢穀的人，數學需要極多，珠算中各種算式均須熟練並要研究算理。先父到師門第二日，徐老先生開口便問什麼叫「三一三十一」。問後對數理頗多泛論。徐老先生對算學是有根底的人。

英美法系的法律學校，學習法律的方法完全從判例上下手，我本人也選習過法律，知道他們對於讀律學生的訓練，就叫他們研究整個的判例，他們公法私法的教授法都用這種辦法；和大陸法系先授大綱原則絕對不同，在英美法律系的法律學校出身比較要切實，不致空疎。我國舊時學幕，若從這一方面論，恐較現在英美法系的法律學校還要切實。從前沒有法律學校，也沒有什麼大學的普通行政與財務行政等科，讀律的學生無論習錢穀或刑名，「老師」

必在衙門裏，衙門就是學校，一切的公文便是課本。初學的人由你觀察，觀察得通，就漸漸可動手助理，大衙門裏多數的公事都經過讀律學生的手，每一個公文到後，先交首席學生，由首席學生分給各同門，這許多學生辦公的方法，大概都將公文上應批應辦的意見，用紅紙條工楷簽注意見，黏在公文上面，呈老師檢定。所以用紅紙條，因為最後的擬定要老師決定，老師決定後再呈長官決定。刑錢兩處辦公事，各有其共同之原則格式，也有各地方之特殊原則與格式，讀律學生於一般知識以外，對這許多地方尤其要牢記，以備辦案時引用。上級地方行政機關公事與下級行政機關性質各別，同為上級機關，巡撫衙門與布政司衙門公事又大不同，譬如一個學生在撫藩衙門學幕，州縣衙門的情形多茫然，甚至在藩司衙門學幕的人，到撫台衙門又茫然，然而頭腦清楚的人，儘管對特殊情形不清楚，原理原則明白，稍加觀摩，即可融會貫通。

「老夫子」在幕中收學生，上流的幕客，例不受束修，學生進門時僅納贖金，贖金數目，六元八元不等，學生入幕後，一切膳宿都由「老夫子」供給，在這種情形之下，「老夫子」的權威自更大。老幕府訓練學生，於文字技術以外，對學生性情磨練常用特殊的方法，有人譬喻如

佛家的「苦行」。一個新進的學生，經不起磨練，大概半途而廢，老師亦認爲不可造就。老夫子所以要採用那種不合理的手段去磨練學生，據說是極存用意，因爲辦官家事不，但要有見識有判斷，尤須沉着細密，幕客不但要辦公事，尤須與長官調和人事，真是行政上的人事中心，如果心氣不細不密不敏，什麼事一蹴就完，一鬧就糟。據先父的年譜上自述。徐老先生對學生，相見不賜坐位，走路不許有步履聲，早晨吃稀飯，一桌多至七八人，小菜惟鹽炒白芝麻一小碟。吃飯時與老師共飯，學生多吃菜或形式不正，即發問，「只吃飯不能做事將爲何種人？」如果學生但吃飯少吃菜，或對葷菜不下箸，老師必叫廚房進來大罵：說他「治着不精，致相公們（當時稱學生爲相公）不屑下箸，有時全桌翻身。與學生交談辨論，學生出語稍激，他老先生輒自批其頰，甚至自己跪下來，弄得學生啼笑不得。這位徐老先生在浙江幕府頗負盛名，他在浙江藩台衙門前後共二十年。有許多人說他有神經病，但是也有人說他那種性情乖奇，是故意做作，用意在磨練學生。他的門下極盛，前後從遊的門弟子有一百餘人，然中途棄去的居十分之七八，在他那裏經過磨練而不爲環境所戰敗的人，大概都有能耐，後來也有相當的成就。這種學生修業並沒有規定的年

限，亦沒有一定的出路，大概學生中對此道有能力，是「老夫子」極好的助手。許多學生都是寒士，來自民間，他們不得志於科名，少年時已夠苦，學了幾年想出外就館，便當然是情理之常，但這位老夫子聽見人家要出去就館，便不高興，說人家沒有大志，常常對學生說：「士志於衣食，不必來學幕，好好學習，將來院司館有得就，不必介意於州縣館。」因爲這個原故，當時學生埋頭五六年學習者也有人。先父在浙江藩司中學幕共留七個整年。我們小時候寫封家信或招待一個客人，動輒遭堂上責罵，說沒有格式，當時亦頗憤憤，現在想起，這都是與他老人家早年所受教育有關，家庭中嚴父兄的管束，對子弟將來立身處世是極有益處的。先父生前常說：「我們那時候的學生生活，若使現在的學生當之，一天就要打走先生，否則便被先生打走。」那時候士氣淳粹，師道尊嚴，從此處都可得到證明。當時的老夫子待學生雖嚴，然他們既不收束修，且供給膳食，學生學習得上路，能幫助辦事，每節還送津貼，都是「老夫子」自己掏荷包，絕不向公家開支。這種貼錢收學生的事，今天怕沒有人肯再做！埋頭學幕，茫茫前途，毫無指望，一學學六七年，今天怕也沒人再做！「紹興師爺」在一般社會心目中不是一個美滿的名辭，然而

「師爺」中品類正多，有許多品格高尚，專做事不求名，儘得許多保舉，連執照都不高興去領，前清三百年的吏治，「師爺」是骨幹，「師爺」是代表一種特別人格。此道中的通人，儘管所學的極呆板，融會變化，各種事件都會辦。先父佐幕撫藩時，已屆清末，自言所辦的事務，與學幕時正是兩個世界，然辦預算，辦禁煙，辦學堂，辦理新刑法纂訂，都一手經辦，辦後成績卓著。

時代正在高速及中轉變，舊時代中許多活的史料，過

關於看不懂

(一)(通信)

適之先生：

看到獨立評論二三八期上「看不懂的新文藝」一篇通信，稍有感，寫出來請教。我想這問題有兩方面，應該分開來說，不可混合在一起，卽一是文藝的，二是教育的。從文藝方面來說，所謂看不懂的東西可以有兩種原因，甲種由於思想的晦澀，乙種由於文章的晦澀。有些詩文讀下去時字都認得，文法也都對，意思大抵講得通，然而還可

幾年再沒有人知道，這許多舊史料中，未必無可以效法的地方。我草本文感情上極感淒惻，我追念我逝世一百十三天的父親，我很追悔在他生前沒有把他許多談話記下來。前兩年陶希聖君在南京曾經要求約同他到常州去看他老人家，請他講述幕中生活，後來陶先生北去，沒有實現。適之先生二月前讀了先父的計文，遂有此建議，勿促草成此文，算是我喪中紀念父親文字之一種。

六月十三日於南京

知堂

詩文其內容不怎麼艱深，就只是寫的不好懂，這有一部分如先生所說是表現能力太差，却也有的是作風如此，他們也能寫很通達的文章，但是創作時覺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出他們的意思和情調。十年前所譯論理斯隨感錄中有一篇論晦澀與明白的問題，其第一節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聽一個學者微笑着說，希臘人的直截簡單的文章與我們喜歡晦澀的現代趣味有點不大相合。然而晦澀之中也有種種不同。便是，有一種晦澀是深奧之偶然的結果，有一種晦澀是混亂之自然的結果。有一回斯溫朋會將節普

曼的晦澀與勃朗寧的相比較。他說這二者的區別，卻普曼的晦澀是烟似的，勃朗寧的是電光似的。我們可以確實的加說一句，烟常比電光爲美，電光在我們看去未必比烟更爲明瞭。倘若我們敢輕易的概括一句，那麼可以說卻普曼與勃朗寧的晦澀之不同在於一個時常多是美的，一個時常多是醜的。如再仔細的看，似乎卻普曼的豐富的感情容易過度的急速的燃燒起來，所以他的烟未盡化爲火焰，勃朗寧則極端整飾而常例的思想上面壓着感情的重載，想藉了先天的吃語表現出來，於是得到深奧的形似。但是本質上二人的晦澀都似乎無可佩服。他們都太多街學，太少雅致。這是天才之職去表現那未表現過的，以至表現那些人所不能表現的。若從天才之職來說，那麼表現失敗的人便一無足取。因爲我們都能這樣做，無論我們私自發表，或寫在公刊的千萬葉上，都不必問。」這樣對於晦澀作家的體諒與寬備我都贊同，覺得說的還公平。不過清算這筆賬乃是批評家與作家間的事，像我平凡的讀者實在只能憑了主觀的標準來找點東西看，不能下客觀的判決，假如看不懂或覺得不好，便干脆放下不看而已。

再從教育方面來說，特別是在中學範圍內，這問題似乎沒有什麼麻煩。中學國文功課的目的在於使學生能夠閱

讀漢文所寫的普通書籍併能夠簡單的發表自己的思想，並不希望他就成爲一種作家，所以新文藝雖然在當閱讀之列，卻可不必一定要做，有才能與興趣者自然做亦不妨，凡事原都有例外，唯就一般說則中學國文不只是以練習做新文藝爲目的，總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吧。假如有學生模仿新文藝至於寫得使教員看不懂，那麼我想教員即可簡直告誡他，叫他先把文章寫得明白通達了再說，那些看不懂的文章有無價值都沒有關係，即使是全國批評家異口同聲的說好，學生模仿了做，教員也可以憑了他的教育的權威加以告誡，因爲模仿與看不懂於中學國文都是不宜的。所以我以爲中學教員只要對於教育與國文有主見與自信，便可自在應付，不必向社會呼籲，徒表白其無氣力，蓋糾正學生的看不懂的文章教員自有權衡，不必顧慮文藝與批評界的是非，看不懂的新文藝即使公認爲傑作亦非中學生所當仿作，翻過來說，中學生雖不合寫看不懂的文章而批評家亦未能即據此以定那種新文藝之無價值也。我想最好的是教育家與文藝家各自誠意的走自己的路，不要互相顧慮，以至互相拉扯。我所最怕的還是中學教國文的人自己醉心文藝，無論是寫看不懂的詩文或是口號標語的正宗文章，無形有形的都給學生以不健全的影響。不過這些也都是沒有

辦法的事，唯一的希望是教員自己的覺悟，這其實也只差無希望一等罷了。我對於教育與文藝都是門外漢，卻來說這好些廢話，未免好笑，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有外行的

淺，卻無專家的偏，未知先生肯賞識我這個優點否？拋了半塊破瓦，希望能得到一方漢白玉，可謂奢望矣。

六月十八日，作人白。

關於看不懂 (二) (通信)

沈從文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二三八期)載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討論到一個問題，以為近年來「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謂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種只有極少數人，也許竟沒有人，能懂的詩與小品文」。從那個通信，還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已然教了七年書。他的經驗，他的職務，都證明他說那些話是很誠實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幾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詩，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散文，第三是無名氏大作。卞之琳的詩寫得深一點，用字有時又過于簡單，也就晦一點，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許還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實在說不上難懂。何先生可說是近年來中國寫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羣中，被人認為成績極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畫夢錄，最近且得到大公報文藝獎金）。但絮如先生看了

他的文章，却說簡直不知道作者說的是什麼。同時您的按語，也以爲寫這種散文，是「應該哀憐」的，而且以爲「其所以如此寫些叫人看不懂的詩文的人，都只是因爲表現能力太差，他們根本就沒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領。」我覺得有些意見，與你們稍稍不同，值得寫出來和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談談。

一，爲什麼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爲什麼有些人寫出文章來使人看不懂？

三，爲什麼却有這種專寫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這種作家與作品的存在對新文學運動有何意義？

是好還是壞？

我想先就這四點來作一個散文走入魔道的義務辯護人，先說幾句話。

其一，文學革命初期寫作的口號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壞的標準，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他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頭。這主張是恁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論文，與其仿駢文，仿八股文，空泛無當，廢話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寫出來好些。不過支持或相信這個主張的人，有兩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學革命同社會上別的革命一樣，無論當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個較長時間中，受外來影響和事實影響，它會「變」。 (且會稍稍回頭，這回頭就是恁談中國西化問題時所說的惰性。適宜于本來習慣的惰性。) 因為變，「明白易懂」的理論，到某一時就限制不住作家。二，當初文學革命作家寫作有個共同意識，是寫自己「所見到的」，二十年後作家一部分却在創作自由條件下，寫自己「所感到的」。若一個人保守着原有觀念，自然會覺得新來的越來越難懂，作品多「晦澀」，甚至「不通」。正如承受這個變，以為每個人有用文字描寫自己感覺的權利來寫作的人，也間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為「平凡」。作者既如此，讀者也有兩種人，一是歡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歡喜寫得較有曲折的。這大約就是為什麼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寫文章看不懂，恁的意思以為是這些人

獨立評論 第二四一號 關於看不懂(二)(通信)

無使人明白的表現能力。據我意見，恁只說中一半。對於某種莫明其妙的摹仿者，這話說得極有道理。但用它來評當前幾個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實似乎稍稍不合。事實上當前能寫出有風格作品的，與其說是「缺少表現能力」，不如說是「有他自己表現的方法」。他們不是對文字的「疏忽」，實在是對文字「過于注意」。凡過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寫來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時期為多數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領用他的新風格征服讀者，他決不會與多數讀者一致。) 不特較上年紀的讀者不懂，便是年事極輕的人也會不懂。不過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擔心文學的墮落，後者不懂(如一般學生)，却摹仿得一塌胡塗罷了。

其三，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就作者說，他認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點，這特點在故事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讀者說，讀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數，只是受一個成見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讀者，作者當然就會多起來了。

其四，由第一點看去，中國新文學即或不能說是在「進步」，至少我們得承認他是在「變動」。目的思想許可它變，文體更無從制止它不變。就它的變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經「大」，然而却可說它範圍漸漸「寬」。它固然使

中學生樂于摹仿，有不良影響，容易引起教員的頭痛，對新文學的前途担心。但這些漸漸的能在文字上創造風格的作者，對於中國新文學的貢獻，倒是功大過小。它的功就是把寫作範圍展寬，不特在各種人事上失去拘束性，且在文體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發展的機會。這自由發展，當然就孕育了一個「進步」的種子。

適之先生，如今對當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傾向表示懷疑的，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表示憐憫的，是一個文學革命的老前輩，這正可說明一件事，中國新文學二十年來的活動，它發展得太快了一點，老前輩對它已漸漸疏忽隔膜，中學教員因為職務上關係，雖不能十分疏忽，但限於興趣認識，對它也不免隔膜了。創始者不能追逐時變，理所當然。但一個中學教員若對這種發展缺少認識，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認為真真成問題的，不是黎如先生所說「糊塗文」的普遍流行，也許倒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在當前情形下，我們應當如何想法，使他對於中國新文學的過去，現在，得到一個多方面的合理的認識。且從這種認識上，再得到一個「未來可能是什麼」的結論。把這比較合乎史實的敘述也比較健全的希望，告給學生，引導學生從正面去認識一下中國新文學，這件事情實在異常重要。不過

關於教員這點認識，是儘他自己去努力好些？還是由大學校幫他們一個忙好些？中學教員既多數是從大學出身的，由大學校想辦法應當方便得多。

我這點看法假若還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們不妨就一般大學校中國文學系的課程表上，看看負責的對這問題有多少注意。檢查結果會有點失望，因為大學校對它實在太疏忽了。課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選的專組研究，有時還是必修課，一禮拜上兩小時或四小時，可是把明清「章回小說」的研究列入課表上的就很少。至于一個學校肯把「現代中國文學」正式列入課程表，作為中國文學系同學必修課程的，那真可說是稀有的現象。（有的學校雖有一兩小時「文學習作」，敷衍敷衍好弄筆頭的大學生，事實上這種課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學生有系統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學二十年來在中國的意義。）大學校對這件事的疏忽，我們知道有兩個原因，一是受規則影響，好像世界各國大學都無此先例，中國當然不宜破例，減去文學系的尊嚴。二是受事實拘束，找這種教授實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還是「習慣」。負責的安于習慣，不大注意中國特殊情形。臨到末了，我們不能不說各大學負責者對於這問題認識實在不夠。因為他如若明白中學生讀的課本雖一部

分是古典作品，其餘所看的書大部分都是現代出版物，中學生雖得受軍訓，守校規，但所謂人生觀，社會觀，文學觀，却差不多都由讀雜書而定。感於這個問題的重大，以及作中學教員責任興味對學生關係如何密切，也許在大學課程中，會努力打破習慣，至少有兩小時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作為每個預備作中學教員的朋友必修課。若說教員不容易得到，為什麼不培養他？為什麼不再打破慣例，向二十年來參加這個活動，有很好成績，而且態度正當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設法？

編輯後記

△今年四月一日和六日的上海字林西報登載：三月廿八日廣東陽江地方的軍隊把當地的麻瘋病人捉去五六十人，全開槍打死了！這是當地美國教會辦的麻瘋區的報告，四月初中華醫學會在上海開會時曾為此事通過議案，向中央政府請求懲辦兇手，並保護麻瘋病人。——不料五月初北平上海各報又登出四月廿五日廣州市警察當局槍斃麻瘋病人男女二百十五名的消息。當時廣州當局即有否認的話。但五月五六兩日的北平晨報（香港珠江日報同）登

我想提出這個問題，請所有國立大學（尤其是師範大學）文史學系的負責人注意注意。且莫說一個教師對於文學廣博的欣賞力，如何有助於學生。只看看教育部課程標準，在初中一年級教本中，語體文即佔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語體文依然還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師在學校讀書時，對這方面的訓練，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學」，怎麼能「教」？這不特是學校的疏忽，簡直是教育部的過錯。我很盼望聽聽您對這問題的意見。

沈從文。六月十八日

適之

出很詳細的廣州航訊，說訪員于四月廿七日親身到槍斃麻瘋病人的地方——登峯路鑼鼓坑——探訪，親見「腥血滿地，縱橫有十餘丈」，並檢得死者遺物遺書，並親見埋葬的三個新塚，並訪問收殮屍首的仵工吳岳，一切都證實四月廿五日確有廣州市警察局長李潔之主持槍斃麻瘋病人二百十五人的事！但六月十一日申報登出中央社的南京電，還說廣東省政府呈復監察院，說「報載槍殺之說係屬謠傳」！

△我們對於這兩件最野蠻的慘殺案子，曾持很慎重的態度，曾托朋友訪問，不願意輕易評論。現在監察院已得着廣東省政府的呈復了，我們還不能相信這兩件事全屬謠傳。我們收到了評論此事的文字不少，我們現在發表嶺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周信銘先生的一篇最平實，最懇切的文字。我們爲人道起見，要求監察院不得以「查係謠傳」四字輕輕放過；我們要求監察院派監察委員多人親到陽江廣州調查事實，傳訊人證，切實勘問這兩件關係三百條人命的案子！

△在幾個月之前，我讀程滄波先生的先父景祥先生的行實，其中一段說：「府君從宜興徐公質初讀律習度支。徐公久遊浙中，持躬謹嚴，公牘疏稿，隻字必求核實；然待諸生嚴，相見不賜坐，行步不許著聲，所以督責困練其弟子者備至。府君刻苦力學，前後七年。」我讀了這一段，很感覺興趣，就寫信給滄波先生，請他用景祥先生年譜裏的材料寫一篇「四十年前一個讀律學生的生活」。滄波先生現在把這篇文字寫了寄來了，這是一篇富於歷史興趣的文字，其中泛論的部分也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當日專掌刑名錢穀的幕客在過去的政治制度裏的地位。其中記載那位徐師爺教育讀律學生的方法，不但是刑名學的史料，

並且是教育史的好材料。

△前一期（二三八號）我們登出一封討論「看不懂的新文藝」的通信，引出了知堂先生和沈從文先生的兩篇很有趣味的通信。他們都是最富於同情心的文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值得我們平心考慮的。

△從文先生表示很盼望聽聽我對這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問題，將來很想寫一篇文字，現在只能簡單表示一個意見。乾脆說來，我十分同情於「有他自己表現的方法」的作家，更同情於「對文字過於注意」的努力。但我的同情有兩個條件：第一，「有他自己」可不要忘了他人，文字的表現究竟是爲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事業，如果作者只顧「有他自己」而不顧讀者，又何必筆之於書，公布于世呢？第二，世間自有「過於注意」而反不如「不過於注意」的。過猶不及，是一句老話；畫蛇添足也是一個老寓言。知堂先生引的譚理斯的話：「若從天才之職來說，那麼表現失敗的人便一無足取」，這句話是很公平的。如果我說的「表現能力太差，根本就沒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領」一句話使從文先生感覺不平，至少我可以說：有表現能力而終於做叫人看不懂的文字，這也未免是賢智之過罷？

△從文先生的通信裏說起「嘲笑明白易懂爲平凡」的

風氣，這正是我說的「賢智之過」。我的愚見總覺得「明白易懂」是文字表現的最基本的條件。作家必須先做到了這個「平凡」的基本條件，才配做「不平凡」的努力。今日「越來越難懂」的文學，似乎總不免受了「不甘平凡」一念的累罷？

△對於從文先生大學校應該注意中國現代文學的提議，我當然同情。從文先生大概還記得我是十年前就請

他到一個私立大學去教中國現代文藝的。現代文學不須顧慮大學校不注意，只須顧慮本身有無做大學研究對象的價值。

△第二三九期裏論「國勢普查」的劉南溟先生是中央大學統計學教授，我在編輯後記裏誤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所員，敬此更正。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冊
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
號費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册四元
平裝二册二元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本館所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後或能領悟，惟因出版已久，迄今社會其多變遷，學校課程亦屢有更新，為應目前需要，重實科目起見，特澈底改編或新編，務使讀者在短時間內能將各科之知識整理而貫之，以作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士亦可用作各科常識讀本。各科內容悉按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銜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社表解參考書等之精華，編排採表解式，主要事項大致歸納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重要近年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酌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各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袖珍版式，茲將書名列下：

本館所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後或能領悟，惟因出版已久，迄今社會其多變遷，學校課程亦屢有更新，為應目前需要，重實科目起見，特澈底改編或新編，務使讀者在短時間內能將各科之知識整理而貫之，以作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士亦可用作各科常識讀本。各科內容悉按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銜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社表解參考書等之精華，編排採表解式，主要事項大致歸納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重要近年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酌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各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袖珍版式，茲將書名列下：

下列七種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書名	冊編	者定	定價	特價	
算術	一	繆師曾	二五	一八	
代數	二	金桂超	五〇	三五	
幾何	二	金桂超	五〇	三五	
平面三角法	一	國文編	二五	一八	
植物學	一	馬光斗	二五	一八	
動物學	一	劉經人	二五	一八	
本國史	二	周景濂	六〇	四二	

下列六種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書名	冊編	者定	定價	特價	
生理衛生	一	程翰章	三〇	二二	
物理學	二	張開圻	四〇	二八	
化學	二	舒貽上	四〇	二八	
外國史	二	李崇厚	六〇	四二	
本國地理	二	曹下摩	六〇	四二	
外國地理	一	陳豪	三五	二五	

郵費每册二分半 掛號費外加

各科精華 薈萃無遺

表解詳明 瞭若指掌

應試準備 事半功倍

特價發售

概照各書定價七折計算
自出版日起至十月十一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二十六年國家總預算

英日談判的前途

不黨者的力量

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

經濟計劃與統制

進步的基礎

編輯後記

陳岱孫

張忠絨

陶希聖

胡適

趙迺搏

任鴻雋

適之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鎮江	揚州	南通	徐州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濟寧	臨沂	鄭州	開封	西安	蘭州	西寧	成都	重慶	昆明	貴陽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廣州
佩文書局	華英書局	開明書店	中央書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獨立評論

第二四二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廣州	汕頭	梅縣	瓊州	梧州	柳州	南寧	海口
開通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電：東局一〇六五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二十六年國家總預算

陳岱孫

二十六年度國家總預算案，已于六月二十五日經立法院第一百零九次院會審查通過，並于七月一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佈，于本會計年度初開始執行。根據本年三月修正的預算法，會計年度原定的以七月為開始期的制度，將于明年一月起，實行這個新修正的預算法之後，改用一月為開始期的制度。所以二十六年度國家預算，是七月制最後一個預算。

本年度預算的總數收支各為一，〇〇〇，六四九，四九六元。以較二十五年度的九九〇，六五八，四五〇元多了九，九九一，〇四六元。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百分之一。在今日對外對內處處需錢情形之下，九百餘萬不能算為很大的數目。不過處民窮財盡的今日，這也不是渺小之數了。

支出項下最大的項目有四個：（一）軍務費，經常臨時二項合為三九二，四九九，九五二元，佔全部預算百分之三九，二二。以較諸二十五年的三二六，七二七，六五五元，增加了六五，七七二，二九七元。這個增加的數目不

為不大。不過據某負責專家聲稱：「軍務費中有各省軍費七千餘萬元，或由補助費移列，或屬新增者，于軍政軍令之統一關係甚大。軍政部管理經常軍費歷有不敷，此次編造軍務費預算，事前由軍政財政當局協商妥定，並相互聲明，此後依照預算執行，不再如以前年度之請款追加預算。」這個聲明，一方面可以解釋二十六年預算中補助費一項，由二十五年一〇五，二九一，六六〇元，減為三一，〇〇五，〇七六元的原因，而另一方面表示過去預算案中的軍務費的數目與實際開支相差甚多。實際的開支總是超過預算，而追加預算變成一個經常的辦法。這種辦法使預算變為具文，而失了它的用意。我們希望本年度的預算果然能依照法定數目執行，不再如以前年度之請款追加預算等等，則軍務費雖然有如此鉅額的增加，而尚有準繩可守。

（二）債務費共為三二四，六九三，七五四元，佔百分之三二，四五，以較諸二十五年之二三六，六四一，九〇八元，增加了八八，〇五一，八四六元。換言之，就是增加了百分之三七而強。這個增加的數目實在可觀。二十五年

度並沒有發行巨量的國債。則以這個債務費的大部分還是前此所遺留下來的負擔。我們十年來以舉債度日。債負的日重是這個政策的自然結果。前年政府因為債負太重，發行統一公債，換債利率較優的舊債。這個辦法固然可以暫時蘇解政府的困難。然而舉債的政策並沒改變，統一公債的發行額較所抵換的舊債額已經多出一萬八九千萬。同時還有三萬四千萬元的復興公債。這是一大筆，此外還有小額的債務，此不列舉。只要我們還是繼續舉債，一債本身的好壞與債的用途是另一問題——債務費與年俱增無可避免。然而八千八百餘萬確是巨大的數目，恐怕除「本法令契約無可節減」的理由之外，還該有一點具體的解釋罷。

(三)建設事業專款基金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百分之七。這是一個新的項目。然而廿五年度預算中有國有營業資本支出費九六，三三七，七二〇元，及建設費五二，七一四，七二一元。廿六年度預算案中就沒有這二項。大概這三項費用的性質大可以相同。不過「國有營業資本支出」一辭較為具體，而「建設事業專款」一辭較為廣泛，較為活動。若以數字論，則「建設事業專款」較諸「國有營業資本支出」及「建設費」二者的合計數，尚少七九，〇五二，四四一元，所以只就昏上數字來說，二十六年用在

建設事業上面的預算，還不及二十五年度的一半，雖然事實上二十五年度的建設支出並沒有照着預算開支。(四)財務費共計六九，二三二，〇九〇元，佔百分之六，九二，以較二十五年之六四，五一五，五六六元，增加四，七一六，五二四元，立法院于通過預算時，以財務費為太大，建議「切實核減以節糜費」。財務費幾佔總預算百分之七確是太大。這是一向積重難返的情形，然而在現行制度之下，加上加重緝私等工作，這四百餘萬的增加能設核減到如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綜上列四項支出，它的總數已經佔總支出百分之八五，五九。其餘，除教育文化費佔百分之四，二八，補助費百分之三，一〇，國務費佔百分之一，七九外，每項所佔，皆不及百分之一。所以只就節流一方面說，似乎我們不能不注意這幾個首列的大項目。

收入方面仍以關，鹽，統三稅為大宗。(一)關稅收入為三六九，二六七，五二三元，佔歲入百分之三六，九〇，較二十五年之三一七，九七三，五一四元，增加五一，二九四，〇〇八元。(二)鹽稅為二二八，六二五，五五四元，佔百分之二二，八五，較二十五年之一八九，一八七，二二五元，增加三九，四三八，三二九元。(三)統稅為一

七五，六一七，六五〇元，佔百分之一七，五五，較二十五年之一三二，七九六，一一七元，增加四二，八二一，五三三元。以上三項合作數已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七七，三〇。其他如菸酒稅佔百分之二，二〇，印花稅百分之一，一三，所得稅百分之二，五〇，國有事業百分之一，四一，國有營業收益百分之一，六一，則爲次要收入。所餘者，（除其他收入包含雜項收入佔百分之九，九三外）如礦稅，交易所稅，銀行稅等收入，與總歲入之比數，皆在百分之一以下，則更爲次要矣。

收入方面一個特殊的現象，是沒有債款一項，而昏上收支也能平衡。細以我們過去財政，專以舉債過日的習慣，這確是一樣希罕的事情。然而這個昏上樂觀的數字，果然可靠嗎？我們確是有一點懷疑。我們歲出比去年加多，出入的平衡當然不是從「節流」得來的。在開源方面，我們只有求于舊收入的增加與新收入的創立。二十六年年度預算案似是在昏面上做到這兩層。關，鹽，統三稅，本年度預算比去年度的預算合計增加了一三三，五五三，八七〇元，此外所得稅增加了二千萬元，菸酒稅增加四千餘萬元，礦稅，國有事業，協款收入，行政收入等項增加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而交易所稅，國產收入，國有營

業純益，及其他收入等項，尚較去年爲短收。此外則正在籌劃舉辦的遺產稅，列入二百萬元。這算是新開的財源。遺產稅何時舉辦，我們還不能確定的說。就是果然辦了，這二百萬元的數目，在二十六年度中，並不能算爲很大的「開源」。至于舊收入的增加，除所得稅外，其餘主要增加的收入都是消費稅。這一年來，世界經濟情形逐漸好轉，中國也未能例外。經濟好轉的一個結果，就是人民購買力的增加，或是說消費的增加。消費的增加當然可以增加消費稅的收入。然而我們預算中所期待的各項消費稅收的增加，尚不止靠這個自然的增加，而一部分是要靠增高稅率的力量。統稅中，捲烟，棉紗稅率都已提高，其他統稅貨品稅率的提高，似乎也在擬議中。鹽稅，如果市斤公斤的條文真照政府的建議更改了，也就是變相的加率。我們承認，如果國內經濟情形好轉，許多的稅收可以自然增加。我們也相信，在適當範圍之內，稅率的增加也可以增多稅的收入。不過在現況之下，所增的數目能否如預算案所期待如是之多，大可懷疑。例如關稅一項，期待的增加是五千餘萬。經濟好轉，出入口貨多，稅收旺，是可能的。然而增加有如是之驟嗎？況且年來走私甚熾，雖然各方面多力緝私，而私貨尚是充斥市面，這是關稅一個大漏洞。我

們有否一個有效的方式塞這個漏洞？若沒有，則關稅增收就有點不可靠。至于鹽稅，我們已有的稅率已經不輕。在現稅率之下，一部分人民已經只好淡食，或買食硝鹽。稅率再加重，就是重苦小民了。只就收入論，會不會產生如許巨量的收入，也是可疑。至于統稅也許尚可負點負擔，然而稅的飽和點也是應該注意的。所以就這幾個主要期待增收的稅來說，雖然都有增收的可能，而都未必能達到所期待增收的目的。惟有所得稅一項，二千五百萬的收入大概可靠。因為廿五年度所列的五百萬原來是隨意加列的。除此之外，其他期待增加的收入為數甚微，實現與否，並不生嚴重的問題。總之，我們覺得這幾項收入的估計未免過于樂觀。而收支不賴債款的平衡，恐怕只是昏而上的希望。

在通過本年度預算案時，立法院向國府附帶建議四項：（一）建設事業專款一項，只另編概算送立法院查照，與法令不合，應編成預算，送立法院審議；（二）營業預算迄未編送立法院審議，自下年度起，應依法編造送院審議；（三）庚子賠款，及其他特種基金預算，自下年度

起，應依法編造送立法院審議；（四）財務費應切實核減。立法院這幾個建議都很確實合理。然而我們因之聯想到現在政制問題與立法院的地位了。現在的立法院不是一個人民代表的機關，而是一個技術的機關。它對於預算的地位是有點特別的。一方面是執行收支的行政機關，它們對於預算的支配當然有很大的力量。有時候也許還覺得這種立法審議的手續為麻煩，而率性置之不理了。另一方面，又有中政會為決定概算的機關。中政會在決定概算時已是把預算的輪廓確定了。根據概算案所造的預算案，所餘者，不過是細節，手續種種問題。介于二大之間，立法院對於預算的權限自是有限。在黨治現政制之下，中政會是最高決定政策的機關，國家財政的計劃當然由這個機關決定。所以就是一切通常，特種預算，都依法由立法院審議，而其實立法院所做的也只是技術工作。有人疑問，為甚麼在其他國家議會中，預算案的討論是一個大事情，而在我們立法院，預算案總是很順利的照案通過。政制的不同，或許是一個重要的解釋罷。

廿六，七，四日。

英日談判的前途

張忠絨

最近一個月以來，英日兩國間談判的聲浪甚囂塵上。

這件事，無疑的將影響到中國，遠東國際關係，以及世界國際關係的前途。談判的內容，據我們所能想像的，與報紙上的紀載頗相彷彿，大約不外：（一）中國問題；（二）英日兩國間的商務問題。這種談判既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對之自應嚴重關切。在這篇短短的文中，作者無法詳論英日談判的各方面，只擬將這個問題對於我國的關係扼要敘述，以就正於讀者。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在中國境內得寸進尺；直到最近兩年，英國在中國境內的商務利益處處遇到日本的威脅。在東北四省境內，門戶開放原則，在事實上已成過去。在中國的北部，因日本的勢力侵入與走私的結果，英國的利益也大受威脅。日本的勢力如長此蔓延，則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重要利益亦將感受威脅。這是英政府現時對日不得不採取積極政策的第一層原因。

在過去數年中，日本對外貿易的發展，其速度至為可驚。在英帝國的各處領土中，日貨的侵入，也使英國的貨

品受到嚴重的壓迫。這是英政府現時對日不得不採取積極政策的第二層原因。

自從德國的希特勒登台以後，歐洲國際間的關係日趨惡化。德、意、日三國的威脅，使歐洲與遠東與世界整個的和平隨時有破裂的可能。此種局面如任其長久繼續，則和平終將不能維持。英國是利於維持和平的國家，故英政府不得不趕速採取積極的政策，以求得各項國際問題的和平解決，安定現時不穩的狀況。這是英政府現時對日不得不採取積極政策的第三層原因。

英政府對日既須採取積極政策，而英國的利益又需要和平，於是英政府乃一方對日施以相當的壓力，一方誘導日本與之談判，以求得和平解決的方式（英國現時對德對意的政策大致亦與此相同）。

上述是英國政府現時贊成英日談判的主要原因。

至於日本，因九一八事變後，各國對之莫可如何，以為從此以後，日本可以獨霸東亞，於是一方盛倡亞洲門羅主義，一方拒絕歐美列強干涉中國問題。

最近兩年來，因英國積極對日施以壓力，因俄國實力日臻強盛，因美國充實戰爭準備，因中國統一告成；而同時日本經濟能力已有捉襟見肘之勢，國內政局復日益不安。日本政府內審國力，外察國際形勢，始稍悟日本欲嚴格實行日本所謂之亞洲門羅主義，完全拒絕歐美列強干預中國問題，日本一時尚無此能力。此日本政府之所以贊同與英國談判中國問題，而不堅持其他國不得干預中國問題之主張。

上述是日本政府現時贊成英日談判的主要原因。

英日兩國政府現時既都願意相互談判中國問題，我們不妨於此推測英日兩國政府對此問題所持的立場，因而推測兩國談判的前途。

從英國的方面講，英國的主要目的在保全英國在中國境內的利益。英國在中國境內的重要利益，集中在華中華南兩處。英國在華北與東北四省境內的利益比較微薄。此所以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幾年中，英國對於東北事件甘守緘默。逮至日本在東北四省境內採取門戶關閉政策，同時復積極侵入華北，英國始感覺到，不僅止英人在東北四省與華北境內的利益將遭遇損失，而因華北鄰近揚子江流域之故，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主要利益亦大感威脅，於是英

政府對遠東的政策遂不得不由消極而轉趨積極。（於此，讀者請參閱拙著，五年來的英國遠東政策，載在外交評論八卷二期，三期。）

據作者個人的看法，此次的英日談判，如能繼續舉行，則英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立場將如下述：（一）對華南華中兩處，英政府將絕不肯放鬆英人既得的利益。（二）對東北區域，英政府或將採取下列的談判方式：（甲）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但要求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與國聯的決議案，在名義上，取消『滿洲國』。（乙）上述（甲）種方式如辦不到，則英政府或將表示願意承認『滿洲國』，而要求日本担保東北四省境內的門戶開放。但英國之承認『滿洲國』，必須先徵得國聯中國與美國各方的同意。（丙）上述（甲）（乙）兩種方式如均失敗，而東北四省以外的問題如均獲得圓滿的解決，則英政府或將承認滿洲國，而同時放棄東北四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三）對華北區域，英政府將先主張，日本應退出華北，恢復榆關事變以前的情勢。上述如辦不到，則英政府至少將主張在華北境內必須維持門戶開放原則與中國的領土完整，而在事實上不妨容忍日本的較大權益。

從日本的方面講，日本的主要目的在獨力支配中國，

驅逐歐美列強在華的勢力。這是日本近數十年來一貫的國策，而達到這種國策的期間與方式，自當依照各方的環境而定。日本現時既肯與英政府談判中國問題，是日政府已感覺上述的日本國策一時不易實現。

據作者個人的看法，此次的英日談判如能繼續舉行，則日本對中國問題的立場將如下述：（一）對華南華中兩處，日本將承認英人既得的利益，與門戶開放原則。（二）對東北區域，日本將主張維持現狀，并要求英國承認。此層如辦不到，則日本將主張撤開東北四省問題不談，而任聽現狀延長。（三）對華北區域，日本對中國的領土完整或可承認，但要求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有特殊的地位或權益。此層如辦不到，則日本或將放棄，日本請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有特殊地位的要求，而對於日本在華北已獲的非法權益不肯退讓。

觀乎上述，是英日兩國間的談判，關於華中華南兩處，不致發生爭執或障礙。關於華北，英日兩國間談判的爭執將繫於日本在華北境內已獲的非法權益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對於這種權益肯否退讓。日本如肯退讓，將退至如何程度。英國對於日本在華北的這種非法權益能否容忍，容忍至何限度。關於所謂之『滿洲國』，英日兩

國間談判的爭執將繫於英國是否願意放棄東北四省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至於承認『滿洲國』之問題，其關鍵不在英政府本身，而在英政府如何求得中國，美國，與國聯之認可。若英政府不能獲得上述各方的認可，則英政府勢將不能只為求得對日之妥協，而犧牲中美兩國之友誼與國聯之原則。且對於承認『滿洲國』問題，英政府如不能獲得中美兩國之諒解與國聯之認可，則英政府如冒然承認『滿洲國』，則英國輿論亦將反對。

上述是作者對於英日談判關於中國問題扼要的簡單推測。當然，英日談判的內容不僅限於中國。英帝國對日整個的關係亦須談及。且英日兩國間的談判，如果獲得相當成功，時機一熟，則英國必將邀約其他太平洋上的國家共同或個別談判，以謀解決彼此相互間的問題，并進一步以謀太平洋上的永久和平。是英日兩國間的談判能否成功，固不專限於中國問題的能否解決。而中國問題的能否解決，固亦不專繫於英日兩國政府的態度。此次英日兩國間的談判，當視為太平洋上各國談判的起點。不過英日談判如果能獲得共同的諒解，則此後太平洋上各國間的共同或個別的談判，必將以英日兩國為主角（至少在幕後），而以英日兩國間成立之共同方式為出發點。

英日兩國間此次的談判，對於我國的關係既如是密切，如是重要，我政府似不應只作消極的主張。若我政府切盼和平，希冀英日談判成功，則我政府尤應及早提出具體的主張，積極在外交上有所活動。我政府若只宣言，英日談判的內容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必須徵得我國的同意（據報載如是），那是不夠的。那只是消極的辦

不黨者的力量

陶希聖

一 就黨的支持者來說

我兩次寫文談黨禁問題，也許使人起兩種感想：一則感想到我的黨味很濃，二則感想到我太重黨禁的開放，感想到我主張多黨政治。如果有人起這樣的感想，至少對於我的意思是不合的。關於第一點，我始終是一個拿粉筆和毛筆的人，沒有工夫和興趣做黨的工作，沒有什麼多說的必要。

民主政治是不是定要有多黨林立？這是一個可爭的問題。在目前，黨禁開放的樣子，已經有不少的人在回想民六民七。在門首挂一塊牌子，就算得一個黨的日子。什麼這樣幻想着呢？因為他們以

法。等到英日談判一旦成功，那時再來徵求我政府的意見，則我國已處於被動的地位。反對未決定的提議，較之推翻已議成的方案，其難易是大有區別的。

本文的目的只在討論此次英日談判的一方面。英日談判的其他方面或將留待日後討論。

爲民主政治就是多黨政治。要行民主，必開黨禁。黨禁既開，組黨的機會就到了。我不組黨，更待何人？今不組黨，更待何時？我首先要說：這是幻想。一個黨，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如果以爲一宣傳，一組織，就可以號召青年，組成一黨，這是不對的。青年們雖一時可以烘得起來，却難得做一個永久的黨員。青年容易相信有歷史有基礎的黨，却難得相信一位光桿黨魁。如果以爲一下子把依賴自己吃喝的小官吏集合爲一黨，這個黨只是官吏一團，此外更無社會基礎，值不得叫做一個黨。民六民八是政治勢力分化到極點的日子，現在的政治勢力非常集中。在大黨的勢力沒有傾壞，並且很是隆盛的今日，門首挂一塊牌

子就算一黨，只是表現這門口以內，住的是一位政治神經病者而已。

這並不是說今後的政治只是一黨政治。爲了引導別的黨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應當而且必然有承認他們的一日。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政治變成三十年前的英國兩黨迭掌政權的政治了。中國的政治，最可能的趨勢，是國民黨執權，不過容許一兩個支持這個政權的他黨合法活動。爲什麼呢？對外的形勢，不許政府因更迭而起動搖。國內的形勢，國民黨又是最大的力量。這兩層就是爲我們作這樣的推測。

一個黨的力量，不在於黨的組織以內的黨員之特多，以及黨員的訓練特精。組織及訓練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支持這個黨的人口之多。黨的力量，在於支持他的不黨者。不黨者的力量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不黨者在平時是最容易被操縱或被抹殺的。他們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在平時並不關心。黨的宣傳，對於他們，並不受拒絕，也不受歡呼，也許受他們一時的歡呼。但是黨的宣傳爲「甲」時，受了歡呼，改爲「乙」時，就被拒絕了。這種人，在平時容易被急燥的黨員叫做落後分子。但一到緊急關頭，這些落後分子的力量立時表現出來。他們的觀察是很具體的，

很堅牢的。緊急關頭一過，他們又不動了。

在中國，不黨者的數量最多。在學生裏面是這樣，工商業者尤其是這樣。農民就不用提了。通常的宣傳員也許容易想到農民是愚蠢的。其實他對於他自己的打算是別人不可及的專家。通常的組織員也許容易看不起多數不問時事的學生，但到大問題到來時，他們才是真實的力量。甚至於最厭惡政黨的職業人口，正是最能支持政黨的人口。

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好處，是讓不黨者有表現他們的意見的機會與制度。在平時，他們各自營謀自己的事業與生計。他們從自己的事業與生計上，深知某種政策或法令的利害。到了一個時機，他們有一個方法，把他們的意見表示到實際政治上去。這一票的投下，固然免不了受政黨的指示或操縱，但是這一票正是不黨者支持政黨的一條柱石。無論政黨的組織宣傳多好，不受他們的支持，是不能持久的。

不黨者的力量可以從投票表現，也可以從別的方法表現出來。這一年，農民受暴動者的宣傳，那一年他們對於同樣的宣傳起了反感。這一月，學生受宣傳者的鼓動，下一月他們不受了。消極的接受不接受，何嘗不是他們表現力量的方法？

如果我們看重不黨者的力量，我們就可以推測民主政治開始實行以後是不是一定變成多黨政治，是一問題。黨禁縱開，能有多少黨存在和發展，也不會盡如人意。

二 就國的建設者來說

革命以後，如果政權趨於安定，就有一個建設時期。在革命時期，到處都需要黨員的活動。在建設時期，那種活動不獨不很需要，並且遭人厭惡。建設時期，有力的活動是勞動民衆和技術科學人才。民衆是不黨者，上段已經說過。技術科學人才雖不一定全是不黨者，但是他們的活動，不是以黨員的資格做黨的宣傳組織工作。他們是在施展他們的專門學問，專門學問是不分黨界的。

在建設時期，不獨是鐵路工廠的經營需要技術科學人才，政府自己也變成技術組織。立法政策固然由執政黨來決定，立法技術非專家不行。司法審判當然是法學家的職務。行政的技術也一樣要專家指導，要專家執行。全政府組織裏面，不過少數政務官有黨，其餘多數事務官便都是以不黨者的資格來活動。

這時期，不獨所需要的是不黨人才，並且黨的活動如

果仍然在技術組織裏面活動，還成爲一種分散的破壞的力量。普通政黨是宣傳團體。革命政黨是爭取政權並支配政權的團體。如果在技術組織裏面，到處有爭取政權的活動，或是人人都想做政權的動力，其影響所及，一定是紀律弛廢，秩序紊亂，妨碍建設的進行。

搖旗吶喊的戰場活動，只是可以用在一時。如果無論何時都捨不得這樣的活動方法，除了國家永遠不安以至於滅亡以外，只有自己碰壁。也許有些人在悲哀。爲什麼民十三國民黨改組以後，聲勢那樣浩大。爲什麼最近的許多同樣的舉動都很快的失敗了。他們應當知道：在今日，他們的社會需要遠不及技術科學人才的社會需要那樣大。何況不黨民衆不會支持他們的宣傳和組織。

不黨者的力量並不是隨意濫用得來的。所以今後的政治雖是民主政治，不見得就是三十年前歐西的多黨政治。民主政治的任務應當是宣達不黨民衆的意思，並不是助長搖旗吶喊的宣傳組織的黨的活動。預料將來的趨勢，雖不是一黨專政，也並不就是幾個政黨更迭掌權的局面。

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

胡適

最近有幾位朋友在獨立評論上討論中國憲政問題，我們得到的結論頗有出人意外的一致。我現在想把這個結論提出來，供全國國民的考慮評論。

人犯了規矩，同賽的人可以請求評判員公判處罰。這就是小規模的民主憲政。我們能遵守下棋，打馬將，打網球，賽跑的規則，我們也學得會民主憲政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結論的第一點是：憲政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學得到的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憲政並不須人「躬親政治」，也不必人人都能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種政權。民主憲政不過是建立一種規則來做政府與人民的政治活動的範圍；政府與人民都必須遵守這個規定的範圍，故稱為憲政；而在這個規定的範圍之內，凡有能力的國民都可以參加政治，他們的意見都有正常表現的機會，並且有正常方式可以發生政治效力，故稱為民主憲政。這種有共同遵守的規則的政治生活就是憲政，其中並沒有多大玄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須遵守「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進一步」的規矩一樣；就如同打馬將的人必須遵守馬將規矩一樣；就如同田徑賽的人必須遵守田徑賽規矩一樣。下棋的人犯了規矩，對方可以糾正他；打馬將的人犯了規矩，同桌的人可以拒絕承認；田徑賽的

我們的結論的第二點是：憲政可以隨時隨地開始，但必須從幼稚園下手，逐漸升學上去。憲政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唯一的學習方法就是實地參加這種生活。憲政的學習方法就是實行憲政，民治的訓練就是實行民治，如同學游泳必須下水，學網球必須上場一樣。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個「下學而上達」的程序是不能免的。所以我們幾個朋友都不贊成現行的國民大會選舉法的「普通平等」的選舉方式。我們主張先從有限制的選舉權下手，從受過小學教育一年以上的公民下手，跟着教育的普及逐漸做到政權的普及。這不是用教育程度來剝奪多數人的選舉權；這只是用選舉權來鼓勵人民讀書識字。我們也不贊成現在的人輕易主張「創制，複決，罷免」三權。這些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議制的民主憲政長久實行之後用來補充代議制之不足的。我們此時應該從一種易知易行的代議制

下手，不必高談一些不易實行的「直接民治」的理想。

我們的結論的第三點是：現在需要的憲法是一種易知易行而且字字句句都可實行的憲法。憲政的意義是共同遵守法律的政治；憲政就是守法的政治。如果根本大法的條文就不能實行，就不能遵守，那就不能期望人民尊重法律，也就不能訓練人民養成守法的習慣了。古史上曾有商鞅下移木之令，使人民相信他立的法是必須執行的。漢高祖請叔孫通制定朝儀，他的訓令只是這樣一句話：

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

叔孫通的朝儀草成之後，先在野外搭篷演習，演習了一個多月之後，叔孫通請高祖去參觀演習。高祖看了，說：

吾能爲此。

他然後令羣臣學習這個新朝儀。叔孫通的朝儀所以能發生效果，正是因爲它是一部試演過的易知易行的制度。如果叔孫通制定了一部理想很高而不能行的朝儀，漢高帝第一個就不能行，那一班酒醉妄呼拔劍擊柱的功臣也就不肯遵守了。漢高祖給叔孫通的訓令——「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真是今日制憲的金玉良言。我們主張，我們

的憲法裏必不可有一句不能實行的條文。例如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在中央爲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區及縣市爲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但我們查今年的國家預算案，教育文化費只佔預算總額「百分之四·二八」。憲法頒布之後，是否我們就能每年增加一萬萬元的教育經費呢！如果不能，這一條可以放在任何種人的論文演說裏，而不可留在憲法裏做一條具文！依此標準，我們主張暫時把憲草裏的第六（國民經濟）和第七（教育）兩章完全刪去。又依此標準，我們主張，憲草第五章（地方制度）裏的縣長民選和市長民選兩條，如果此時不能實行，也都應該刪去。至於國民大會職權之中的「創制法律，複決法律」，也決不是那每三年集會一個月的國民大會所能行使的，這一類的空文也應該刪去。這樣刪改之後，去年五月五日公布的憲草大概可以成爲一個字字句句可以實行的國家根本大法，可以做憲政的開始了。

二十六年，七月，二日。

（七月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經濟計劃與統制

趙迺搏

在國難深重的今日，全國的經濟力量應集中于國防力之增厚，及生產力之增加，斷不能因私人的利益妨礙民族經濟的建設。此理甚明，無待解釋。不過政府在經濟生活上之地位既日見重要，則其所負之責任也自然十分繁重。

欲統制全國之經濟，必先有整頓的計劃，須通盤籌算，妥為分配，以定各種建設進行之程序。切不可頭痛醫頭，腳痛治腳，零亂破碎，漫無系統。例如公路之敷設，鐵道之建築，若省自為政，彼此不相聯絡，結果釀成營業上之競爭，耗財勞民，莫此為甚。尤須切實者，公務人員有時欲在政績上有所表見，於是不顧實際上之需要程度如何，年築公路數千里，月設合作社若干所，報紙宣傳，競以擲瓶剪綵為榮，刊物所載，尤多歌頌之溢詞。此種虛驕的建設，其能增厚國防力者幾何？其能增進生產力者又幾何？故斯後建設應以國防力生產力為標準，不必好高為遠，僅求速效。

對於我國經濟建設之探討，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茲舉其荦荦大者五種，分述如次。

一，統制國內農產品，使全國人民的衣食二項可以自給自足，迺是根本要圖。對於復興農村的對策，簡言之應注意數點：（1）關於生產方面，應注意如何方能改良生產之環境，生產之技術，及生產之組織。在短期內應勵行墾殖，妥籌水利。（2）在經濟方面，應注意如何方能使農產品之價格比較穩定。荒地之面積不使日益增加。自耕農之百分數不使日漸減少。在可能範圍內，免除田賦附加，促進資金歸農。（3）關於運銷方面，應如何改良糧食分配制度，便利交通，低減運費，增設倉庫，調節盈虛。同時加徵農產品進口稅，保護農民利益。

二，民族工業之衰微，產品銷路日漸減退，實為我國經濟破產之一大隱憂。故統制工業尤為刻不容緩之急務。考我國工業衰落之原因，不外（1）捐稅負擔太重，層層剝削，價格不得不提高。（2）外貨傾銷之壓迫，以及外資企業之膨脹，使國內工業無從發展。（3）因交通之不方便，國內市場形成割據的局面，同時因人民購買力之降低，此割據性的國內市場便萎縮不振。有此諸因，所以我國重工

業之煤鉄既操諸外人之手。即輕工業之棉紡業麵粉業也都憔悴得可憐。挽救之道，不外（1）金融與工業應聯絡一氣，互相提携。（2）減少勞資糾紛，增進工廠效率。（3）改良管理法，使成本減輕。（4）提高關稅，保護國內幼稚工業。（5）取締外人在內地設立工廠。

三，統制國外貿易，減少不利的輸入，增加有利的輸出，庶幾資金不致外流。關於統制貿易所採之方略，除關稅保護政策外，應採用下列幾種制度。（1）定額分配輸入制。（2）實行封鎖制（對於某種商品）。（3）輸入許可制。（4）物品交換制。（5）外匯干涉制。（6）外匯限制制。（7）輸出獎金。（8）減免出口稅。以上數種，應于可能範圍內擇其可行者而採用之，庶幾生產與消費可以得到均衡的調節。蓋進口貨之管理，即本國消費之管理，出口貨之管理，即本國生產之管理，一為消極的抵制，一為積極的發展，雙管齊下，方能收效。

四，統制貨幣及金融，使國內物價可以穩定，迺近年來中央政府最大之企圖，亦近年來經濟建設中最大之成功。蓋自新幣制實行以來，法幣之信用日高，金融之組織以健，其他各種經濟建設當可逐漸推行。不過個人對於我國之金融組織認為有應改革者數點。（1）中央儲備銀行應

立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治之牽制。（2）中央銀行酒銀行之銀行，不當做普通銀行之業務以爭利。（3）對於農業金融應遵守期限長利率低之二大原則，向僻處鄉間努力擴充。（4）對於商業金融應向全國分佈，不可集中于沿海都市。並宜獎勵商業票據，創造短期資金市場，獎勵公司債券，創造長期資金市場。（5）發行權必須集中。如華北某省市年來濫發紙幣，流弊所及，不堪設想。

五，統制全國消費，使之合理化。個人在十五年前赴美過東京時，得有一深刻的印象，覺得日本國民有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力，但依舊保留着封建制度下的消費習慣。至于我國人僅有封建制度的生產能力，反而已養成資本主義的消費習慣。所以他們的經濟建設一日千里，我們則動輒懶做，債台高築。對於統制消費，我個人提出二點意見。（1）培養合理的消費習慣來替代不合理的消費習慣。所謂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別，一以民族生產力為標準。能扶助民族生產力或減少生產力之程度較輕者為合理。否則妨礙民族生產力或減少生產力之程度較深者為不合理。（2）消費的需要，以氣候的寒暖，以及職業性質，工作情形為標準而定。不應以傳統或社會地位的虛榮為尺度。年來新生活運動之勵行，對於消費之改善大有裨益。不過個人以為新

生活應由上層階級做起，因為祇有富貴之家，才養成不良的或不合理的消費習慣，至于勞苦民衆，生活尙且不能維

持，根本談不到新舊問題。

進步的基礎

任 鴻 雋

民國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諸君：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進步的基礎。因為我新從內地出來，曉得大家希望知道一點內地的進步情形，同時我覺得進步要有一個基礎，方纔不至於三前兩却，永遠達不到目的的所在。我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是要想趁這個機會來討論一下進步的基礎在甚麼地方？

我現在暫且把四川來做一個內地的代表，來講一講四川的情形。

我們要講目前的四川，不可不回顧一下過去的四川是個甚麼情形。過去的四川，大家都知道是混亂，黑暗，戰爭頻仍，民不聊生。至於產生這些禍害的原因是甚麼？大概說來有以下幾個。第一，是防區制度。甚麼是防區制度？就是一個地方由軍閥派兵前去駐紮。在那個區域以內，無論是師長也好，旅長營長也好，對於當地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有生殺予奪的自由全權，而且對於上官與國家也

不負任何責任。所以每一個防區，就等於春秋時代的一個小諸侯。在一省的區域以內，要供給幾千百個小諸侯，民力焉得不枯竭？生活焉得不困苦？不但如此，因為防區就是軍人斂財致富的寶山，擴充勢力的地盤，所以每一個軍人都要拼命爭到一個防區，以便滿足他們的慾望。這便是民國以來四川的戰爭獨多的一個大原因。第二、是人民負擔的繁重。我所謂負擔有兩種：一是田賦。大家曉得外間的田賦是每年一征的，四川的田賦在防區制度時代是每月一征的，那就是說，每年要征十二次。所以本年是民國二十六年，四川的田賦有已經征到民國百年以上的。如其四川在旁的方面不免落伍，在納稅方面却比其他省份前進了幾十年，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二是苛捐雜稅。四川苛捐雜稅的衆多，只要舉一個例便可以明白。我在成都看見民國十九年某商家的一張納稅單，由嘉定到成都不過四百里的路程，這個商人便上四十幾次的捐，而且因為沿途留難

也走了二十幾天才到。請問照這樣情形，商業如何進行？第三，是鴉片的禍害。我們曉得的四川原是產煙的地方。清末民初，經過幾次嚴禁才漸漸有消滅的希望，後來在防區制度時代，經過軍閥的提倡，又回到從前繁榮的狀況了。記得民國十九年，宜昌關一個地方出口的煙稅有四千萬元之多，其出產的數量也就可以想見。現經中央禁煙委員會嚴厲管理之下，聽說種煙可以分年禁絕。不過種煙能否如期禁絕尚是問題，而吸煙的人則不但不會減少，而且還有增加。這是甚麼原故？因為四川的鴉片是公賣的。公賣即無異於公開的推銷。我曾經在內地的一縣旅行，看見城內的「特許店」「吸戶管理處」隨處皆是。這些都是煙館的別名，即是官辦的煙館。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禁止人民吸煙，豈不等於掩耳盜鈴？第四，是交通的閉塞。四川的許多禍患，如像軍人的橫行，政治的腐敗，社會事業的不發達，人民智識的落伍，都可以說發源於交通的不便。交通的閉塞，雖然大半得之於天然，但天然的缺陷正要人為的力量去征服或改善，方可以談到進步。

以上所說的四件事，我們認為是四川黑暗混亂的原因，目前因為中央的力量到了四川，都有了相當的解決與進步。如防區制度，自川政統一，督察專員制度推行以

來，已算廢除了。但防區制度起原在於兵多。除非把軍隊裁減到某種程度以下，這個制度的威脅依然存在。如田賦的負擔，雖然由十二征減到四征，但加上各種地方的附加稅，仍有八征之多，這在饑饉荐臻的人民是負擔不起的，還有減輕的必要。如鴉片公賣，即於公然推銷，這簡直是拿民族做犧牲品以圖從中取利，與復興民族的政策背道而馳，非立刻改正及撤銷不可。如開發交通，現在雖有了四省公路的完成及成渝鐵路的開工，但非把川湘或川陝鐵路聯絡起來，四川的交通問題不算解決。

講到此處，我們以為一個地方的進步有自動的與被動的不同。被動的進步，並非出於真知灼見，或心甘情愿的要做，而是由於外力的壓迫不得不做。壓力一去，便可立刻回復原狀。這種進步，是敷衍一時的，是靠不住的。自動的進步，必須對於環境有明白的認識，對於事情有深切的了解，而且經過審慎考慮的結果，然後按着計畫逐步進行。這種進步才是真正的進步。換一句話說，真的進步，要有幾個心理的條件做基礎。這幾個條件是甚麼，我們在下面略為說明。

第一，正確的人生觀。一個人在黑暗的社會中處久了，最容易發生一種同流合污得過且過的人生觀。理想主

義幾次碰壁之後，便使你起一種滔滔皆是何必自苦感想。這樣你的行為便不知不覺的由進步的而歸到保守的了。其實社會上自有真是非，真善惡，除非你把是非善惡認得清清楚楚，如何能舍非而取是，去惡而就善呢？譬如軍閥是一切罪惡的泉源，我們不能當學生時便狗血淋頭的罵軍閥，回頭軍閥給你一官半職，你又神聖文武的恭維他了。小而至於對人接物的信用禮貌，我們都應該有一個不容假借的標準，不要圖一時的便利，甚麼都可以不顧。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我們要能辨別是非，而且勇於為義，才能說到進步。

第二，充分的現代智識。現代的事業，可以說百分之百都需要特殊智識，沒有現代的智識而想把社會現代化是不可能的。譬如說吧，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四川的水力怎樣的，但却無人能指出水力究竟在甚麼地方。又常聽見四川從古相傳的諺語說：「打開雷馬坪，世上無窮人。」但却無人知道打開雷馬坪的方法是甚麼。有人說，中國今日的大毛病，是以十八世紀的方法生產，二十世紀的方法

消耗。這個話前半句在四川是絕對正確，後半句在四川也有一部份正確。根本上都是由於現代智識的缺乏。現在要促進落後的生產，革除謬誤的現代的生活，都非有充分的現代智識不可。

第三，虛心從善的態度。一個人要求進步，必須先發見自己的缺點。一個社會亦然，要求社會的進步，必須先發見牠的不完備，不滿足。所以容納批評的虛心，是社會及個人進步的基礎。我對於四川一切的批評，是甚麼都有，甚麼都不見得好。換一句話，就是甚麼都有改良的餘地。這一句話，決不是鄙薄四川，而是對於四川抱有絕大的希望。但是要改良，必須先承認牠的不良。若是沒有這一點容納的虛心，那只好讓井底之蛙去夜郎自大了，還說甚麼進步。

以上三項，一正確的人生觀，二充分的現代智識，三虛心從善的態度，我認為是任何社會進步的基礎。尤其是文化落後的內地，應該特別注意。我們希望內地進步，不要忘記了培植基礎的工作。

編輯後記

適之

△本年度的國家總預算，上月廿五日才通過立法院。陳岱孫先生的分析與批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重要的問題。

△張忠絨先生去年休假出國，在美國住了半年，又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住了幾個月，最近才回國。他對於「英日談判的前途」的推測，當然是我們最願意知道的。我們特別贊同他在這篇文章裏建議我國政府對於英日談判應該提出積極的主張來。我們盼望我國的外交當局不要忽視了這個應該明白表示積極主張的機會。

△陶希聖先生在獨立上發表了兩篇開放黨禁的文字，今回又提出一個有趣味的問題來：論「不黨者的力量」。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趙迺博先生寫了一篇「寫在廬山談話之先」，我們因為篇幅關係，發表了全文的第一部分，題為「經濟計劃與統制」。這篇短文提出的都是大問題，我們很希望他將來能有機會對這些問題一一都有更詳細的發揮和更具體的主張。

△任鴻雋先生此次堅決的辭去了國立四川大學校長職務，是我們關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的。他在川大的兩年，真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個簇新的四川大學，我們深信他這兩年努力種下的種子不久一定可以顯現出很好的結果。這一次他寄來了一篇「進步的基礎」的講演稿子，是一篇很平恕的對四川的觀察和期望。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冊
售價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
另加掛
號費

推進社教·實施社教的要籍

社會教育小叢書

全部二十四冊·六開版式·精良紙質

定價七元 特價四元九角 國內郵費
二角三分

特價期：六月二十日起十月十九日止

全書子目及編著人列左

各國社會教育事業	陳友松	民衆閱報處	蔣建白
中國社會教育行政	蔣建白	民衆學校	蔣建白
圖書館	劉友松	識字學校	蔣建白
博物館	陳端志	職業補習教育	楊衛玉
教育館	彭大銓	特殊學校	李萬育
動物園	沈祥瑞	公民訓練	吳劍真
植物園	蔣希益	青年訓練	潘公展
體育場	江良規	通俗科學	李熙謀
電影場	徐公美	民衆讀物	徐卓呆
劇場	顧仲彝	兒童保護	錢弗公
通俗演講	呂海瀾	勞工教育	龐振鸞
無線電播音	徐卓呆	合作社	鈕長耀

概論社教事業的全部

融會理論實際於一編

社會教育之範圍極廣，與人民各方面的生活皆有密切的關係。近年我國人士已逐漸認識社會教育之重要，各教育行政機關亦正在努力推行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參考書實爲目前之一個急切的需要。敝館有見及此，特約請專家編著社會教育小叢書一套，共二十四種，內容包括社會教育全部份之各種事業。編著者皆爲專家，且多是從事社會教育之實際工作者，故所言皆以個人之體驗爲根據，至爲寶貴。凡辦理社會教育事業者，研究社會教育者，或對於社會教育有興趣者，皆宜購備本叢書。

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對於政府澈查投機的期望

陳之邁

國民大會的一個解釋

陶希聖

整軍與我國憲政前途

王贛愚

對暑期農村服務學生的希求

鄭林莊

復興農村與行政機構

李樸生

婚喪喜慶之簡單化

溥鳴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第二四三號

國民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本刊寄售處

廣州	南昌	漢口	武昌	南通	徐州	蘇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江蘇	上海	天津	北平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南大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對於政府澈查投機的期望

陳之邁

中國內政上近日來一件大事是上海紗布交易所的風

潮，及其所引起的官吏投機問題。市場背後有人操縱投

機，坐獲厚利，不自今日始；官吏利用其特殊優越的地位

從事於投機，亦不自今日始。但此次事件仍是中國政治

上最應為全國人士所最嚴重注意的事件，其原因有二：

第一，我國政府當局，特別是行政院蔣院長及實業部吳部長，發動雷霆萬鈞的力量來剷除這種所謂「高等犯罪」，

一方面用行政的力量澈底清查，一方面將高級的官吏——稅務署長吳啓鼎，蘇浙皖統稅局長盛昇頤——免職扣留，并發

動司法機關嚴究其犯罪的行為加以懲處。這是從前的政府所不願為所不敢為的，故值得我們注意。第二，我國的輿

論界對於這種事件向不能發表，不敢批評。但此次則若干報紙，特別是津滬大公報，却能刊載此事詳細的消息，并

且連載社評（七月三日，七月五日）及短評，痛切剖陳其利害。這也是我國輿論進步的表徵，值得注意。我們觀察

這次的紗交風潮及政府對於此事的應付方法，有幾點意見提出來供讀者參考。

我們須要認清中國歷來貪官污吏充斥的政治，不特是

國際上一件最可恥辱之事，貪官污吏不知耽誤了中國前進

多少時間，犧牲了中國多少自奮有為的機會。我嘗想中國

在清季維新之時，許多政府的功令在用意上是相當完滿

的，只是執行這種功令的人吞食了辦理維新事業的經費，

捏報搪塞以自肥，遂使那時的維新事業一敗塗地。譬如我

國當時朝野上下都注意到西洋堅甲利兵的模倣，用意未嘗

不善。我國現在仍然在模倣西洋的堅甲利兵。但是當時一

位福建船政大臣在一年之內便能發財二三百萬兩，甲午戰

爭之時，中國的火藥竟有是用砂土製成的！所謂「百廢俱

舉，一事無成」，貪官污吏應負其最大部分的責任。清廷

的政府雖然有權臣主張維新，當局也能體會維新的用意未

嘗不善，但是未能認清維新事業之收效在其澈底之執行，

更未認清澈底執行的障礙就在官吏的貪污。在民國初年袁

世凱當政時代，民國初造，朝氣勃勃。但是一般的官吏仍

然沿襲着往日貪污的惡風，一般的新政均因為這些貪官污

吏而一事無成，那時有一班官吏更明目張胆地操縱投機，

把持金融，他們不特立致鉅富，并且藉此得到了晉升之階。清廷及袁氏兩個政府之所以傾覆，它們之所以受到後世之唾罵，貪官污吏實爲其主因之一。貪官污吏之存在使得它們的法令完全不能執行，使得一切革新的設施均成了官吏自飽私囊的機會。這樣它們的威信日趨墮落，政績全無，而終於不免傾覆倒塌。由此可知一個政府之能否繼續存在，能否邀得人民的信仰，能否切實推行其政令，能否獲得優美的成績，都在乎它有無澈底剷除貪官污吏的決心及成效。

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對於這個嚴重問題，的確會極力的注意。它秉承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設立種種的監督官吏機關，造成一套複雜的制度。它會屢次用黨的決議及政府通令的方法表明其根絕貪污的決心。但是這種制度及法令仍然有一部分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往往牽涉到人事問題而不得澈底的解決。制度不可謂不備，法令不可謂不全，但是貪污仍然未能滅絕。這個現象有其根本的原因，前此我曾爲文屢屢申述；但是除了根本的原因以外，政府當局未能努力去運用官吏監督制度，未能切實執行官常的法令，也是政治之所以仍不免有貪官污吏的原因。我們對於此次紗布市場的風潮有無官吏在內，如有官吏在內是否

便是吳啓鼎盛昇頤二人，現在均不能判斷。但是政府如果能認真查究，不要像前此財部那樣具結了事，其中真相當然不難水落石出。我們所以對於政府的設施表示充分的希望就是因爲當局此次的確是立下了最大的決心。我們唯有希望政府繼續努力，標懸澈底的解決爲其不易的鵠的而勇往直前，這樣才能維持政府的威信，這樣才能邀得人民的信仰。

近日來關於此事的行政部分已告一段落，司法部分方在開始。我們的司法機關距離現代化健全化的權威尙相當遙遠，殆爲公認的事實。法院在偵查及審判案件時往往被人事的牽動而不能盡量維持獨立的地位。法院偵查此案之始，已聞各關係部分大肆活動，奔走說項。他們的目的在憑藉人事來牽動司法的尊嚴。我們觀察此案，希望我國正在萌芽的司法機關要潔身自好，不要因外力的壓迫或環境的惡劣而使法律及司法機關的尊嚴遭受一絲一毫的損失。同時我們希望站立在重要地位的人物激發天良，本着愛護國家愛護政府的熱腸，絕對不爲浮言所動，絕對不干涉司法機關的範疇，俾使其能達到完全美滿的結果。中國政治人事的成分太重要了，所謂法律解決，往往也是人事的解決；法律所不許者，人事往往竟使法律爲之通融。這次的

案件是最重要的案件，我們誠懇希望人事的成分能減至最低限度或甚至於完全泯除。

同時，我們願告政府的最高當局：司法機關只是國家的一臂（an arm of the state）。私人不能干涉司法固為現代國家的天經地義（此即所謂人事之混雜），但別由政府機關却應盡力為司法機關的臂助。在案件偵查之時，政府的各種機關應盡力供給有關的事實及證據，案件判決之後，政府的各機關尤應盡力執行法院的判決。不執行的判決等於無判決，深望政府當局能體會此旨而協助此案法律之解決。

一般人往日早知市場有人投機，且聞有重要官吏在中染指，但是却無人敢於將其內幕公開地揭穿。大公報中有一段話：

追憶兩三年來，全國盛傳有一小部分中上級官員，在滬為組織的投機，繪影繪聲，通國皆曉，上海市上更皆了解為公然之秘密。然而報紙不能載，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者，蓋其人大都接近權勢，藏身甚深，而方法甚巧，尋常人所不敢櫻其鋒，尋常方法亦斷不能得其底蘊。政府不問，誰人敢問？法律不究，誰人能究？（七月三日社評）

一報紙不能載，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是獎勵貪污的原因。輿論制裁是泯除貪污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固然有其揭發懲處貪污的機構，人民之督促是使政府不敢姑息，不敢「官官相護」唯一的制裁。年前我會說：

民主政治下的輿論遠較專制獨裁下為自由發達。在民主政治下貪污的懲處雖然由政府機關去執行，但是舉發的監督的則是輿論的機關。所以輿論若果發達，監督自然澈底，貪污也自然容易杜絕（本刊第一八四號）。

胡適之先生譯美國的 Muck-raker 運動為「耙糞運動」，而認為耙糞足以為貪污泯除的方法。他說：

我們中國也有句老話：「挑狗矢惹臭。」「耙糞可以使臭氣四揚，但耙糞也是除臭穢的最有效方法……這種「耙糞工作」只有民主政治之下可以存在。在言論不自由的國家裏，儘管有用軍法嚴懲貪官污吏的教令，然而如果報館發表財政官吏操縱公債市場的社論就可以得停止發刊的懲罰，誰還敢來捋虎鬚做「耙糞」的運動呢？（本刊第一九〇期）

中國的輿論現在還未到健全的地步，政府對於言論的自由還有種種的箝制，但是既為輿論機關，便應該盡輿論機關

應盡的責任，盡量的登載關於貪污的消息，盡量督責政府剷除貪污。在政府發動剷除貪污之時，輿論機關應竭力鼓勵政府使其前進，遇政府有姑容苟且之時尤應嚴正剷除其不當，以促政府的注意，以禁政府的軟化。關於這天的來

件，若干的輿論機關可謂已盡其應盡之責；我們只有希望全國的輿論界都能動員來鞭撻督率政府。官吏操縱市場太嚴重了，我們希望政府能夠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直幹到底。

二六，七，十。

國民大會的一個解釋

陶希聖

在野黨多主張今年的國民大會依孫先生十四年「北上宣言」所定的國民會議辦法召集。他們說這個辦法是民主的。依于這個辦法，各黨各派各職業團體外加學生團體，以至于各界各軍，都可以自舉代表參加。他們反對這個國民大會依於建國大綱所定的國民大會辦法來組織。

這個主張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但不知中國國民黨這樣的說法，有人問到這個問題。我當然沒有深知國民黨的主張的地位。我祇能夠說：倘如國民黨依於他們的黨綱來行事，這回的國民大會既不是孫先生的國民會議，也不是建國大綱的國民大會。甚至於這個國民大會也不是一年前各方所主張的國民大會。

爲什麼不是孫先生的國民會議呢？國民會議是當時在野的國民黨領導全國民衆團體，向北洋段執政政府的一個

民主鬥爭。在野的國民黨沒有方法讓無組織的民衆選舉代表，只有就當時的法團各舉代表。這是一。在野的國民黨在既成法團以內可以用黨團來領導，可使這樣產生的國民會議向段政府作有力的鬥爭。這是二。這個會議是一個民主的號召，在當時可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這是三。反之，今年這個國民大會，國民黨一則有方法使無組織的民衆出代表，所以代表不限于職業團體。二則這個國民大會是執政黨召集的，當不能使其成爲對自己鬥爭的組織。三則這次國民大會不是一個號召，乃是一定實現的議會。所以國民黨人似不願把這回國民大會當做「國民會議」來舉行。

這回國民大會是不是建國大綱的國民大會呢？也不是的。依於國民黨的黨綱，他們有兩條革命方略。一條是和

平革命，即上述的國民會議的號召。一條是流血的革命，即依於建國大綱，以武力肅清障礙，以中央權力與國民的民主運動提攜，然後于民主運動成就時召集國民大會，改組中央權力。如依建國大綱，則國民大會的全體代表都是三民主義者。爲什麼呢？建國大綱規定，每一縣完成自治時出一代表。每一省有過半數的縣完成自治，即爲自治省。全國有過半數的省皆成爲自治省，即召集國民大會。而縣的完成自治，有一條件，即全縣公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立即可以看出訓政時期結束後的國民大會全體代表都是三民主義者。反之，今年的國民大會並不以全體代表皆是自治縣的三民主義縣民所選舉爲條件。這個國民大會還有容許一些非三民主義者參加的趨勢。

在野黨當然不期望這回國民大會是一個三民主義一意獨開的建國大綱國民大會。他們如果期望這回國民大會是一個向於三民主義國民政府的大鬥爭，在事實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說這回國民大會既不是那個國民大會，也不是這個國民會議。

何以說今年的國民大會不是一年前各方主張的國民大會呢？九一八以前，國民大會的主張，只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裏面有人提過。九一八以後，國民黨內部的鬥爭之

外，黨外的國民大會的主張漸漸有力。過去的國民大會主張既只是國民黨內部的爭執，並沒有把黨外的勢力放在眼裏，黨外也沒有主張這個的，所以政府往往持拖延或拒絕的態度。二年以來，形勢變了。政府的對外準備與對內安定逐漸確實。國民黨內鬥爭漸歸消弭，贖下來的西南的矛盾，在最嚴重的時間，和平解決下去了。西安與陝北的和平解決，尤足見和平手段比軍事手段更能鞏固國基。西安與陝北的和平解決又是國民黨與黨外的黨的關係劇變的開始。三中全會因此一改過去拖延國民大會的政策而爲決不延期的決議。這個國民大會不再是國民黨對內的政策，乃是國民黨藉以與黨外和平共進的政策。他不再是政府動搖時期的鬥爭，乃是政府安定時期的開放。

由政府自己立場來說，假如在野黨對他用兵，他只有用兵來對付。換句話說，政府如遭危險，武力是必然使用的。反之，假如在野黨以和平方法對待他，他的武力自可不用。動搖促成獨裁，安定反趨民主。使安定的局面民主化，有幾個動因：一是國民黨自同盟會以來本是民主革命的組織。二是民主更可以增加政府的安定。三是一致對外的必需。由於這些動因，於是有決不延期的國民大會。

依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這回國民大會不是在野黨對

于政府的一大鬥爭，反而是政府對於在野黨的一大開放，——並且是政府較為安定以後的開放。所以這不是建國大綱的國民大會，不是北上宣言的國民會議，也不是國民黨內部爭執的國民大會。

說到政府對黨外的開放，又有兩點要加分析。

第一點是法律上的開放與政治上的競爭，兩者不免有抵觸。即令有抵觸，也是不足怪的。在法律上，國民黨以外的黨有競選權，這是一件事。在政治上，國民黨競選比較他黨便利些，甚至於他黨不能獲得議席，或有而不多。這樣一來，在國民大會席上，國民黨員一致舉手，可以通過他黨不願意的法案。這在民主政治已經發達的國家是常有的現象，在一黨專政初改的今日中國也是最可能的事情。

第二點是國民黨首領的態度與黨員的態度，兩者不免有不同。國民黨首領態度如不從狹隘改為寬大，不會有今天各黨可以相當活動的局面。但是他黨如因此期待國民黨員不來競選，或是需要國民黨扶助他黨獲得議席，都是不

可能的。黨與黨即令合作，也只是黨的首領的合作。如果一個黨的個個黨員都與他黨融合了，這個黨也就只是消滅的一條路了。

所以我在本刊二三九號「再談黨禁問題」裏說過：

國民黨外的黨能不能自舉代表而以某某黨的代表資格出席，這是很重大的問題。問題的重大不在乎人數和入選。問題的重大是在由於這種制度，國民黨外的黨就合法化了。

却原來，黨禁之開不開，不在乎具體規定，而在乎國民大會選舉和召集時是不是許別黨競選。即令不許他們競選，如果讓他們正式派遣代表，就算開放黨禁了。

這些話都是推測事實的發展所至而說的。在現在，各方面也只有從事實上着想來解決如何集中國力的問題。倘如在野黨只顧鬥爭，執政黨只顧關門，那就是把民主化的一步前進的樓梯給撤了下來。這是國勢民心所不許的。

整軍與我國憲政前途

王贛愚

近日來中央當局積極推行整軍，確是目前開始憲政聲

中惹人注意的一樁大事。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全國

上下莫不深切了解中央軍權之不完整，適足成爲建設真正統一的現代國家的最大障礙。整理編制紛歧系統不一的軍隊，當然要算是收拾時局的根本要着。關於整軍一項，中央雖早有通盤計劃，然實施屢遭挫折，直至最近數月內纔見順利無阻，如果沒有意外的曲折，將來定可澈底完成。

就大勢觀察，整軍既已依序進行，中央決不無故中輟，似乎非推及全國不已。陝變以後，整理東北軍隊，在人事編制及經理各方面業已具體解決。上月初在開封舉行豫蘇皖軍事整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亦有很好的結果。最近川康整軍方案，地方當局踴躍接受，川康軍的「國軍化」大致可成事實。除東北軍及川康軍外，尤值大家注目的，就是十年來高揚赤幟轉戰數省的共黨軍隊。本年三中全會決定對共黨方針，壓求解編紅軍，絲毫不肯放鬆，情勢所趨，紅軍終久也要歸屬國軍系統之下，殆意中事耳。至於其他亟待整理的地方軍隊，揆之情理，中央當不故意畏避，致遭功虧一簣之譏。老實說來，在短規幾月內，中央整軍能有這樣迅速的成功，的確給予國人不少的興奮和安慰！

最近中央整軍的成就，在主張憲政的人們，尤當格外注意到它的深遠意義。日前我曾寫「軍權統一與憲政」一

文（見天津益世報時論，六月十三日），竭力說明整軍的意義不特在於充實全國的國防力量，而且在於鞏固今後的憲政基礎。我以為軍權的統一是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軍權不統一的國家，始終沒有所謂「憲法之治」，而祇有所謂「軍閥政治」。我說過這樣一段話：

軍權統一是現代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一個國家以內，軍隊組織龐雜，系統不一，如果中央無法統馭，這個國家必定分崩離析而至於滅亡，還夠得上談什麼法治什麼憲政嗎？軍權統一是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這是毫無疑義的。從廣義上言之，憲政的精髓在於使國家實力的行使遵循法律的範疇，而不至違反維護社會正義的意旨。普通國家實力的具體表現，要算是軍隊，警察以及監獄等組織；然而軍隊的重要性却高超於其他組織之上，因為它的組織較宏大，機械較完備，紀律較嚴密，而且行動較迅速。軍隊雖然有這樣莫可比擬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有莫可比擬的危險性。何以呢？一般國家軍事組織完全以服從長官爲基礎，兵卒的一舉一動無不馬首是瞻，如果長官利用命令關係，使整個軍隊供其營私圖利，不只漠視民意，還要弁髦法律，儼

成一種「太上政府」，證諸實際，的確是最大可能的事。所以在憲政已上軌道的國家，軍隊可說是維護國家統一的利器；反之，在憲政未上軌道的國家，軍隊往往變成破壞國家統一的工具了。

不錯，不論那一個國家，在促進憲政的過程中，怎樣制馭軍隊，總成一個嚴重問題。這個問題讓我在這裏再加一討論。

軍隊是國家實力的主要表現，是從古至今國家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組織。可是歷來政治學者對於軍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是根本不提，便是不加充分注意，簡直令人百惑不解！據我個人所知，置重軍隊與政制的關聯的政治思想家，一是十六世紀的馬克維尼(Machiavelli)，一是十九世紀的特來斯克(Treitschke)。馬氏說：「優美法律和精良武備雖都是立國的基礎，然而前者不過是後者的附屬品。」特氏亦說：「以往政治學把軍隊看做外交的附庸，在政制上祇給它以隸屬的地位，這是絕大的謬誤。……如果強力(對內及對外)是國家的特徵的話，那麼，軍隊的組織必定為憲法上所應首先加以考慮的，……因為軍隊乃所以維護國家的存在。」這二氏的話實在值得研究政治學的人深深推敲的，雖然許多人不肯贊成他們的政治學說。

任何一個國家，倘無法制馭軍隊，使其成為自身的支柱，便是軍權分裂的國家。軍權分裂，無以絕亂源，更無以施行政治改革。國內各種軍隊都是特殊軍人的私有財產，這班軍人仗着軍隊的力量來霸佔中央政權或割據地方地盤，不受任何社會勢力的節制；霸佔中央政權，而缺乏統治全國的力量；割據地方地盤，亦祇求擺脫中央權力的羈絆。中央也好，地方也好，誰都夠不上做全國的統一中心，各守一隅，互相攘權，結果釀成一場混戰。

軍權完整是國家統一的前提，雖然未必就是國家憲政的端緒。不過憲政的完成，祇限於統一的國家，這是沒有疑義的。沒有達到統一的國家，確實不配為現代的國家，更談不到實施憲政，此理極其顯明。我們都知道軍權的統一，不一定只限於施行憲政的國家，考諸史實，不無充分佐證。但是所謂軍權的統一，在專制和憲政的兩種國家中根本相異其趣，不容混為一談。在專制國家中，軍權的運用完全置在一人或一黨的指導之下，而盡量脫離國民或議會的監督；而在憲政國家中，軍權却直接間接受着國民的控制，不許一人或少數人的意志所左右。就前項意義上來講，軍隊是一人或一黨的爪牙，而不是全國人民的利器；就後項意義上言之，軍隊却不是少數人私有的財產，反而

是全國人民共有的工具。這樣看來，在這兩種不同的政制下，軍權的統一雖然或許都是政治統一的象徵，但在運用上則有極大的差異，我們不得不加以辨別。

軍權怎樣在政制上受國民的控制，早成憲政先進國的重大問題。三百多年前，英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企求相當

解決。在『大憲章』(Magna Charta)裏，關於軍權的民主

統制有這些規定：(一)君主不得駐兵於民房，(二)平時不得施行戒嚴律，(三)君主不得任意組織軍隊，強使人民負擔軍費。英國憲政所以較早上軌道，未始不是因為軍權較

早受着民主統制的緣故。美國軍權統一的完成，實應歸功於華盛頓(Washington)將軍，因為華盛頓深明大義，一

到軍事結束，立刻就將軍權奉還國民，所以後來軍權的民主統制很容易得到了制度上的根據。本來法國軍隊對於政治上的影響極大，如一八七七年馬麥翁(MacMahon)的政變，一八九〇年蒲郎克爾(Bullanger)的事件，以及十九

世紀末葉都意菲(Dreyfus)的案件，都是明證。不過一半因為法國採行徵兵制度，一半又因為民意監督頗為嚴密，致使軍權逐漸趨於統一。說到日本，軍權問題至今還無從解

決。明治維新後，德川幕府崩潰，藩閥相繼而起，漸進而掌握政權；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事後，藩閥勢力益形膨

脹，遂開現今軍人干政的局面了。我國憲政從來未走上軌道，實在因為我國軍權從來沒有澈底統一過。以前所謂『藩鎮』，所謂『王侯』，以及所謂『督撫』，都是口道『尊王攘夷』，而實則擁兵自雄，犯上作亂。民國以來的軍閥幾乎亦是同出一轍。軍權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許許多多政治問題因之孳生。二三十年來，國內政治改革的呼籲雖然不絕於耳，終究仍抵不住軍閥混戰的彈聲炮響哩！

我不是說軍權統一就是憲政的開端，却是說軍權統一

是憲政的根基。英美各國憲政之所以有光榮的歷史，可說是軍權從早統一的結果，而其他國家做行憲政之所以未著成效，也未嘗不是因為軍權沒有得到適當控制的緣故。例如歐戰時倡議憲政的克林斯基(Kerenski)政府，無法統馭軍隊，卒為布希維克派(Bolshevists)所推翻。戰後意大利軍隊態度曖昧不明，終使法西斯黨一躍而攫取政權。近來德國議會政治的沒落，亦由於國社黨勾結國防軍之所致。在這些主要的獨裁國家中，軍權未嘗不是統一，但因其不受民主的控制，實際上它的運用祇求鞏固一黨的統治或增強獨夫的權勢而已。

在今日我國，實施憲政既是國民革命的最終鵠的，而促進軍權的統一至少要含軍權的民主統制的意義。原則上

到了憲政的時期，全國軍政軍令應完全出自民選的中央政府；但目前制度上所亟應做到的，依我個人主張，約有兩項事件：

(一) 廿國府頒佈的憲法草案上，對於軍權的控制，應酌量增加比較完妥的種種規定。扼要說來，在憲政時期中，統率軍隊的全權應屬於一國的行政元首，軍官任免權劃歸於上級行政機關，而軍隊的編制，軍額的決定，以及軍費的增減，則屬諸立法機關的職權；甚至發放餉精一項，亦應由中央機關執行，以免私人募兵之患。

(二) 在最短時間內，亟應採行徵兵制度。徵兵制度

容易打破封建割據的觀念。國民認清自己的天職，受命捍衛國家，一舉一動要以全國利益為前提，自然不會甘心供人奴役驅使，圖利營私。這個優點在法瑞兩國確已昭然若揭了。日昨我政府已通令各省市準備辦理徵兵，聞初步調查工作行將開始，這是極可欣喜的消息。

總之，這次中央整軍的最終目標既不在減少軍費，又不在裁汰士兵，實則在於統一軍權。更進一步言之，統一軍權正所以奠定憲政的基礎。我們為愛護憲政前途計，亟願中央當局澈底整軍，則國家幸甚！

二十六，七，六，南大。

對暑期農村服務學生的希求

鄭林莊

暑期學生農村服務之議，自經新生活運動總會倡導以來，再加蔣先生七月十五日由牯嶺發表的長篇談話從旁鼓勵之後，各地學生都有響應，而已決定組織此種服務團的地方也不在少數。正如蔣先生所說，「農村建設是各種建設事業中最重要的基礎」，故此這個倡議一經發動，很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更加是那些「有血氣」的青年學生尤

為興奮。于是在這種興奮狂熱的情緒之下，就預伏了不少過奢的期望，以為這份最基礎的建設工作，一經學生於暑期下鄉參加之後，就可以馬上成功，而民生的救濟國家的復興也就可以從此達到了。

其實這種奢望對於這新生的運動——假如是一種運動——是一種很不利的妨礙，正是這運動前途的礁石。談起農村

的建設，牠真是千頭萬緒，不是一時可以完成的。過去不知有多少團體，不知集合多少人力和財力，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的不斷的努力，還沒有理出一點頭路，得到百分之一的功效，現在豈能以一些未有經驗的青年學生，用短短四五十天的工夫來一手造成？爲得使那些「有志氣」而且「能犧牲」的青年學子，不要在一瞬眼就過了的四五十天之後，看到自己的努力沒能發生些微的效果，而致挫折後來的志氣和犧牲的精神起見，我個人在此願對那些暑期下鄉服務的勇士們，提出最基本的兩點希求，以爲他們參攷和勉勵。

我對他們所希求的第一點，是盼望他們能利用這短時間去認識農村。我國的高級教育素來集中于城市，多數的學生也都來自城市。他們生于城市，教於城市，根本不知農村是什麼。即使其中少數是生長于農村，來自農村的，他們經過城市幾年強烈的陶化，也早已忘却農村的本來面目，而與城市同學相差無幾了。農村與城市本是兩個對立的地理區域，彼此的生活習俗根本不相同。在城市受教養的人們，對於性質不同的農村必多隔閡。所以要做農村建設的工作，必先從認識農村入手，因爲認識環境每是實現事業的基礎。如果對於環境不會明瞭，就貿然去從事工

作，其結果必是到處碰壁，徒勞無功。所以我在這裏以認識農村環境做爲對暑期下鄉服務學生的第一點希求。認識環境的最有效的方法，據我個人看來，莫過于親身去體驗牠。祇有參加到那個環境的生活裏去，才能更親切地來了解牠。本刊二三期裏胡適之先生所提的那個濟寧的新鄉建工作，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使到那裏實習的學生可以由實習上去了解農村的實質，以便他們將來能夠更有力地去負起實際的責任。如今這個暑期農村服務的運動也正好給我們有志於農村建設的學生們一個去認識農村的機會，所以他們是該怎樣去抓住牠，而儘量利用牠呢！

我對他們所希求的第二點，是盼望他們能得到農村生活的優點，而且在暑假歸來後能把這些優點轉傳給其餘的青年。農村生活的優點在于勤勞，儉樸，忍讓，謙順，忠實，知足，和平和康健等。這些正是城市居民所缺乏的，在血氣方剛的青年身上尤其不易找到。正相反地，他們都害着懶惰，奢侈，不忍，倨傲，奸猾，貪婪，暴躁和懦弱的毛病。這些情形祇要一到農村裏去就可立刻對照出來。如果我們真要獻身與農村建設的工作，那麼我們非先具備這些美德是萬難與農民共生活的。現在各地鄉建工作都有才難之感，才難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受過教育的人們不能具備

農民這些特質，而不肯去和他們共工共力。所以我盼望這些下鄉服務的學生們，不但自身要當先去養成這些美德，而且在服務期限完畢之後，尤應以身作則來把他們傳佈給城市裏其餘的青年。祇有這樣，才能發自己將來為農村去服務的品格，才能為農村的建設造成更大的力量。

果如我這兩點希求能夠實現，那麼暑期學生農村服務

復興農村與行政機構

李樸生

廿六，六，廿四。

本月蔣院長發表長篇談話，勸諭大學生利用暑假，到農村服務，以期增進農村復興的速率，意思非常懇切，而參加的人數，聞比去年為大增。這是極好的消息。

復興農村是多方面而艱鉅的工作，我想就我最近在行政制度方面觀感所及的，貢獻一些意見。

行營前為復興農村，曾令劃設區域的五省每一行政督察區開辦一所農業學校。五省遵照命令完全辦到的有河南省。但

(一)教育廳因為是行營命令辦理的，屬於行營系統，未便管理。督學到學校也只說是參觀，不是視察。

這運動已算得到預期的最高收穫了。也許有人以為這種希求失之太卑，這種收穫失之太小。然而成陰的大樹那有不從芽枝孕育出來的，那些「救國救民」的偉大企圖何嘗不能種根于這最卑的希求和最小的收穫上呢？努力吧，我們這些暑期到農村去服務的勇士們！

(二)行政督察專員因為是新政之一，重視新政，使多自兼校長。但事實上專員政務多，又不是農業出身的，自然難有內行的設施。

(三)學校的經費是由所屬各縣選送學生名額為分担的標準。現在各縣經費困難，不願負擔學校的經費，使不高興選送學生，致學校的學生不足額，經費也很困難。

(四)學生畢業後，回鄉村從事農作，因(1)在學校所得訓練未必合于實際應用，其經營成績多有不如其父兄；(2)父兄送其入學，原志在畢業後可以得一官半職，食「安樂茶飯」，不歡喜他們回來鄉村

還事農作；(3)學生年齡聲望不足在鄉村號召改良農業的運動，政府又沒有預定的計畫使用他們。

所以河南各區的農業學校辦理實少成績，畢業的學生也多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投閒散散的更不少。我以為這種情形應予糾正。而首先要

(一)把農業學校隸屬教育廳系統之下，切實整理，以充實為主，數量或可合併，不必一區一所。

(二)行政專員不應兼校長，校長必須為農業專門出身。

(三)學校經費由教育廳全權作詳細規畫，必要時得請中央于生產教育費項下補助。

(四)教育廳與建設廳對於農村復興應有一個分年的具體計畫，俾學校能在此計畫內造就需要的學生。

其他各省如有和河南類似的情形，也應該趕快整理。

縣以下分區設署用意原是很好的，但區署布在農村裏，他的對象是農民，如果區長以次不懂得農業，對於農業改良沒有濃厚的興趣，對於農村復興在我國前途沒有深切的認識，他平日在區署所辦的事只不過是例行的公文承轉，于執行關於農村經濟建設的政事如農業推廣，合作運

動，鑿井等，恐怕也只有「等因奉此」推出門口了事，在實際推行政令未必有好處。(我曾和好幾位縣長談過，都覺只公文多一度承轉而已。)有好些人以為現在區長所以流品雜，能力薄弱，只因待遇低，好資格的人不願做，做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增加了農民的一層壓迫，所以要改善目前的毛病，便要提高區長待遇，並可以升任縣長，使有能力的人肯回去服務。這自然是極中肯的見解。

而我以為若能夠把區署側重為農業教育化的機關，則復興農村的成功當更速。現在各地方有股匪的很少，農村最嚴重的問題是增加生產。區署若能做到增加生產或預防災害的工作，不知有多少行政的麻煩可隨而大減特減。如棉產的地方能夠推廣美棉，並教他們使用浸沾法預防虫害，則生產增加，盜匪搶掠以及流警罰法的行為必然大減，公民教育壯丁訓練必然更有效。所謂「倉廩實而後知禮節」。否則保甲儘管嚴密，壯丁儘管訓練，也支持不了農村崩潰下的「鹿死不擇蔭」。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動員的今日，我以為分區設署的意義應該和這個大目的合拍進行，而農業教育化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行政專員制在今日有好些人要重新估定他的價值。我以為專員制在匪區調動軍隊，指揮剿匪，確是極需要的。

當時專員全由軍人充任，也就是適應這個需要。又以現行

省區的遼闊，在邊遠的區域，省政府有鞭長莫及之感，設立專員就近處理，也是極需要的。但在非匪區及距離省會不遠的地方，專員是否需要，便值得討論了。距離省會不遠的地方，省政府耳目所易周，何必再有『派出所』？而且第一專員所在又不與省政府同，所以有好些縣政府與省政府的公文，從前很快達到的（如武昌縣對湖北省政府），有了專員，公文更要大兜圈子。所以以為專員的設立，必要合于制制的本意，是

（一）事實需要（剿匪的事實），

（二）專門性質（軍官就是專門人員），

如領導，督察的意思，我想都是後來附加的。故對現在專員的情形，必得調整。甘乃光先生主張某區域水利問題重要，我們的專員應是水利專家，某區域的工業問題重要，我們的專員應是工業有深刻的研究者。……然後他在某區域的環境需要方能為有效的應付，否則我們雖不願意專員之『道尹』化，而事實上會流而類于『道尹』，成了地方的三級制。如其要把專員實行專門化，以我國農業問題的嚴重，自然需要有多量的高級的農業專門人才，以担荷此種責任。而各項人才的簡拔與儲備，統是中央應有具體

辦法的。

中央關於農業行政的機構，現在是不很健全的，實業部，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在農業行政上職權的分散，而事業上有時聯繫得很微妙，對於建設的效率，人才與經費的使用都有相當不良的影響。這個問題陳公博先生以身歷的經驗論刻頗詳，筆者亦曾屢見管見，某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并曾有不少中委建議設立農政部以專責成。大家都以為是極重要的。不過設立農政部第一個問題是要把職權劃分清楚。年來中央對於此項職權的劃分未嘗不很注意。如最近經委會把合作事業移歸實業部，裁農業處，都是極好的例子。但可惜還不夠澈底，如棉產改進所等仍然保持原有的系統。如果設立農政部，便不宜再像從前拖泥帶水的情形。不只經委會應該如此，建委會亦不能例外。軍政部的墾政，也應該從詳研究，是不是移屬農政部的效率為更高。其次是用人問題，最應該就上述機關的得力人員完全調用，不得有門戶之見。我們所以主張職權調整，完全是對事，絕不稍涉對人。年來農業建設有極大的進步，上述機關職員的努力是很值得欽佩的。如棉產改進所的吳振鐘先生，以兩年的功夫，發明美棉治蚜虫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達二萬萬元。這種偉大的

貢獻就是我們的建設英雄，我們國民政府今年的勳章雖然沒有賞給他，但農氏卻要替他立廟。像他這樣的人才，我想還有不少，我們衷心的讚頌，是無以復加的。至機關的長官，都是革命元勳，我們崇拜他們早非一日，而希望他們現在對國家的貢獻，不必是限局部之範圍，效其手足

之烈，應該是總持風會，把歷史上沒有法治習慣的我國，建立法治的永久的規模。要做到『爲而不爲』的地步，不單是『只見有爲』的氣格了。

我這些意見，希望大學生在鄉村服務時得到經驗，給我批評。

六月廿二日

婚喪喜慶之簡單化

溥 鳴

北平市近來總算有點進步了，六月二十日第一屆集團結婚，在懷仁堂舉行，一利那同，一個証婚人，造成了十六對夫婦，多麼省事！這次集團結婚費用，聽說一共才三百餘元，比老法子結婚的費用，雖然不一定減到十六分之一，總省了不少。中國社會已經弱到極點，一切建設都要用人工與金錢，能夠省一塊錢的浪費，就可以多做一塊錢的建設，能夠替一個人省一天的光陰，這個人就可以多做一天的建設。集團結婚的制度，可以省許多事，可以省許多錢，所以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因此我又想起我們社會上還有好些禮節風俗也應該改良，應該簡單化的。

中國社會上最大的浪費就是婚喪喜慶的虛文。婚姻從定親算起，經過下聘，送嫁粧，迎娶，拜堂，回門，會

親，一共忙了多少天！男女兩家一共請了多少次客！說起費用，聘禮和嫁粧之外，多的話可以幾千，少的話也得幾百。窮人家典當東西爲兒子娶媳婦，那是常有的事，這是何等可憐！西洋人男子給女子一個戒指——不一定是值錢的——就算定婚；男女兩人站在牧師面前，聽幾句祝福的話，說一字「諾」，就算結婚禮成。禮成之後，至熟的親友幾人也許有一場宴會，其他賀客至多吃一點茶點就散了，這是何等簡單，何等省事！但是看見過西洋人結婚的人，沒有人不覺得他們的禮節比我們的還要整齊嚴肅。從前煤油大王的孫女出嫁的時候，我碰巧在紐約，也被請去觀禮。禮堂設在他家裏的一個客廳。這個客廳並不甚大，布置也很簡單，禮成之後，賀客向新郎新娘賀喜就算完事，沒有

一點鋪張，大富之家而這樣儉樸，真令人佩服。

中國喪事的虛文比婚姻還要厲害，從小殮，大殮，接三起，經過做七，開弔，出殯，以至安葬，要忙了好幾個月，甚至幾年，花費了無數的金錢！前清的大臣死後，朝廷往往給銀三千兩治喪。其實三千兩銀子那裏夠用？一具棺材，好的話就得幾千塊錢。中國木材已經缺少，把最好的木材埋在地下，與死人早晚一同腐爛，這是多麼可惜！此外每逢七，以及百日，週年，三週年等，念經，做佛事，燒錫箔，紙錢，冥衣，冥人，甚至房屋車馬以及死人生前所喜愛的東西，都要照樣用紙糊起來，當做真的來焚燒，以為這樣就可以把牠們送到陰間給死人享用，這是何等幼稚，何等昏迷！到了出殯的時候，已經笨大的棺材還要加上笨大的棺罩和槓子，用三十二人來抬。前後儀仗，排起來可以有一里長，拿儀仗的人都是街上的花子，穿的是破爛不堪的綠衣。我看起來，實在丟醜，那裏有莊嚴？那裏有榮耀？未末了做墳，還要用一塊風水好的地方，墳地大的可以佔地一二十畝，拿活人可以享用的可以生產的地方，讓給死人佔據，這是何等可惜！西洋人辦喪事，往往幾天之內就可以完全終了，儀式方面除了在禮拜堂開一次追悼會之外沒有什麼舉動，他們的墓地差不多都是公

墓，一個死人不過佔了幾尺地方，在金錢，土地，時間，人工各方面，比中國的喪事不知道要節省了多少！

凡是正常的人，結婚之後，生男育女，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西洋先進國家的人民，要維持他們高等的生活程度，對於子女的數目有嚴格的限制，並且不到時候，不生孩子，以免種種受累。所以他們對於生育非常的慎重，一家有幾個孩子，以及要在什麼時候生育，都有預先的計畫，若是防範不周，在不要生孩子的時候生了孩子，那就算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並不以為是喜事。中國人對於生育的事情漫無計畫，不問自己能力能夠養育幾個孩子，不問母親生孩子的時候對不對，凡有生育，一律看為喜事，請客來慶祝，這是何等糊塗！

一個人一年一度的生日，是很平凡的事情，用不着慶祝。若是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事業成就，身體康健，眼見子孫成人長大，個個有為，那麼他的生日才值得慶祝。但是晉九也慶祝，開一也慶祝，那是沒有什麼道理的。甚至於已經死了多年的人，還要做什麼陰壽，那是更沒有道理了。做生日的時候，請親戚朋友來聚首一堂，同舉慶祝之觴，那是應該的，但是接連着演幾天的戲，大擂鑼鼓，或者擺起麻雀棹子請客人賭博，那就未免過於鋪張了！還

有明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因為兒子做了官，發了財，於是請能文的人做起一篇徵文的文章，把做生日的人說得孔子復生，周公再世一般，還要別人做壽文壽詩來隨聲附和，空費了多少人的心思，糟塌了許多的紙墨，這是何等虛偽，何等浪費！

婚喪喜慶和平常酬應所共有的一件事，就是酒席。一棹酒席，三四塊錢也能辦，幾十塊錢也能辦，相差的地方多一半在乎有沒有燕窩，魚翅，銀耳等貴重的菜，平常人以為有這些菜就是好酒席，沒有就不是好酒席，其實這完全是心理作用。這些菜並沒有特別的營養價值或者特別的滋味，我們看他們做貴重菜，只因為他們是希望的東西罷了。民國二十五年全國海參進口數值共計六一九，五五八金單位，折合國幣為一百四十萬六千一百九十九元；同年魚翅進口數值共計三四二，一九九金單位，折合國幣為七十七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元；海參魚翅兩項進口之數共合國幣二百一十八萬有奇，國產者尚不在內。當茲山窮水盡之時，兩項酒席上可有可無的食品就要花費幾百萬，豈不是浪費嗎！當茲提倡國貨的時候，還讓可以不用食品進口到二百多萬元，豈不是糊塗嗎！所以我現在對於酒席的改良要發表一點意見。

中國的酒席有兩個毛病：一是碗數太多，二是蛋白質——並且是動物的蛋白質——太多。我們平常吃酒席，若是不特別客氣，吃到一半以後，就要覺得飽了，等到上飯的時候，總是再吃不下去。我吃酒席的時候，看見鷄，鴨，魚，肉，任意糟塌，想起農民那種儉樸的膳食來，總覺得有一點不平，雖然酒席不是人人吃，也不是天天吃的，我總覺得我們生活比較舒服的人應該節省一點。

酒席上的食物，蛋白質居多。鷄，鴨，魚，肉，是蛋白質；鴨掌，鴨舌，鷄肝，又是蛋白質；魚翅，燕窩，魚唇，海參，也是蛋白質；鴿子蛋，烏魚蛋，蝦仁，鮑魚，也都是蛋白質，並且都是動物的蛋白質，除了冬筍，蘑菇，及新上市的碗豆，冬瓜之類以外，差不多沒有蔬菜。在平民膳食裏差不多看不見動物的蛋白質，在酒席裏就大用特用。穀類豆類的食物是平民膳食的主要成分，在酒席裏就差不多沒有。所以在平常膳食裏，嫌動物蛋白質太少，在酒席裏則嫌太多。我們若是接連着吃幾天酒席，就覺得受不了，而想吃清淡的東西，這就是因為酒席太富於蛋白質的緣故。

碗數太多糟塌了東西，蛋白質太多糟塌了肚子，一是不合經濟，一是不合衛生，兩件事都應當改良的。平常一

棹酒席，從冷碟算起，總有二三十碗，若是把碗數減少，什麼魚翅燕窩也不用，只要可以下飯的菜六碗，或者八碗（其中應該有兩碗青菜）。碗不妨用大一點，菜來就吃飯或者吃麵。這樣客人可以多吃一點穀類食物，少吃一點動物蛋白質，既可以省錢，又適合衛生，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禮節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實的，禮節是虛的。情感務必真摯，禮節不妨簡單。若是禮節看的太重，往往會

編輯後記

編者

把真的情感反看輕了。中國人開口仁義道德，閉口孝悌忠信，其實中國所存的只有道德的空殼，講起來真的道德，中國人並不比西洋人高，這也許是中國人把禮節虛文看的太重的結果。婚喪喜慶所有的禮節都應當簡單化，所有的一切虛文都應該取消，這是社會上很重要的問題，講新生活運動的人大概贊成吧！

△本月七日午夜，日軍在蘆溝橋一帶實彈演習，藉口

無論作戰與交涉，全要聽命於中央！

失落兵丁一名，要求入宛平城內搜尋，我方不允，遂起始以炮火轟擊宛平縣城。經南方口頭交涉，日軍退駐原防，宛平則由我方保安隊維持秩序。但日方仍由各處增援，並不斷地以槍炮對我射擊，至現時止，雙方仍在相持中。此事開展到甚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在此際我們祇願表明我們的態度與決心：我們必須抵抗，如地方當局所表示，敵方再不速停射擊，我們唯有準備大犧牲！並且我們希望

△陳之邁先生所論的紗交風潮問題，是內政上極重要的問題，財政當局更要負責任！南京離上海太近了，年來社會上關於有地位與勢力的少數人做投機的風傳，太與政府不利，這事非澈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王贛愚先生是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其餘作者都是「獨立」讀者的熟朋友。

七月十二日正午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者咸稱便利，惟因出版已久，迄今社會其多變遷，學校課程亦更有更張，為應目前需要，並充實科目起見，特徹底改編或重編，務使讀者在短期內能獲各科之知識，而習之，以作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亦可用作各科常識讀本。各科內容悉依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鑄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社表解參考書等之精華，編排採表解式，主要事項大致歸納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重要近年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酌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各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補珍版式，茲將書名列下：

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者咸稱便利，惟因出版已久，迄今社會其多變遷，學校課程亦更有更張，為應目前需要，並充實科目起見，特徹底改編或重編，務使讀者在短期內能獲各科之知識，而習之，以作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亦可用作各科常識讀本。各科內容悉依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鑄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社表解參考書等之精華，編排採表解式，主要事項大致歸納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重要近年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酌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各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補珍版式，茲將書名列下：

下列七種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書名	冊數	編者	定價	特價		
算術	一	繆師曾 國文編	二·五 (元)	一·八 (元)	代數	二
幾何學	二	桂叔超 金品	五·〇 (元)	三·五 (元)	平面三角法	一
植物學	一	馬光斗	二·五	一·八	動物學	一
本國史	二	周廷人 劉紀	二·五 (元)	一·八 (元)	本國史	二
本國史	二	周景濂	六·〇 (元)	四·二 (元)		

下列六種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書名	冊數	編者	定價	特價		
生理衛生	一	程蔚章	三·〇 (元)	二·二 (元)	物理學	二
物理學	二	張開圻 柳大維	四·〇 (元)	二·八 (元)	化學	二
外國史	二	李鴻禧 李崇厚	六·〇 (元)	四·二 (元)	外國史	二
本國地理	二	曹玉麟	六·〇 (元)	四·二 (元)	本國地理	二
外國地理	一	陳彥	三·五 (元)	二·五 (元)	外國地理	一

郵費每册二分半 掛號費外加

各科精華 薈萃無遺

表解詳明 瞭若指掌

應試準備 事半功倍

特價發售 概照各書定價七折計算
自出版日起至十月十一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我們沒有第二條路

張佛泉

投機事業的限制

鄭林莊

選派國外留學生問題

齊思和

政治與經濟上的海南島

南溟

研究社會科學必須先有立場嗎？
(通信)

陳之邁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寄售處

北平	天津	濟南	青島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鎮江	揚州	南通	漢口	廣州
文華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華北書局

獨立評論

第二四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廿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四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汕頭	廈門	福州	廣州	梧州	柳州	貴陽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石家莊	保定	濟南	青島	天津	北平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新民書局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我們沒有第二條路

張佛泉

七日深夜發生的蘆溝橋事件，到今日已經是十二天了。我軍在衝突地點已略撤退，但是日方援軍却源源由我們的鐵路運來。交涉由北平移至天津。外面有種種的傳說，但是官方却未曾露過任何消息。近幾天所告訴我們的祇是：交涉在側面進行中，尚未得到具體結果，更無任何文字協定。

這幾天我們沒有聽見砲聲，但是我們北平市民都感覺鬱悶極了。我們幾乎沒有一人覺到敵人的飛機大砲可怕，我們祇怕諺語所說的「夜長夢多」。十七日路透社電訊傳說，馮治安師長的軍隊須調至保定以南，另以二十九軍其他部隊接防。這使我們惶恐。我們以為黨察政務委員會宋委員長應立刻回到該委員會所在地的北平來！

但是神經過敏的狐疑是沒根基的！離開是敵人所最善用的方法。同盟社十五日有一條新聞，專挑撥我中央與地方的感情。人他們的圈套是最愚蠢不過的。我們四萬萬人並且決不能容人徘徊，猶豫。有人果如此，不論他為誰，則我們立刻以敵人視之！

二十九軍，尤其是牠的下級士兵，是全國所最信賴，最敬愛的！我們始終有這樣感覺：撼山易，撼念九軍的士兵難！士兵抗敵的決心，是他們人格的全部，即牠們的長官都沒有方法使他們立刻轉變！

中央與地方所表示的態度是不挑戰亦不避戰。但國民却希望我軍能一鼓而下通縣，且直搗榆關，看對方究將如何！關內日軍至現在止亦不過萬餘人，祇二十九軍即十五倍此數而強。且今日相當機械化了的二十九軍，遠非在喜峯口以刀做戰時可比。以三對一，敵亦須有六七萬人方能言酣戰。

日本總動員的宣傳非常厲害，其中是否有法西斯政治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却祇有一條路，即，小來自然抵抗，大來亦自然祇得抵抗！決沒有不戰而退，以大好山河拱手送人的道理！東四省的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做亞比西尼亞是一件悲慘但却壯烈的事！但如我們之送東北，却是怎也講不通！我們近來怕地方與對方有所協定，因為我們雖相信二十九軍有抗敵決

心，但如中了奸計，弄得後來到了想抗亦抗不了的地步，那却最堪痛恨！近來的北寧路——亦不知是不控制，還是沒法控制——便是前車之鑒。

一二年前似乎有人說，二十九軍日後定會名利雙收的，現在總該是他們收名的時候到了。宋哲元將軍是想佔歷史一頁的（這自然是指流芳而言），喜峯口一戰，他已

佔了半頁，現在是他填另外半頁的時候了！我們希望他把握得穩，往遠大處着眼，以祖先同子孫的尊榮幸福當做目標，準備做一次悲壯的大決鬥！

我們決沒有第二條路，祇有抵抗！

七月十八日夜午

投機事業的限制

鄭林莊

最近一個多月，在經濟界鬧得最凶的案子要算是紗花交易所的事件了。初傳空多兩頭傾軋甚烈，繼傳有現任官吏在中操縱，於是引起主管當局的實業部按照交易所法對

神尤為我們所佩服。且聞當局因此更想加重投機事業的限制，使它不會再有越軌的行動而妨害商業的活動。由年來交易所之過份的投機看來，這是很必需的。

馳實行監督，派員去檢查該交易所的業務和簿據。在檢查中，發現了此次投機買賣確得日商坐享很大一筆數目的利益，因而引起最高當局的注意，而將犯有重大嫌疑的兩名現任官員告發，提起訴訟，而此掀起軒然大波的事件亦由行政處分的階段入於法律處分的階段。截至目前，法律處分部分尚未結束，這個案件究應如何處置，自有司法當局去負責。不過行政當局此次能如此斷然地來施行監督權，實是國內向來罕見的事，處置此事的長官的果敢負責的精神

投機 (Speculation) 在國人的心目中種下的印象很壞，他們幾乎全把它與賭博 (Gambling) 當做相通的字眼看，就是那些經營此種事業的人也未嘗不把它當做賭博來做，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在現代運銷機構中，投機是穩定市場和保障企業家利益的很重要的因素，如運用得宜，它能發揮出很大的能力。不過投機很易流為賭博的行徑，此不獨我國為然，所以各國為保護其國民的商業利益，莫不對投機事業加以限制。例如此次我國政府所用的最後監督權和

制裁權就是其中一種。此種政府保留的最後權柄，往往在發生了過度的投機 (Over-speculation) 而交易所自身不能處理的時候始偶然一用，在程度上也以行於規模小能力不大的交易所的較嚴於規模大而能力足的。在普通的時候，投機者的限制還以放給交易所自己去負責為多。

這些限制之中，除了那些會員資格，抵押金，信用保證等外，最主要的有兩項：一項是交易所自身的仲裁權。其運用的方法是在交易所內設立一個仲裁委員會，由會員中派定三至五名仲裁委員組織之，如遇有會員間發生糾紛，即由該會出頭來仲裁，仲裁的結果會員必須遵守。即使是非會員間發生糾紛，若經請求，該會也可以施行其仲裁權。另一項就是散佈市場消息的監督權。投機者的原則是在用買賣的手段來取得價格變動的利益——就是普通所說的買空賣空。此原則的運用，自然有許多許多的變化，在這裏不能詳細解說，不過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那些投機的人無不希望日後價格發生變動，而且變動越大越好。至於希望價格的變動是向上或向下，就要看他所做的是買進或賣出來決定了。所以在一個投機市場內，一定有買賣兩方，各方的希望正與對方相反。他們的盈虧完全繫於日後價格的變動是與他有利或有害，因此投機的結果有一方

勝利，必有一方失敗。他們為造成自己的勝利，必用種種方法來使價格的變動能如心所欲，然而又正因為他們所希望的適成相反，故此他們彼此之間必演成對抗的形勢，而互相傾軋乃成爲不可避免的事。交易所為解決買賣雙方由此而生的種種糾紛，故必有仲裁委員會的設立，以阻止投機交易因此而生的不當的惡影響。然而，這種仲裁祇是事後的制止的力量，要防範未然還有待於這後一項的市場消息的監督。

何以要監督市場消息呢？這也和投機原則的運用有關係。因為投機者的利益維繫在價格的變動上，所以他們要用各種人為的方法來操縱價格的變動，而其中最有力和有效的方法，則莫過於散佈各種真或假而最終是有利於己的市場消息。市場上價格的決定固然要看買賣兩方的相對的勢力，但是促成買或賣的動機的却是這市場的消息。投機市場上的情形尤其是如此。投機之所以異於賭博的，就在於投機並不如賭博之盲昧，它們雖然同是在捉摸一個未來的機運，然而前者却是根據了現有的事實和消息來對未來加以推測的，而後者即對未來毫無把握，把現實託於空虛。所以在投機市場上，一個投機者的買或賣大部分是根據那時的實況和市場消息在他心中經過評價作用所得出的

結果而定。所以投機者很重視市場消息。正因為是這樣，一般投機者都在利用這個工具來壓到對方而造成自己的勝算。所以在投機市場上，除了交易所自己所傳達出來的消息之外，還往往有許多由投機者直接或間接造出來的種種消息；這些消息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不正確的，真是撲朔迷離，雌雄莫辨，莫說是不熟此道的新人會弄得頭暈目眩，就是那些斷輪老手也會不辨真偽。所以交易所為免得這些消息造出破壞市場的惡結果來，就對它的散佈保留着監督權，到必要時可以對它加以制止或揭破。

這兩種交易所自有的限制力，對於投機事業是很重要的。它們可以幫助投機來發揮它的穩定市場保障企業家利益的正常功能。因此歐美的國家大多都把這種權柄授給交易所，而交易所也很能運用它們。我國的交易所則還未能做到這一層。這次紗交事件之能鬧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正足以證明這一點。不但如此，而且在行政檢查中，更揭發了許多未與交易所法相合之點。所以今後主管當局對於各種交易所仍應加以嚴格的監督。但要使得監督能很輕易地行使，則最好從監督交易所自動來執行這兩種限制力量上着手。

最近政府且傳出限制兩種糧食交易的價格的消息，就

是用立法手段來規定那兩種交易所各種商品的最高標價，其理由是這些商品關係民生甚重。從經濟的立場看，價格的劇動，不但是過漲，就是過落也會影響民生，對價格變動的限制自然也很需要。投機即正是穩定價格的一種作用。在前面我們屢次說價格的變動是投機的出發點，在這裏我們又說投機可以穩定價格。此理粗看起來似頗費解，其實祇要稍加解釋就可以明白。所謂價格的變動是投機的根據，是拿一個短的和截斷的時間來看，如果把時間拉長而且不斷地探求下去，投機又正是市場上穩定價格的一種勢力。我們且拿買空來說：做買空的人是希望價格日後會上漲，假如日後價格果然上漲，他就把現在買進的貨拋出；如此一來，在他自己是得到他所希望的利潤，在整個市場上，即因他拋出一部貨物來，增加了供給的勢力，由於供求律的作用，價格就會下落。反過來，假如價格是跌落，也會因賣空方面的收貨而促起反漲。這自然是把複雜的事象過份地簡單化，然而投機之能穩定價格即正基於此點。由此可見，投機——假如運用得當——非但不會造成反會限止過劇的價格變動。所以價格的限制並不是正常的限制，它的施行反足證明投機事業的不健全。自然，投機的利益最大，可是風險也最多，投機者為保存自己的利益往

往會使出甚至是不正常的手段來促成價格的劇動。不過防範此種劇動，却不在如何用外力來抑止它，却在於健全交易所的內容，使其能發揮其正常的功能，來穩定價格，並進而穩定市場，以爲企業家的一重保障。這份健全的力量，即正放在我們上述的那兩項交易所自身所有的限制權上。

固然在過渡的和變動的期間，未嘗不可倒果爲因，對

交易所的最高標價有所限定。不過我們總希望：這是暫時的，而不是長久的；而且當局不要重視了這枝末，而忽略了交易所內容的充實和組織的健全。我們尤其希望的，是政府能曉諭那些「投機巨頭」，使他們知道去遵守交易所的章則，如果不然，即使交易所已經有了限制權，也是沒有用處的！

選派國外留學生問題

齊思和

去年本刊曾披露一位留英的學生「關於留學的幾個先決問題」一篇文章（第二二三號），可供將要或希望到國外去留學者和教育當局的參考。可惜作者於留學的幾個重要問題還沒有討論到。留學是現今中國一個重要的問題，年來政府對這方面已經有不少的改革，這自然是很可喜的事。不過這問題究竟是非常複雜，如何達到理想的境界，還需要縝密的研究和繼續的努力。爰就個人管窺所及，將幾個基本的問題略加討論，以供留心這問題的人們的參考和指教。

一 留學是否需要

一個國家的高深專門人才要在外國去培養，這自然是

一件極不經濟，不方便的一樁事。所謂不經濟者，爲求學的緣故要遠渡重洋，但以筆費而論，已經爲數不貲。何況我們要去的是先進國家的生活程度與生活費用也先進。得遠在我們之上。在國內一個大學生一年能有五百圓費用已經綽有餘裕，而歐美貴一點的大學一年要用五六千圓。即至最便宜的日本，一年也要千圓左右。這就是說，在國外造就一個人的，在國內可以造就二至十個人，這是多麼不經濟！據二十三年教育部估計：「就目前國外留學人數統計，約共五千人，年費約需國幣二千萬元。」（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頁一一一）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數字還是過低的估計。據最近駐日留學生監督談話，現今留日的學生

約有五千多(見目前各報)，據留美國中國同學錄，現留美學生共有千二百多人，再加上在其他各國的留學生，總數絕不下八千人，用費絕不下三千萬。這是與全國公私立大學經費相等，這是何等的畸形發展！在由窮水盡的中國，每年又有這大量金錢的外流，又是何等的損失！

金錢上的損失還是有平的，比這個損失更大的還有精力和精神上的損失。學術雖說是無國界，終不能完全脫離了地方色彩，而應用科學和社會科學尤其如是。各國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彼此不同，他們所注重的技術問題與政治經濟政策自然也就彼此相去很遠。因之在外國所能學到的都是些外國學問。一位在美國學商業學的朋友曾感歎最近各科討論的都是與我們關係很少的 ZB 問題。又一位在美國學法學的朋友也以爲他們的 Case Method，於我們毫無用處。自己在美國也選過一兩門關於國際關係的功課。內容是以美國的國際問題爲出發點，中間以美國人的眼光分析國際各種問題及各國對美政策，最後又回到美國來討論今後美國應採取的外交政策。他們這種學以致用的精神，當時我很受感動。不過要把這種學問搬到中國來，我們必須加一番改造的工作，不然必要鬧出某位社會學家跑到中國鄉下調查無線電播音機和某位衛生家要鄉下人吃牛奶的

笑話了。所以到外國去求學僅能學得空泛的理論和方法，以爲整理中國材料，解決中國問題的預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間接而迂緩的方法。此外留學生在外國所度的不自然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刺戟，於他們的身心尤是一個莫大的損傷。在西洋，白人對黃人種族上的偏見，強國對弱國心理上的鄙視，在在給予人以深刻的刺戟。在東洋，年來日本對於中國留學生的虐待更使這些在「友邦」受教的感情上印了深深的傷痕。最近留日學生回國請願代表上許世英大使函中有云：「非但留日學生行動不得自由，即研究出版亦多受限制，至於涉及愛國，擁護中央時，日方認爲思想不良，橫遭被捕者，所在皆是。對於被捕同學，彼等或恣意押禁數週，或隨便驅逐回國，或施以嚴刑，或予以拷打。」(見本年七月八日天津益世報第六版)在這種虐待之下，五千多的中國學生是如何地忍受着！有人會說留學生在神經上大多數是不健全的，這話恐怕至少有一部份真理。

遣派青年到外國去留學雖是極不經濟，不合算的一樁事。但雖是如此，在現今和最近的將來，我們的高等專門人才還須在外國培養。因爲近十年來中國在學術方面雖然有驚人的進步，但是各門的大師畢竟還是太少，各科的設備大致還是不很完善。高深的學問技術，除了少數的例

外，還是不能在國內獲得。這本是學術落後的國家必經的過程，並不限於中國。即以所謂先進國家而論，當文藝復興之後，首先將『新學問』帶到英國去的，是一批留學的學生，到十六世紀，英國在學術上才漸能獨立；但是直到十八世紀，英國的風氣還是要到大陸上完成個人的高深教育。美國和俄國在學術上的獨立不過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事體（直到現今美國老輩的大師多數還是留德的學生），而美國在學術上能同西歐各國並駕齊驅更是大戰以後的事。日本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走出這個過程。中國開始得稍晚，收效自然也略遲些了。

二 如何選派留學生

派遣國外留學生既是極不經濟，而又不能不辦，則我們辦的時候應當十分小心。關於如何選派，要選派多少人，都要根據國家社會的需要細密計劃，以免虛糜國帑。無如直到現在我國對於留學生的選派還是漫無統制。自上中央的各院各部各委員會，下至地方政府省政府縣政府市政府，以及各學校各種學術團體，都在遣派人到外國去留學，『去考查』。全中國幾乎沒有一個機關不派留學生，整個的政府成了遣派留學的機關。各機關都有牠自己的標準和辦法，在這樣紊亂的狀況之下，自談不到全盤計劃和

統制。所以要整頓留學問題，必須先統一事權，由教育部統籌直轄。中央政府各機關應將所劃定的留學經費全數交給教育部支配，不准擅自派人留學。地方政府關於留學名額的分配，考試的方法，也全要遵照部令辦理。全國各機關各地方需要何種專門人才，可以呈請教育部派送；然後由教育部匯集起來，詳加研究，酌定學門與名額。這樣選派才能根據實際需要，才能合理化。據報載現行行政院已通令中央各部會，各省市府及庚款機關，嗣後派遣公費留學生須先經致部核定，否則不發給護照（本年四月三十日大公報第四版）。足見政府已感覺整頓的必要。不過我們希望政府更進一步，將留學問題全交教育部去支配統制。

其次，留學的人數應當逐漸縮減。留學本來是最不經濟的事體，所以名額應該減到最低的限度。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進步已逐漸減少了國外留學的需要。如在不久的以前大家大都是到外國入大學本科。近年來我們較好的大學在師資方面設備方面都已提高，因之到外國去上大學本科已非必要。現今教育部禁止大學未卒業的學生出國留學，本是極應當，無如實際上，據我們所知的，在外國入本科的學生依然很多，甚至還有人在那裏入中學，其中尤以自費生為多。這樣浪費國家的財力，希望政府要嚴加取締。

到外國留學的需要既已逐漸減少，留學的名額自然逐漸減縮。近年來雖因外匯高漲，出國留學者數目已較以前略少，但各遣派留學機關（除了少數例外）大都還是保着十年前或民國以來的經費。雖說現今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對人才的需要增加，但是年來教育部限制文法名額，側重技術人才的政策已足適應這個需要。我們日常見到大批留學生的失業即是証明遣派的過多。以後政府對於留學名額應根據實際需要擬定計劃，不要僅當作一種照例的公事。

第三，選派的標準應該提高和劃一。國外留學既是不不得已的辦法，所以凡能在中國學到的不必到外國去學。未去之先，應有切實的準備，不但所預備學習的課目應先在國內打好基礎，並且所要去的國家的語言文字更應在國內練習純熟，免得到外國去糜費時間。近年來清華和英庚款的留學考試辦理較嚴格，所以成績也較好。各省的考試有的便沒有這樣嚴格。預備不充分即到外國去，決不能入好學校，入後也不能跟上班。於個人是『受罪』，於國家是損失。於公於私都無益處。所以我主張學生們應當充分利用國內的設備，今後選派留學生應持劃一標準，『寧闕勿濫』的態度，以免貽誤國帑，和給外人一個關於我國教育不良的印象。

三 如何考核留學生的成績

從前政府送留學生，僅是把學生們送出去，至於他們如何學，甚至於學不學，都在不問不問之列（自然也有例外）。這種放任的辦法自難希望有好的結果。現今遣派辦法進步，選派機關替考取的學生們指派國內經驗豐富的學者担任指導，代他們詳細計劃到外國要入那個學校，請那位教授指導。這比從前任學生們自己去瞎撞當然好得多。可惜現今實行這種辦法的僅限於清華和英庚款基金董事會兩處，其餘的選送留學機關仍是僅管送而不管學，實有改進的必要。因為選擇學校是一件要緊的事體。世界最好的大學雖都在外國，但外國的大學並不盡是好的。即以美國而論，她擁有一千三百八十個大學和專門學校，照數字自是世界第一。世好的大學也不過幾十個。這些學校論設備，論人才，自非我們一時所能比擬。至於大多數的大學並不比我們的大學好，而他們的小大學，其簡陋猶如中國的小私立大學，或者還不如。波士頓有一個東北大學，校址是在青年會的二層樓上。還有一個商業學院設在一個商店的樓頂。遠渡重洋入這種學校，何如在國內研究？西歐各國大學的數目很少（英國連愛爾蘭在內有二十個大學，法國十七個，德國二十五個），其中最好的也僅限於少數。

並且所謂好大學也並非各門學問皆擅長，而規模小的大學有的也擁有一兩位大師。這自非專家不能知道。所以對於學校的選擇，主管機關應請專家代為擇定。

其次，關於留學的年限，各機關的規定也參差不齊。有的省府還沿以前六年為期的規定，現今既無須入外國大學本科，這種規定自嫌太長；而近來清華，英庚款僅限二年，又未免過短，因為現今側重理工，學生既要學理論，又要實習參觀，短短二年的期間很難有相當的結果。據請求延長期者之多，便可證明二年期間過短。普通論來，仍以規定三年至四年為宜。若感經費不足，無妨縮減學額。與其使兩個人都不能充分研究，倒不如使一人深加造就。

普通說來，留學生——特別是留歐美的學生——大致是勤勉用功的。一則因為到西方緊張的環境裏即是鬆懶的人也不能放棄了在國內時優哉遊哉的雅緻，一則因留學生歲數都比較大一點，對自己自然也較為負責。所以留學生的成績大致都很好的。但雖是如是，公費派送的學生國家自有監視指導的責任。從前清華有駐美留學監督，監護很嚴。而其他機關便未足以語此。有的省甚至留學生久已回國，省當局還不知，仍繼續匯款。或者甲已歸而乙來頂替，儼同

世襲。這也未免失之放任，近年來各省雖然考核較嚴，但也是紙上公文。今後留學生的行動應由主管機關嚴格管理，他們的工作應請他們所入的學校按時報告。這樣不但可以考核他們實際成績，並可作將來任用和推荐的參考。

四 如何逐漸廢除留學制度

以上所舉的幾項建議如果能實行出來，我相信留學的效能必會提高。但是我在本文的關頭已經說過，留學是暫時不得已的辦法，並非百年的大計。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整頓留學制度，一方面更要籌劃如何使我們學術獨立，如何逐漸廢除派送留學生的必要。派送留學生既不經濟，而現今學術的進步一日千里，留學生回國後如不能繼續研究，他們的知識不到三四年便已陳舊。國家費許多錢來造就一個人為用不過數年，更是加倍地不經濟。近年來我國重要的大學中漸仿照西洋實行隔數年一休假，使教員出洋考查的辦法，用意自是極佳。但這仍偏重於被動的吸收，而輕於主動的創造。教書是不能同研究分開的，而要想學術獨立，更不能永站在被動的地位。我國近年來各門學問的研究雖已漸呈活躍的現象，但同歐美比較起來，還是相差甚遠。這並非因為我們沒有研究的能力，實是因為我們沒有研究的機會。所謂沒有研究的機會者我們第一沒有時間，

第二沒有設備。外國辦大學的目的，一半教育青年，一半在培養專門人材，所以一個教授教書的時間較少，可以將大部分的時間用在研究工作上面。而學校又給予種種的幫助，促成研究計劃的實現。中國的大學教授每週要擔任十幾小時的功課，而每年所擔任的功課又常常更換。全部時間皆用在教書，準備功課，和指導學生，很少餘暇來從事研究。所以胸中縱有研究計劃，也徒視歲月消逝，不能着手工作。其次，科學的研究是需要工具和材料的。「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沒有完備的設備，研究工作便不能進行。中國圖書館和實驗室關於大多數學門的設備，用來教大學入門的功課還嫌不夠，更談不到研究。（中國年來在自然科

學方面，地質，生物，生物化學諸科的研究所以很有成績者，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幾位大師的倡導，但也是因為生物學地質學是有地方性的，生物化學虧了協和完善的設備）所以在外國時成績儘管不錯，回國後便不能繼續努力，過了幾年便成了落武的學者！這是怎樣可惜的事情！所以教育當局不但要注意如何選派留學生，更要注意如何使已回國的留學生繼續研究，常久服務社會，如何使我們在學術上能獨立。如果照我們所說，一方面減輕教授的担負，使他們有研究的機會，一方面寬籌經費，增添設備。以我國人士的聰敏好學，一二十年之內，吾國的學術必能趕上歐美，超越日本，到那時選派國外留學生自非必須了。

政治與經濟上的海南島

南 溟

數月來，國人在各種出版物上討論得最熱鬧的題目，恐怕要算海南島了。

從歷史上看起來，海南島或瓊崖是往往被人輕視的。漢時賈捐之有「議能珠崖」。唐的李德裕，宋的蘇東坡，都是海南人很尊崇的人物，直在現在還且修祠紀念，可是兩者都以爲海南島乃鬼魅之地。德裕在其詩裏，有「崖州在

何處；生度鬼門關」的句子，東坡在其到昌化的謝表裏也說：「子孫痛哭於江邊，以爲死別；魍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清代雍正乾隆年間，何絳在其平黎立縣議中，還以爲「得其地不足以益國家分毫之賦，得其人不足以當一物之用」。這不過是隨便的舉了幾個例子，然而瓊崖之被了輕視已可概見。

自安南與台灣喪失之後，通商對於海南島又不斷的垂涎窺伺，國人始逐漸的感覺到海南島的重要。清末曾紀澤與張之洞都主張開闢道路，以爲建設的張本。前者大概是從海南島在國際地位上的重要來看，而後者却因了兩廣總督的地位而加以注意。民國以後，政府與地方人士都屢有改省的提議。西南軍政府時代，曾派殷汝蟻彭程萬等到島上調查實業，他們後來寫了一本「調查瓊崖實業報告書」。這可以說是中文方面之關於海南島的概況一本出版最先的著作。十八年前，陳銘樞先生任廣東南區善後委員時，又編了一本較爲詳細的海南島誌（神州國光社）。數年前，伍朝樞先生願意以衆立法院院長而不做，要做瓊崖特別區委員。這均可以說是國人對於海南島逐漸加以注意的表徵。去年北海事件發生後，有些日本人且公然提倡佔據海南島，於是愈引起我國政府與一般人民的注目。

此外商界與實業界以至學術界，對於海南島也逐漸的注意起來。宣統時代，在南洋的華僑中已有人注意到瓊崖的種植事業，並且有些人移植南洋各種著名植物於島上。

民國初年，南洋華僑商界與實業界曾集資開闢清瀾商埠。後來因爲歐戰發生，南洋商業大受影響，股本不能收，開闢商埠的工作也因之而停止。這一次花了十多萬塊錢，現

在所遺留的雖只有將要毀壞的一條長堤與一間貨倉，可是清瀾港之急要發展已深入一般人的腦海中。又關於種植方面，如椰子園的開闢與南洋著名植物如樹膠咖啡的移植，均有不少的效果。去年各報登載，從不談回原籍的朱子文先生也跑到海南島探訪原籍與考察實業。至於學術團體如廣州嶺南大學的自然博物院與社會調查所，年來常常派人到島上調查動植物與人民情況。此外又如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以及好多大學也逐漸的注意到海南島的各種物產。

海南島之所以被國內外的人們所注意，主要的可以說是因爲牠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關於政治方面，而尤其是軍事方面，海南島是中國南方的門戶。去年十月三十日上海華美晚報，譯日文世界智識日人石丸藤太郎的「從軍事上觀察海南島」一文，其中有數段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願意摘錄於下：

余每次過中國南海，無論從東至西或從西至東，一面仰望海南島之最高峯五指山，一面即思及此島與我國第三生命線有密切之關係也。……海南島不僅對中國南部有關係，而在日本之南進論中尤負有重大之任務。

海南島爲對兩廣作戰之根據地，有軍事上之重要價

值。此次北海事件的發生，我南遣支隊即以該島爲根據地。海南島對兩廣之地位，好比兩廣爲輕氣球之氣囊，海南島爲氣球之吊籠。中間有雷州半島如氣球之頸部，即吊籠網，氣球由吊籠網捲縱，則以該島爲根據地，正好牽制兩廣也。

若日本能以海南島之榆林港爲一大軍港，可由日軍使用，短期內以優秀之艦隊集中於該港，則可牽制中國南海，減去香港軍事上的價值，折服薩伊港之法國艦隊，控制美國優秀艦隊航程，能如此，則南海之海權可落於日本之手，日本即爲南洋之主人翁矣。……否則日本人民若忘却海南島，則一般南進政策論不啻爲空中樓閣。

以海南島爲根據，一方面可以牽制華南，一方面又可以控制南洋，日本人因之而當作他們的第三生命線，我不知我們中國人看了這數段話之後要作何種感想。我個人以爲，假使日本人能說海南島是他們的第三生命線，我們可以說海南島是我們的唯一生命線。自台灣與安南喪失之後，我們好像已失了兩手；假使海南而也被人佔據，那就等於殺害我們的生命。

而且自東四省被佔以後，華北的形勢岌岌可危，華南

的地位愈形重要。假使華北有了嚴重事件發生，則在嚴重時期所需要的一切供給，不能不依賴於華南。可是華南本身，直接上是與南洋各處有關係，間接上是與西洋各國有關係。海南島是我們與南洋和西洋的交通航程上的關鍵，我們在非常時期，好多必須用品既仍要依賴西洋，而在經濟上又有不能不仰給於南洋的。南洋有千萬華僑，他們不但執南洋經濟的權柄，就是在華南的經濟上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比方廣東的財富，根本就是華僑的財富。華僑在過去對於革命與抗敵上既佔了重要的位置，那麼今後的非常時期中所需要於華僑的是很顯明的。假使海南島被了敵人佔據，則中國的交迎不但與直接的南洋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且與間接的西洋也受了影響。

至於海南島本身在經濟方面的重要也很顯明。海南四而環海，漁鹽之利至爲豐富。廣東湖南各處的鹽，有了不少是來自海南島。現在島上的鹽場大致是在陵水的三亞一隅，假使沿海各處都能利用起來，不但可以抵抗安南暹羅各處的鹽的輸入，且可以供給內地其他各處。漁利的豐富更不待說。所可惜者是捕魚的方法太不講究，卒使豐富的漁利每爲外人所侵佔。又島中森林很多，祇以交通不便與其他的原因，至今尚很少利用。海南島孤懸海中，風勢很

烈，故所產樹木，性堅硬而耐久。如石枳，苦枳，坡榴，荔枝，胭脂等木，均有千年不朽之稱。他如沉香伽楠，尤爲島上的特產。又因爲氣候的關係，農產方面不但種類很多，而且年間收穫的次數也較多。從前邱溶曾說過：「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此外有好多用途很廣的植物如椰子之類，是爲國內各處所沒有的。又南洋一帶的各種名產如樹膠咖啡之類，均可以移植於島中。假使國人能夠努力發展，則瓊崖在經濟的地位上必更爲重要。

上面是從海南島的特殊的地理與豐富的物產，以說明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重要。至於海南島的民衆，在政治與經濟上，也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據史籍所載，漢族之移居島上最多的時候，是在異族征服中國的時候。所以元初與清初，島上的人口都增加得特別多。因此之故，反抗異族的心理很爲厲害，廣東東莞鄧淳的「嶺南叢述」裏，曾錄「廣語」：「瓊人不仕元」條云：

宋末瓊州人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曾從安撫趙興路拒元兵於白沙口，皆被執，不屈以死，於是終元之世，郡中無登進士者。明興，才賢大起，文莊忠介，于奇句有光。

到了明亡後，瓊崖人之不願仕清者也很多，所以有清一代

在政治的舞台上幾乎沒有瓊崖人的地位。直到民國以來，情形始稍爲變更。

漢族之所以南移海南島，在政治上看起來，固多因反抗異族的統治，在經濟上看起來，可以說是開源闢土的先鋒。又海南島是人們所目爲炎熱瘴癘之地，這些遷居於島上的人們逐漸適應於這種環境之後，又多變爲開闢南洋的各處先鋒。比方，在暹羅北部，西部，與東部好多地方，一般華僑從前因爲水土不服，難於居住，可是來自海南島的僑胞多能處之泰然。等到後者居住過相當的時期與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之後，別的僑胞才慢慢的增加起來。

國人對於海南島從來沒有這樣的注意過，從來也沒有這樣的熱烈討論過；我們希望今後能從注意與討論而進一步的去作實際政治（軍事在內）與經濟的建設工作。不過在努力提倡這種建設工作的時候，我們尤希望政府與地方人士不要忽略了治安與教育這兩個問題。

海南島在歷史上的大患是黎患。自民國四五年後，軍隊橫行，土匪猖獗；近數年來，大股土匪雖少有發生，然而打劫村宅，還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駐軍七八里以內的地方，一夜之間，也可以有劫案數起。治安不良，人民是無從安居樂業的。我有一位朋友有了一個很好的椰子

圍在藤橋，因為治安不良，自己既不敢在園內居住，託與別人又恐管理不周而要虧本，他現在正在希望售給別人。又如一位華僑很熱心的在海南島種植樹膠，可是因為土匪太猖獗，連他的兒子也被打死，他只好放棄一切而跑去廣州養老。所以一般華僑一談起發展瓊崖實業總有戒心。

從量的方面看起來，海南島的學校並不算少。民國三年間，文昌一縣，有三百多間學校。可是在質的方面，却大有改良的必要。近年以來，好多在瓊崖讀過書的學生，

想升入各處辦理較好的學校，往往有了困難。海南島有了十三個縣，然而高中是最近纔有的。至於適合於地方性的職業或專科學校，完全沒有。這可以說是對於將來各種建設所需要的人才方面有很大的關係。

總之，治安是各種建設的先決問題，教育是各種建設的根本問題，假使政府與國人對於這兩個問題不注意，那麼政治與經濟的建設是不大容易下手的。

研究社會科學必須先有立場嗎？（通信）

陳之邁

適之先生：

人們一樣去說一堆糊塗話。

七月二日大公報「文藝」第三百五十六期，有一位「外行人」季英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論「詩壇的『豐災』」，從研究社會科學者的立場論中國的新詩，其中有一段說：

我對於詩，無論新詩或舊詩，都是絕對的外行。但是我是一個讀社會科學的人，看了這位研究社會科學者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之欠缺，不得不寫信同先生討論一下。

依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習氣來說，凡遇到一件事情要說幾句話的時候，總得先說明立場，只少的很籠統地說是惟心或者唯物。我要在這兒趕快說明：我是唯物的。以下論到詩，我不能離棄我的說話的立場。這立場很要緊。因為我生怕像專作糊塗詩的詩

現在中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的確有一種「習氣」，在未會收集事實——追論研究事實——之前，先去找一個立場，他們正如季英先生一樣，認為「這立場很要緊」，并且把它推而廣之，應用到一切事物之上，例如季英先生應用到新詩之上。我不問季英先生之論新詩是否精當——其實我

不過用他做個例子，但我認爲「研究社會科學得先有立場」的主張是絕對錯誤的。這種先有成見的人，根本便不配做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他們無論如何對社會科學不會有一絲一毫有價值的貢獻。研究社會科學是先用最客觀最公正的態度來仔細蒐集可靠的事實；這樣勤慎的事實蒐集本身便是最有價值的貢獻，因爲它能增加人類對於人類社會的智識。等到事實蒐集得到相當充分的時候，社會科學家可進一步的「研究」這些事實，「解釋」這些事實，尋覓個別事實間的關係，然後創爲一種學說；在創造學說的時候，他不但要完全根據於事實，并且要採取純粹客觀的態度。這樣他才可以說是對於社會科學有所貢獻。反之，如果這位自命爲研究科學的人，在未會蒐集事實之前，先有了一套的「立場」，等於在未蒐集事實之前先有了結論，在蒐集事實的時候，看到了可以用來擁護他的結論的事實便蒐集起來，看到了足以反駁他的結論的事實便擯棄不要，這個他憑空造作出來的結論及他所蒐集出來擁護他的結論的事實有什麼價值？偏頗之見是社會科學最大的敵人，倡說社會科學必有立場正是「助紂爲虐」，這種人根本便不配做社會科學家。

凡此都是稍通社會科學者最粗淺的常識，我之所以把

它寫了出來上讀清聽，是因為我國許多自命爲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偏對於上述荒謬之見聽得進去。一般有「立場」的社會科學家的先有立場再填事實的書籍也層出不窮供青年學子瀏覽。在作書的人這是最簡便的出產方法，因爲他根本不必用勤慎的工夫來蒐尋及分析事實；在看書的人這種偏激痛快之論也最容易了解。最可嘆的是這種互相偷懶走近路的人還要認定真有客觀態度的書籍爲「糊塗」。我真不懂爲什麼沒有立場，或先有事實才有立場的著作一定是糊塗的。「不是唯心便是唯物」主義是最幼稚的主張，正如小孩子看小說時認定天下不是忠臣便是奸臣一樣的可憐可笑。我不是提倡德國史家 Ranke 的主張，認定歷史——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只應平鋪直叙乾燥的事實，世界最著名的史家如 Gibbon, Macaulay, Treitschke 的著作儘有一貫的線索或偏頗之意見，但是我們要切實認清他們的線索或意見是畢生辛勤蒐集事實的結果，他們未嘗先有立場再填事實，他們也未嘗因爲立場而故意的把事實擯棄。如果我們的社會科學家連一點道理都不懂，而倡說如季英先生的主張，我們的社會科學是不會有前途的。

我這一點憤慨，高明以爲如何？

之邁。二六，七，三。

編輯後記

編者

△ 廣溝橋事件很少可以無條件地當爲地方事件解決的，我們須有大規模的準備。這次我們不能有所割讓，如此則又回到兩年前的局面了，那還了得！

們竊疑，漸着政治上變象大規模的貪污問題，這是非究出背後最高的主動人不可的！

△ 鄭林莊教授在「投機事業的限制」文中，告訴我們正常的投機交易應該是怎樣的。但這次上海紗交風潮，我

謝。南溟是一位社會學者的筆名。七月十八日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冊四元
平裝二冊二元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獨立評論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
|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 第七冊(第一五一期至一七五期) |
|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
|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 第九冊(第二〇一期至二二五期) |
|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 |

每冊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售價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編局總政郵部通交

種餘百三千二產物訪採
處餘百七千二點地查調
戶餘千六萬八號行入錄

中國通郵地方物產誌

計劃全國生產建設之基本資料
經營產銷販賣專業之參考寶典

本書由交通部郵政總局，就全國通郵地方，實地調查，彙編而成。蒐羅普遍，取材翔實，全書都五百萬言，依省分編，每編分為兩部份，一為物產調查，包有全國物產一農、畜、水產、林、礦、製造一六大類，凡二千三百餘種，將產地、產時、價目、數量、銷行地帶，逐項載列。一為工商行號調查，共二千七百餘處，八萬五千餘戶。經營業務，亦皆按類歸納，並載明所在地點。復於編首著有概說，將地理交通等，彙編呈領，綜貫敘述。並分插物產照片，共二百四十五幀，大都選取特產影印，足資參證。卷首印物產分佈圖六大幅，擇要核計，繪製顯明。卷末附載分類索引、地名索引、四角號碼索引、尋檢極便。此書不但可供生產者採購者運銷者之實際應用，且為研究國內產業狀況計劃全國生產建設之基本參考書。

行發館書印務商

購代可均局郵地各

三開本 布面精裝
一厚冊 定價十二元
特價八元四角
郵費掛號費三角○五
特價九月八日截止